

可选择的现代性

——哲学和社会理论中的技术转向

Alternative Modernity

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安德鲁·芬伯格 著

陆俊、严耕等 译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序言

第一章 导言：技术和自由

民主化的技术变革

待确定和公众干预

合法性和合理性

价值、文化和技术

结论

第一部分 恶托邦的启蒙

第二章 马尔库塞和技术批判：从恶托邦到互动

序言：作为理论优点的顽强

对进步的抗议

合理性和恶托邦

对技术社会的激进的批判

对技术的本体论批判

互动的变革战略

第三章 恶托邦和《启示录》：批判意识的产生

作为大众文化的批判

历史的终结

最后的人文主义者

正在消逝的共识

第二部分 技术和价值

第四章 再现的技术专家治国论：阿道尔诺、福柯和哈贝马斯

启蒙的辩证法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主题

从系统到组织

授权和共识的形成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技术代码

行动和共识的形成

待确定和操作的自主性

结论：再现的技术专家治国论

第五章 论人体实验：爱滋病和实验医学的危机

受控机体医学

关怀和治疗

对伦理规则的反叛

参与者的利益

医学实验的社会技术伦理学

科学和伦理学

第三部分 后现代技术

第六章 法国理论和后现代技术：从利奥塔到小型电传

- 破解现代之谜
- 叙事的危机
- 后现代语用学
- 后现代技术
- 社会存储器
- 代码的失落
- 结论：互动的展望

第七章 从信息到通讯：法国可视图文经验

- 信息还是通讯？
- 新媒体的兴起
- 代码的冲突
- 小型电传的社会构造
- 结论：通讯社会的未来

第四部分 多元文化的现代性

第八章 西田哲学中的现代性难题

- 现代性问题
- 经验和科学
- 地位的辩证法
- 文化的自我确定
- 希腊人或犹太人？
- 结论

第九章 可选择的现代性？玩日本文化的游戏

- 作为理性系统的游戏
- 游戏的规则
- 围棋之道：自主性和反思
- 无念：冲突的结构
- 被扰乱的模式
- 元-规则：礼仪或平等
- 意义的层次
- 唯美主义，东方与西方
- 文化的谱系
- 地位的文化
- 地位和可选择的现代性

第十章 结语：文化和现代性

- 现代性的批判
- 混合的现实
- 设计的类型
- 从统一到多样化

参考书目

后记

中文版序言

现代性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一方面，它显然是指现代科学技术、各种民主政体和城市化等事物的普遍完成。由此可见，建立在一种独特的技术系统扩展基础之上的现代性与传统是相对立的，并且处处用一种合理的“技术文化”取而代之。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就只有一种现代性，它正逐渐地消去人类的文化记忆并在全世界扩散开来。现代性是一种全球现象，在它把其普遍的理性主义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之前，最先摧毁了欧洲的传统文化。我将把这称作是对现代性的技术性理解。它设想了一种决定论的技术哲学，根据这种哲学，社会是由技术进步来构造的，而技术进步本身又有赖于自然知识的进展。

但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还有另外一种关于现代性的文化观念，在这种观念中，现代性是西方传统，更明确地说是美国文化这一特殊传统的表达方式，爱因斯坦是现代的，但米老鼠也是现代的。那么，现代性概念的这两方面又如何相互联系呢？现代化真的是普遍性的吗？还是说它仅仅是西方化，美国化？或者说它是一种民族文化必须加以适当抵抗的文化帝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强国，技术的现代性观念也得以盛行。随着殖民主义的崩溃，世界所需要的似乎是用一种建立在仿效美国的技术合理性基础之上的现代文化快速地取代各种传统文化。共产主义世界抵抗这种分析，但只是用一种被称作共产主义的现代性来代替美国所提倡的现代性。实际上，两种立场是相似的：都是由技术决定论支撑的理性主义的普适论（universalism）。

在最近的 10 年间，有两件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尽管全世界的金融机构和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技术和政策机构继续把技术性的现代性作为一种普遍的目标来追求，但知识分子们已经日益开始根据第二种定义来看待现代性，把它当作一种伪装成普遍合理性，或是一种更加复杂变体的特殊文化。他们谴责那种我们从西方立场来界定的现代性，认为它是文化上的偏见并且缺乏普遍的意义。根据这些观点，技术的现代性被斥责为一种对极权主义的强迫接受，是对难以被具有安抚作用的社会机器整合的一切事物的拒绝。这已经引起了对普适论的各种挑战，从伊斯兰教新的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到五花八门的各种后现代哲学。

但是，这些挑战已被证明是没有成效的，因为它们仍然停留在一种如此抽象的层次上，因而它们对现代性真实基础的技术发展没有任何意义。人们难以放弃现代世界，因此，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后现代的批评家一样以向旧神的屈服而告终，原教旨主义者出没于军火市场上，而后现代派的人则总是把钥匙插进汽车的点火器。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如此深入地建立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之上，以至于各种激进的意识形态似乎都难以触及其根本。我们转而需要的是我称之为“技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这样的东西，这是一种深入各种技术系统生活内部的批判，因为正是这些技术系统构成了我们世界的基础并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当对现代性的纯粹否定的批判把一切事物当作既成事实时，技术批判理论却能够揭示各种未加探索的可能性。只有运用这样一种理论，我们才能开始破解这种既普遍又特殊的现代性悖论，同时又能开始破解理性和文化悖论。

《可选择的现代性》是我进行这种探索所写的 3 本书中的第二本。第一本书《技术批判理论》出版于 1991 年，最新的一本书《质问技术》则在 1999 年出版。在写这些书的 10 年间，许多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两种特别具有戏剧性的转变标志着本世纪的终结：苏联的崩溃和因特网的兴起。

80 年代晚期，当我正在准备这一系列书的第一本的时候，苏联正在逐渐地解体。而且，公开化（glasnost）似乎引发了各种意义深远的、积极的发展，在苏联导致了一种革新的、更民主的社会主义。我曾以此来证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也许并不是现代技术社会惟一合理的体

制。至少可以希望有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形式能够代表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这种前景引发了对技术决定论的拒斥和对现代性既定模式局限性的反思。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希望并没有得以实现，至少就俄国而言情况远非如此。随着收入，甚至是预期寿命的下降，强盗式的资本主义和社会分裂反而弥漫开来。中国是否能够实现俄国所没有实现的东西，这有待考察。

在逐步完成本书写作的 10 年间，我还帮忙设计了第一个在线教育规划，它是由位于加州 La Jolla 的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于 1982 年发起的。在与赫伯特·马尔库塞一起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进行了数年的研究之后，我就迅速地投入到早期的计算机网络领域中去了，甚至在因特网大众化之前。不久，我就为一家大的计算机制造厂商——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主持了一个有关计算机通讯界面设计的项目。

从与一种正在发展的现代技术的这种密切联系中，我学到了另一种，也是更持久的关于可选择现代性的知识：计算机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由设备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用户的选择。他们并没有简单地把计算机当作一种给定的事物，而是以交往功能为目标重新为计算机制造者和计算机系统管理员确定方向，因为交往功能的重要性一直被长久地低估了。的确，网络行为的扩展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的计算机概念，并且以各种难以预料的方式正在改变社会交往的世界。

《可选择的现代性》吸取了当代历史的这些教训，描述了一个其中未来尚不确定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各种社会运动、不同的伦理和美学价值以及各种有差别的民族文化都能在影响现代性的定义方面占一席之地。为了支持这种非决定论的立场，我根据社会构成主义理论，在现代性的哲学反思和科技研究正在展开的领域间首先建立了联系。社会构成主义所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技术发展并不是宿命论式地由一种普遍的合理性来决定的，而是依赖于多种多样的社会因素。从这种观点来看，行动者与理性一样重要。我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各种现代性哲学的批判以及本书所涉及的具体研究上来了。

《可选择的现代性》认为，因为技术发展并不仅仅依赖于理性，而且还依赖于社会，因此，它应当像其他领域的社会行为一样实行民主化。我最新的著作《质问技术》对此持同样的观点，就技术的民主政治学性质作了详尽的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涉及到中国，在那里，各种重要的技术决定今天是由政府和商界的少数精英在没有大量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

现代技术正在改变中国，就像它早些时候改变了其发源地西方国家一样曾经改变了日本和俄国。但是，在这些事件中肯定存在着区别。中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家，它占世界人口的很大比例，因此不能在不破坏世界经济和生态的情况下简单地模仿西方。运输技术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中国将继续发展，但它必须开创一条新的不依赖于汽车的道路。一想到中国将有 500,000,000 辆福特和菲亚特牌汽车就令人不寒而栗，这一数字将等于美国汽车化的水平。

这难道说中国就注定要永远贫穷？完全不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富裕与正在改变的标准和价值有关。这些标准和价值已经有助于超越时间而适应于各种真正的限制：再拿汽车的例子来说，人们最想要的汽车在大小上已经根据油价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第一次石油震荡之后，我们美国人并不是仅仅倾向于更小的汽车，而且实际上开始认识到它们比我们过去所驾驶的庞然大物更优越。当油价跌落时，美国人又逐渐地重新发现了大车之美，现在，他们到处开的车比以前大两倍。同时，阿姆斯特丹、巴黎和纽约的许多居民尽管很富裕，但根本不以拥有一辆私车为荣。趣味上的这些变化证明了经济文化的易变性。中国也将以一种与其真正的发展可能性相适应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富裕模式。

那么，到下世纪，当中国富裕时，它将创造什么样的世界呢？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能够回答的。更重要的是理解对中国来说什么样的发展过程是最好的。而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着许多争论。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无疑忽视了大多数的细节，我也预先承认我的观点的种种缺陷。但是，中国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使得旁观者情不自禁地想说上几句。在我看来，中国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主流似乎仍然与那些在西方要么受到严厉的批评和质疑，要么完全抛弃了的西方模式的许多特征联系在一起，尚未开始追求一种有创造性的发展道路。相反，对各种西方模式的模仿却是蔚然成风，例如，各种使社会分裂并且破坏环境的宏大计划如果不是在美国和欧洲，那么在中国依然具有一定的魅力。

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对技术和社会的反思也许能够为中国提供一种更有选择性和批判性的观念。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们不仅考虑西方政府和公司的官方宣传，而且还考虑将对西方未来的形成作出贡献的各种批判的声音，那将肯定是有利的。否则，中国将以冒我们称之为“累赘”（white elephants）的风险而告终，成为过去正统观念的笨拙的牺牲品。

《可选择的现代性》的目标就是激发一种解放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社会的未来并不仅仅是现有基础之上的一种数量扩张。我们当然是从一般意义上了解这种思想的，但是，把这种普遍的知识运用到特殊的事例上却不那么容易。我们倾向于以数量标准来思考各种技术性的事物，如更强的计算能力，更多的电，更多的汽车和飞机等。而量到质的转折点却被忽视了，例如，正是不断增强的计算能力使得计算机从一种专业劳动的工具转变为一种消费者的技术。而从一种发展过程向另一种发展过程的最终转变事先是难以预料的。但是，因为迄今为止现代性的含义是根据技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渗透来确定的，因此，我们技术想象力中的这些可以理解的范围便成了社会理论中难以接受的界限。

“可选择的”现代性这一观念意味着可能性范围的扩展。本书考察了许多不同的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但最重要的是，它主张把更多的行动者包容在技术决策的过程之中。而行动者，我们的意思是指那些参与到技术网络之中的所有人，如工人、用户、技术进步副作用的受害者或受益者等。这些行动者中的每一个都有一种独特的发展观。他们的经验和主张构成了福柯所谓的“被抑制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这是一种从下面来揭示现实各个方面的知识，而这种现实只是朦朦胧胧地受到那些处于权威地位的人的关注。

让我用一个医学上的例子来说明这样一种在被抑制知识影响之下的进步。这是一个技术转移的案例，不是沿着人们所熟悉的方向——从西方到东方，而是沿着从东方到西方这一相反的方向。

西医很久以来一直视中医为前科学传统的一种无效的残存物。在美国，这种态度实际上排除了中医作为一种医术的合法地位。没有医生会推荐诸如草药治疗和针灸这样的服务，也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此理赔。然而，患者们却发现，某些中医疗法对各种西医难以应付的症状有疗效，如软组织损伤和慢性病的症状疗法。到 90 年代早期，对“替代医疗”（alternative medicine）的要求已经难以拒绝。这种要求导致 1992 年在国家卫生学会设立了替代医疗部门，很快，保险公司开始为某些中医疗法作理赔。1998 年，情况急转直下，《美国医学会学报》发表了关于替代医疗的专刊。这件事的寓意是简单的：专家们也有他们的成见和根深蒂固的传统，并且能够学会与具有更大量经验的普通大众交流。

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就是促进各种被抑制的知识与计划者和执行者的官方技术知识之间的交流。有一些迫切的原因促使中国技术系统进行这样的民主革新。首先，只要公民觉得难以提出和表达他们的看法，发展的代价和问题就难以估算。正因为如此，一个相对自由和充满活力的文明社会是必要的。苏联如今已经为受舆论所蒙蔽的工业化造成的各种生态灾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正是因为重要，因此，如果在基本的大众与那些对发展负责的人之间没有打开一条交流的通道，那么，找到一条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独创的道路将是不可能的。无论他们的意向如何，发展中国家中的一群孤立的技术统治精英只能模仿各种外国的模式，因为西方是其合法性的最终根源。只有全体人民丰富多样的互动才能创造出一种适合于中国的可选择的现代性。而中国也确实应该这样。

序言

本书论及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在哲学和文化领域中所出现的一种新的、激进的技术批判。根据他们与这一趋势的关系，我重新解释了几位理论家，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于尔根·哈贝马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几位重要的日本思想家。

为了避免仅是从总体上抽象地谈论技术，部分研究是以个案分析的形式进行的。全书 4 个部分各包含 1 篇论述 1 名哲学家的文章和另一篇关于文学、文化或技术等具体现象的文章，这些现象以实例说明了哲学讨论中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尽管本来打算使各章之间能够有效地相互映衬，但每章相对而言是独立的。

这些个案分析讨论了二战之后科幻小说中早期的核灾难景象、20 世纪 60 年代流行的间谍影片中的恶托邦（dystopian）主题、爱滋病对人体医学实验的影响、法国小型电传（Minitel）出人意料的成功以及川端康成（Yasunari Kawabata）的著名小说《围棋大师》所描述的那种日本人对现代化的反应。

在全部这些研究中，我的中心思想是，科技理性和文化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我从这种构成主义的（constructivist）前提一直论证到重塑我们周围技术世界的可能性。60 年代大众文化和政治中出现的那种技术恐惧症的意识形态低估了重新构造现代技术的潜力，而计算机的历史却最为清晰地体现了这种潜力。那些看似建立在稳固的技术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机构和制度，比如医学，实质上在其自身的结构中融入了各种价值，而且终究并不是十分稳固的。我认为，现代化本身就是经受剧烈变化的种种技术和文化因素的偶然结合。在各种可选择的现代性的出现过程中，美学、伦理学、文化可以和科技一道发挥作用。

虽然《可选择的现代性》一书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但在本书第二和第四章中，我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批判理论的传统现在必须被修改。我试图克服技术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僵硬的对立，对于这种对立，法兰克福学派也起了一些作用。同时，我不愿在后现代的潮起潮落中放弃全部的技术研究的批判传统。关于利奥塔的那篇文章解释了我对这种倾向有所保留的原因。最后有关日本的章节是想与新的多元文化论达成一致，在某种程度上这既避免了实证主义的普适论，也避免了民族相对主义。在此，我在通常是冲突的关于理性和文化的各种主张的妥协方面，得出了一些暂时的结论。

哲学和政治传统都需要从现代社会中技术重要性日益增长这个角度加以重新审视。这些文章给这项为人忽视了的工作开了个头。然而，我对技术关注的焦点是想把它重新置于人们对技术的批判性讨论之中，并不是为了使许多现代社会中同样重要的、近年来又开始受到世人瞩目的其他方面黯然无光。为了给这种讨论提供一个新思路，我这里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批判模式，它把文化解释学、技术社会学和伦理学研究结合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今天的当务之急。

这里收集的大多数文章都以以前的出版物为基础，并按本书需要做了很大改动。除第三章完全属于它那个时代而没有被完全更新外，其他文章都在必要处做了修改。这些文章的原文全部或部分地出现在以下地方：《技术专家治国论与反叛：间谍电影与社会批判》，载《泰勒士》，1970 年夏季卷；《历史的终结：核时代的科幻小说》，载《约翰·霍普金斯杂志》1977 年 3 月刊；《技术的偏见》，载 R·皮平、A·芬伯格和 C·韦拜尔等编辑的《马尔库塞：批判理论和乌托邦的承诺》（马萨诸塞州南哈得利：Bergin & Garvey 出版社，1987）；《计算机通讯（CMC）语用学用户指南》，载《符号学》1989 年 7 月刊；《从信息到通讯：法国图文实验》，载 M·李所编的《计算机通讯的由来》（伦敦，Harvester-Wheatsheaf 出版社，1992 年）；《论人体实验：绝症实验治疗中的利益与义务》，载《哲学论坛》1992 年春季刊；《

对技术的批评：从恶托邦到互动》，载 J·伯金纳和 T·卢克斯编《重现的马尔库塞》（劳伦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93 年）；《技术专家治国论论调的重现：关于对权力的批评》，载《探求》，1994 年春季刊；《玩日本文化的游戏：川端康成的〈围棋大师〉》，载《文化批评》1994 年秋季刊。

感谢以下的朋友、同事与我交流观点并帮助我形成了自己的见解：有坂阳子（Yoko Arisaka）、哈尔·巴伍德、凯瑟琳·伯叟、琼-玛丽·查顿、皮特·戴尔、杰拉尔德·多普尔特、安-玛丽·芬伯格、皮特·菲丁、马克·吉洛姆、琳达·哈拉希姆、路丝·墨菲斯、沙伦·赫尔塞尔、马丁·杰、嘉指信雄（Nobuo Kazashi）、道格拉斯·凯尔勒、伊拉纳·洛维、玛丽·马钱德、泰德·梅尔内楚克、大桥良介（Ryosuke Ohashi）、罗伯特·利宾、马克·波斯特、里查德·史密斯和莫顿·索比。

第一章 导言：技术和自由

民主化的技术变革

在数十年关于技术问题的公开论战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对技术的新的理解。辩论已经从生态学扩展到核能、医学和遗传工程，甚至以各种更不明显的方式，扩展到诸如人工智能和人类基因组计划等这些理论领域。

公众参与的直接结果是有些这样的讨论带来了种种重大的技术改进。例如，在 70 年代早期，当生育高峰的一代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待产妇女们要求改变助产术，并且有很多人加入了旨在促进自然分娩的组织。她们对她们常去的医院过分强调医疗技术提出质疑，她们的一些成果成了医院的工作程序，例如，减少了止痛药和麻醉剂的使用，而且允许丈夫或辅导者进入产房（Charles 等，1978）。在这个例子中，一种主要的技术制度——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医疗护理是技术性的——迫不得已地适应了公众要求。

但是有些公共干预并没有取得如此圆满的结局。大约在妇女们参加自然分娩运动的同时，公众越来越关心核工业的安全，以防现代的这种重要技术工程的崩溃。核能曾被认为能够使工业社会从对化石燃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但是 60 年代核工业的不安全设计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它不符合 70、80 年代的标准。在与随之而来的公众观点的正面交锋中，技术败下阵来（Morone 和 Woodhouse，1989）。今天，随着旧的核工厂主重新使用化石燃料，变革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我会详细地分析这些例子，但要点还是清楚的。首先，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泛化的技术为特征的新时代，这些技术以非常难以意料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其次，它关系到我们如何对待技术，因为，这也许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公众的参与正在开始对技术变革的形式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一本关于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形的具有哲学意蕴的书。

技术哲学正在逐渐地适应于技术政治学的出现。直到最近，它分化为大致两种相反的立场：我们被迫在两种情形中进行选择，或者非批判地接受有利于技术的主张，或者毫不妥协地抵抗技术的恶托邦的力量。这种二分反过来又取决于技术与技术进步的鼓吹者和反对者通常所共有的社会之间的明显区别。今天，这种区别已经瓦解。

对有些人而言，这种瓦解标志着历史的终结，标志着在对美丽新世界的后现代庆典中对异化的一切抵抗的崩溃，这个美丽新世界把人类和机器融化在一种新的总体性中；对另一些人而言，同样的变化在激烈的转变中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与海德格尔、阿道尔诺和埃鲁尔（Ellul）这样的对技术社会丧失了信心的人的恶托邦式的推测正相反。由此看来，用海德格尔的话说那就是我们被“框住”（enframed）了，但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了，因为当体制把我们拉进它的轨道时，它已经使自身暴露在各种新的抵抗形式面前。《可选择的现代性》反映了后一种态度，它表明，现代技术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坚不可摧的铁笼，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充满着问题但可以从内部加以改变。

正如我在第一部分所解释的那样，50、60 年代流行的恶托邦主义是最初的突破，它在美国为批判的技术政治学开辟了道路。因此，本书的每一章都对这种突破作出回答以试图理解在一个技术的时代中各种新的批判和介入（agency）条件。可想而知，我的结论是，技术与自由的和解的确是可能的，但不是在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技术文化的框架内。那种文化支撑着一种僵硬的等级制的技术秩序概念。在第二章中，我论证道，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能够从技术变革的逐渐民主化中产生。然而，技术政治学中的公众参与经常被看作是病态的、非理性的恐惧或希

望而被忽视，这种恐惧或希望在最好的情况下被看成是一种讨厌的东西，在最坏的情况下被看成是对进步的一种严重威胁。

对环境保护主义、反核运动、爱滋病患者的斗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的这种通常的反应暴露出一种令人惊讶的蒙昧。理解这些积极性需要改变对技术的习惯看法，本书的许多内容既从理论上，又通过事实的历史来为那种转变辩护。但是，我们能够有理由期待普遍的民主积极性，并最终伴有重大的社会-技术转变吗？在这篇导言的余下部分中，我将考察这个与这里收录的论文相关的问题。

待确定和公众干预

首先，我想简要地描述一下我最近的一本书《技术批判理论》（1991）的成果，它对技术研究中的几种最新趋势进行了反思。这本书试图建立三个主要论点：1，与决定论的观点或技术中立论不同，技术设计与社会有关；2，对技术设计不平等分布的社会影响助长了社会不公；3，至少在一些例子中公众对设备和系统设计的参与已经产生了影响。（这最后一点在本书第五和第七章中将进一步展开。）

这些论点为一种民主的技术变革理论构建了必要的基础。的确，如果上述论点都是错误的——即，如果技术是已经决定了的或是中立的，如果对设计过程的不平等介入毫无结果，或者如果没有建设性的公众参与的例子——那么，民主的技术变革观念将是无稽之谈。

解释我立场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运用待确定（underdetermination）观点，即科学哲学中所谓的迪昂-奎因（Duhem-Quine）原则。这个原则所指的是，从逻辑上讲，人们不可避免地缺乏选择一种具有竞争性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另一种理论的使人非信不可的理由。在技术领域，这种观点坚持认为技术原则不能自己决定设计。当然，依然是有些事情的确起作用而其他事情则不然：成功的设计并不违背技术原则。但是，常常有一些可能的设计，通过它们能达到同样的或相似的目的，对选谁弃谁而言，并没有什么确定的技术原因。因此，技术选择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对可选择事物的最终决定归根到底取决于它们与影响设计过程的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信仰之间的“适应性（fit）”（芬伯格，1992）。

显然，技术设计是许多参与者之间共同协调的结果，并不完全源自某个天才或纯粹实验室的合理的灵感。设计过程是这样一种空间，在其中，对发展技术感兴趣的各種社会行动者一开始就获得了发言的机会。业主、技术专家、消费者、政治领袖、政府官僚等等都是合格的行动者。他们的多样化保证了设计代表了多方面的利益。通过提供或控制资源，通过确定他们所需要的设备的目的，通过把它们纳入适合他们自己利益的现有的技术秩序，通过把新的方向强加给现有的技术手段，他们对技术设计施加着各自的影响。技术是这些行动者的社会表达方式。我的早期著作所依赖的这个论据，也是当前构成主义技术社会学和阿克塞尔·霍赖特（Axel Honneth）重建批判理论的核心，本书第四章将讨论这一问题。¹

我已经提出“技术代码”一词来描述反映了盛行于设计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和信仰的那些技术的特征。和文化本身一样，这些代码通常是看不见的，因为它们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例如，工具和工作场所按成年人的手和高度来设计并不是因为工人必定是成年人，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历史的某一时刻把儿童排除在工作过程之外，我们现在把设计结果当作理所当然而已。

在技术代码同时成为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文化上加以接受的特征的程度，它们也包含了多种技术目的基本确定性。电话、汽车、冰箱和许多日常用品在主流文化中有着清晰的、明确的定义：我们轻而易举地大体上知道它们是什么，因为我们是我们的社会的文化适应者。这些

¹ 关于构成主义的观点，参见 Bijker, Hughes 和 Pinch (1990) 以及 Bijker 和 Law (1992)。

标准技术的每一种新的例子都必须使其解释性的“代码”被像我们这样的人所认可和接受。构成主义者有时把这些代码的确立称为“黑箱化”（black boxing），因为一旦它的定义被普遍接受，人们就不会去问技术“之内”还有什么。

如果这一切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必需严肃地看待兰登·温勒（Langdon Winner, 1992）的建议：技术是形成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新的法规，与本来意义上的法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反映了特殊社会利益的技术代码决定了我们在哪儿和如何生活，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我们如何交往、娱乐、协调等等。随着技术成为我们生活越来越多的层面的中心，它的合法性权威也在增加。但是，如果技术变得如此强大，那么它必然应该受到和其他政治制度相同的民主标准的衡量。按这些标准，设计过程看来是过时的、不公正的。业主、军事官僚和技术专家的职业组织对技术设计具有比普通公民大得多的影响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决定了技术代码。我将在第四章中论述精英的“操纵自主权”这一问题。

这里，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并不认为现今的统治集团为追求其自身的利益而阻碍了技术进步。更准确地说，他们把进步导向了一个符合那些利益的特殊方向。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他们对技术实施着专制独裁。显而易见，在市场的作用下，他们代表了广泛的社会需求并且实现了许多重要的目标。然而，重要的是不要把这种回应与对技术的民主控制混为一谈。尽管丰富多彩的商品市场肯定是合乎需要的，但它们缺乏公共性质、讨论的环境和有意识的协作等我们与民主行为相联系的东西。除了像下面将讨论的法国可视图文（the French videotex）案例这样极少的例外，孤立的个体能够在市场上所做的是非常有限的。把这样一种制度的消费者称作“主权”（sovereignty）是对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着实际影响力的消费者的可怜的夸大之词。即使在国家调控的帮助下，他们通常也不能突破现代企业的财政力量和技术资源的森严壁垒。事实上，对技术决策控制的问题很少显现在市场关系中。因此，不管它们如何在其他方面引起反响，那些掌管我们技术命运的人在他们的与消费者的关系中，在再生产他们的技术力量中不会遇到什么严重的障碍。的确，他们保持那种力量的兴趣是一条刻在他们所有的技术决策中的底线，并使这些决策偏向于中心化和科层化的方向。因此，非民主的设计程序具有独立的成果，通过有影响力的行动者的努力，保持了他们的技术主动性和对他们所创造的制度的控制。

在我更早的著作中，我效仿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他们来说，生产流水线代表了由强势利益影响的设计偏见。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的降低技术含量（deskilling）的历史，在受机器控制的生产系统中达到顶点，表明了设计在为阶级结构提供一种客观基础中的基本作用。根据这个假设，异化就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追求效率，而是因为争夺管理权。这种情况明确说明，由于有影响力的参加者试图维护他们在他们所创造的系统中的技术自主权和控制权，非民主的设计程序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他们的保持那种力量的兴趣是他们所有的技术决策的基础，使得这些决策偏向中心化和等级制的方向。

尽管技术和管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最终的不平等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并没有被超越。相反，尽管劳动力的一些部分从新近的发展中明显地得到了好处，但其他部分却固着或落后于一种格局，这种格局有可能把一个阶级分裂的社会再次带入可以预见的未来，或许还强化了它所引起的冲突。在第六章涉及社会的计算机化时我将论述这些问题。

这里，我还将引入其他的例子，这些例子比这些传统的生产控制问题更能揭示民主所涉及到的事物。在第五和第七章中，我提供了医学和计算机设计的案例研究，这些案例表明，一些有特权的行动者用政治经济学并不普遍公认的方法阻碍了重要利益的表达。医学实验的技术代码仅仅从科学研究和工业产品测试方面对此进行了界定。那种代码为人体受试者提供了免遭私自利用的基本保护，但是它最终忽视了病患者参与实验的要求。法国可视图文是一个遍布全国的连接数百万免费终端（著名的小型电传）的计算机网络，它为获取信息而设计，但用户间彼此进行交流的旨趣却被忽视了。爱滋病患者是一种情况，网络用户是另一种情况，在每一种情况下，公共干涉都有效地改变了系统以符合曾被排斥的利益。如今，食品和药物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的规章和实验设计作为对一种新的方法的探索处于不断变化之

中，这种方法认可临终患者的要求。同样，在法国，当用户们“黑了”（hack）系统，并且引入设计者没有设计的新的通讯应用时，小型电传也被改造了。

这些经历揭示了设计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的盲点。它们进一步说明，在经受社会考验之前，技术系统不能被认为是已经完成的，这些考验把它们暴露在设计阶段排除在外的、广泛的公众力量和关注面前。这些例子至少说明的事实是，在有缺陷的技术系统产生过程之后，它们经历了重大的改变。随着新技术和对民主化设计的论证，这种观点被其他经验所证实。

合法性和合理性

技术变革的民主化意味着赋予那些缺乏财政、文化或政治资本的人们接近设计过程的权力。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因为非技术人员已经卷入其中，他们的参与将是有害的，民主化仅仅增加了他们的数量和种类而已。事实上，与有时所想的那样不同，技术的民主化并不阻碍进步，它也许还能有助于避免那些目前困扰着临床研究和核能的问题。同时，它将确保目前被低估的权利得以充分的体现，因为这些权利与对设计的集中化的、精英的控制相抵触，比如工人发挥他们技能的权利。假如精英控制对我们社会如此之多的方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那么，更加民主化的设计的长远意义将是极其重大的。

从典型意义上讲，民主的参与是被卷入局部问题或危机的积极分子的工作。这种狭隘的观念是不会令人惊讶的，因为技术问题通常仅仅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注意，他们直接受到技术问题的影响因此愿意花必要的时间形成唐纳·哈拉维（Donna Haraway, 1991）所说的那种“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在有些情况下，少数积极分子是在诸如邻居、种族或性别、嗜好或疾病之类的普通社会属性的基础上脱颖而出的，然后通过挑起技术争端来努力影响公共观点（Cambrosio 和 Limoges, 1991）。例如，爱滋病患者就抨击过规章规定的程序，要求开听证会并且商议变革。在另外的情形中，对设计过程的公共参与采取了我将称之为“再利用”（re-appropriations）的形式，即，通过创造性的应用来修改技术。法国可视图文系统的例子显示了用户这种凭经验（a posteriori）加以干涉的效力。

流行的常识依然阻碍着对技术社会这些民主潜力的探讨，因为它有下面 3 个理由：第一，中心化的集权管理是工业生产的一种“技术绝对命令”，如果它是成功的，那么每一个现代社会都必须予以尊重。第二，尽管各种反对团体也许有时是正确的，甚至与受职业偏见误导的专家们的主张正相反，但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知道他们的看法是否具备代表性。因此就没有特别的理由称他们的干涉是民主的。第三，技术领域的政治活动代表了一种从专家来之不易的自由到实施干涉的倒退，如果普通大众知道真正的代价，他们很可能会不赞成这种干涉。

与上述意见相反的支持技术革新的民主化的观点必须：第一，表明技术的民主化控制的可能性。第二，确立非正式的公共参与的合法性。并且第三，使公共参与与专业技术工作的合理性和自主性相协调。在这篇简短的导言中，我不能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这里收集的论文为思考提供了一些出发点。在本节中，我愿意为用这种观点来阅读这些论文提出一个框架。

第一，为了驳斥第一个理由，我们至少需要一种通过技术来实施权力的理论构架。（想了解更完整的论述，参见《技术批判理论》。）每一种技术都有一个操作者和对象，而且，特定的技术力量就在两种角色都由人类来承担的地方产生。例如，医疗和生产技术就是这种情况，更一般地讲，通过技术系统的选择而被强加的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情况。这种类型的权力对现代社会的组织来说极为重要，它必然要求管理，以使得它的成员在与复杂的技术系统的接触中行为相互协调。然而，重要的是，不能通过草率地把操作者和对象等同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方法来预先设定技术民主问题，好像技术结构决定了社会系统。可以选择技术精英主义或是民主，在一个不同阶级共同承担这样两种角色的系统和另一个两种角色分别由不同阶级承担的系统

统之间，也存在着选择。在后一种情况下，管理被选定并且是由那些服从系统的人用通常的民主方法来决定基本政策。这不是一种无关紧要的选择，在下一节中我将再论述这个问题。

第二，尽管有时难以断定一种技术论争的结果是否符合公共意愿，但有另一种观念认为对技术革新的公共参与在本质上是民主的。民主包括公民为了增加参与和发挥作用而改革政府、商业、教育和其他社会领域的程序的努力。这里，我同意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 1973）的主张，即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为发展人民的才能和力量提供机会。只要它们尊重公民权，任何形式的公共行为和参与都应该被看作是民主的并被认可。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生活被纳入到技术系统的框架内，对技术的公共干涉决定介入（agency）环境的例子会不断出现。如果介入有其自身的价值，那么它的增加可以以为呼唤某种技术争论和再利用民主提供一个基础，尽管事实上它们初看起来似乎不是政治的。

这样的行为预示了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的“合法性”将产生于各种类型的新的公共磋商之中。例如，在法国小型电传的例子中，用户不仅通过对系统进行重大的修改而在技术领域内发挥了不寻常的作用，而且他们还通过创建一个新的公共讨论的虚拟空间为其他许多人扩大了公共交流的领域，从而总体上直接增加了民主力量。² 这个例子以及许多其他例子表明，无论采取少数人抗议或是再利用的形式，技术政治学都不会如怀疑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与民主的共同体处于直接对立之中，反而实际上实现了重要的民主价值。

第三，然而，民主的价值并不是我们惟一关注的事物。我们还要知道公共干预是否有着无法接受的代价，并且是否减少了我们技术社会的效力。这使我们注意到技术中公共干预的合理性这一问题。

这个问题与当代重要的民主社会理论的研究之一，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有关，我在第四章中将考察这个问题。哈贝马斯（1984, 1987）用区分认知（cognitive）、规范（normative）和表达域（expressive spheres）的方法来定义现代性，以对应于事实、价值和情感。造成一个社会现代化的是表现在合理化过程中的这些领域之间的体制化的区别，合理化过程一方面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增进了政治的 and 个人的自由。这种区别显然受到公众技术参与的威胁，因为与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相比，人们较少去区分和在方法上去约束融合了价值和事实的政治观点和情境知识。哈贝马斯的理论因而可以为拒绝技术的民主化——作为一种与现代性主流背道而驰的倒退运动——提供基础。

然而，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哈贝马斯（1991a）提出了另一个重要概念，“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观念，作为民主的非正规的制度基础。公共领域和正规的民主是截然不同的，但又是民主化的政治生活相互依赖的方面。这种二元体制对技术的扩展提供了丰富公共生活的可能，为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交往理性”提供了进步的可能。环境保护主义可以被看成是这种新的“技术公共领域”的典范。这又是一种技术决策的待确定，它为公众干预留下了空间。

哈贝马斯强调共识（consensus）在合法性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他的理论的这一方面在技术政治学的情况中特别不足以令人相信。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权威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建立共识最有效的机制基础之上——由于决定论的发展观念而使技术选择神秘化了。政治化的技术完全是歧义（dissensus），而不是共识。我在后现代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著作中为这个论点找到了论据，我在第六章中将讨论他的著作。他的“谬误推论的合法化”（paralogic legitimation）概念为思考交往理性提供了一种替代的方法。

合理性问题也会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即担忧技术的政治化将破坏技术职业的自主性（Florman 1981）。这种担忧建立在一种对技术变革特有的幻想之上。成功的抗议或再利用改变了技术代码，这些代码所反映的利益在设计过程的更早的阶段是被排除在外的。随着这些新的利益在代码中的内化，它掩盖了它们在公共抗议中的根源。抗议浪潮淹没了已经遗忘的争论，技术专家重新回到了对他们自己的自主性的令人安慰的信念上，这看来已经被日常生活的技术

² 关于在爱滋病案例中对再利用的同样的说明，参见 Epstein（1991）。

工作环境所证实。今天，甚至在妇女们曾经努力要求改变程序的医院里，针对允许丈夫进入产房，是谁重新挑起有时是猛烈的抗议？有多少核工程师记得辐射曝光标准的来历（Caufield, 1989）？有多少建筑师知道安全门后面的楼层？³

那种认为技术是非政治的观点实际上正是过去抗议成功的一个令人误解的结果，作为不想要对其技术创新加以干涉的专业和公司的一种自卫反应，它在公众对技术的参与的每一个新的阶段都一再出现。但事实上，他们所要求的自主性很久以前就在更早期的争论中受到他们现在在保卫他们的传统中不自觉地认可的结果的阻碍。因此，不论技术专家的幻想如何，非正式的民主程序已经是设计过程一个内在的部分。

技术领域中的公共和专业统治的历史节律与库恩著名的革命性和常规性科学之间的区别相对应，然而也有重大的差异。随着它的专业化，自然科学在直接的公共观点和民主干预的表现变得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独立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成熟的科学独立于政治和文化，而是恰恰表明，成熟科学通过现成的行政渠道和科学家个人的观点而间接地对它起作用。然而，技术活动中全体居民持续不断的参与——只要作为技术系统的一种目的——产生了日益常新的情境知识，在一种技术领域发展的任何阶段，这些知识能够成为公共干预的基础。⁴

在这些例子中，社会的积极性影响了技术合理性，但并没有破坏它。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与它们的把政治转变为合理的专门术语的能力相比，技术行业的自主性更难以应付它们与政治的分离。在这种情形下，公共干预也许实际上通过使重大主题突现的方法增强了技术合理性，而在此之前，它与占据在设计过程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是相对立的。

价值、文化和技术

至此，上述论述已经在介入的民主价值基础上确立了斗争对设计的重要地位。但是，介入具有一种形式上的重要性。人们仍然能够问道，以什么名义介入以及为了什么更高的目的？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技术设计赋予介入，而不是赋予中心化的权力以特权，还会有人关心它吗（Robert Pippin, 1995）？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 1981）认为，超越自然的技术力量的持续扩展来源于传统的规范共识的崩溃和更新的生产效率，因为生产效率是现代社会惟一共有的价值。因此，以民主的名义对精英设计所提出的异议没有真正指明现代性的根本问题之所在，对满足日益增长的对物质财富的需要的技术力量来说，它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螺旋线。

我对这种对问题的诊断提出两点批评。

首先，即使麦金太尔所说的现代社会处于一条无止境的螺旋线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它在全体居民的需要是否只能够由一种独裁的技术系统来满足与或者一种可选择的民主系统是否是可能之间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区别。

显而易见，或是对健康和安全、时间、技能的或多或少的控制，或是为了行政程序的便利和公平，无论发生上述哪一种情况，都将有实质上不同的结果。《技术批判理论》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技术设计将有不同的发展。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关系上，这些区别甚至更加明显；情况常常是，一切发展中的经济都围绕着先进的技术手段而加以重新调整，这些手段使控制中心化并且为世界市场生产产品。各种有效的生存经济常常被破坏并且没有可行的可选择

³ 怀疑论式的读本当推 John Burke (1972) 对 19 世纪早期为轮船安全的斗争中普通锅炉规则的起源所作的出色研究。

⁴ 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在有些领域，例如在第五章讨论的医学实验中，这种区别必须用“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这样一个混合范畴来取代。然而，不考虑这里所做的具有战略意义上的区别是不成熟的：理论物理学和通用汽车公司都证明它持续的，即使是减弱了的有效性。

事物的地位。因此，现代化对本土的居民来说便有了灾难性的后果。的确，甚至绝大多数得到好处的个人都将关注这些事情，而且他们直接依赖于谁控制技术。

我的第二个反对的理由是，现代文化对取得规范共识而言缺乏任何资源这一点难道真的是正确的吗？事实上，共识就是常识，只是它的表现形式出乎意料因而被哲学家们所忽视，这些哲学家认为，就象早期议会制度或中世纪教会逝去的各种乌托邦一样，必须对法规或教条的一致同意采取推论的形式。今天，正相反，共识在不同的社会和技术代码中被具体化了（materialized）。在任何时候，我们都确实“知道”这些事情，诸如：南北战争中联邦的胜利是一件好事，巴黎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应该加以保护，医学应该服从于患者的利益，减少劳动成本在社会意义上比保护工人的技能更可取，等等。这些规范性的陈述不仅仅是判断，而且，例如，正如我将在第四章所认为的那样，它们是对教科书标准、分区制代码、职业规则、技术设计，总之，是对真正的现代生活基础的制度性的“授权”（delegated）。而这样的每一种价值既未建立，又没有被争论这一事实仅仅证明，我们正生活在现代世界，我们没有理由持草率的相对主义或对文化表示绝望。

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它表明，技术包含着美学、伦理和文化领域中规范共识的成果，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效率或用户第一主义者渴望获取的狂热。看不到这一点就等于接受实证主义要求表面价值的主张，并且夸大了前现代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无论是以批判的态度，还是以欢呼的态度对待这种立场，它都将对具体把握实际的社会生活形成阻碍。

因此，有必要扩展与技术决策有关的价值领域。这恰恰不是一个与民主相对的精英主义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文化领域，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体现在技术代码中。为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还不明确？为什么我们往往把现代技术看成“纯洁的”，并且把它与不同领域的价值加以比较？一种我将称之为“韦伯式的”技术观似乎这样支配了现代思想，我们只能非常困难地从这种现代思想中脱身。这种技术观认为，技术建立在与价值形成鲜明对照的因果作用的知识基础之上，而价值仅仅表达了主观偏好。即使伦理规范有其自身特殊的合理性，就象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但它们依然被安全地与技术相分开。

这种韦伯式的偏见本质上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它排除了完全不同的、建立在另一种技术体制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的可能性。本书有几章从不同的思想家，如马尔库塞、霍赖特、拉陶和哈拉维等出发论述对韦伯式立场的挑战。他们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对现代思维中价值和事实的截然分离，并且视技术与社会实践结构相关。技术不再体现纯粹的合理性，而是扎根于受价值支配的行动系统之中。从这个观点来看，作为政治批判和行动的一种可能的目的，技术秩序出现于它的偶然性之中。

第四部分关于日本的章节遇到类似的历史问题，接着前面关于伦理学和美学的讨论，要论证一种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的可选择的现代性的可能性。它们对韦伯主义观念所设想的非西方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令人反感的对比提出了挑战。二战之前，在日本哲学家西田（Kitaro Nishida）的著作中，那种设想就受到了质疑，我将在第八章中讨论。和马尔库塞一样，西田受到了黑格尔的强烈影响，他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说明，文化的可选择性出现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成就之中。

本书第九章继续这种论证，通过日本文学作品的一个例子，川端康成的《围棋大师》，探讨理性化与文化的关系。川端康成的小说以一场围棋锦标赛为例证涉及日本的现代化。比赛象征着旧日本与新日本之间的对抗。从构成主义的观点看，比赛是西方现代性文化特性的象征。小说从一步棋开始，和科学事实或技术装置一样，它看起来纯粹是理性的。但是那步棋能够从许多角度加以阐释——战略的，也可以是社会的、历史的和美学的，事实上，整部小说的内容都围绕这一步来展开。小说揭示了表现在那步棋中的现代化过程的偏见，并且总体上揭示了更大的合理性偏见。川端康成对西方合理性的虚假普遍性的挑战表明一种建立在某种具有日本文化价值特点基础之上的可选择的现代性的可能性。

结论

这篇导言已经说明，技术转变的民主化表现了包含在技术本质自身内的潜力。通过新的并且更加民主的程序使技术决策过程与美学的、伦理的规范和民族的特性相联结不是乌托邦。现代技术不仅展现了它们所构成的独特的世界所固有的可能性，而且还展现了与它们能够被改造成为之服务的其他世界相应的变化可能性（metapossibilities）。技术变革不仅仅按照由西方资本主义所遵循的连续统一体进步或退步，而且还包括不同连续统一体之间的运动。

随着要求从 20 世纪技术专家统治的传统中转变出来的后现代时代，这个计划将日益作为一项实际的任务而出现。我们唯有能使技术领域的问题具体化，那种转变才能成功。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发现，在一个技术社会中，生活和创造真正意味着什么。

第一部分 恶托邦的启蒙

第二章 马尔库塞和技术批判：从恶托邦到互动

“所要完成的任务不是保存过去，而是拯救过去的希望。”

—— 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1972，XV）

序言：作为理论优点的顽强

马克思认为任何仅仅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都是武断的。整个社会不能凭个别批评家的一时之兴来加以谴责，而必须以他们努力实现的价值来衡量。因此，马克思参照一种内在的标准来判断资本主义，即人们的没有满足的需要。这个论点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但一旦资本主义证明它自身能够提供商品，这个论点就不再贴切了。然而，个人的（满足了的）需要却使得既定的秩序合法化了。激进主义意味着不仅与那个体制的不足和匮乏相对抗，而且也恰恰针对它的成功。

那么，一旦社会满足了它的成员，能够从什么角度评判它呢？超出这一点来坚持激进的社会批判则需要花很多功夫。赫伯特·马尔库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 50、60 年代的“富裕”社会中，他面临着这种挑战并且努力重建批判的传统。这是不是固执地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也许是，但正如马尔库塞自己曾经写的那样：“顽强（是）哲学思想的真实品质”

（1968：143）。顽强意味着拒绝与社会轻易妥协，意味着把现实感维持在更长的时间维度、更深的张力、更高的期望和目标基础之上。

马尔库塞是从两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先，他相信，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和平、自由和幸福理想仍然提供了以此来衡量现存社会的标准。这些理想不仅仅是主观的，而且来源于自然本身。它们通过形成新的、表达尚未实现的人类潜能的需要，从而推动历史过程向前发展。

新的需要不是任意的，因为——这是马尔库塞答案的第二部分——发达工业制度没有实现的技术潜能为把它们具体化为历史的方案提供了基础。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社会能够“安抚”生存，但却有意地维持作为统治和不平等基础的竞争和暴力。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社会通过它的成就造成技术上的过时。正如他在晚年关于生态学的一次演说中所指出的：激进的政治斗争今天存在于“对陈腐的现实原则的生存反叛之中”（1992：37）。

本章中，我将探讨马尔库塞对技术问题的贡献，在过去的 30 年中，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注重把这一问题放到政治讨论的议事日程中来。在 60 年代，他写了他最有影响的著作。在本书第三章，我研究了这一时期科幻小说、电影和广告中大众恶托邦的根源。马尔库塞按照丰富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传统对这一新的精神状态作出了回答并有所贡献，自 30 年代，他就属于这个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使他能够把对社会的现实的恶托邦批判转变为激进反抗的基础。

然而，他没能详细阐述一种超越造反姿态、曾经激励过新左派的策略。形成这样一种策略今天也许是可能的，因为技术批判不再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攻击，在马尔库塞发表《单面人》的 1964 年曾是这样一种攻击，但它已经日益成为一种具体的实践事务。在本章论述过程中，

我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把激进批判传统与新的“互动主义”观点联系起来，本书最后的章节用具体的例子来论述这种观点。

对进步的抗议

是什么使得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如此不同于日常对进步背后的代价的抱怨？主要是因为这些抗议是保守的，并且主张有节制地运用技术，或者甚至主张倒退到前技术的社会状态。和马尔库塞一样，我们持有不同的立场。他认为，至今为止的进步都与统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涉及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本身。因此，解放不仅仅需要社会变革，还需要理性的彻底转变。他写道：“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实现一项特殊的历史规划的最后阶段，这个规划就是把对自然的体验、改造和组织仅仅当作统治的要素。随着这一规划的展开，它塑造了论说和行动、精神和物质文化的完整世界。在技术环境中，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个系统吞没或排斥了一切选择的余地。这个系统的生产力和发展潜力稳定了社会并且在统治的框架内控制技术进步。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合理性”（1964：XV-XVI）。

阿道尔诺和海德格尔的确持有相似的观点，但正是马尔库塞的著作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因为那些更早的开创者在 60 年代已经黯然失色，而且无论如何也引不起美国听众特别的兴趣。正是马尔库塞产生了极大的效果，结果是他对技术的激进批判对新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今天，他所抨击的许多矛盾现象被如此彻底地证实了，以至于他会对当代关于技术的讨论毫不生疏，比在 60 年代的环境中还要自在，那时，他的观点常被看成是非理性主义的而遭抵制。例如，马尔库塞会同意这样一个现在看来是很普通的观点：尽管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它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生活方式。他肯定会为我们失去对专门技术和进步的信心而喝彩。这些情况使得可能发生的关于技术主题的公共辩论像马尔库塞所希望的那样发展。

但是，最近从东方传来的消息似乎终止了这场尚未开始的辩论：如果事实上没有我们所知道的对资本主义的替代物，那么无论如何，技术就是命运，社会批判就如炼金术一样是过时的东西。用最近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就是，历史终结了。事实上，历史的状况正在好转，比我们所用的试图理解历史的各种理论的状况要好。尽管旧的关于进步的假设失败了，但没有新的同样令人信服的假设已经取代了它们。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各种事件作用的结果，尽管这些事件令人沮丧，但是它反映出的正是更深刻的现代性基础的问题，建设一个合理社会的规划问题。今天，那种规划正处于全面的危机之中——政治的、经济的和技术的。

以前，对理性天真的信念支持着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区别。现代性被说成是理性的，尤其强调它的认知基础——科学和技术——比任何更早的社会都优越。在实证主义看来，理性是普遍的，不受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对理性的怀疑或批评不仅仅是对现时代合法性的挑战，而且破坏了评价世界的惟一可以依赖的立场。

但是最近几年，这种合法性越来越令人怀疑，而且合理性也日益被解释为一种文化效应。今天，在上一代破碎了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幻想中，对科学和技术的新的社会阐释正活跃起来。传统，就其支持文化多样性以反对西方“虚假的普遍性”这一点来说，现在被认为是一种不确定的暂时中止（dubious reprieve）。在普遍的理性熔炉中已经失去其重要性的种族、宗教和性别之间的差异重新得以恢复。

要理解马尔库塞，我们必须从启蒙假设的这种令人吃惊的崩溃中进行抽象，并且让我们自己回到更早年代的思想中去，那时，理性实际上没有受到挑战。他的立场在与这些假设背景的

对比中显现出来，而且引发了像他自己一样的边缘思想家们对这些假设的少量的却必定是偏执的攻击。

合理性和恶托邦

旧的对理性信心的核心是相信人类控制着技术，几乎只有一些古怪的社会批评家持有这种信念。我将称这种同样的观点为技术工具论（the instrumental theory of technology），或简言之，工具主义（Borgman, 1984:9）。工具主义认为，技术是中性的，就像一种透明的溶剂，它不给它所服务的目标添加任何东西，仅仅加速目标的实现，或在更大的范围内、或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它们。因为技术是中性的，所以能够在纯粹理性的基础上，即效率上能够改进的基础上作出运用它的决定。

这个观点具有政治意义。合理性总是被认为是真正自由的交往的基础，只要从辩论和讨论中产生公共目标，人们就能轻松自如地合作。而我们在本书最后一章中看到，现代生活告诉我们，分享这些目标是多么的困难啊，但效率却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并且本身就服从于理性的一致性。而且随着对效率的关注蔓延到越来越多的领域，它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强制性的框架。作为有效手段总和的技术与理性建立了象征性的联系，并且技术的有效控制日益被认为是与社会合理化的规划相一致的。在一个技术社会，争论消失了，尽管还有对代表现代世界目标的未定的争论，共识能够超越手段。至少这将有助于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争论的领域被纳入到易操纵的范围之内。工具主义者因而对发达社会中的全面和解——社会整合——抱有希望。

这种形式的建议听起来无伤大雅，但也暴露出了局限性。它描述了技术专家治国论，即，政治秩序取决于专家而非公民，这种思想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但只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它才成为现存国家的合法性。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无能为力了，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宣称的正在兴起的“伟大社会”，由于货运上成功，就要合法化了。在这一点上，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批判——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就曾表达过——就从为数不多的文学知识分子的幻想变成了一个大众文化现象。

在描述极其理性化社会中的恐怖生活的故事里，科幻小说长期以来就表达了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恐惧。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或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样的“恶托邦”（负面的乌托邦）中，人类精神的命运在一个以科学启蒙为基础的世界中变得生死攸关。问题完全不是科学发现的毁灭性滥用，而是一个科学化世界中个体性的命运。对现代大众社会的成功整合激起了对已失去的自由的乡愁式的回眸。这些故事中的个人主义英雄代表着不可避免地倒在理性大军脚下的人类价值。

从这种恶托邦的立场看，技术进步恰恰不是价值中立的效率提高，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的观点，我将把海德格尔提出的观点称为技术本质论（substantive theories of technology）。他们反对技术是中性的这种论点，认为技术实际上是一种体现其自身特殊价值的鲜明文化框架。这种批判形成了马尔库塞著作的基础，这也许并非偶然，因为海德格尔曾是马尔库塞的老师。的确，海德格尔的一些话听起来与马尔库塞没有什么区别，比如下面这段话：“现代技术的突出特点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它根本上不再仅仅是‘工具’，不再仅仅处于为他者‘服务’的地位，而是相反……具有鲜明的统治特征”（转引自 Zimmerman 1990: 214）。

本质批判的基础各不相同。有些社会批评家认为，诸如此类的技术被它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或抽象观念所误导；另一些人则认为，技术在其自身的领域是中性的，但在诸如家庭或公共领域这些本质上非工具的范围则被扭曲了。海德格尔、雅克·埃鲁尔（Jacques Ellul）和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是第一种观点的最杰出代表。那些女权主义者加入到他们的行列

中来了，女权主义者批评现代技术天生是一种“男权主义的”事业。于尔根·哈贝马斯是第二种观点的最著名的捍卫者，我们将在第四章来谈他的著作。

所有这些批评家都一致认为，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迄今为止由传统和人类价值加以调控的行为，既然这样，那么相比较而言，它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就微乎其微。与效率标准在作出这些选择中发挥作用这一事实相比，在效率原则下所作的选择的内容就更不具重要性。它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仅只是旧社会的现代版本。

从海德格尔那里，我们可以很好地领略这些不同理论的风采。例如，让我们考察一下他所论述的关于传统工具与现代技术之间的区别。工具主义认为，手段对欲望本身不起作用，而是对它所执行任务的步骤、规模和条件有作用。但是超出某一点，步骤、规模和条件的变化都会把手段转变为与它们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无关的事物。海德格尔称此为现代技术的“巨型症（giganticism）”（Heidegger, 1977: 135）。

一个马路纵横的城市与旧的前汽车时代的市中心不是同一个空间。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了技术中性论的局限。当然，汽车与司机的目的地无关，但它毕竟不能与行驶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等先决条件无关。提供这些先决条件，把田地和周围地区改造为路基，这实际上重新塑造了世界，这其中就选择了各种目的地。这个例子具有典型性：现代社会中我们所说的“效率”的提高恰恰是运用了具有如此巨大效果的工具（Berman, 1982:166-168）。⁵ 我们的世界在它们的掌握之中，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被框住了”。

事实上，前现代的制造物偶尔也是“巨大的”，例如，中世纪晚期的建筑。但它们被创建时通常就保存着自然形态，而且它们的社会影响更多地依赖于象征性的力量而不是技术力量。今天，我们的机器的彻底的渗透性已经不可能把它们的影响确定在特殊的运用上。那些原先明确打算用来实现预先目的的设备已经变得如此具有侵略性，以至于它们破坏了自然景观并且把它们自己的要求强加在它们被造出来为之服务的人类身上。过去的伟大传统能够在哥特式大教堂的附近繁荣兴旺，而不是在高速公路经过的地方。

总之，现代工具已经“内在地”改变了世界，而不受它们所为之服务的目的的制约。我们的工具已经成了一种生活环境，渐渐地，我们被融合进我们所创造的器械之中，并且服务于它的节律和要求。海德格尔把这叫做时代的“风险”（peril）。

对技术社会的激进的批判

恶托邦的文学作品和对技术的本质批判开创了一个文化空间，今天我们在这个空间内思考现代性的意义和本质。我们从这些批判中认识到，技术并不仅仅是扩展我们能力的工具，我们处在机器的之中。这种认识是理解当代文化的必要条件。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算马克思本人，对这个问题显得无能为力。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激进的社会批判并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尖锐并且最终激发了对其所谴责的恶托邦世界的反抗。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在单面社会中获得了真正的欢迎，法兰克福学派指责这个社会已经几乎使批判变得不可能了。美国和德国的新左派都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恶托邦观念的影响。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之后不久，在德勒兹（Deleuze）和福柯的作品中，法国的社会理论也出现了恶托邦式的转向，而且以这种形式对七八十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尽管受到本质批判的强烈影响，但马尔库塞还是反对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宿命的顺从。更准确地说，他坚持认为技术统治是一个政治问题。马尔库塞与许多新左派都持的这种态度标志着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决裂。马克思主义者从前曾经抨击资本主义的低效率，如今，新的激

⁵ 请注意，“巨型症”（giganticism）不仅仅是一个物理规模问题，而且更重要地是活动范围和影响问题。因此，按海德格尔的理解，生物技术是巨大的，尽管它是在微观水平上发生作用。

进分子抵制成功追求效率的独裁主义的结果。他们认为，现代社会被卷入到一场肮脏的交易之中：它们的不断增强的秩序和繁荣总是伴随着来自上面的新的控制形式。这种控制不是依靠身份、财富、年龄或性别等传统的社会差别，而是运用了管理、行政、培训、治疗、医学广告等等社会技术。新的权力系统来自于把其人类对象征服了的这些技术的操纵者的力量。

效率与权力的这种关联对马尔库塞而言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为一种对合性理的恶托邦批判。⁶ 这反过来又促使他回到伟大的合理化理论家韦伯的著作上来，尽管韦伯的现代性概念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在粉碎社会主义的希望方面，他比谁做得都多。

韦伯从市场、正式的法律、民主、官僚体制和技术的普及这些方面给现代性下定义。他把这些称为“合理化的”的制度，以与传统的制度相对照，因为它们具有某些我们通常与理性相联系的性质：它们看起来更抽象，更确切，更不带有价值和情境色彩，有更好的科学知识基础，而且更有效率。

韦伯的合理化概念是含糊不清的。一方面，他常常这样写作，好象现代社会事实上比以前的社会更合理。这是一种启蒙运动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现代方法比传统方法好，现代个人摆脱了他们古代前辈的偏见。但是另一方面，韦伯似乎说过，“真正的”合理性更贴近于社会学家的现代社会的“理想类型”，而不是现代社会肮脏的现实（韦伯，1949：39）。而且他担心，官僚政治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发展日益变得仪式化。韦伯断言，我们并不是朝向启蒙，而是朝向被神秘的灾变周期性打断的“僵化的机械性（mechanized petrification）”（韦伯，1958：182）。

韦伯发现了一种有影响的社会学传统，在这种传统中，合理性观点继续起着核心作用，但是失去了其批判锋芒。例如，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著作中，随着科学和民主取代了传统的信仰形式，历史在“普遍的”价值取代以往“特殊的”价值中达到顶点（帕森斯，1964：61-63）。在后-殖民时代，现代化理论扩大了这种讨论的范围，兴高采烈地预言世界范围内向西方风格的现代性的过渡。在本书第四部分，我将讨论日本对这些种族中心主义论断的批判，和苏联的挑战一起，它代表了本世纪惟一重要的对正统现代化概念的替代。⁷ 随着这些替代的失败，正统观念，经过相应修改以适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西方世界政治的常识和东方充满热情的希望。

把“合理性”强调为现代性最突出的特性，这意味着把传统贬损为“不合理”。当然，不平等和不公正几乎还没有消失，但自由主义者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在起因问题上与恶托邦的激进分子决裂了：这是现代社会不完善的合理化，还是已经出现的这种合理化的结果？马尔库塞赞同后一种观点，并且在讨论过程中呼吁注意已经被大量遗忘的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他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批判。

传统社会并没有隐蔽权力实施的真实结果，即它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平等，而对不平等的偏袒是它的特权。但现代形式上的合理性在中立的外表下服务于类似的社会目的。统治者不再随意决定命运。而代之以用纯粹客观的标准，如考核、听证会，或测量和个体分类等。市场不认人，只认商品和货币。科学和技术发现依赖于客观的证明而不是主观的偏爱。然而这些体制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在这个社会等级制度中，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取代了传统的秩序。

正是马克思第一个发现了如何对这个新的等级制度创立一种有效的批判。他认为，市场不仅仅是供需者之间中立的仲裁人，市场的普遍化使社会屈服于一种新型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对市场适用的事物同样适用于劳动过程，虽然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接受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论述的内容已经更加困难。

⁶ 福柯对恶托邦合理性的批判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异化是一种更普遍的文化主题的变异，是“规训”（disciplinary）社会的出现。在这个社会，科学和技术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而且在新的社会等级制形式的制度化中发挥着作用（福柯，1977：221）。想了解福柯和马尔库塞的比较，参见芬伯格，1991：第4章。

⁷ 想了解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参见Amin，1989年。

当早期制造业中所有权和管理与劳动本身相分离时，开始出现了对外部监督。资本主义开始赋予生产以新的形式以便加强它对工人的控制。最终通过降低劳动的技术含量（deskilling）而使纪律得以加强，即，用每个只承担整个工作的一小部分的非熟练工人取代了掌握传统工艺的熟练工人。工业时代，控制的功能被转到机器方面，机器的设计由预先存在的劳动和权力分工决定。通过使观念和实施之间的分离具体化，机械化最终完善了至今仍是笨拙的、个人化的工业训练技术。马尔库塞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技术系统并不是普遍的，而是反映了特殊阶级利益。他写道，“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特定社会的社会理性，并且其结构是能够加以改变的”（马尔库塞，1968：225）。

在韦伯的理性化理论中能够看到这些社会起源的踪迹。韦伯从未对效率标准从技术到行政的扩展提出疑问。他没有想到，人类关系的合理化也许可以不通过技术控制。在这点上，他不加批评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观点。马尔库塞总结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高度物质的（material）、历史的事实因此变为……合理的经济活动自身的……一种形式上的结构要素”（马尔库塞，1968：212）。韦伯把整个统治系统偷偷地带进了他的合理性定义中。今天，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社会把同样的神秘化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合理化的领域，包括休闲、教育、性生活等等。

这个论述使我们超越了马克思，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因为技术无能而应受到批判。马克思认为，因为私有财产无论对生产者个人愿望的满足还是对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一种阻碍，资本主义的一般目的与提高经济生产率的技术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能够突出技术思考的重要性，这种思考指望可以取得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就是，进一步的技术增长也会达到它的一般目的。

马尔库塞总结道，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已经不灵了。技术的合理性不再揭示资本主义的不足，相反，却使得这个社会合法化。“论域”，公共的、甚至最后连私人的语言和思想，不断把自己限制在提出和解决技术问题范围内。“当工艺学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它约束了整个文化，它设计了一种历史的总体性——一种‘世界’”（马尔库塞，1964：154）。技术的普遍化消弱了对立意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范性也因此受到关注，它不能够继续隐藏在生产力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要求后面。

这里，我们对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潜在的实证主义”的批评和他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理论的根源有所察觉。现代社会受到技术上合理的工具的无限扩张的威胁，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过程，因为它抹杀了人类经验的规范性和技术性之间一切重要的区别。但是，我们在第四章中将看到，与马尔库塞不同，哈贝马斯实际上不是科学和技术的批评家，而是仅仅反对把科学技术的制度化作为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他认为，即使科学是正确的并且技术是中立的，技术的这种总体化也是不合理的（哈贝马斯，1970）。⁸

马尔库塞本人比这种观点要走得更远。他认为，科学和技术，甚至一切形式上合理的、被假定为中性的现代社会结构，在政治上恰恰不是在应用过程中，从本质上讲是在其自身中，被资本主义加于其上的特殊需要所误导。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最激进的批判预示了当前的女权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并且证明，当今重新关注他的思想是有道理的。

⁸ 哈贝马斯关于技术中立性的观点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是当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时，所表现出来的工具主义偏见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一些批判理论家跟着他一起迅速从马尔库塞要求改造科学-技术合理性的大胆呼吁中撤退下来。第7章所叙述的社会构成主义最近的研究，消除了任何承认科技合理性的自主性的理由，从而最终为这个主题划上了句号。

对技术的本体论批判

我将把马尔库塞技术批判的第二部分称为“本体论的”，意思是说它涉及批判对象的本质。就当前的技术产生于已经在其中发展了数千年阶级社会的特殊环境这一点而言，那种本质是文明化的。

在这种批判中，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因而不仅是一个认识论范畴，而且也是一个文明范畴。由现代社会及其技术构成的结合体，并不比哥特式建筑或埃及金字塔具有更多的中立性，而是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文明——西方文明，“理性”的文明化——的价值。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明确表达和评价这些价值，并在此过程中揭露理性自身的偏见。正是在这个方面，马尔库塞提出了他的最有争议的观点，即主张在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先验的联系。根据这个观点，“科学，凭借它自身的方法和概念，已经设计和促进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对自然的统治与对人的统治联结在一起”（马尔库塞，1964：166）。

这里，马尔库塞对把科学当作无偏见知识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恰恰相反，知识的主体必须首先被看成是一种积极的存在物，因而是一种被制约于本质上代表各自利益的现实的存在物。从这个观点来看，主体性和与科学-技术知识相关的公正性是作为一种藏而不露的、与存在相关的意识形态出现的。因此，科学产生技术不是偶然的，不是简单地如培根所主张的是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更正确的说法是，如果科学对自然产生了作用，是因为一种先验的力量倾向性，这种力量带有科学的最基本的方法和概念的特色。说到底，这不是知识的力量，而是某种知识形式的力量。在一般概念和规律下的形式分类，因果推理，尤其是量化，是工具性控制中旨趣的认识论表达，这种控制形成了追求科学知识的基础。

这是马尔库塞立场的一个方面，并通过引用胡塞尔、海德格尔、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而得以详细论证。然而，对马尔库塞来说，仅仅指出科学和工具性控制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种不充分的批判。例如，哈贝马斯表明，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理论能够在对一切政治内容的完全抽象中被构造出来。科学能够被建立在人类工具旨趣的基础之上，而实际上又不推翻客观性的“偶像”，因为，就象康德早就证明的那样，这样的一般属性能够被看作“好象”它们普遍适用于一切实际的目的。的确，如果科学代表了人类对控制的旨趣，那么对一切特殊的旨趣来说，也就是说，对一切我们所知的真正历史地存在的旨趣来说，它是公正和中立的。那么，在消除偏见方面，人们还能再问些什么呢？

马尔库塞的目的并不限于证明科学与对自然的工具性控制相关，而是想进一步表明，科学注定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服务。这个引起争论的观点来源于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的著名的《启蒙的辩证法》。他们认为，理性的结构从本质上讲带有它所属的阶级社会传统的烙印。

具有独立功能的理性产生于匮乏条件下的生存斗争中。随着原始生活遗落在对环境的越来越大的能力的追求后面，人与自然相分离，并且伴之以理性、想象和情感之间的分裂。能力的代价首先是个人自身内在冲动的压抑，其次是一个个其他冲动的压抑。在这种情形下，那些不是服务于直接生存需要的功能被划归到非现实的幻想领域，并且不适当地与理性的严肃和效率相对比。这是一个作为统治的启蒙出现的阶段，与此相关，乌托邦的理想领域，这一最不可能的理想重新回到与自然统一体中。

在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建立理论的实践理性的现象学设想影响下，马尔库塞发展了这种对启蒙的批判。根据现象学，理论上纯化的科学概念在生活世界——日常实践和知觉的生活世界中

有其根源。马尔库塞补充道，科学概念不仅仅建立在日常实践之上，它们还在它们产生的普通条件上覆盖了一片理论的天空，包括缩小在无情的生存斗争由阶级冲突而产生的知觉。技术也被深深地打上了这些起源的烙印，并发挥了和科学一样的作用。通过这些思考，马尔库塞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合理性全面的社会批判和对发达社会由技术构成的生活方式的具体分析之间建立了联系。

与这种批判并进，马尔库塞发展了一种否定的、与现实世界相反的艺术理论，在这个相反的世界中，文明原则中已经消逝的东西在想象中得以保存。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的“肯定的”功能。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把它等同于奥德修斯（Odysseus）和塞壬（Sirens）的神话。被绑在桅杆上，奥德修斯听到了逝去的乌托邦的危险音乐，而他的水手们则堵住耳朵奋力划桨。社会分裂为阶级也是两种人的这样一种分裂：有些人的提高了的社会地位有效地使得回归的梦想变得无害，而另一些人则完全被剥夺了梦想，因为作为文明社会的成员，他们低下的地位不能为他们的匮乏提供足够的补偿。

这种对合理性的历史叙述预示着可能解决文明生活的矛盾。如果文明能够进步到超越生存斗争，那么它也许还能够把自然从对它的侵略性的攻击中解放出来，并且重新把各种功能结合起来，使存在的不同领域重新汇入一个和谐的整体，重新恢复那些在脱离原始起源过程中已经消逝的东西。马尔库塞论证说，今天，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是发达社会在第二自然上使生存竞争永恒化了，它们已经造成和强化了人与自然、与自身的异化。而且它们是在越来越接近完全解放的可能性时这么做的，这种可能性反映在它们必定加以压制的新的不满和反抗形式之中。

马尔库塞的论证必然导致这样一种理性的末世学。如果阶级社会已经导致功能之间的分裂，那么阶级社会的终结将看到它们的和解。理论导致的结论是，艺术和想象的非现实的维度现在必须通过一种完全新的科学-技术理论与实践和现实生活重新结合在一起。两个世界必须通过本质和存在、现实和理想的最终和谐而成为一个世界：“技术将会成为艺术，而艺术也将会创造现实：想象和理性、高级和低级功能、诗意的和科学的思维之间的对立将会消失。出现一种新的现实原则：在这种原则指导下，一种新感受性和一种非升华的科学智能将在审美精神的创造中结合起来”（马尔库塞，1969，24）。

这种新的技术实践形式的内容将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它必将继续提供食物、庇护所和其他必需品。但是，它这样做的方式将由审美需要来决定，审美需要实际上表达了各种在人类之中并通过人类才能意识到的倾向。马尔库塞认为，描述了这些倾向的“令人难人接受”的“自然解放”概念，并不是在自然目的论的意义上，而是指“那些实际上被歪曲和压抑的力量——这些力量能够支持和扩大人的解放”（马尔库塞，1972：66）。

在自由社会，这些倾向的实现将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不是伴随或者在普通技术实践之外和之上，象今天边缘化的艺术生产领域那样，而是在改造自然使之成为人类需要服务的实践之中。结果将是人类和自然的和解，不是回到自然状态，而是一种在轻松合适的技术框架内的和谐共存。

马尔库塞的社会主义理论结合了消除工业社会异化的马克思主义目标、现代先锋派激进的为艺术的非升华而作的斗争，以及当代环境保护主义和女权运动对生产主义的工业制度所作的批判。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对作为新的需要和新的自由实践的源泉的美学的重新估价。“解放的美学，作为一种自由‘形式’的美：这看起来好象马克思不喜欢这个拟人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概念。或者说，难道这明显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而不是唯物主义基础的扩展？因为‘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他是肉体的、活生生的、真实的、感性的、客观的存在物’，他把‘真实的、感性的客体’作为他的生活的客体……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扩展达到了在人的解放中发挥极其重要作用的高度”（马尔库塞，1972：67-68）。

这段话回到了马尔库塞早期用本体论的革命概念试图综合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主题上来了。马尔库塞早期的综合建立在现象学的观念之上，这种观念认为，必须通过我们人类参与其中的世界的结构，而不是按照科学的抽象本质来理解现实的终极本质。马尔库塞这里所指的具体人类主体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本质对自然基础而言是基本的、不可化约的。主体在其中领会和对待世界的各种形式不再被看作仅仅是对原始感觉材料的一种主观的增加物，它们也不是先验的结构。勿宁说，这些形式是人自身的展示。美之类的范畴，它们从我们实际的参与中产生，能够得到一些“客观的”意思，或者至少不被看作是任意的。在黑格尔式的综合要素中，它们提供了革命的规范，并为既定现实提供了辩证的对照。

在后面讨论战前日本对现代性的反应中，我将回到这种超越科学自然主义和技术工具主义的研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上。日本哲学家和马尔库塞一样拥有相似的德国根源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然而，关于理性，我将在第七章中解释，他们强调民族-文化价值的突出作用，并赋予这种价值以一种本体论的地位，而不象马尔库塞那样赋予它一种美学的地位。

互动的变革战略

尽管马尔库塞成功地复活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并且破坏了对社会等级制的理性主义的辩护，但对如何造成激进的变革还是缺乏充分的说明。他坚决地主张反对种族主义暴行和帝国主义战争，但在技术领域却没有相应地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尽管有时被指责犯有技术恐惧症，但他从未提倡粉碎现代工业社会。反而他争辩说，“如果科技计划的完成包括与现行科技合理性的决裂，那么这种决裂反过来将建立在技术基础自身的持续存在的基础之上。因为正是这个基础使得需要的满足和辛苦的减少成为可能——它仍然是一切人类自由形式的基础。质变正是在于这个基础的重建——即，在于它的发展以不同的目的为目的……各种新的目的，比如技术目的，将在机器设计和建造中发挥作用，而不仅仅在它的使用中发挥作用”（马尔库塞，1964：231-232）。但是这如何实现呢？

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技术合理性的批判包含着一张他没有交付的期票。从中我们应该能够得到一种替代的合理性理论，这种理论将告诉我们人类价值如何能够被结合到技术性（technicity）的结构中去。不幸的是，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太抽象和粗略，它们难以与任何具体的实践相联系。当试图与技术的实际扩散作实际的斗争时，这一缺陷看起来就越来越突出。总之，我要描述最近的理论变化，这也许有助于使马尔库塞为之付出很多的批判运动超越他自己立场的界限。

恶托邦的形象激起了马尔库塞称之为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大拒绝”，但是今天，这种不妥协的对立的观念听起来是错误的。⁹ 尽管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不信任在增加，但对技术的依赖也在继续增长。没有把异化伪装起来，但也没有从系统中逃脱出来，没有能够集聚和动员非异化的历史主体的各种能量的精神的或政治的避难所。进而言之，对合理性信仰的崩溃在马尔库塞那里已经显而易见，并进一步表现在德里达、福柯和列奥塔的法国理论中，还表现在当前社会构成主义的科技社会学中。因此，我们被不同类型的、在现代社会制造着内部紧张的战略所吸引。目的并不是要摧毁我们被其框住了的系统，而是通过一种新的技术政治学改变它的发展方向。

这种战略已经既在全球范围，也在局部范围内出现。正如我将在本书第四部分中所指出的，某种非西方的与现代性的遭遇，例如日本，包含着通过一种相互的转变而把西方技术结合到一种种族的文化中去的企图。有些相似的事情也已在西方出现，最明显的就是围绕着环境问题，但在计算机和医学这些领域，现代生活的技术统治观念日益受到我称之为互动的技术政治学的质疑。

福柯对合理性的社会限度的批判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理论创新，它使得目前的技术斗争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福柯指出，强迫接受一种合理的秩序将产生特殊的、局部的立场，而被统治者是从这种立场理解现实的各个方面的，但从取得支配地位的科学的普遍化的立场看，现实的各个方面是模糊不清的。这些“被抑制的知识”为进步的转变提供了基础（福柯，1980：81ff）。因此，和马尔库塞一样，福柯至少区别了以迄今为止的现代性为特征的等级制的合理化与适合一个更人道更民主的社会的可能的颠覆性合理性之间的不同含义（芬伯格，1992）。

⁹ 马尔库塞也偶然地提到改革主义的战略，如“穿越制度的长征”和在系统的“空隙”中活动，但从未详细地展开这些观点并把它们运用到技术领域。

但是，在马尔库塞的批判瞄准全面的变革的地方，福柯则要求没有任何全面计划的新的局部行动方式。

尽管在其短暂的历史中它是非政治的，但科技社会学中的构成主义还是通过把科学-技术的成就与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而对福柯的观点提供了支持。虽然是概括的叙述，但构成主义的论据表明，从一种精巧的主意到成功的运用的路程是漫长而又曲折的，到处是废弃的实际上可行的可供选择的事物，因为理性在做最后的选择时，考虑的与其说是内在的技术优势，不如说是社会价值和利益。

这个观点标志着与工具主义明显的决裂。工具主义假定，技术发展为产生于基本人类需要之中的明确规定的问题提供了惟一有效的解决办法。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因素对技术领域的干预仅仅是边缘性地决定了，例如，发展的速度或指派给不同类型问题的优先权。相反，构成主义则认为，发展包括具有不同问题和答案的观念的社会集团之间的谈判和斗争。每一个齿轮或控制杆的选择，每一种电路或程序的构造，恰恰不是由内在的技术逻辑来决定的，而是由特殊的社会结构决定的。问题并不在于技术进步的速度或谁从中受益，而是进步自身的内容和意义。

在与各种揭示社会行动者和技术系统之间交互关系的技术发展的“网络”理论的密切联系中，构成主义已经取得了进展（Pinch 和 Bijker, 1984; Latour, 1992）。这些理论所认为的重要行动者不仅仅是发明者和工程师，而且还包括管理者、工人、政府代理人、消费者、用户，及与技术相关的所有人。¹⁰ 网络必定与人们所创造的事物的结构有关，它反过来又为他们进一步的活动提供了一种平台。

技术因此既不是工具主义理论所说的是中性的工具，也不是本质理论所说的是一种自主的力量，而是和其他制度一样是社会的。技术在现代等级制度中起着核心作用，这种等级制度由技术制造物及相关的实践支撑着，而不象前现代社会那样，由神话和仪式，或由意识形态和强制力量的实施支撑着。构成主义因此是对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性”事物的最终拒绝，是对那种认为在效率原则下维持统治的惟一的形式就是技术合理性这种幻想的拒绝。

但是大多数构成主义的研究太局限于技术发展特殊的案例上，以至于缺乏对更广泛的社会内容的认识，而正是在这种社会内容中，这些案例才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Winner, 1992）。而且，哈拉维注意到，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历史受到了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的曲解，这种观点把与实证主义的决裂归因于由库恩开始的纯粹的学术革命，而否认六十年代，我增加一点，和象马尔库塞这样的激进思想家的不同的反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斗争的贡献（Darnovsky, 1991: 75-7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主要的科技社会理论看来并没有领会它自身可靠性的社会条件。

而且正是因为构成主义的高涨与不断增长的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反抗是如此密切相关，这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它加强了对立的思维。福柯和构成主义都关注是什么使得“系统”是一个系统，关注多种多样的方法，系统正是通过这些方法把人类整合进他们的社会再生产的技术条件中去的。这种探讨提出了被马尔库塞忽视的战略上的可能性。

在六十年代，各种尖锐的斗争组成了一幅反抗的图景，如法国 1968 年五月风暴这样的大规模同时发生的政治动员，美国的城市骚乱浪潮，或反对入侵柬埔寨的国内学潮等等。在这种情形下，反对技术专家统治压迫的斗争用从政治革命历史中得到的语汇表达了出来。对许多站在左翼立场的人而言，与更早的年代一样，技术就是敌人；造反就是在机器面前保持人性。

今天的政治运动超越传统的政治、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界限而扩散开来。值得关注的是，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人，在种族、性别和环境等问题上受到了左派的影响。但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同时出现的总动员却寥寥无几。同时，我们已经学会了小规模干预中的政治学，这种小规模干预改变了生活环境但没有直接反抗国家。这种探索有时被称作“微政治学”（micropolitics），这是一种建立在局部知识和行动基础之上的情境政治学。它没有为全面

¹⁰ Latour (1992) 还进一步把物质客体当作行动者来对待。

的战略提供方法，也没有对社会形成全球性的挑战，不如说，它对大量潜在的集中行动有长期的颠覆性的影响。

更大的问题是，微政治学的本质以及它为早期的动员形式提供了一种有效替代的能力，这些在本章中我都不讨论，在第六章中我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那里，它用列奥塔的概念“谬误推论”（paralogy）来表示。我这里感兴趣的是在技术领域微政治学实践的出现，因为在这个领域过去只有任何种类都非常少的运动。技术微政治学涉及具体的政治抗议的形式问题，这种抗议旨在通过来自用户、顾客或受害者的压力来改变特定的技术或技术系统。这样的鼓动缺乏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运动的机制，它也许没有集中的协调，只有在想要达到的方向上有一种含糊的共识，但它能够超越被实证主义对进步的信仰的霸权所妨碍的技术政治学早期的形式。

所有这一切的确不同于马尔库塞的观点。他曾经总结道，技术发达的社会被如此成功地整合在一起，以至于反抗只能来自于社会的边缘，例如，来自于少数民族、学生或第三世界。与这种边缘性的造反相对应的是他的准弗洛伊德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反抗的精神基础是社会斗争的根源。当我们进入到个人和系统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不清的历史时期时，这些思想更缺乏说服力。在这种情形中，反抗必须是“内在的”，意味着正是在系统的矛盾中做些什么。解铃还需系铃人。

本书后面的几章将讨论一些案例，它们刚好说明技术系统是多么的容易受到这种来自内部转变的攻击。然而，我所描述的运动与传统政治运动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它们被轻易地忽视了。这些运动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或顾客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技术网络基础之上。第四章解释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等级制是如何通过限制和引导交往而被建立在这种网络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些斗争的利害关系还是难以预料，不是财富或管理权，而是对构成交往实践的技术程序和控制的控制。

这里，让我简要地举出三种类型的例子来说明我的论证。

1，环境保护运动曾经对理解技术，对把个人掌握的、被认为是中性的“技术”信息转变为对公众讨论有利的东西有重要影响。“知情权”（Right to know）立法、从相关技术人员那里得到消息、对环境保护局听证会诸如此类的公共论坛的熟练运用，所有这一切都有开放的渠道，公司和政府机构逐渐失去了神秘的面纱，而在过去它们以此逃避它们行为的责任。结果，在核能和有毒废物处理这些领域，技术设计问题暴露在公共讨论面前。当个人把他们自己重新确定为污染的潜在受害者，他们在要求他们对被不情愿地卷入其中的工业过程的控制权时而接通了政治领域。

2，计算机的演变提供了公众参与技术发展的新型的突出的例子。在过去的十年中，两种大规模的计算机网络已经吸收了数百万用户。它们是因特网（Internet），一种国际性的研究网络，和远程电信（Teletel），法国国内可视图文网络，我将在第七章对它进行讨论。两种网络都是由它们的发明者提出来的，目的是促进诸如研究数据和航班时间表之类的信息的流动。两种网络都被其用户攻击并改造成个人通讯的媒介。这些用户改变的不仅仅是计算机的意义，而且还有一个它正在逐渐创造的社会模式。这种战略不是“大拒绝”，而是一种精巧的综合，它使得技术系统产生了没有意料到的扭转。

3，医疗领域提供了大量的患者在医疗系统内部改变医疗实践和技术的例子。正如在导言中所表明的，七十年代早期发生的分娩教育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妇女在分娩中的地位，尽管最近几年它的成就受到了新的技术攻势的侵害。在一段时期内，妇女从被隔离的、被麻醉的、被控制的被动患者变成了分娩中积极参与者。就象我在第五章将解释的那样，最近，爱滋病患者已经要求有更多的接近实验治疗的权利并且在治疗过程中对临床研究机构和原理提出挑战。在这两个例子中，患者改变了他们在医疗系统中的角色，要求得到信息和对方法的控制，这暂时地推翻了医疗行业既定的技术专家等级制。

从本质批判的立场看，这些运动似乎仅仅导致了合作而已，因为它们没有从机器中提升出人的能动作用，没有恢复人原有的自主性。这就需要从乏味的技术化中拯救生活的某种价值和领域，但是平常的对技术的敌视不仅仅无济于事，而且还削弱了一切缺少整体性批判的力量。

相反，新的互动的技术政治学展现了人类在不同的技术设计和发展战略中的意义。它把我们确定为设备和系统中的道德和政治主体，这些设备和系统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环境并创造了我们的未来。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运动所表现的交往要求是十分重要的，它能够作为检验与技术时代相适应的政治学概念的标准。

我们已经离马尔库塞很远了。相比之下，他的边缘性概念具有强烈的概括性观念的意味，只是看来越来越不适用于我们的经历。技术微政治学的出现证明了这个事实，即，在技术社会，边缘性潜在地是每一个人生存条件的一种状况。尽管我们是社会机器不可或缺的部分，不能够把我们自己从中分离出来并且以传统的革命政治学的姿态向它提出挑战，但我们并不是无助的：我们正在发现如何作为社会技术系统中的互动者（inter-actors）来行动。我们日常生活的技术环境不再象我们在六十年代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野蛮的压迫者，而是一种“软机器”，一种把我们包括在内的松散地组织起来并极其脆弱的结构。

总之，马尔库塞正确的地方在于他认为，由发达社会普遍建立起来的那种技术网络使它们的成员处于新的控制形式之中。而他忽视的事实是，这些网络自身又经历着由它们招集的人类团体所引发的变革。在技术领域出现的内在的反抗是新价值的重要承担者，正把一种新的形式加在技术体制身上。这些变革也许能够互相补充和互相依赖，改变发展的方向并消除恶托邦式的危机。

第三章 恶托邦和《启示录》：批判意识的产生

作为大众文化的批判

二十世纪是一个对现代方案的生命力越来越怀疑的世纪。只要悲观情绪局限于少数文学人文主义者身上，它就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已经成了每一个人的老生常谈。迄今为止一直为知识分子精英所谈论的社会批判主题现在成了大众的政治文化。

本章论述这样一个主题：世俗的世界末日神话，即一种不再需要宗教的末世论，因为现在末世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技术上的可能性。神话有两种形式，分别与人类由于自己的技术而造成的人类物质的和精神的毁灭相对应。核灾难和环境灾难带来的是人类的灭亡，而未来的精神控制技术从当代的宣传机构、广告和计算机中就可推断出来。本章中，我将描述三种重要的还在进行的运动，通过这些运动，末世论的和恶托邦的主题在五六十年代进入了大众的意识。

我开始先追溯一下由原子弹的发明而引发的新的世界末日神话的起源。那些被他们自己的成就所惊吓的科学家是意识到技术进步的后历史（posthistoric）意义的第一批人。他们通过既写关于公共政治的严肃论文，又写科幻小说的办法，试图把他们的见解传达给普通大众。尽管他们的核裁军希望很快破灭了，但他们打算激发越来越多的关于核战争可能性的忧虑性的思考。

由于描写星际范围自然灾害风格的科幻小说，那种忧虑在公众想象中打上了烙印：太阳的冷却，来自另一个世纪的长期冷冻的怪物的苏醒，与另一颗行星的碰撞（Sontag, 1969）。和核战争的威胁一样，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暂时延缓了人类历史的日常冲突，为了人类生存的利益，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对抗而把能量突然动员起来。作为科幻小说的捧场文章，原子弹的制造将是灾难风格的另一种例子，最终留在了读者的想象中。

当一种类型的战后科幻小说散布世界末日的恐慌时，另一类作品对正在出现的恶托邦忧虑产生了影响。在五十年代，文学上关于全面受控社会的推测提供了一种关于美国的越来越可信的描述。电视和普遍的官僚主义化，尽管也许并不十分象赫胥黎和奥威尔所想象的技术那么有效，但给认真的信奉者产生了压力。恶托邦小说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主要的社会分裂出现在现代技术系统的主人与在这个系统内工作生活的那些人之间。

这些对新社会的早期反应很快就被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所掩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压制公开的对美国技术统治趋势的敌意，而把恶托邦的形象投射到对手苏联的身上。恶托邦主义第一次以这种扭曲的形式成为一种大众现象，作为一种流行的对历史的解释，取代了新政的自由主义。

在六十年代，有一种企图是用具有种种灾难性结局的冷战模式来塑造越南。电影提供了一种完整的正在增长的危机的指标，而令人惊奇的是，那时并没有什么电影是关于越南的。相反，那时真正的战争电影是轻松愉快的间谍历险记，它受到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大量群众的欢迎。本章第二部分将分析这些电影中所出现的流行的恶托邦主义。

这些电影的最奇怪的特征是它们所展现的敌人的景象：在大多数这类电影中，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代表了技术专家的专政。敌人从不运用越共的游击战术，相反，它拥有配备着先进武器、直升机和核装置的蚂蚁一样多的军队。英雄——一个西方人——被敌人逮捕，并且在其内部活动，最后赤手空拳摧毁了敌人的技术。这里，落后代表着比人强大的机器的力量，而西方则是人文主义的避难所。观众被怂恿着把自己看成是一场反对第三世界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游击战中的詹姆斯·邦德。

这种荒谬的影射以及它为越南战争所作的辩解很快就变得如此平常以至于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一时期流行文化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关注于发达社会自身内技术统治的威胁。恶托邦主义转移目标并在国内找到了一个新的焦点。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把自己设想为合理化秩序的反叛者，这一时期对服从和专门知识的拒绝也一起发展起来了。广告利用了这些混乱的造反情绪向市场兜售与新的个人主义相一致的产品。与此同时，真正的造反在迅速扩张的年轻人文化中流行开来。本章第三部分将追溯这些进展。

恶托邦概念意味着逃避的不可能性；这一时期，社会批判实际预见到了它自身在现代技术日益增长的成功面前的消失。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批判消失了这一观念对批判却是一种有力的刺激，比对行动的刺激更有力。当冷战开始时，激进的抗议曾与共产主义一道被清除，而当新左派从反恶托邦的抗议浪潮中脱颖而出时，它以一种新的状态回来了。

历史的终结

“我想是没有办法把蘑菇云收回到闪着迷人光亮的铀球里面去了。”

艾萨克·阿斯莫夫 (Isaac Asimov, 1972: 236)

核时代的科幻小说

科幻小说，至少它的一些重要部分，是一种“另类”文化——科学和技术文化——的文学。其双重的读者总是不仅仅有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也有寻求消遣的普通公众。它把前者的体验和思考传达给后者，它向那些仅仅是被动地参与日益机械化的社会的人阐述了科学家的世界观 (Bainbridge, 1986: 第三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实如此。随着原子弹的发明，摆在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面前的难题成了普遍关心的事情。

四十年代晚期和五十年代早期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不寻常的文学活动的时期。约翰·坎贝尔 (John Campbell)，《震惊》 (Astounding) 的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鼓励科学家写科幻小说。紧随二战之后，这种参与戏剧性地增加了，既在数量上，也在质量上 (Stover, 1973)。战争及其后果显然造成了巨大的共鸣，它把佛瑞德·霍伊尔 (Fred Hoyle)、艾萨克·阿斯莫夫 (Isaac Asimov)、亚瑟·C·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和利奥·齐拉德 (Leo Szilard) 等这些严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吸引到想象的世界中去了。的确，许多在科幻小说中仍然由非科学家探讨的主题在战后的科学共同体中得到它们现行的形式。

在战后的时期，美国科学家立即陷入了一种矛盾的情形之中，他们对此有一种复杂的心态。那时，在资本集中和政府规模上，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蜕变。战争极大地促进了按公司-官僚政治模式组织的“大科学”趋势，洛斯阿拉莫斯 (Los Alamos) 的所有人都已经看到它的基本含义 (Greenberg, 1967: 第6章)。

小科学的个人主义，在有些方面类似于手工艺工人的状况，让位于各种温和形式的公司集体主义，即服从，而异化已经是大公司和政府的世界的典型特征。古老的智慧文雅的数学诗人的理想，在许多方面爱因斯坦是这种诗人的化身，被学术企业家的现实所取代，这种企业家是更加官僚化地组织起来的科学共同体和资助它的政府之间的中间人。

因此，原子弹的制造由于摧毁了科学共同体传统的自我形象而一下子使其受到了伤害。独立的、迷恋于小科学的聪明人突然成了热核权力政治学中魔术师的学徒。正如罗伯特·奥本海默所指出的，“在某种本来的意义上，这多少还有点粗俗、幽默和夸张，物理学家已经知道罪过；而且这是他们不能失去的知识” (1955: 88)。

当然，有些科学家从这种变化中获得了大量增加的权力和权力感，而其他大多数科学家则发现他们的物质条件戏剧性地得到了改善。总的说来，新时代很受欢迎，而且科学家最终感到他们的有用性得到了承认。但即便如此，增加了的影响力意味着增加了的依赖性和严密的控制，传统的价值系统和作用模式被新的科学工作组织所推翻。科学共同体中扩散开来的“错误”感体现在对政府控制、新的安全体系的敌意中，体现在对原子弹、奥本海默命运的担心和有关的问题中。这些被关心的事物以隐喻的方式出现在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中，因此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社会团体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的一种反思（Kevles, 1979: 第 23 章）。

物理学家阿瑟·罗伯茨（Arthur Roberts）在五十年代晚期广泛流行于科学家中间的讽刺歌曲中把握住了这种矛盾的时代精神。这里引用的其中的一段歌词也许抵得上几本书的社会学分析。

在一九四七年，当一个物理学家是多么的幸福啊，
你的财政大权只略逊于莫洛托夫或贝文，
你可以带着财富躲避那些纠缠不休的借贷者，
当你不知道如何消耗它时，只想想钞票就行。
研究是漫长的而时间却是短暂的！
在架子上塞满新的仪器，
整车整车地去购买它，
不要担心——
你能够拥有一切能够买到的东西。
在我们这个美好的时代，当一个物理学家是多么的幸福啊，
你看到这不屑一顾的世界终于接受了你正确的主张，
你看到议员们听从于每一个明智的观点，
你迷倒了妇女俱乐部，你是每一次庆典中的明星，
研究是漫长的而时间却是短暂的！
喝一杯盛满奉承的美酒吧，
为新的发现而自豪。
不要担心——
西拿特拉（Sinatra）拥有一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位置。
但是，你找没找到一个物理学家并取代他的位置，
而你找遍全城却没有发现一间可以安身立命的小屋，
或许，难道不可以去教教那些成百上千不会数学的学生
和那些想成为居里夫人的姑娘？
研究是漫长的而时间却是短暂的！
敦促学生，靠近主题，
物理学是他轻率的选择。
不要担心——
智力是一件仍然能够买到的东西。
哦，你写没写一本你想出售的关于裂变的书？
哦，当你演讲时欲言又止，你感到奇怪吗？
哦，你还想向世人公开某些原子式吗？
哦，如果你必须在秘密的状态下工作，你感到奇怪吗？
研究是漫长的而时间却是短暂的！
如果你发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请悄悄地确定它的密级。
不要担心——
一定会得到联邦调查局的同意。
一九四七年，当一个物理学家是多么幸福……

多么幸福啊？

哦，了解一个小问题，你认为要花多长时间？

和罗伯茨的歌一样，这一时期的许多科幻小说表达了面对核时代的矛盾心态、道德困惑和忧虑。当然，新的“科学的政治才能”也在关于公共政策的文章和演讲中揭示了时代问题。但是科学共同体的政治领导者宁愿作出重大让步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增加资金、裁军谈判，等等。科幻小说则更自由地表达了科学家深深的忧虑甚至反抗。当朱迪思·梅里尔（Judith Merrill）说麦卡锡时代“科幻小说一度实际上成为表达政治不满的惟一工具”时，这只有一点点夸张（Merrill，1971：74）。

从这个角度看，科幻小说与更早时期的圣西门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相似，这些哲学也试图使产生于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的、与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和体制相对立的新技术阶层的世界观普遍化。这种流行的新的科学表达方式显然是一种策略，就象齐拉德（Leo Szilard）的海豚所借用的声音一样，科学家只有通过它才能够使其他人倾听他们关于世界问题的见解。

利奥·齐拉德的小说《海豚的声音》（1961）事实上是对科幻小说本身的一种隐喻。它是对世界问题的理性主义研究的一种极好的总结，这些问题在五十年代吸引了许多科学家。但在一组研究者假装已经理解了海豚的声音之前，科学的“声音”被忽视了，从海豚那里他们声称获得了解决从饥饿到裁军等一切重大世界问题的方法。齐拉德的海豚是以外来的和超越的智慧形象介绍给大众的，并且大众也接受了，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这些智慧正以科学家的身份隐姓埋名地存在于我们中间。在科幻小说中，科学也是从文学中借用了一种“声音”以便使人们听到并理解它自己。

来自本我的怪物

原子弹的制造是人类历史上知识向力量的一次最耀眼的转变。那些完成这次技术壮举的人相信他们自己是惟一有资格控制其运用的人。他们至少能够懂得，人类历程的一个转折点已经到来。在那些原子弹的制造者中出现了一个“科学家运动”，因为他们认识到，尽管他们个人所献身的是研究的人道主义使命，但他们已经给人类提供了毁灭自己的方法。

在战后的几年里，一个不变的主题既在科学家写的关于公共政策的严肃论文中，也在科幻小说中反复出现：关于人类的知识已经落后于关于自然的知识，而两种知识之间的裂缝说明了自然科学探索的启示录式的结局的原因。人类有了力量；但是，即使人类必定会在新的科学发现上超越牛顿，在对自己的破坏性冲动的控制上超越苏格拉底，现在，人类需要运用这种力量的智慧。事实是人类已经处于这样一个关头：要么将实现它的最崇高的潜能，要么像恐龙一样消失。

在广岛毁灭后不久，这些感想促使科学家呼吁超越国家间的对抗。一九四六年，奥本海默在对科学团体的讲话中认为，“许多人曾经说过，没有世界政府就不能够有永久的和平，而没有和平就将有原子战争。我想人们必须同意这个观点”（奥本海默，1955：12）。

这个观点在罗伯特·怀斯（Robert Wise）的电影《地球停止的那天》（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1951）中得到了通俗的表达。这一次，好莱坞成了科学共同体的代言人，反映了科学共同体的恐惧、悔恨和意识形态。但虽然如此，故事还是讲述了一些不祥和残酷的事情。这部影片是根据哈里·贝茨（Harry Bates）的中篇小说《告别了，主人》（Farewell to the Master，1940）改编的。在原来的故事中，机器人格鲁特（Gnut）和男人克拉图（Klaatu）乘坐“时空旅行者”（space-time traveler）从一种比地球更先进的文明来到了华盛顿。当他们从飞船出来，克拉图还没有来得及说明他们的使命就立即被一个疯子杀死了。机器人后来根据克拉图声音的录音又重建了克拉图。当克拉图打算离开时，讲述者克利

夫请格鲁特“告诉你的主人”：人类为他所受到的无礼的接待而道歉。“你搞错了”，强大的机器人说，“我就是主人”（Bates, 1975: 815）。说完，时空旅行者离开了，给克利夫留下的是对机器人统治的世界中人类清楚的未来命运的敬畏和迷惘。

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电影赋予正在流行的机器形象以一种特殊的历史内容。克拉图现在代表着要求在地球上中断武器发展的银河帝国。他所访问的地球被描写成处于持续不断的、由无休止的技术和民族对立而引发的紧张之中。克拉图暂且让地球上所有的发动机停下来以“证明”他的力量，以遵循一项由许多科学家向美国政府提出的政策来替代向日本投原子弹。在拒绝了世界政治领袖们和他们的“小争吵”之后，克拉图向科学家和作家的一次国际会议传达了信息。他的机器人，被改名为高特（Gort），被遗留了下来，被帝国赋予了摧毁侵略者的权力。高特象征着那种“国际控制”，按纯粹的逻辑智能行事，科学家把这视为对核时代战争的惟一替代。

但是，甚至好莱坞也没能理解克拉图的信息。抱怀疑和敌对情绪的公众把科学共同体视为一种恶魔似的力量，既不可信赖又具有威胁性。弗兰克斯坦的实验（Frankenstein's experiment）是小孩游戏，可以与现在成为大众意识的哥特体传奇故事¹¹相媲美。科学家，就像齐拉德在《海豚的声音》开头所抱怨的，“劳而无功”（1961: 20），他们的政治抱负受到怀疑。用科幻小说本身通行的隐喻方法来说他们都被看作是“外人”（aliens），他们的干预已经中断了历史的连续性。

这些形象的冲突导致科幻小说的分化。电影中“狂热的科学家”形象在《被禁止的行星》（Forbidden Planet, 1956）中的“语言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他想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使其过于智慧和强大而死于自大。科学家感到被这类讽刺所攻击，似乎他们之所以受到责备不仅仅因为科学发现，还因为对科学发现的滥用，不仅仅因为知识的灵光，还因为“来自本我的怪物”，在《被禁止的行星》中，它支配着知识的运用。然而，普通大众却通过影片的寓意消除了疑虑，有些人类本来不知道的事情，如我们的无知和软弱，我们的有限，被我们物种内在的界限安全地保护着。

尽管代表科学家自己观点的科幻小说反对这种把知识、权力和邪恶浓缩在他们自己身上，但它仍局限在这些电影魔术师学徒的套套中。当科学家的裁军和世界政府的希望受挫时，他们也把问题的根源归为“来自本我的怪物”，群众的、独裁者的和政客的本我，总之，归于为其自身利益而过于强大的物种的非理性。

《原子科学家公报》的编辑尤金·拉比诺维奇写道，“人类意识需要时间来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其中不存在安全的事态”（Rabinowitch, 1960: 608）。当杰克·威廉森（Jack Williamson）的《人的特点》（The Humanoids）最终指出下列观点时，这听起来像《公报》的一篇社论，“技术已经与精神脱节，有性格的人还在坚持。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技术专家们太忙了，以至于没有看到悲剧性的结局是把这些像铊磁雷管一样的玩具放到有精神病的野蛮人手里。我创造了人的特点，要给它一个终结。这类和你们自己一样的技术专家——具有可能是最高尚的意图——已经破坏了文明的平衡，因此这就像一个离心的飞轮一样正在破碎。在哲学家能够恢复一种更好的平衡之前，人的特点是无法使它们停下来的”（Williamson, 1949: 168）。

艾萨克·阿斯莫夫的最著名的小说就是围绕这同样的主题创作的。在《基地》（Foundation, 1951-1953）三部曲中，哈利·塞尔登建造了两个行星基地以便从垂死的银河帝国的毁灭中拯救某些东西。第一个专用于自然科学，但是被一种具有动员非理性情感的催眠力量的生物变体所摧毁。然而专用于“精神-历史”的第二个基地介入进来，并通过制服逃脱自然科学控制的非理性力量而取得了胜利。

在亚瑟·克拉克的几部小说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在理性的或者甚至是非理性的精神世界中发挥作用的能力问题。在《城市和星球》（The City and the Stars, 1953, 1956）中，人类不再试图走进那他们以前感觉像在家一样舒适自在的星球中。这有点象《基地》三部曲，

¹¹ Gothic romance, 以恐怖、凄凉、衰败为特征。——译注。

文明被划分为两种彼此独立的文化，一种建立在完全机械化的技术基础之上，另一种被精神的力量掌握着。只有通过这两种文化的结合，人类才能发现其过去的真理，才能克服其恐惧，并且再次投入超越想象的宏大的银河系的精神历险之中。

在这些小说中，对核国家达到极点的真实推断唤起了对相似的道德和精神推断的可能性和需要的令人绝望的反思。智力，作为一种也许很好地超越我们目前界限的形式等级，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与此相应的是精神所能设想的最大热核力量究竟有多大。

变形的梦幻

原子弹促使科幻小说作家对人类，实际上是对世界本身的命运产生新的思考。吉恩·吉劳多斯（Jean Giraudoux）把命运称为“时间的加速力”（Giraudoux, 1935: 13）。没有任何东西像原子弹那样一直在给时间加速。在等待第一个核装置爆炸的掩体里，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重新计算了行星大毁灭中使大气氢发生核聚变的炸弹的概率。在早些时候，人们深信核战争正在来临，随之将是历史的终结。《原子科学家公报》封面上的时钟越来越靠近全面核毁灭的零点时刻。正是这种科学所造成的……

在通往培根的《新大西洋岛》道路的尽头，并没有乌托邦，而只有一个疯狂的世界、返祖的后嗣和社会结构，正是这种社会结构促使人类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无休止地生产和战争。现代技术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已经把社会劳动提到如此高的生产率水平上，已经使一切人的命运如此彻底地相互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人类继续束缚于生存斗争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愚蠢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意义的问题就很迫切地提了出来。数百万年的进化和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当然并非等于零。就像在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泰坦的塞壬》（Sirens of Titan）中一样，对外星飞船而言，人类历史只不过是（机器等）备件的生产，即使这样，全部的人类历史一定存在着一种意义。总之，历史的终结引发了对历史的意义，尤其对历史令人惊恐的进程中科学的作用作出新的反思。

许多当代的小说通过被认为是超越人类极限象征的太空旅行而接近了这个问题。这种象征选得很好：太空旅行能够有助于发挥类似于核战争那样的文学功能。两者都是思想实验，并成为对生活真实的、惊人的艺术模仿。

就象原子弹一样，银河系命运的景象产生了人类一致的理想感受。（请回忆一下汤姆·莱尔（Tom Leher）的歌曲《我们同行》）两者使传统的历史性胜利和政权观念在更大的目标面前贬值了。正如亚瑟·克拉克所指出的，“我们的胜利的幻想在来自星际的强烈光芒的照耀下荡然无存”（Clarke, 1965:157）。而对那首先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发出的“光芒”来说，情况同样如此。行星的前途是一个知道原子弹真相的观察者的前途，这个前途就是，它消灭人类历史自身。同样，火箭使人类直接面对命运，它超越了政治和民族对立，实质上是人类和永恒的对立，这与核弹有某种结构上的相似。

当然，在科幻小说之前太空旅行就已经被探讨。但让人激动的是征服太空本身、技术程序和第一批探险家令人惊异的发现。这是孤独的智慧在让可怜的帕斯卡尔感到震惊的无限太空中的历险。这样的小说继续地被写出来，但是它们现在是过时的了。核时代的非神秘性的太空需要一种新的探险的幻想。阿德勒·本尼迪托（Andre Benedetto, 1966: 58）曾经写道：“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的沉默很早以前就突然被打破”。

二战后，随着第一枚火箭推动的飞船到达月球，各种技术上的困难都随着“原子驱动”或“超-空间”等的草率提出而烟消云散。通过复制，各种稀奇的技术从此普遍地运用在面包电烤炉上。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人类太空旅行中精神上的适应性。

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 Bester）的《目标星球》（The Stars My Destination, 1956）描写了一个远距传物¹²已经扩展到天文距离的未来。在这本书的高潮部分，英雄在世界范围内随机地选择一些人接受一种新的能够被人的思想直接引爆的可裂变的物质：不是政治家，而是普通人必须在生与死、星球与核自我毁灭之间作出抉择。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了核战争和太空旅行的辩证法。星际争霸是核战争的道德等价物，这是一个在其中世俗权力的意志得以升华的领域。

在其他许多小说中，太空旅行同样被看作是——常常是面对非理性的恐怖或上辈人或外太空人所强加的禁令——对人类勇气 and 智慧的考验。在艾萨克·阿斯莫夫的《钢铁牢笼》（Caves of Steel, 1953）中，一旦克服了对未知太空的恐惧和对机器人的仇恨，是通过向星球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的。亚瑟·克拉克的《城市 and 星球》也是关于克服对太空的恐惧的。西奥多·斯图尔吉恩（Theodore Sturgeon）的《超越人类》（More Than Human, 1953）是另一部关于征服的小说，但所要征服的不是太空旅行的技术障碍，而是精神上的障碍。在所有这些小说中，问题与其说是把掌握技术看作具有普罗米修斯式的命运，不如说是把太空飞行看作是自我主宰或自我超越的象征。在有些小说中，太空旅行形成了对人类真正的神化的基础。西马克（Clifford Simak）《城市》中的“修剪工”，克拉克《孩童时代的终结》（Childhood's End）中的超智人，是超越历史领域的完全变形的典型。

在《城市》（City, 1952）中，木星探险家使用了一种装置，它把他们变成能够在行星表面生存的“修剪工”（lopers）。当它出现时，更有意思的是它是一把修剪树木的剪刀而不是一个人。“他已经发现了某些比人类所知道的东西更伟大的事物。一种更敏捷、更可靠的身体。一种令人振奋的感觉，一种更深刻的对生活的感觉。一种更敏锐的思想。一个地球的梦想家尚未想像到的美的世界……”（Simak, 1952: 117）。人类遗弃了地球而奔向木星，把他们旧的家留给了一种能讲述西马克的故事的有智慧的狗。人类的外形被完全地抛弃了，随之抛弃的还有人类的理性、死亡和责任。在这部小说中，人类的命运就是在逃离不可忍受的历史和个人生存重负中，成为一种宇宙的垮掉的一代。这里，人类没有超越它的界限，而是人类自身被超越。

《孩童时代的终结》（1953）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它是从美国和俄罗斯打算征服太空开始的：这是互相征服和毁灭的长征中另一步骤。突然，外太空飞船出现在所有大城市的上空。

“最高统治者”已经来了，就是为了把人类从他们自身的愚蠢中解救出来。人类被禁止进行战争和太空旅行[“星球不是为了人类的”（第137页）]，并且繁荣昌盛地团结在一个世界政府之下。一个和平、安逸和富有创造力的黄金时代开始了。

但是人类的一切希望都被子孙后代中的一种惊人的转变所打断。越来越多的人从现实撤退到梦想的世界。最高统治者解释道，在宇宙智慧的层次中，一种纯粹精神的存在矗立于所有人类之上，人类的后代将很快与之结合。人类的历史终结了。最高统治者不是作为主人出现的，而是更高的纯粹精神生活方式诞生的助产婆。最终活着的人目睹了人类子孙的最后的变形：“有一种超智者（the Overmind），不管它也许是什么，它与人的关系就像人与阿米巴虫的关系。从潜力上讲它是无限的，超越死亡，当它跨越星球时，是那么久久地同化着一个又一个种族！它也有欲望吗？它有没有它蒙胧地感觉到还从来没有达到的目的？现在，它已经完全进入它的存在，这种存在人类也曾经得到过。这不是悲剧，而是圆满”（Clarke, 1972: 205）。

这些小说中的变形概念使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的一些最不切实际的梦想复活了：傅立叶的人与自然的和谐，青年马克思的感性解放，爱斯陀耶夫斯基《魔王》（The Devils）中的自然的复萌。不仅仅是和平地生活在一种文明和理性的社会秩序中——这是科学启蒙的目的——而且出现了欢乐和无目的的力量更遥远的地平线，一种神圣的、对“寄生人类”及其羞耻的神圣性的尼采式超越。

为什么浪漫的反理性主义恰恰再次出现在总是试图使科学梦想中的幻想理性化的文学主流中？它就象作为一种社会方案的启蒙的失败一样，还暴露了自然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把自然当

¹² Teleportation, 远距传物，即，将物质转变为能，传送到目的地后重新转变为物质。——译注

作观察和控制对象的现代观念服从于把自然当作不可思议的生物，人类仅仅是其一部分的更为古老的观念。这是*自然哲学*再现，是一种展望，它接近关于这方面内容的科幻小说的主流传统。

极权主义的启蒙

科学的社会目的表面上看是通过超越自然力量的进步而获得的人类解放，早期的科幻小说经常通过一个由科学家和工程师明智地统治的世界的形象来回应这些科学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主张。在十九世纪语言的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文学作品。

然而，在原子弹之后，这个主题对许多作家和读者来说听起来是虚假的。一旦科学和技术被动员起来加入到一场毁灭性武器的竞赛中，旧的关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掌权的幻想就没有更多的引人之处了。科学已经——如果不是掌权的话——充分地接近控制的中心，以至于它对历史的进一步干预不再有解放的可能。随着科学的重新组织，纯洁的理性护卫者结果成了华盛顿或莫斯科有教养的官僚主义者。

冷战强化了对这种结构转变的道德感伤，因为更严密的科学组织不仅仅是效率问题，也是忠诚问题。亚瑟·罗伯茨打趣地提到的安全问题是极度严肃的。自由是那些太粗心地实施着压迫的人的暗语：对宽容的保护需要慎重的不宽容。这种情况使得科学家的政治散文以及科幻小说的隐喻变得复杂起来。科学家受到怀疑，只有表达了无条件的忠诚和对西方理想的顺从才能减轻公众的恐惧。敌人还是可恨可怕的，恰恰是因为它要求无条件的忠诚和顺从。因此，在这一时期，全面管理的社会形象同时是对苏联的谴责，并且多多少少有意识地表达了对西方自身趋势的担忧。

结果，非-顺从性（non-conformity）和个人主义的形象也还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科学家希望保护他们的思想自由，就他们周围压抑日益增加的社会而言，这必然使得他们为非顺从者（non-conformists）。¹³ 另一方面，大多数科学家接受了使归顺要求合理化的冷战意识形态构架，并且在对其自身秘密和安全系统的科学的新的官僚主义管理中，使其制度化了。

科学的官僚主义化是这一时期更严重的经济生活官僚主义化的一种温和形式。在一个机器和机械化的社会体制的世界中，它加深了对人类因技术发展而引起的过时性的忧虑。从卡莱尔·卡派克（Karel Capek）一九二零年写的《R.U.R.》到现在，这种类型的主题材料被反复地论述。战后，随着西方民主日益按官僚主义模式重新改组，这个主题越来越流行。如奥威尔《1984年》一类的小説，在战前就对处于全面操纵的世界中的人文主义价值唱起了挽歌。

整个流派建立在这个主题基础之上，那就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增长伴随着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更有效的统治。这些关于极权主义启蒙的恶托邦体现了以人道主义名义作出的各种反应，这实际上承认了人道主义的失败。而对胜利的实证主义者来说，乌托邦因而相当于人道主义的恶托邦，这是实证主义的精神支点。在两种流派中，历史都被描绘为理性的命运：理性是用于智慧、用于对目标的理智选择上，还是仅仅用于统治、用于对包括机器化的人类在内的工具的野蛮控制，理性的这两个方面谁将取得胜利？

四十年代晚期和五十年代，许多科幻小说试图修正日益大众化的恶托邦风格。这些小说没有象实证主义的乌托邦那样忽视或极度轻视现代社会趋势的危险特征。尽管对旧的个性形式作了明显成功的分解，但总是能找到希望的理由。仿佛是冷战的压力，顺从主义和科学团体的官僚主义的重新组织化迫使它去思考这样的可能性，即技术确实将导致人类仅仅成为一个机械化系统的工具。而且接受这个结论将放弃科学的意识形态和整个战胜自然力量的进步观念。这意味着在挽救启蒙梦幻的同时必须重视人文主义的梦魇。

¹³ 正如 P.W.Bridgman 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中所写的：“假设社会拥有把一种科学家并不想要的责任强加在他身上的权力，这显然意味着认可……傻瓜利用名声的权力。”（1948年3月：69）

阿斯莫夫的《钢铁牢笼》(1953)描写了一个人口过于稠密的世界，这个世界被向拥挤的城市开放空间的恐惧所笼罩。随着机器人取代了工人，大批“降低了社会身份的”(declassified)劳动者在增加，人与机器之间的敌意达到了冲突的顶峰。但是最后，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身为警察的英雄甚至和一个机器人结成了被迫的伙伴关系。人和机器人的半机械(cyborg)命运就是生活在“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结合两者最好的东西的文化”之中(Asimov, 1972a: 48)。

佛瑞德·霍伊尔的《奥西恩传奇》(Ossian's Ride, 1959)用一个科学家英雄来对抗一个高科技企业，这个企业除了开发有用的产品外还涉嫌有邪恶的企图。这个英雄在经历了惨痛的暗中侦察过程后终于发现公司的主人是来自另外星球系统来的仁慈的造访者，他们到地球来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他们劫后剩余的文化。他们将通过公司为人类和一切智慧生命的进步斗争作出贡献。

这类小说能够被理解为是科学共同体内部对其自身和整个社会转变的矛盾心态的详尽表达。它们是蓄意的“谱系间断”(generic discontinuities)练习(Jameson, 1973)。读者已经熟悉了《1984年》、《美丽新世界》之类的极权主义启蒙的小说。阿斯莫夫、霍伊尔和类似故事的作者把读者带进了一种冲突的类型中去了。但是，和所有由老生常谈的“人与机器”的故事引起的悲观主义的展望不同，冲突最终都以一个令人惊讶的结局而得以消解。但直到批判所赖以建立的基础——“误解”已经被经历、容忍和超越，乐观主义的结论才把启蒙的成就从批判中拯救了出来。

五十年代晚期和六十年代早期出现了没完没了的、连篇累牍的对科学的颂扬，在这种为了证明研究和政府之间有代价结合的正当性的颂扬底下，已经埋藏着自我怀疑的种子。上面所描述的科学生活和自我意识的所有变化为对启蒙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作好了准备，而从传统上讲科学活动正是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对征服自然的力量追求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把科学共同体日益增多的不安景象大众化的过程中，这些小说和故事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战后逐渐被传统政治学所遮蔽的恶托邦的历史意识。

最后的人文主义者

“渴望成为一个原始人是一种文化病症。”

桑塔耶拿(1926: 19)

自由主义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崩溃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这一时期是美国当代历史中最不平常的历史时期之一。三十五年的美国自由主义经过检验并且发现了它的不足。反对运动出现了，先从左翼，后从右翼，强大到足以震撼既定的政治模式。不健康情绪、偏执和个人残酷性的蔓延损坏了美国人性格中尚存的最后一点点活力和单纯。一个民族的性情都被改变了。

这些变化与自由主义发展到顶峰相呼应，与自由主义从一种含糊的民众运动（至少在与既定政权对立这点上是清楚的）转变为一种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相呼应，而这种使整个社会一体化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得到了“科学的”专门技术的推动。贫穷地区的战争和越南战争恰恰是最后的为了结束社会冲突历史的斗争的两个方面。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和自信，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致力于完成一项更无希望的任务。不久，在越南的失败成了自由主义的技术专家治国论全面崩溃的序曲。

问题究竟在哪儿呢？马尔库塞的文章《大社会中的个人》提供了一个有先见之明的解释，它表明了越南对技术专家治国论通过全面管理来安抚人类生存的规划所具有的意义。马尔库塞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权力转移，即从人类个体转移到技术的或官僚的机构，从活劳动转移到死劳动，从亲自控制转移到遥控，从一个或一组机器转移到整个机械化的系统”（马尔库塞，1966：15）。个人的生活现在被机器本身从上面加以计划，并和其他人的生活编排在一起。个人“生活在服从于一种机构的社会中，这个机构包含了生产、分配和消费，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工作和休闲，政治和娱乐，它决定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需要和欲望”（马尔库塞，1966：15）。

在这个社会中，劳动仍然是“异化的”，也就是说，它依然是为**他者**（Other）生产，而不是为个人自身的需要或他或她的同伴的需要。尽管社会富裕到足以为它的成员提供一切，但“个人必须继续耗费体力和精力为生存、地位和利益而斗争。他们必须忍受、维护和热爱这个把这种必要性强加于他们的机构。劳动世界中新的奴役并没有被超越劳动世界的新的自主性所补偿”（马尔库塞，1966：15）。

个人反而被更牢固地限制在他们的社会范围内，这是由马尔库塞所说的对社会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力比多的附着”所造成的。当“个人把他们自己等同于他们的他在（being-for-others），等同于他们的影象”，异化的意识就容易受到压抑（马尔库塞，1966：15）。“在这些情况下，社会需要一个攻击性能量能够释放的**敌人**，而不能把这种能量传导到正常的日常生存斗争中去。个人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它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动战争或者准备发动战争……敌人不是其他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也不是一种**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的或然性赋值能够忽略或者它能够随便地涉及的偶然因素。无论国内或是国外，商业或是教育，科学或是娱乐，**敌人**都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马尔库塞，1966：15）。

六十年代的大众媒体反映并传播了这些恶托邦的趋势。本节讨论新意识的两种流行的表达方式。当约翰·肯尼迪在他特别喜爱的作家中提到伊恩·弗莱明之后，间谍热席卷美国。第一部詹姆士·邦德影片吸引了数百万观众，并且立刻产生了一种新的电影流派。差不多在同时，法国和意大利影片受到了见多识广的美国观众的热烈欢迎。象费利尼的《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 1960）这样的影片表达了通常在好莱坞作品中听不到的不满。这些影片多少带有明显的恶托邦色彩。随着文化对抗的扩散，它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观众。

这两种类型的电影似乎代表了正好相反的社会态度。欧洲的电影抵制现代社会并且为死亡了的传统人文文化蒙上了一层乡愁，而间谍影片歌颂了技术社会的快乐并且为它战胜了恶毒的第三世界人民及其罪恶的同谋而自豪。但是对这些电影作细致的考察不免会对这种惯常的对比产生疑问。我将表明，两种类型都描写了对压抑的社会机器的抵抗。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一种新的大众恶托邦主义。

反对恶托邦的斗争

吉恩·卢克·戈达德（Jean Luc Godard）的《阿尔法村》（Alphaville, 1966）对间谍影片作了讽刺性的注解。戈达德的英雄，莱米·考胜，访问了一个由被称为阿尔法 60 的计算机控制的都市。在阿尔法村，“人已经成为可能性的奴隶”。从“外部世界”来的间谍站在“那些哭泣的人”的立场上挽救了人类价值，这些价值已经从居民的心里铲除并仅仅成为字典上的东西。考胜最后摧毁了计算机并和首席科学家的女儿逃了出来，有意思的是，她的名字叫冯·布劳恩（von Braun）。

阿尔法村被放在未来的巴黎中，并被逼真地配以当代巴黎最美国化部分的场景。电影中的英雄代表了现代技术文明中正在衰落的价值。这种技术文明不仅包括西方，也包括它的苏联对手：考胜在阿尔法村的化名叫“伊万·约翰逊，是《费加罗-真理报》的记者。”

显然，在戈达德看来，人文主义的最后幸存者是间谍、侦探和新闻记者。因为考胜说，“新闻出版（Journalism）和正义（Justice）都以同样的字母开头”。他通过不断引用法国诗歌和哲学而被证明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从拉辛开始直到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埃鲁阿德（Paul Eluard）的诗集《痛苦之都》（Capital de la Douleur）、菲迪南·塞利内（Ferdinand Celine，作者真名为 Louis-Ferdinand Destouches）的小说《穿越夜的尽头》（Voyage au Bout de la Nuit）和帕斯卡尔关于永恒沉默的无限空间的著名的警句等，形成了一条脉络，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在其中（Benedikt，1968）。

考胜是与生命和爱的敌人“技术时代”作斗争的英雄，阿尔法 60 用下面的话描写了这个时代：“没有人曾经生活在过去，没有人将生活在未来。现在就是一切生活的形式。时间就像是永远旋转的圆圈，下降的弧就是过去，上升的弧就是未来。”在一个全面管理的社会中，个人没有对过去和未来的需要，两者都由计算机来处理。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一个莱米·考胜能够让显然退化的技术时代束手无策，只有一个行动的男人能够理解那不幸的、因在妻子葬礼上潸然泪下而被处死的罪犯的忠告：“为生活和所爱去死，值得！”

六十年代大量的欧洲影片都有某种人文主义的英雄，尽管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莱米·考胜。在像费利尼的《甜蜜的生活》和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红色沙漠》（The Red Desert，1964）这样的绝望的影片中，那些代表了与社会抗争的角色都难逃厄运。在前一部影片中，贵族斯坦勒研究巴赫和梵语，款待艺术家和诗人，但最终自杀了。在后一部影片中，一个患精神病的女人消失在拉文纳¹⁴附近的工业废区这个情节起着相似的作用。在弗朗索瓦·特鲁福特（Francois Truffaut）的《华氏 451 度》（Fahrenheit 451，1966）中，人文主义的英雄从一个受电视控制的世界中逃到了这样一个地区，那里，一个小小的边缘团体保持着文学传统。

在《阿尔法村》中，就像在许多间谍影片中一样，英雄通过爱情而确立了他的人性并取得了胜利，因为在阿尔法村，爱情早就被当作非逻辑的和无用的东西而被废止了。在一个极端禁欲主义的场景中，女孩子在爱情的感召下从敌人那边转变了过来：主人公之间实际上没有肉体的接触，只有一种诗意的相互影响。一旦获得了爱情，女英雄的爱情就有助于确立男英雄的人性，并使他与冷酷的、不可爱也没有爱的计算机区别开来。

但戈达德甚至走得更远，他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虐待狂式的莱米·考胜，以便突出与仁慈的计算机的区别，它的一切行动都“为最终的利益服务”。因此，在一个情节中，考胜有意地驾车碾过一个敌特的脸。戈达德抓住任何蛛丝马迹来表明不管什么种类的人的本性都能在逻辑的统治下生存。

作为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社会的“压抑的合理性”的纯粹体现，计算机代表着系统。在各个国家中，“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没有通过灌输或金钱而使人屈服的罪恶的欲望，只有组织、计划和减轻不可预见性的自然欲望。”但对全面的效率的追求贬损了人性自身。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人成了……机器世界的性器官。”（1964：46）非人化的威胁支配着所有这些恶托邦影片，从《甜蜜的生活》到《红色沙漠》，前者采取了大众文化的方式，而在后者中，人物纯粹是工厂的物质产品。

在这种风格中，有三种不同的描写大众的方式。阿尔法村的全体居民被法西斯式地组织进一个原子化和机器人化的集体中。在《华氏 451 度》中，全体居民带着天真的归属希望组成了一个友好的大家庭。这种形象看起来起源于对美国青少年新部落文化的一种毁谤的观念。在《甜蜜的生活》中，对大众的描写则是分裂的，它把传统与处于转型中的社会的现代性分开了。马塞罗（Marcello）的未婚妻，她寄希望于宗教和家庭，代表着一种正在消亡的，但对下层阶级依然具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但是 Via Veneto 的极好的生活表现了真正的现实，在那里，广告商及其他的奉承者为一个越来越现代的社会制造了新的顺从主义。

与这些不同的集体主义恐怖相联系的是对技术落后的简朴乡村生活的怀念，在那里，精神尚未屈服于机械装置。但是这种可供选择的事物从未被明确地表示出来。莱米·考胜和他的女

¹⁴ Ravenna，意大利东北部港市。——译注

友驾着闪亮的野马式战斗机从阿尔法村逃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在《红色沙漠》中，一个美丽的海滩象征着一种替代，而《甜蜜的生活》结尾中一个纯朴乡村女孩的微笑也包含着同样的信息。在《华氏 451 度》中，“书人”（book people）的国土，这是一个国家的避难地，那些居住的流亡者每人都记住一本喜爱的书，它为残存的自由的可能性提供了最具想象力的解释。人类价值的恢复被描写为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甚至在《红色沙漠》中，是一种精神病状的白日梦。

直升飞机和游击队

同一时期的这些影片和间谍影片之间的对比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詹姆斯·邦德为西方社会最坏的方面而自豪，这些方面毫无疑问地遭到戈达德或费利尼的社会批判的拒绝。在邦德的英雄传奇中，合理化的集体主义典型地表现在《不博士》（Dr. No, 1962）中那充满着罪恶的东方人的岛上，没有谁像它这样在背后对古老的英国形成巨大的威胁。莱米·考胜在阿尔法村的生活得不到快乐，它的欢乐被一台售货机计算成用一张票面为“谢谢你”的纸币兑换一枚硬币。邦德是一位自负并且文雅的快乐主义者。

而且，除了那些明显的区别之外，两类影片也有非常相似的结构。邦德也许没有引用拉辛，但他以其他方式确立了他的非机械的人性。影片的开始他总是被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和武器，最引人入胜的是《戈尔芬格》（Goldfinger, 1964）中他的那辆汽车。然后通常便是他的这些防御物被他的敌人夺走，他被捕并且敌人暴露了他们的武器。从这时起，邦德必须依靠他的勇气、运气和诱人的力量来渡过难关。我们就这样被轻易地说服了：他解除一个原子弹装置时的笨手笨脚和不熟练，他的纯粹的体力，他在一个走向疯狂的世界中对快乐的追求，与一个敌方姑娘的爱情等等，这一切都在证明着他的人性。没有机器的力量、爱情的考验看来是间谍英雄普遍的特征，这些特征提醒我们注意到一种潜在的恶托邦形象。

尽管不断地遭遇危险，但间谍英雄总是能够躲避伤害，这个特征给那些最令人恐惧的情节一个黑色喜剧般的转折。在激光束下或在鲨鱼池中，逃避对手的枪弹或与一个美丽的反面间谍共眠，英雄总是能成功并且冷静地活下来。他不仅能够躲避死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避免恐惧、伤害以及一切会使他失去他的自我控制的事物。

《冷酷间谍》（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1966），它以“现实主义”为由拒绝这种模式，但毕竟还是以认同这种模式而告终。英雄无缘无故地选择了死亡来作为对现实的抗议。他本来可以免于死，但在最后关头却让自己被杀，因为各种人类价值已经成为可恨的世界的牺牲品。但这部影片没有根据规则来游戏，这样做实际上是让影片吸引那些根据邦德影片而形成了自己的期望的观众。

一个好的间谍不能有理想或人的感情。他知道从生活中能够得到什么，并且从不为政治操心。他正好与《冷酷间谍》的英雄不一样，他是一个正常的、成熟的成年人，能够完成个人的使命和处理感情纠葛。他不再是一个“酷的”超级青少年，在一个没有安排悲剧角色的疯狂的世界中，他能够确立自己的人性和个性。往轻里讲，这种“酷”就像是某种对存在于观众日常生活中的威胁的反应方式。这是在把现代生活问题浅薄化，它是使比尔·科斯基（Bill Cosby）走红的当代电视连续剧《我是间谍》（I Spy）一以贯之的副题。

就像在恶托邦影片中一样，间谍影片中的敌人是有组织的并且掌握着高技术。《戈尔芬格》中有一个有趣的情节就强调了这种新的邪恶与旧式的犯罪行为之间的对比。戈尔芬格先邀请许多歹徒到他的家里分赃，接着用毒气处死了他们。这里，不是黑社会的壮举，而是化学战在迎合着三四十年代电影中的“小凯撒们”（Little Caesars）。

原始的邦德小说的特点是，以一种十分陈旧的帝国主义风格对中欧人、俄国人、东方人、黑人等以及任何非英国人进行丑化。但是，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弗莱明的种族主义并不

完全是表里一致的，他的摩尼教¹⁵出于方便的目的而不是对始终如一的意识形态的反思（Eco, 1984: 161）。情况与邦德影片有些不同。在两者中，以及在许多它们所激发的电影中，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或非白色种族被委以反面人物的角色。但这是越战时期，它赋予间谍影片的种族主义以新的含义。

人们也许设想，假定东南亚的事件是真实的，即匪徒们运用了越共的游击战术，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掌握着一支训练有素的、装备有大量高技术武器的军队。那么英雄通常就要被他的敌人抓获，并且在实际上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从敌人内部战胜了敌人的先进技术。有时在最后关头他从配备了先进武器的自己人那里得到了一点帮助，就像《戈尔芬格》的结尾那样，但基本的工作必须由一个在敌人领地的孤胆英雄来完成。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和不发达世界的真实关系被颠倒了，前者把自己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而后者则建立在机器的基础之上，前者建立在毛泽东的原则之上，而后者则建立在利顿·贝恩斯·约翰逊的原则之上。

在片名为《阿拉伯图案》（Arabesque, 1966）的影片中，人与机器之间的斗争出现了自我讽刺的特点。故事讲的是必须从一伙邪恶的阿拉伯反叛者手中拯救一位中东国家的总理。有一个情节是，歹徒们追赶一位驾驶着联合收割机和脱粒机穿过田野的“好汉”。正如戈尔芬格试图用一种废金属挤压机把汽车中的邦德压碎那样，出现了普通美国人所看见的在快速路上迎面相撞的奇特景象，于是，敌人所抓住的西方社会的代表，只相当于城市交通中的行人。荒唐的是在接下来的情节中，英雄发现了一匹正等着带他离去的马，并被一辆坦克和直升飞机追赶着。西方不知怎么变成了十九世纪而东方却成了二十世纪。

这里，存在于我们自己社会之中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威胁被放到了不发达世界的头上。那种威胁常常以一架直升机，一幅从越南战争中得来的形象为代表。在《华氏 451 度》中，英雄也被一架直升机追赶着，在《甜蜜的生活》中，开头有一段极具讽刺性的情节，一座巨大的耶稣雕像吊在一架直升机上以此象征着技术专家治国论对传统的胜利。在每一种情形下，我们都被要求站在直升机的地面受害者一边，而不是站在直升机一边。

对欧洲和美国观众来说，“不发达”的概念有其不同的意义。恶托邦影片具有深深的反美倾向和对美国技术入侵之前昔日欧洲的怀念。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致于法国卡通连环漫画《Asterix》通过颂扬纯朴的高卢人（法国人）战胜世故的罗马人而像米老鼠一样受欢迎，至少在法国是这样。

在欧洲，恶托邦的形象通过对抗强大的力量（伊万-约翰逊）而得以表达。这个主题构成了娱乐间谍电影《你只能活两次》（You Only Live Twice, 1967）的背景。这部影片制作于英国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反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第三种力量”概念。这里，詹姆斯·邦德冒险尝试进入附属力量的行列中去。这些力量尽管虚弱，但它们的正当性在于以其人性来对抗强大的国家——俄国和美国、中国和斯派克特（SPECTRE，意为鬼怪）四方面的威胁，前两个国家代表了盲目的机械自动性，而后两个国家代表了残暴的罪恶。

在这部影片中，邦德“死了”，后来又以另外的身份复活了。邦德为小英格兰（Little England）所作的牺牲与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本身的衰落相对应，和它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崛起的梦想相对应。影片是这样宣告邦德的死亡和变形的，本该被处死的邦德在一艘潜艇的鱼雷发射管里获得了新生，他被发射到海岸上去执行他最后的任务。这个名叫肖恩·柯莱利（Sean Connery）、肥头肥脑、并有着中年商人肚子新邦德仍然没有准确地表现出英国后帝国时代的、腐朽的成熟性。为了把世界从强大国家的疯狂和愚蠢中拯救出来，他还必须与非盎格鲁-撒克逊力量，如日本，结成联盟。为了保证这种联盟，邦德的转变必须是彻底的：他必须成为一个日本人，甚至要与一位日本姑娘结婚。

接着，邦德学会了日本传统武术忍者（ninja），并开始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在最后的情节中，邦德的小直升机机智地战胜了斯派克特的大直升机，它代表了大国的高技术。这太不浪漫了！邦德不再用血肉之躯来对抗机械装置，而是他有了自己的小技术。这再次确切地指明

¹⁵ Manichaeism, 摩尼教, 强调善恶对立说。——译注

了欧洲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不像越共那样打地面战，而是在中间地带战斗，依靠灵敏和机智生存，甚至偶尔还能取得胜利。

恶托邦影片和间谍影片的这种对比揭示了令人惊讶的趋同现象。在两种影片中，英雄都是一种游击战士，都是在邪恶的技术统治的内部进行战斗。在两种影片中，英雄的人性都是靠对抗机器的个人行动来确立的。在两种影片中，敌人拥有直升机而英雄只是个游击队员。但是两类影片的社会功能是完全不同的。恶托邦影片加剧了人类价值和技术社会之间的冲突，而间谍影片提供了一个虚构的答案。这就解释了它们对不发达社会的不同态度，它的原因必须搞清楚，因为它在发达社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象征作用。

对技术社会的矛盾心理

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影片有着相似的目的：由于受到合理化的秩序的干扰，观众被要求把他们自己等同于在和技术专家治国论作斗争中的英雄。但有一种不健康的信仰因素存在于这种摩尼教（善恶对立论）的自居作用¹⁶中。正如菲利普·斯莱特（Philip Slater）写道：“非人的、复杂的、无所不能的机器对马尔库塞《单面人》中所说的无助的个人形成了威胁，并使之麻木不仁和官僚化，这种机器对个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它就是个人——一个人转变的奇形怪状的物化”（Slater 1970: 125）。个人发挥着相互矛盾的作用：他既是社会一体化的参与者，也是社会顺从主义和社会技术的外在的批评者。在前一种作用中，他们驾驶着控制着别人的、反暴乱的直升机，而在后一种作用中，他们在为一个更加个人主义的社会而与一种殿后的游击运动在战斗。然而不用奇怪的是，系统本身就是既可厌又可爱、既可怕又可敬。

间谍影片的帝国主义是这些矛盾心态的一种编码的表达式。在进行一场反对掌握着先进技术的不发达世界的游击战中，当观众们确信他们自己就是“个体”时，就会把他们自己社会的最令人不满的方面投射到其他社会身上。由第一世界中的压抑而导致的侵略性被释放到第三世界身上。与把管制归罪于一个他国，并且用人道主义和技术的完美结合（邦德就是代表）来战胜它相比，还有什么解决个人主义和顺从性之间二难选择更好的方法呢？在幻想中，个人变成了美国社会的游击勇士，正在与技术先进的不发达世界战争。

这种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虚假解决办法使全体居民处于对社会敌人的防御状态。与社会的和解就意味着与各种秘密的、无意识的“破坏”倾向的象征性规划作斗争。对战争的需要就成为一种迫切的必要性，因为只有通过战争个人才能保证他们矛盾地融入系统之中。正是这种心理上的定势使得数百万人既对间谍影片，又对真正的反暴乱战争半信半疑。

恶托邦的影片有一种不同的效果。它把与社会的疏远理想化了，并且没有把任何抵抗社会的真正可能性结合进来。观众们仍然感受到日常生活的真实的矛盾心态，仍然认识到他们的与社会环境相矛盾的批判意识。有关前技术社会那种文质彬彬和人文主义的浪漫形象，即使尚不清楚它的具体地点——越南或古巴肯定不是要去的地方，不过是间接地象征着一种历史和个人可能性：“落伍”（dropping out），对发达社会的大拒绝。因此，恶托邦影片戏剧化地表现了不发达的象征意义、它所包含的真正威胁和它所代表的个人解放的真正可能性。

¹⁶ 自居作用：以理想中的某人自居的一种心理变态心理。——译注

正在消逝的共识

“我们难道不能证明这种诊断的正确性吗？这种诊断就是，在文化动力的影响下，有些文明，或者说某些文明的时代——也许整个人类——已经变成了‘神经病患者’。

弗洛伊德（1961：91）

操纵和反抗

流行的恶托邦主义渗透于越战时代的文化中。在这一节中，我将对广告的变化作一个概述，它相当于对上述科幻小说和电影的一个证明。我将说明，在五六十年代，那些思想的管理者显然试图走在对公司的主张越来越怀疑、抵触情绪日益增长的公众前面，而这种抵抗产生了不仅对零售业，而且还有政治学的新的研究方法。

广告的二难境地在于说服（persuasion）的真正本质，说服包含了与那些宣传对象的真正兴趣和自由的一种内在关联。只要那些兴趣能够被那种自由所把握，那么说服就要求恢复对这些兴趣的意识。而无孔不入的广告和宣传的受害者因此发现，他们自己的个性恰恰在被改变为外在的目的时，不断地被各种补助形式的商品价格所维持。同时，存在着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受操纵的大众是自由的，自由运用和解释他们在各种不可预见的方面都对其屈从的操纵（de Certeau, 1980）。由此产生的广告和它的受众之间的张力与其说被消除，不如说被不断变化的技术所掩盖。

尽管在广告风格的历史上没有明显的突变，但重点的确发生了变化。例如，存在着长期的脱离理性的而朝向非理性的吸引力的倾向（Schudson, 1984: 60）。从十九世纪起的广告看起来明显地像是止痛剂，它们似乎主要由信息构成，通常伴以某些有限的图画和适度的口号。二十世纪早期，我们看到了迫使个人进入新的消费市场的、粗鲁的“硬销售”（hard sell）的广告，随之在二战后出现了向描述顺从主义式的生活方式的“软销售”（soft sell）的形象广告的转变（Riesman 等, 1953: 100ff）。当六十年代这些广告也开始像是旧的风格时，不断提供给消费者的是非顺从的自我矛盾的形象，这种非顺从迎合了消费者的个人主义和独创性（Ewen, 1976: 218-219）。

我不想论述这些广告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有效的，这是它们所代表的文化逻辑问题（Schudson, 1984: 第四章）。但它们的确取得了某些值得注意的成功。正是在早期已经掌握了新的逻辑，大众汽车在汽车进口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里根成为加州州长并最终还当了总统。新的广告至少是新的情绪和不断增长的离心力的表达，而这种离心力在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几乎使社会四分五裂。

早期电台无所不在的“硬销售”——在老电影或后半夜的电视中我们都曾经听到过这些刺耳的声音和空洞的曲调——在向那些渴望成功又害怕成功的个人作呼吁。罗伯特·沃肖对当代歹徒电影所作的分析揭示了这种矛盾情感的机制。

“实际上，歹徒注定要灭亡并不是因为他所使用的手段是非法的，而是因为他承担着成功的义务。在更深层次的现代意识中，一切手段都是非法的，每一种试图取得成功的尝试都是一种侵略行为，都使得一个人独立无援、充满犯罪感，并使他在敌人中间没有抵抗力：人因为成功而受惩罚。这就是我们的无法忍受的二难境地：也就是说，失败是一种死亡而成功是一种罪恶和危险，因此——最终——是不可能的。歹徒电影的作用恰恰体现了这种歹徒人物身上的二难境地，并以他的死来解决这种二难。而这种二难之所以被解决正是因为他的，而不是我们的死亡。我们是安全的，因为我们暂时能够默认我们的失败，我们能够选择失败。”

（Warshow, 1964: 88）

歹徒电影能够使个人在艺术中彻底地体验他们的雄心，并且使他们暂时地与一种平庸的生存相协调。

这一时期的广告重复着这同样的结构。硬销售把拥有很少积蓄的胆小的消费者吸引到新的、他们还不习惯的大众消费市场中来。广告用视觉震撼、令人作呕的曲调和持续不断的声音对观众狂轰滥炸。消费者得到的并不完全是关于商品的信息，他们被迫去违背他们的意愿。这种方法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花钱的自由和更好的判断力正在受到侵犯。但是，如果那种侵犯没有引起一种受抑制的并且不被承认的超越平庸、进入一个梦幻、成功和独立的世界的雄心，它将必然失败。在这一时期，消费品似乎作为诱惑而被抵抗。硬销售与其自身的愿望结成了反对消费者理性的同盟。

在五十年代，顺从主义式生存提高了的舒适和安全为其赋予了一种实证主义的价值。超越大众的愿望在平庸的光芒面前黯然失色。正如埃里克·古德曼（Eric Goldman）所解释的那样：“毫无疑问的趋势就是追求一所市郊——中产阶级和工人到市郊采蘑菇的距离——的住宅，那里，最好的美德就是适应邻居的思想和行为。在这些环境下，强烈的欲望与其说是个人主义的，不如说是为了使人自己与某些更大的集团或组织处于最有利可图和最舒适的关系之中”（Goldman, 1961: 264-265）。

也许这种转变的最纯粹的表达是电视情境喜剧（Hamamoto, 1989: 43-45）。那里，对男男女女的幸福的家庭生活作了过分多情善感的渲染。平庸变成了娱乐。个人高兴地完全把他们自己等同于他们的角色。从未有过如此可爱和漂亮的母亲，也从未有过如此强壮和宽容的父亲。尽管劳动的世界依然是一个充满挫折和冲突的领域，但它却几乎不出现了。而情境喜剧似乎要说，这些轻微的烦恼当然值得用来交换家庭的欢乐。因此，只要出现挫折和冲突，那么它们就不是悲剧的，而是一种温情脉脉的娱乐资源。

当然，个人和社会的这种完全的和谐是一个神话，肥皂剧揭穿了它的虚伪性。个人劳动中的异化并不有趣，家庭生活也并不幸福，主要的用品和规划好的休闲并不能满足空虚的生活。个人在他们顺从主义的生存中的确取得了一种成功，但这种成功伴随着由经济社会转变而产生的不断增加扩散的焦虑，这种转变即使在灵魂的深处也受不到批判。

个人必须效忠于持续非人化的和机械化的系统，因为它毕竟给他们提供了象样的收入。社会的动乱、对抗以及对更美好事物的愿望只能以损失已经取得的成就为代价。独立的个人不再仅仅是鲁莽的，而且对他人构成了威胁。现在，一切有差异的东西都是罪恶。在麦卡锡看来，科幻小说中的那种外来的威胁是真实的。顺从主义的民众生活在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飞碟的恐惧之中（Condon, 1969: 523）。

事实上，对外星人的恐惧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一个科学家谘询委员会警告美国空军，如果侵袭的敌人耍弄大规模飞碟入侵的把戏，美国的通讯系统将不堪重负，他们敦促空军检查飞碟现象以便更好地揭穿它们（科学家报告的原文可以在康登（Edward U. Condon）书的附录中找到，1969: 905ff）。这也是大洗脑的恐怖时期，弗洛伊德主义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的传播就体现了对人格的诚实和持久性的怀疑。约翰·弗兰克海默（John Frankenheimer）预言式的恐怖电影《满洲的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1962）总结了这些恐惧（Whitfield, 1991: 211-213）。

如果不丢掉恐惧所带来的影响，就无法摆脱个人不幸的根源，他们因此根据这种恐惧来改造自己以释放它所产生的剩余攻击性。他们的仇恨以拥有和控制机器力量、汽车马力、动力割草机和汽艇的形式出现。同时，通过建造核弹掩体而得到最终的安全。（甚至出现了关于是否让邻居也能进入掩体的可怕的争论——多数人的意见是“不”。）随着已经准备好了安全撤退，机械化的个人尚能继续与社会的要求保持一致。

这一时期的广告反映了这些转变。在广告面前，消费者体验到了一种与内在诱惑相对应的外在强制。但是现在，有些消费者，尤其是那些受过更好的教育并且有更多的钱可花的消费者，怨恨这种强迫接受。他们学会了保护他们钱包的自由以反抗硬销售的猛烈攻击，并重申他们自由的权利。更精巧的软销售广告促进了团体身份感，这是一种偶然让消费者购买广告产品的身份感。

软销售能够更好地起作用，因为它根本就不施加强制，而是简单地反映了个人已经认同的自由的内在化限制。既然它已经假定他们要求像别人一样，那么形象广告相对而言简单易懂。它也许展现了一群幸福、有魅力的年轻人，任何观众都愿意属于这样一个群体。然后，广告只要指出团体成员某些特殊的品性即可，显示他们用高露洁牙膏时露齿的微笑、他们的可口可乐、他们的服装等，把消费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产品身上。这类广告强化了顺从主义的强制，而且正是在它们利用这种顺从主义的强制的时候。消费者在硬销售面前所表现的矛盾心态在显然是自发的归属于团体的强烈欲望中得以化解，这种矛盾心态由对产品的愿望和对自由、理性的愿望所构成。

如果没有越南战争，“顺从主义的五十年代”也许将延续到另一个十年，但是，如果我们相信马尔库塞，那么这种强制最终会导致不可抑制的攻击性和某些种类的已经爆发的冲突。无论如何，按照间谍影片的结构所表现的思路，越南战争使得把这种攻击性发泄到越南人头上变成了可能。

在越南战争期间，大多数人都害怕去表明他们独立的个性，因为这将导致与社会的断裂并失去对它的信仰，他们不想“落伍”（drop out）并成为“垮掉的一代”的成员或嬉皮士。但他们也担心被社会机器所吞没。正如歹徒电影时代那样，最大的危险不再来自于个人主义，而是来自朝向顺从的无法抗拒的推动力。因此，尽管个人主义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虚构的）特征，但必须对外在事物表现出顺从性。

随着保守思想的回潮，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对内部冲突一种相似的错觉的解决方法。右翼领导人是间谍电影的国内政治版本和在越南释放社会紧张和攻击性的等价物。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通过他的宣传和最广泛的游说活动，他被等同于美国的个人主义，但实际上，对现存的事物一点也没有什么改变。

罗纳德·里根任加州州长第一届任期内树立了典范。这位精明的州长通过对学生和福利“强盗”进行口头攻击而使他的大多数选民确信，他正在为缩小政府的范围而努力。这些“敌人”被污蔑为未开化和具有动物性，而且还被认为与里根声称正在与之作斗争的技术统治的国家相一致。但事实上，预算却在持续增加，而且，里根所提倡的瓦解社会政治结构从来就不是他的任期内的真正目标。

此外，这些变化也反映在广告中。对许多人而言，不用花很多时间就自觉地理解了形象的作用。一旦个人决定维护他们的个性，五十年代的形象广告显然就具有压抑性。对加入有魅力的、快乐的年轻人的团体的向往在出人头地的愿望面前开始退缩了。在这方面，左右为难的个人不仅作为被整合的顺从主义者，遵照团体同一性的仪式对广告作出回应，而且还作为外在化的自我。但是，成为独一无二的个人的愿望并不像三四十年代那种非理性的诱惑来体验的。相反，个人正是通过他们的独特性来展示他们的自由。

利用个性化的愿望是困难的，因为如果每个人确实想要与众不同，那么就不存在通过广告来组织他们的方法。的确，生产过程几乎不可能预料他们的需要。问题的解决方法在于发现各种差异的特殊性，它建立了自我的新的模式。这些“分裂的”类型并不是通过展现每一个团体中个人之间的相似性，而是通过强调团体间的差异来作为反-形象的基础的。

这些新的广告所呈现的不是被整合的，而是外化的个人。那些为喜爱现代艺术的女士而设计的奶罩、表示其主人过度节俭品格的汽车和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极力拥护者构成挑战的计算机，我们都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思考者的过滤器”。广告最终达到了不再呈现形象的地步，而是通过取笑广告自身来努力反映优良的个人品味。

消费者的自我意识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在这里，最好的广告恰恰是在摆脱了形象和它的顺从主义的个性限制的力量条件下来称赞他们。但是现在别无选择：顺从主义者和非顺从主义者一样，广告的爱好者和它们激烈的反对者一样，双方都成为了广告的形象。个人的自由和经济的必然性取得一种荒谬的和解。

内部的敌人

对广告历史的这种简要概述指出了六十年代早期不稳定和矛盾的程度。越南战争是一个灾难，它使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越南与敌人进行战争的代价如此之高，以致于在国内不能允许被排除在外的团体同时发生的整合。但是这类团体往往总是被当作并且成为代理的敌人，由于需要一个发泄攻击性的对象，整合它们的意愿消失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自由主义不能适应这种从帝国主义向彻底的种族主义的转变，因而在更加保守的政治趋势面前倒下了。同时，新的对立运动从攻击性的真正的根源上向个人揭示了释放攻击性的方法，这个根源就是“体系”。

当时，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再次产生了社会矛盾，因为敌人已经在社会内部出现了。尽管不再以竞争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为基础，但社会内部的斗争还是可能再次存在的。一旦对立在体系内部出现，社会全面整合的理想便被粉碎了。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的斗争而引起的激动很快超过了它们和平共处的愿望。分裂和瓦解的趋势开始征服了自由主义的幻想。六十年代晚期，体系显然还没有把其自身整合为一个“大社会”。越南战争显然在每个人的思想中确立了“不发达”和“个人主义”的媒体形象，并使对抗的团体有可能从某种通过“颓废”（beat）诗歌和恶托邦科幻小说表现出来的含糊不清的人道主义抗议转向一种政治运动。

学生和黑人拒绝体系提供的对冲突的虚假解决，他们是第一批改变，因而也是第一批对这种解决产生实际结果的人。他们由创造新的需要开始，但很快就遇到了强有力的压制。对自由的内在限制——顺从主义——成了一种客观的外在限制，并且因此成了任何斗争的目标。

只要这个方向的姿态是谨慎和适度的，合作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但是当保守的报刊和政客诽谤早期改革主义者的反抗时，异化的个人怀着持续高涨的热情扮演了攻击他们的角色。左派开始模仿社会上流行的敌人的概念以及体现了一切社会罪恶的可恨的他者的概念。在谴责左派的暴力和共产主义时，社会规划了通往新的同一性的路线。就像标语所说的：“我们是我们的父母要我们提防的那种人。”

对抗的动机存在于每一个人之中，但是通过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遭到压制。只要敌人是一个外国，改变立场就是叛国。但是一旦敌人出现在社会内部，那么通过加入到敌人一方就容易明确地维护对抗体系的个性。许多个人做出了这种选择。到七十年代，更加明显的是敌人已经就在国内，因此不需要跨海去寻找一个攻击的目标。在社会内部再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抗和社会斗争，大部分是建立在新的恶托邦意识基础之上的。

技术统治的自由主义要求个人通过他们的社会角色、通过他们的合作、通过他们的相似性来认识他们自己。但是当真正的帝国主义竞争强化了攻击性趋势时，个人越来越倾向于与暴力一致，这使得他们与体系重修于好。正是因为与敌人有关，个人真正成为真实的自己，不再与他们的同伴合作。这就为一个社会冲突的时代奠定了精神基础。由于美国人口数量的增长，高涨的攻击性成为一种具体的流血欲望和对警察暴行、政治暗杀和社会迫害的狂热。在与尖锐的民族主义对抗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试图通过在激进的政治斗争中实施和容忍暴力来解除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就为流血和残酷的十年开辟了道路。

第二部分 技术和价值

第四章 再现的技术专家治国论：阿道尔诺、福柯和哈贝马斯

“惟一让马尔库塞感到与技术理性的政治内容的观念相互纠缠的难题是，以绝对精确的方式确定合理的科学和技术形式……向生活形式、向生活世界的‘历史总体’范围扩展的意义。”

——哈贝马斯（1970：90）

启蒙的辩证法

在马尔库塞的著作中，批判理论与恶托邦传统相结合而处于一种与六十年代出现的政治运动相互回应的爆发性混合状态中。作为一种力量，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影响了广泛的大众并进入了历史。但是，法兰克福学派转到这个方向已经好多年了。在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很久以前，特奥多·阿道尔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的杰作《启蒙的辩证法》就探讨了控制自然、心理压抑和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关联。在他们对发达社会的权威系统、整合这个系统的各种技术和抵抗这个系统霸权的各种艺术形式的解释中，马尔库塞的理论就被预示到了。

《启蒙的辩证法》是一部深沉的悲观主义著作，它没有为克服它所谴责的罪恶提供策略。尽管马尔库塞不遗余力地确定一种激进的替代事物，但他的著作最吸引人的还是一种缩命的历史哲学，它表明，人类正是被使他们支配自然的技术装置所奴役。因为法兰克福学派拒绝像海德格尔主义者求诸于存在那样的任何形而上学的东西，它所伪造的科技进步和社会控制中的进步之间的联系看来是不可消解的。

哈贝马斯通过交往理论的运用对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修正克服了它的一些最严重的缺陷，但失去了它许多批判的锋芒。他对学术讨论和福利国家的一般构架的冷静接受适应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历史风暴之后的平静。但即使是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技术也是作为一种压迫力量，而不是作为一种人类自我表达的媒介出现的。结果，他最终也是悲观地谴责了正在兴起的技术专家治国论浪潮，而没有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替代物。

阿克塞尔·霍赖特（Axel Honneth）在《权力批判：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反思过程》中对这种消极的观念进行了反驳。霍赖特的讨论使当代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社会思想家中的自我批判过程达到了顶点。本章中，为了回顾这一过程并且在交往理论对技术研究的方向上拓展这一过程，我将把霍赖特作为一个衬托。

尽管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认为他们自己更新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但他们对工具统治批判的强调完全遮蔽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他们按征服自然的模式把阶级斗争解释为被动的人类原材料的工具化。失去的是霍赖特所谓的“社会性的东西”，如集体、人类之间克服同一性的斗争、意义和价值等。这种模式不仅模糊了反抗的根源，霍赖特还指出了它在理解建立在对规范的普遍认同而非工具控制基础上的统治结构方面所造成的各种困难。

统治主要建立在规范基础上这一观念初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它与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等的工具性的大众操纵理论相比，更贴近于发达社会的现实。的确，有效的操纵以社会成员在他们自发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详尽阐释的同一性和理解的文化背景为先决条件。正是那种更深的文化共识中的裂缝使社会受到了操纵。

但是阿道尔诺不但没有认识到他的研究的局限，反而在他随后的著作中把它们激进化了。他认为，概念化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统治形式，为了恢复与自然的非统治关系，哲学的任务变成了概念批判，而且阿道尔诺相信，这也是，而且确实主要是伟大艺术的成就。批判理论离它的马克思主义起源已经很远了。

从阿道尔诺相信发达工业社会能够包容马克思主义习惯上所依赖的一切这样的对抗力量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个差距。霍赖特把他的悲观主义归咎于过于简单地把个性化领域等同于传统的竞争的市场。以此设想为根据，官僚政治的资本主义和媒体操纵标志着个性本身的消失，社会现在显得象一台均匀地抹上了油的机器。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霍赖特写道：阿道尔诺“没能认识到各种特殊团体的价值倾向和日常解释模式，作为意义的标准，这些模式通过大量的媒体信息指导着活动中的个人……因此，他不能够相信，在特殊团体的倾向标准的合作生产过程本身并不屈从于操纵这一事实中，文化工业的启发性的影响能够发现它的局限”（Honneth, 1991: 80）。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这种解释形成了霍赖特的书的第二部分的基础，其中在福柯和哈贝马斯这两位当代主要的社会理论家之间以及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作了比较。

统治问题构成了福柯晚期著作的中心，但是前提却与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不同。福柯的研究建立在尼采的社会理论基础之上，尼采把社会看作是一个通过狡猾的权力斗争而出现的暂时平衡的网络。福柯没有把主体的异化归于工具性（instrumentality）之类的东西，相反，他试图揭示，在主体工具化过程中，主体是如何首先变成为不同的社会实践的客体的。尽管出发点不同，但最终结果是相似的：一种总体的社会整合理论。

因为福柯已经把主体界定为一种派生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生活的一种不可简约的基础，于是他就必须把某种事物确定为主体能够从中产生的更为基本的东西。这里，既不是文化价值的各种理论，也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精神动力学能够帮助他，因为它们以主体为先决条件而不是解释它。相反，从《规训和惩罚》开始，通过规训技术的身体训练被用来说明在产生人类个体即主体的同时，对社会的整合。

就象在法兰克福学派中一样，科学与统治相联系，但是出于不同的，且更精确的历史性原因。科学（至少社会科学）依赖于制度上的身体控制技术的有效性，它使个体得以在交谈中表现。科学一旦建立起来，就出现了新的强化了那种控制的技术。正是在这里，知识与社会统治，而不是与自然统治相联系。

霍赖特认为，福柯的那幅屈从于越来越有效的、并且越来越极权主义的合理化过程的社会图景与他思想中尼采主义的成份是相矛盾的。一旦个性被简化为对身体训练的一种反映，就不会有反抗权力的支撑点来支持他最初由此提出的社会斗争的观念。行动-理论的出发点在制度理论中被抛弃了，而制度理论把权力视为对增长的人口和扩大的经济再生产的一种功能性的反应。《规训与惩罚》中悄然发生的这种变化还把整个制度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界限弄模糊了，这种方式还进一步模糊了社会的自主性。

我们已经从阿道尔诺的内化统治理论（theory of introjected domination）转变到一种同样片面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社会整合是通过身体规训而达到的。在两种观念中，社会的领域都被丢弃了，因为两者都没有充分地使社会生活的规范基础概念化。霍赖特于是转向了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看来正好解释了这些基础。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启蒙的辩证法两者都有系统地把交往还原为技术控制。这是把工具化扩展到包括整个社会的结果，就象阿道尔诺和福柯所做的那样。与此不同，哈贝马斯把整合和个性化的社会功能定位于一个独立的交往领域。

交往理解（communicative understanding）包括对他人主体性的认可，它受到各种真实性和诚实性的规范的制约，这些规范即使在实践中遭到不断的侵害，它们仍然构成互动的平台。交往并不预示着控制，而是预示着意见一致，并不预示着对规范和意义的预言和控制，而是预示着一个规范和意义的共同世界，即同一性。根据这种观念，稳定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力量或操纵，而是取决于共同承担的义务。霍赖特赞许地评论道：“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交往理解第一次被系统地当作了社会的范式”（Honneth, 1991: 243）。但是这里仍有未解决的问题。

哈贝马斯的理论最初建立在符号互动和目的-合理行动之间的鲜明区别的基础之上。他后来按照两种“主要的社会整合”重新阐述了这种区别：通过讨论而达到的交往理解和以金钱和权力之类为“媒介”的成功指向的行动（Habermas, 1984: 342-343）。在每一种情况下，前一个词涉及有关事实和规范的合理共识，而后一个词被限定于实际的控制、权力方面。于是，哈贝马斯就这样通过明确地把社会的交往方面与技术区别开来而拯救了社会。

霍赖特并没有更多地否认哈贝马斯所做的区别的有效性，因为这种区分是对它与实际的制度的关系的同一化的拒绝。再者，理解和控制的相互排斥往往被传递到它们与此一致的制度上。结果是对仅仅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功能”作了精心阐述，是家庭和国家、公共领域和经济的净化理想类型，排除了理解和控制在其中不可避免地相互纠缠在一起的真正的社会生活的内在模糊性。¹⁷ 霍赖特指责哈贝马斯错误地对“技术专家治国论主题”进行了矛盾的批判，这在他的思想中担负了启蒙的辩证法的功能。正是这个信念，对哈贝马斯观念的发展而言，在它的形成时期扩展开来，同时伴随这种信念流传的是“技术的自主化，因此还有社会进化对技术操纵的因果强制的必然屈从”（Honneth, 1991: 248）。

对哈贝马斯而言，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主题是一种“矫正实践的虚假意识”（Honneth, 1991: 218）。因此，他并没有拒绝自我扩展的技术领域（最后称作“系统”）的观念，而是认为，它必须在一个还包括规范地调控的社会“生活世界”的概念的框架中加以理论化。哈贝马斯认同了系统的“中立性”，它在其自身领域的合法性的权力。因此，他“告别了异化的概念”并且抛弃了对经济和国家彻底转变的希望（Habermas, 1992: 444）。取而代之的是他不仅在概念上，还在实践中努力维持各种领域之间的界限。在传统的激进目标的范围内哈贝马斯式的批判所提供的正是这种分界工作。

在霍赖特看来，哈贝马斯的批判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意识形态退让得太多以至于以一种具体化的功能主义而告终。（在《认识 and 人类旨趣》中形成的）哈贝马斯的早期理论提出过一种不同的思路，这种思路不是建立在行动类型的制度性相关事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社会斗争的基础之上。在那样的替代中，符号的和目的-合理的行动之间的区分仅仅是分析性的，无论制度的功能如何，这种区分贯穿于每一种制度。主题就不是规范或权力，而是规范和权力，作为形成每一种制度的相互补充的“双重方面”（Feenberg, 1992: 311）。这种研究打破了哈贝马斯后期理论的框架，证明了向更激进的早期批判理论阐述的局部回归的正当性。

的确，霍赖特继续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设定了许多问题。例如，他相信反常的交往概念，所谓反常的，是相对于非强制的认同这一理想来说的。但是他把这个概念运用到哈贝马斯曾经认为原则上受中立的工具规则支配的现代生活方面。于是，霍赖特重新把意义和价值

¹⁷ 参见麦卡锡（1991）对这种异议的有说服力的阐述。哈贝马斯（1991b: 250ff.）对霍赖特和 Joas 的批评作了辩驳。

之上的社会斗争置于系统的中心。就象在哈贝马斯那里一样，主题现在不仅仅是系统的影响范围，还有它的特殊的规范偏见。

在霍赖特新的立场的推论中间，与技术问题特别相关的有两点。首先，社会模式威胁到技术的中立性，这是一种从哈贝马斯早期文章《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1970）起一直流传至今的哈贝马斯式的基本假设。其次，霍赖特对是否实际发生像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进化之类的任何事情表示怀疑。至于他如何把他的社会方法运用到扩展的技术子系统的恶托邦逻辑中这一点一时还不甚明了。但是，即使哈贝马斯没有用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区分来充分地解释它，难道技术控制不是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权力来源吗？

在这点上，出现的两种选择未必是相互排斥的：（1）一种也许可以包括技术专家治国论主题并且使更加传统的阶级斗争的论述复活，或者取代建立在诸如种族或性别划分基础之上的社会斗争理论。或者（2），另一种也许可以用社会的措词重新表达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观念，以便揭示出在社会斗争的过程中，技术控制的渣滓是如何转变为具有支配力量的金子的。

本章涉及第二种选择。我同意哈贝马斯的这一观点，即各种现代社会被越来越有力的、其合法性由社会的技术效用性赋予的组织支配着。但是这一结果不能够被理解为脱离现实的“技术合理性”的胜利，勿宁说它是一种方法，特殊的社会集团通过它们的技术组织中的领导作用运用这种方法而取得对社会的控制。问题因而就是在一种社会理论内部重建启蒙的辩证法，而不是用一种理论取代另一种理论。

从系统到组织

哈贝马斯的“系统”概念，同样主要来自于卢曼（Niklas Luhmann），是一个特别具体化和失去个性的概念。正如卢曼所指出的，这个概念与组织社会学的发现相矛盾，这些发现突出了形成功能性团体的基础以及使它们能够追求工具性目的规范理解。如果没有对合法的目的、程序和人类关系的背景认同，那么既不仅仅是命令和服从，也不单纯是随后的官僚政治的规则看来能够发挥作用。建立在这些背景认同基础之上的非正式的网络常常起到真正的作用，为已经有功能障碍的官方组织形式作补充。成功指向的行动因此从未达到象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分化”和“自主”的程度，即使在最彻底的现代化社会，成功指向的行动也是不可避免地扎根于规范的生活世界之中。

哈贝马斯的各种范畴是从这种组织复合体中抽象出来的。因此，如果有些象技术专家治国论主题这样的事情幸免于霍赖特的批评，那么，社会的合理化必须被视为组织扩展和控制的一种结果，而不是相反。霍赖特因此认为，社会理论必须不仅仅解释各种替代——技术的控制或者合理的共识——而且还要解释在真实的情境和制度复合体中两者的交织。“社会劳动或政治管理在其中被组织起来的各种制度形式因而必须被理解为道德共识形成的体现，各种社会集团在其相互作用中通过妥协已经（并且总是）取得道德共识的形成。也就是说，必须被视为交往行动结果的道德实践的观点也共同决定了明显的目的-合理性的组织”（Honneth，1991：274）。

这看起来象是一种有希望的研究，但是在它能够被运用到对技术专家治国论作进一步的论述之前，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需要澄清。我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到霍赖特打算在什么地方来确定组织生活的规范方面：在技术信念之外，或是也在技术领域之内？在前一种情况下，例如，组织被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宗教信仰或对国家的忠诚所整合，结果并不是技术专家治国论而是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技术专家治国论主题要求进入共识形成过程中的偏见至少达到贯穿组织生活的各种技术方面这样相当高的程度。

但是这里又出现了另一种不明确性。怀疑的解释学会立即抓住诸如“技术的”和“有效率的”之类术语的修辞上的确切涵义。技术专家治国论可以存在于意识形态上受到曲解的主张和

操纵之中，而这些主张和操纵是建立在可疑的证书、行话和神秘性、人为的信息垄断，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基础之上的。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尽管存在着明显有效的策略，但难以看到它们是如何合起来形成技术专家治国论主题所主张的那么大规模的灾难。

不，既然这样，“技术的”、“有效率的”的东西将*的确*不得不是有偏见的。这里，“两重的方面”再次出现极度的紧张：技术的方面，当它体现在特殊的机构和系统时，不仅仅运用了认知-工具性的理解，而且本质上也是规范的，并且歪曲了共识的形成。这个观点缩小了哈贝马斯努力维护的对应于一般的控制自然计划的中立的工具领域与被不平等和技术专家治国论所曲解的交往领域之间的差异。技术于是就有了某些意识形态的特征，就象马尔库塞非常令人满意地所指出的那样。但是，难道这与我们相信有些事物*的确*起作用而另一些事物不起作用这一常识相矛盾吗？

霍赖特提出了一种答案，一种与人们熟悉的科学哲学的待确定主题相同的技术上的答案。“技术的规则并不完全地规定它们向具体行动转变的各自的形式。制约行动可能性的并不是再三要求考虑目的-合理性，而是通过规范的或政治的观点的额外运用”（Honneth, 1991: 254）。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技术就不受人类利益的支配，而恰恰是另一种社会战场。因此，人们不能简单地把对技术事物的决定移交给专家和他们的老板，而不冒在技术上相同的事物之间进行自私自利的选择而使结果受到歪曲的危险。（这个“纯”技术概念恢复了哈贝马斯的区分了吗？*的确*没有，因为它涉及到技术系统的抽象特征——一项工作中的可测量的有效性——并且没有使各种技术的目的、技术具体化，这包括许多其他的性质。）

随着待确定概念的这种运用，霍赖特打开了通往技术转向的道路，而批判理论在对马尔库塞的新科学和技术的乌托邦的建议失望中警醒后，曾经一直抵抗着这种转向。但是霍赖特自己没有理解这种转向。他的书尽管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一样从技术问题上躲开了。不愿意涉及这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最近十年的研究和政治行为已经如此地摧毁了对技术自主性的信心，以至于使我们能够根据新的条件重新开始旧的讨论。

这就是我下面所打算做的工作。我将努力解释技术选择如何既以规范的选择为先决条件，又产生规范的结果，它们如何在团体内部发生作用，并且，反复的团体行为过程如何能够具有哈贝马斯对《启蒙的辩证法》进行的系统-理论的重新阐述中部分获得的自我扩展的性质。

授权和共识的形成

在现代社会，对技术的控制与对社会的控制结合在一起。但是，那种控制不能直截了当地被视为和规范的合法力量是一样的东西。修正了的技术专家治国论主题必须说明一事物如何从这一事物变成他事物，现代权力系统如何在没有传统的对外在于技术领域的意识形态的依赖下成为合法的。我们的研究必须加以证明的是揭示在社会中，更具体地说，在组织的条件中，理解和控制本质上的相互交错。我们必须表明，规范的共识如何不仅来自于霍赖特所讨论的那种社会斗争，而且还来自于现代组织中共存的不同集团的技术作用和任务。

可以把重点放在各种机构（mechanisms）如何能够具有规范上的强制性以及技术上的有效性这一问题上。布鲁诺·拉陶（Bruno Latour）的“授权”（delegation）概念提供了一种答案。拉陶认为，规范按惯例体现在能够执行这种或那种义务的装置中。他举了自动门闭合器这个粗俗的例子，它取代了那些进出者欠缺的义务感。道德命令“关门”在机制中被具体化了，按拉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就是被“授权”于它（Latour, 1992）。

那么，技术装置体现了某种规范共识的证据是什么呢？它们的效果难道不能用纯粹战略上的措词得以更好的解释吗？当我们把财产的秘密“授权”给一把锁时，我们便以一种战略上的干涉取代了一种伦理要求。但那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锁也具有被那些看到它的人所易于识别的

交流的内容：确定了所有权，或者也许确定的是那种其全部的严肃性尚待证实，而不是不言而喻地假定的所有权。同样，门闭合器标志着人们所期望的门以及关闭它的状态。体现在技术中的具有足够重要性的战略性干涉恰恰没有改变世界，它们教给我们的是世界如何去被期望。就这方面而言，技术仅仅超越了战略，并且参与了社会共识由此形成的交流过程。

我所举的例子到目前为止也许看起来是琐细的，但提出了更加严肃的问题，这里，确定社会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拉陶所指出的，“我将把……由非人的授权反过来强加给人类的行为称作规定（*prescription*）。规定是机制的道德伦理维度。不管道德家们如何不断地哀叹，没有人象一台机器一样具有不折不扣的道德性……我们不仅能够把我们已经了解了数个世纪的规章等的效力授权给了非人的东西，我们授权给它们的还有价值、责任和道德规范。正是因为这种道德性，不论我们感觉我们自己是怎样的软弱和邪恶，我们，人类，都如此合乎道德地行动着”（Latour, 1992: 232）。把这种立场当作纯粹具有字面意义而不予考虑将是一种错误。这里有一个实际性的主题，即这样一种观念：社会联系不仅以技术目的，而且还以主体间的交往为中介。那种中介维持着规范性自身特有的（*sui generis*）形式。事实上，拉陶认为，既然传统、法律和口头协议不能简单地发挥整体的作用，如果没有技术的中介，社会的内聚将是不可理解的。

在拉陶所要求的道德领域中，授权也许不会发挥全面的作用，但是他的解释的确提出了一种有趣的组织上的运用。装置中所包含的规定随着白领和蓝领、观念和执行、命令和服从的区分，也确定了劳动分工。就一般化的共识确定了角色名单尤其是其中好的表演的愿望这一点而言，技术选择就是规范的选择。再者，因为权力和服从与成员资格不可分离，这些选择也使得组织等级制度合法化了。附属于组织的产物或活动的价值向下转变而使组织结构和组织中个人的地位合法化。

拉陶的观点能够用哈贝马斯版的帕森斯的“中介理论”的术语来重新构造（Habermas, 1987: 183）。帕森斯曾经提出过一个相当详细的构想，在这个构想中，像威望之类的非语言媒介调整着以市场为模型的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哈贝马斯把帕森斯原来的建议剥离得只剩下两种“非语言化的行动协调中介”：金钱和权力。这些制度通过用系统地客观化了的相互作用来取代通过对话而达到的理解而使社会生活简单化和一体化。如果这里所提出的论证是正确的，那么技术将是另一种这样的中介。

然而，哈贝马斯的中介理论在对技术的这种讨论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局限。他仅仅是在中介取代了交往行动的地方，例如在政治中，才反对中介。这就是著名的“殖民化主题”，它批评了在非工具性价值才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生活领域中不恰当地发挥其作用的媒介的内在工具性倾向。但是这种研究似乎意味着，错误仅在于媒介在它们“合适的”领域之外的运用，因此，它并没有为对这个领域之内的任何事物的批评提供基础。在那样的水平上，就需要进行不同的探讨，它所关注的是我称之为技术的实施倾向（*implementation bias*）。这种倾向产生于在根据社会规范或利益进行的技术上不充分的设计多样性中选择其一。下一节将做进一步讨论的装配线为实施倾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装配线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体现了内在工具性倾向，而是它的实施倾向是等级制的。

这种区分与单独的殖民化主题相比，有助于对协调中介进行更为具体的批评。例如，就市场来说，人们必须考虑下列这些因素的影响：引入一种等价交换系统，由财产系统（资本的公有或私有）所引导的特殊的实施倾向，对外部事物的责任，以及在谋职和取得信用中年龄、种族和性别歧视的作用，等等。也还需要对权力进行类似的说明。无论如何，在考虑技术时，人们必须超越对一切目的-合理行动的成功特征所采取的一般化倾向，重视特殊的技术决策的规范性运用。

随着这种修正，中介理论开始与福柯的权力谱系学具有某种相似性，并且实际地预示了一种纠正后者片面强调整体规训的方法，正如霍赖特所指出的，对身体规训的片面强调具有一种可疑的行为主义色彩。如果沿着上面所说的思路认识到装置的规范功能，那么人们就能够对福柯试图说明他自己的权力/知识两重性理论的那些文字有更好的理解，就象下面对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描述：“权力的行使并不象严格的、有力的强制那样，是从外部添加给它

所具有的功能的，而是如此巧妙地存在于它们之中，以至于通过自己增加它自己的联系点就能增加它们的效率。圆形监狱的机制并不仅仅是一个枢纽，一个权力机制和功能之间的兑换点，它是一种使权力关系在功能中发挥功能、通过这些权力关系使功能成为功能的方法。”（Foucault, 1977: 206-207）那么，如果一种特殊形态的非-口头的规范性共识没有形成和实行，这种在机制中巧妙存在的权力究竟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这看起来象是一种希望，的确，它几乎划了一道明显的线索。然而，“技术”一词在《交往行动理论》（Habermas, 1984, 1987）的索引中甚至都没有出现。我猜这种保留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如果目的-合理行动的最基本形式与社会相关，那么对理论的结构来说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哈贝马斯将失去交往与技术控制之间的严格区分，而正是技术控制保证了交往的独立性，并且使社会理论避免退化为马克思主义者之流的一种生产劳动的神话。

尽管有这些合理的担忧，但哈贝马斯为他在方法论的谨慎上所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我们生活在生态危机，普遍的计算机化，不断出现生物技术、新的电子通讯形式和军事硬件的世界中。如果批判理论没有面向这个世界和它的各种问题，它将很快变得不合时宜。因此，我将继续验证上面所构划的假设。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技术代码

技术专家治国论主题认为，人类已经成为社会机器中纯粹的齿轮和技术控制的对象。哈贝马斯用追求共识中的现实人类交往取代由客观中介而形成的行动协调的方法重新解释了这种条件。霍赖特反对这些阐述，理由是，人类融合进技术系统意味着，在控制的客体是一件事物的地方，就缺少某种规范的条件。关于这一点，我将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些规范条件至少能够被部分地授权于技术，而且，那正是技术专家治国论所做的一切。

修正了的技术专家治国论主题同意哈贝马斯所认为的效率的考虑日益取代了交往互动。然而，它进而认为，技术设计不是中立的，而是通过支持统治利益的授权具有规范上的倾向。这些最普通的授权形成了各种未经检查的、确实为技术本身设计的文化假定的背景。我把这些假定称为社会的“技术代码”（Feenberg, 1992, pp. 313-315）。在资本主义和它共产主义模仿者那里，这种代码使得技术设计偏向于集权化和等级制，系统地削弱了能动作用和参与，因此也削弱了交往的合理性。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技术代码的出现看来在两种情况下是最清晰的。首先，自动控制取代了工人的技能。非技术化减少了与传统手工劳动有关的工人的主动性，以有利于越来越多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尽管这不是什么新东西，但随着诸如劳动和财产权等等这些资本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正当理由的削弱，它的意义已经改变。今天，人类权限向机器的授权不仅仅改变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权力平衡，而且还改变了作为一个工人究竟是什么的意义。以前工人主要被认为是一种单独的经济代理人，商品——劳动力——的所有者，今天的工人是“人力资源”，“机器系统的组成部分”。¹⁸

扭转非技术化和集权化趋势的努力通常是片面的，因为管理部门控制着创新过程并且选择着满足其需要的事物。更弱的一方通常提不出技术选择，因此，管理部门的选择对更高的生产率来说就似乎是“一种最好的途径”。于是，反对非技术化似乎就是反对“合理性”这一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¹⁸ 引文来自安德鲁·尤勒（Andrew Ure）具有预言色彩的《制造业的哲学》（*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出版于1835年，尤勒（1835: 18）写道：“根据人性的弱点，会发生的情况是，工人越熟练，越容易变得任性和难以管教，而且，当然，越不适应机器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系统中，由于偶然的不正当行为，他也许对整体造成巨大的损害。因而，现代制造业的宏伟目标就是，通过资本和科学的联合，把它的工作-人员的任务缩减为值班和敏捷地使用身手。”

但有时这些努力成功地有效改变了新技术的设置和运用，戏剧化地表现了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进步的直接结果的事物的规范性偏见。在非常虚弱的联系条件下，管理部门本身有时选择使一定数量的控制返回到工场车间，以期解决动机问题。这也阐明了所谓的“技术命令”的独断本质。

其次，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组织把它们重新构造于技术中介的周围，正是这些中介加强了中心化和控制。现代医学最近几年已经从这样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变。庞大的官僚机构现在调动了医生的劳动并通过他们调动了患者的身体；这些官僚机构并不是从它们在治疗中的作用中获得它们的权力的，而是从对建筑物、器械，以及会计系统和计算机之类的财务工具的控制中获得权力的。

把治疗重新界定为技术干预的一种形式改变了医生和患者的作用。交流，或“关怀”功能授权给药物是这些变化的特别重要的结果。过去，当医生不能治愈疾病时，他们被要求向患者说清楚他们的问题，帮助他们理解他们的状况并知道如何对待它，而且要使他们相信已经尽心尽力了。今天，处于这种疑难境地的医生常常宁愿给患者一种象征性的技术关怀，一种勉强有效，或者甚至是无效的药物治疗。结果，患者被剥夺了权利，没有什么办法来理解和控制他们的境况，也失去了进一步要求药物的权力的基础。

第五章讨论的是数千治不好的爱滋病患者对这个系统的加入是如何动摇和改变它的。关键的问题是进入实验性的治疗。临床研究是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一个高技术化的医疗系统能够照顾那些尚不能治愈的人。但是，直至前不久，进入医疗实验还受到对患者福利的家长式关心的严格限制。爱滋病患者终于能够开始参与了。这时，他们的疾病才第一次被治疗，他们属于围绕同性恋权利而动员起来的社会网络，与同性恋权利平行的是使他们受感染的传染病网络。不再作为单独的技术实践的客体对医疗进行参与，他们以集体的方式对它提出挑战，并且把它推向新的目标。对技术专家治国论式的医疗组织而言，他们的斗争代表了一种反动的趋势，是一种恢复它的象征维度和关怀功能的尝试。

从这些例子中出现了一种普通的模式。尽管有爱滋病患者之类的偶然的反抗，工作、医疗和其他社会活动的技术中介创造了一个这样的社会，它取消了它的成员进行有意义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劳动分工成为社会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榜样。在工厂或者医院或者学校就象在整个社会一样，专家的意见使权力合法化，而“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在于承认它的要求并且尽责尽忠地执行不用思考的从属的任务。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从根源上受到了这些条件制约，它不仅仅是因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也因为规范上有偏差的技术设计，哈贝马斯看来是不加批判地认可了这种以中立的认知-工具性面具招摇过市的技术设计。

这些例子指出了一条把霍赖特的异议考虑在内的修正技术专家治国论主题的道路。同样的使个体屈从于技术器械的过程也产生了一种默认的规范性共识。在这些情况下，授权有效地压制了公共讨论。装配线不仅迫使工人根据管理部门的愿望来调整他们的工作速度，它还把好的工作界定为与它所设定的速度保持一致。医学诊断和处方不仅提供了某种治疗前景，它还表明了医疗保健的意义。在这些例子中，能够提出来，但难以通过讨论而得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工作并且谁来控制它？功能障碍的个体对社会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权利要求？技术专家治国论只不过是授权来解决这些争论而已。

行动和共识的形成

霍赖特不仅坚持技术制度的规范性方面，而且也坚持社会斗争在规范的确立中的作用。但是，在不倒退到诸如阶级实在论（class essentialism）这样的不可信的研究的情况下，如何公正地对待社会斗争呢？霍赖特提出了一个出发点：“彼此间有交往联系的集体行动者并不需要被看作是宏观-主体；它们能够被理解为社会团体，它们的集体同一性本身是脆弱的，而

且总是威胁到个体间所进行的社会化过程的结果”（Honneth, 1991: 275）。集体的内部生活于是必须得作为一种解释学的过程来加以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境况、利益和自发行动倾向的结合建立了共同的信念和事业。

尽管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规划，但它意味着比发达社会实际展现的不稳定性远远大得多的不稳定性。对霍赖特来说，团体似乎是“脆弱的”，因为他认为团体形成机制的脆弱性：解释性的理解。正如我将表明的，存在多种支配这种机制的方法，能够对其作出更加现实的说明。

霍赖特求助于卢西恩·古尔德曼（Lucien Goldmann）的发生学的结构主义来作支持。古尔德曼的理论来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对他们两人来说，阶级的形成依赖于以共同的理解（“阶级意识”）为根据的集体行动的确立无疑内容的结合。团体的同一涉及到从特别狭窄的环境下的日常行动向更广泛的社会概念的普遍化，而更广泛的社会概念相应地意味着更广泛的（阶级）团结和行动。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内省认知程序（reflexive cognitive procedure），它不同于理论反思，在理论反思中，思想体现在行动中，而行动被转喻地理解为取代了一种更大的社会决断框架（Feenberg, 1988b）。¹⁹（现象学的社会学提供了一种相似的研究。）

就技术专家治国论的问题而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突破必需运用到这种内省的意识理论上来：第一，阶级的行动者必须根据它们在诸如公司和国家机构之类的现代合理化的社会组织的内在生活中的作用重新被概念化；第二，反映在意识中的行动必须不仅包括政治的和联合的斗争，而且还要包括由技术选择决定的各种姿态。当然，现代社会中不仅存在着有意义的行动，而且还存在着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威胁，它们把阶级同一性压制到这样的程度：组织仍保留有行动，甚至是对抗行动的空间。

如果这些假设成立，那么，使内省的理论适应以技术为中介的行动状况的结果将是什么呢？如果团体的自我理解结合了它们的行动，我们能够通过颠倒授权理论的术语并把它引导到组织共识的论述中去的方法揭示技术的规范作用。

正如上面所讨论的，授权具有丰富的规范性意义。在建立行动框架中，它们确定了什么是应其所是的东西，组织的所有成员正是由于他们的归属而对行动框架负有义务。因此，一旦一种装置被成功地安装，它所具有的规定就能够作为组织基础的规范性共识的具体内容而被提高到意识的高度。

使人工制品的设计定型的技术代码因而同时是等待结合的默认的组织共识的基础。让那种共识在一个技术决定论的团体意识中变得清清楚楚巩固了团体，因为这为协调行动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出现问题和冲突时，管理机构常常能够通过工作过程的技术条件而平息它们。这是一种有效的召集部属以形成有关行为和目的的共识的策略。这种策略频繁的，甚至能够预料到的成功是由于这个事实：即，它对事态明显的真相产生了积极的共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并不是霍赖特从团体形成的纯粹解释学理论所预言的那种脆弱和变动的忠诚，而是相对稳定的组织构造了现代社会。

¹⁹ 卢卡奇和古尔德曼的立场可以从决定论和目的论上解释为一种潜在宏观-主体理论，这个昏昏沉沉睡去的宏观主体就象一位神话中的公主，正等着**理论**（Theory）亲吻而重新唤醒生命。此外，因为阶级界线和利益正是由那种要求成为它的解释学的自我-理解的理论所规定的，就存在着教条主义的风险。那么，在理论之外，什么事物能够保证这种同一呢？然而，要避免对内省的说明做出粗暴的理论家式的曲解，要充分地记住学习过程的特殊性，阶级意识正存在于这一过程中，即对最初未澄清的局部行动的联结。卢卡奇和古尔德曼遗留下来的未解决的那些问题并不象有些批评家所主张的那样，产生于斯大林主义者的对党的忠诚，而是产生于没能清楚地指出起联结作用的理论构造上的问题。布尔迪厄的叙述社会学（sociology of representation）对这个目标提供了一种研究模式。（Bourdieu, 1981）

待确定和操作的自主性

这些思考使我们在重新系统地阐述社会中的技术专家治国论主题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我们仍然需要一种对自我-扩展的合理化过程中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力量积累的解释。这是一种经常被称作功能主义或决定论模式的社会动力学方面的问题。这类模式是可靠的：即使我们不喜欢时间箭头所指向的方向，但发展的过程是合理的、必然的，被系统或技术规则所支配。霍赖特指责阿道尔诺、福柯和哈贝马斯用功能主义取代了社会斗争的说明，正是在社会斗争中实际地决定了权力的越发不公平的分配。

就它恢复了社会秩序的偶然性，并且因此还恢复了有效反抗的潜在性而言，我赞成这种批评。但是霍赖特没有解释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在发达社会中，技术控制起着权力基础的作用。我认为这是因为他忽视了另一种既不是功能主义，也不是决定论类型的系统作用。

不是任何长期累积的社会过程都是对功能规则的反应，有些最重要的过程产生于正反馈周期。经济理论充满了这方面的例子：通货膨胀期望值的作用，通货市场自我实现的预言，城市衰退的雪球效应，等等。这里我将申明的是，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力量是同样的类型，是没有根据的，偶然的，然而却是单向的发展趋势。

假如存在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转折，那么待确定的概念就再一次地适用于我的目的。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从传统中解放了技术选择过程。他揭示了对传统技术和劳动分工的取代如何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组织——企业，而且其中还在劳动分工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岗位——企业家。这个过程是引入方法和技术的累积结果，方法和技术加强了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控制。非技术化和工作的机械化巩固了资本家在他们已经创造的新组织中的权力。无论工具理性如何成为社会活动的中介，合理化理论及它不同的追随者——对启蒙、权力/知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批判——都把这种模式扩大化以用来解释相似的权力集中。

不幸的是，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的观点是含糊的，因此常遭各种矛盾的解释。如果象普遍所认为的那样，他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将无法挽回地驳倒他的理论。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对他的观点做另一种解释也是可以的。《资本论》中有一些段落，其中马克思认为，技术替代之间的选择根据的是社会的，而不是技术的理由。例如，他谈到，“写一部自 1830 年以来的真正的发明史是可能的，这些发明的惟一目的就是为资本提供镇压工人阶级反抗的武器”（Marx, 1906: I, 476）。这里，资本家被说成目的不仅在于积累资本，而且还在于控制企业；他的技术决策增强了他的力量并维护了他在未来做出类似的决策的能力。意思是说，无论生产效率如何，他都不会引进削弱他的控制的新设备。这段话意味着非-功能主义的系统理论取代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解释中，对技术主动性的占有就象对资本的占有一样都是在其自身的基础建立起来的。技术专家治国论就不是“技术规则”的结果，而是在特殊的发达社会环境下追求阶级权力的结果。

这种研究解释了技术领域社会冲突的作用。如果另外类似的技术替代对组织权力的分配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那么，寻找技术替代之间的选择常常变成激烈斗争的目标这一点就不足为怪。正如上面所讨论的，非技术化过程和医学有时也是这样。与技术选择方面相似的冲突状况也出现在教育、运输政策、大众传媒、国内电讯，以及许多其他的领域。这里，组织控制的扩展也是以技术选择为中介的，而且有时受到来自下面的抵抗。就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这一点而言，这正是由于这些抵抗的失败而形成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共识。

我用“操作的自主性”（operational autonomy）这一概念来描述那种在可行的技术替代中，从使技术主动性最大化着眼、经过反复选择的权力积累（Feenberg, 1991: 28-29）。操作的自主性的保存和扩大是资本主义技术代码的核心。任何其技术发展受这种代码支配的社会，不管它的财产系统或政治结构如何，都将表现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性。

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这种论述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经常被认为处于社会斗争领域之外，就象哈贝马斯那样。操作的自主性既描述了代理人（agents），也描述了赋予他们权力的社会结构。在做技术决策中，资本家在传统代码方面起着相对自主的作用；同时，这些决策创造了一种正是这样自主的决策才能从中产生的中心结构。当从社会-历史角度来考察组织时，问题的关键就是资本家在引进有利于他们自身不断增长的技术主动性的技术时的积极作用。但是从结构的角度看，资本家在组织中的地位由他们所运用的技术设计所决定。那么，哪一种看法是重要的呢？

因为共产主义系统也建立在操作的自主性基础之上，这已经意味着一个与资产阶级相似的“新阶级”已经在其中获得了权力。然而，似乎更应该从阶级代理人的作用中进行一种彻底的抽象，而且因为他们相异的意识形态和财产权是不相关的，因此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事情的结构性事实上。不管政治系统如何，技术似乎总需要等级制的管理。这就是许多普通的技术专家治国论主题形成的根源，它不再肯定工具性行动的结构对社会的优先地位。当然，在所有的这些形成过程中，不清楚的就是在任何待确定的体系中机构（agency）和规范的基本作用。

通过把任何事物都放在当作它们的中介和对象根据的（规训）实践结构的基础上，福柯试图避免阶级力量（class agency）与结构的两难境地。例如，一种象圆形监狱那样的技术被解释为物质化的监视实践。福柯非常细致地描述了诸如监狱、诊所、学校和工厂这类现代组织中这种实践的工作方式，但对技术专家治国论力量的动力机制，以及规训技术从一种机构向另一种机构“毛细状的”（capillary）传播却缺乏同样具体的阐述。霍赖特认为福柯的意思是，这种发展是对人口和经济增长的一种功能性的反应，但是，它难道不可以归因于能使自身永久存在的、维持控制和技术主动性的规则呢？在福柯的著作中，持续不断的合理化过程因此解释了现代社会相当神秘的“无主题的”进化。

结论：再现的技术专家治国论

修正了的技术专家治国论主题的三个问题在这种讨论中出现了：（1）由于规范性的理解“授权”给设备而导致的组织共识形成过程的畸变；（2）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联结的作用；（3）技术专家治国论权力的积累中操作的自主性的作用。

技术专家治国论是由对那些有利于等级制控制的技术替代进行系统的、长期的选择所造成的。在对全局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和地点可以买到并引进的装置也能够通过技术的授权来改变组织的规范结构，在技术进步显然未受到挑战的媒介中，这种技术授权体现了一种新的规范性共识。

现在，技术专家治国论主题能够被重新构造，以便更广泛地运用于使扩大的等级制控制系统得以巩固和合法化的技术授权。大规模的组织变得越是普遍，与它们相关的操作的自主性就变得越有意义。象工场或监狱这类机构的以前非常特殊性的内在功能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组织将通过那些增强他们的权力和合法性的技术授权疲于奔命地试图解决规范的争论。就这类组织增加和成长的范围而言，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主题获得了一定的可信性，为启蒙辩证法恶托邦式的推测作了辩护。

为未来推断这样一种系统的确描绘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然而它并不完全是阿道尔诺或马尔库塞所发现的缺少社会冲突的“单面”社会的景象。操作的自主性是出现的新团体和挑战能够加以争夺的实践的结果。尽管存在困难，但是正如我们最近几年在不同的有关劳动组织、医疗政策和环境的斗争中所看到的那样，授权能够成为关注的焦点。新的技术公共领域中的争论要比过去更经常、更系统地使技术决策的规范内容凸现了出来。尽管扩大的技术决定论是一种真正的威胁，但它不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它的论述需要和当代的“权力批判”结合起来。

第五章 论人体实验：艾滋病和实验医学的危机

“没有必要从本体论上反对带有组织、技术和文本性质的事物。”

唐纳·哈拉维 (Donna Haraway, 1991: 212)

受控机体 (cyborg) 医学

在常识的世界中，社会规范和技术属于不同的领域，只有当技术干预的各种目标被确定时，它们才有联系。这些目标就像笛卡尔的松果腺那样，允许精神和肉体之间进行无法忍受但却是必要的交流。价值和本质外在结合成效率的技术-逻辑。

在这种结构中，医学把关于肉体（曾被科学地理解为一台精巧的生物机器）的客观知识和体现在健康中的主观价值结合了起来。客观性和主观性彼此间超越使医生和患者分离开来的制度隔阂而相互对应，医学因此成为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复合体，两者都为对方精心确定了作用。尽管在医生的职业义务中体现了患者具有的权利 (right)，但医疗的权力 (authority) 来自于对专门知识的控制。当然，这些权利不会扩展到干扰医学的技术层面，医生的权力也不会无视在其之下进行医疗实践的社会规范。

这种观点或许被人们广泛接受，尤其是医生。但是，对这种简单的关于医术的描述，人们有理由表示怀疑。最近，艾滋病患者发起的试图影响研究和治疗机构的斗争已经比以前所有的患者抗议活动都更加明显和有效地改变了医疗方法。这些斗争实际上表明，医学在其自身的技术结构、工具和程序设计中包含着各种规范。从这些斗争中，人们也会发现，患者对于康复以及其所规定的义务和权利的理解实际上以不同的方式与技术状态相关。

“身体是一架机器”的观念就是一种范例，而不是一个事实，像所有类似的范例一样，这种观念既有它的用途，也有它的局限性。数不清的研究揭示了康复过程中消沉态度的影响、控制病痛方面权威的意见和解释的功效、患癌症后社会支持对生存的作用，以及对过高死亡率的迷信等的作用。这里，原先所设想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截然可分的领域出人意料地融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对常识的否定。现在，有可能把这种事例解释成例外事件并且把它们所提出的边界问题当作无足轻重的事情排除掉。另一方面，这些“例外事件”日益清楚地预示着要对它们以这种方式出现于其中的整个结构进行更加激进的批判。那种结构本身就是人体的一种确定无疑的缩影。

人体是医学知识和行为的对象。就人体既是医疗技术实施的对象，又是要求医疗服务的载体而言，它是既作为客体，又作为主体而进入医学领域的。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区别而使得两种人体集一身正常化了。作为客体，人体是一架机器，就像笛卡尔几世纪前对它的定义那样。作为主体，人体是一个要求话语权利的道德-法律实体。两种人体截然不同，就像中世纪政治神学中国王的两种身份：一种是物质的，另一种是精神的。心理学，被认为能够解释主观经验对健康的异常的影响，也不能清楚地解释这两种人体。

但是，从这些历史资料中，双重人体概念的人造性已经昭然若揭。笛卡尔的人体概念是伴随着新的机械论的世界观而出现的，这是一种明显的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发生的社会变革有关的自然观。因此，非-社会的机械论是把社会当作机器一样推断出其世界模型的；同样，人文主义法律-道德主体的定义源自于神学上的日益令人难以相信的灵魂概念。像哈贝马斯那样试图通过为价值设定一个先验基础来挽救这种观点的实质也不能使人完全信服。

一旦灵魂消散于现代性中，两种人体就会重新合而为一。最近，机械论以神经生物学的思考为基础又得以恢复。意识原则上毫无例外地被看成是大脑的产物，但不幸的是，从医学角度看，这只是一句空话，因为现在的神经科学很难理解在健康和疾病方面我们仍然迫不得已地称之为“精神”的东西的多重含义。

同时，后现代反对科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种种论证激起了器质论（organicist）关于肉体化自我（the embodied self）的讨论。对科学的怀疑论导致了对直接经验的信仰主义，正如教条的怀疑论曾经证明新教对内启的信仰的合理性。现在，医学不是通过使人体客观化直接地要求人的权利，而是直接被用来治病，参与到自我特定的世界中去。尽管这种观点至少使医学重新关注患者的真实体验，但是它不能解释科学治疗方法的明显功效。因此，这些方法都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的解决途径。

也许我们需要的既不是一元论的还原法，也不是关于孤立个体的二元学说。两种观点都把不可比较的、其中表达了医学知识和经验的话语对象具体化了，并且试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调和这些话语。相反，我们需要把那种认为医学是两种不同客体——科学和社会、身体和规范——的混合体的观念颠倒过来，并且把这些不同的方面重新看作实践系统的产物，根据哈拉维有启发性的隐喻，我称之为“受控机体医学”（cyborg medicine）。对哈拉维而言，受控机体是一个有用的象征，因为它并不需要自然心理学或先验的构成主义就使精神和机器形成了社会的，因此也是混杂的联系，这种心理学和构成主义是笛卡尔学说中把精神与肉体联结起来的松果腺的两个版本，现在，我们必须学会超越这一点。

在受控机体医学中，自然和文化不再起着原始术语的作用。不仅在用科学的话语定义它的比喻和模型中，而且在创建其知识的实践和程序中，自然已经是社会性的。以机械特性来看待医学人体客观性的认识论的特殊地位被推翻了。但同时，哈拉维也拒绝人文主义的道德-法律人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要么超越各种经验条件，要么以各种罗曼蒂克的方式建立在关于生物的理想基础之上。自我也是由社会构造的，因此，不能从外在的角度来评判科学和技术。解决途径既不是天真地相信科学的客观性，也不是回到文化之前的自然状态。

为了强调肉体和精神的实际内容，哈拉维把科学和亲身体验的对象说成是文本，而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自然的文本化使它更接近于文化，确实把它当作一种称之为“自然”的文化。同时，哈拉维很注意不把自然还原为人类行动者的一种自由自我表达。而那种后现代运动则大胆地混淆我们自身界限（我们仍然没有能力把我们周围的世界结合到我们的计划中来）的各种条件，混淆自然对我们要的各种预料之外的“诡计”，混淆我们理解自然的各种方法，正是这些方法既阐明又模糊了我们的生命和行为的前后关系。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重新重新构思身体的统一体？两种不同的文体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以记忆叙的。科学的文体如何与其中存在个性的文体共存？对医学而言，两者之间什么样的转换才是确切的？这些都是由哈拉维的反思而引出的新问题。下面，我将论证，在回答这些问题中，伦理学具有最重要的作用。

受控机体的形象是矛盾的，它预示了发达社会两种进化的可能性：或是主客体的一切方面总体上结合成像遗传工程和计算机自动控制那样的文本控制技术（textual technologies of control）；或是在拓展人类能力的弥补性发展过程中技术和人体“友好地”共存（Haraway, 1991: 178）。“机器不是一个被激活、崇拜和受控的它者（It）。机器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过程，是我们化身的一个方面。我们能够为机器负责，而它们不会支配或威胁我们”（Haraway, 1991: 180）。

在医学领域这种二难境地是很明显的，因为在医学领域，它确定了医-患关系的不同形象。如果患者只是简单的机械式肉体的载体，那么他就是接受医疗技术的被动客体；相反，如果患者在身份策略中成功地掌握医学的全部文本，那么，一种十分不同的景象就会出现：医疗技术成了知识和康复集体主体的中介，这个主体包括医师、科学家、病人和其他所有涉及研究和治疗的人。

医学研究是探讨这种二难境地的特殊场合。在研究中，很难维持这种尖锐的对立，而使常识得以缓解。科学总是被迫地走向由其传统向它打开的机械论的道路。然而同时，人体实验对象最近已经通过把他们自己研究的具体经验的医学含义戏剧化的方式，开始推翻机械论观点。这种二难境地产生了要在研究设计中进行创新的伦理要求，患者，尤其是爱滋病患者，已经试图使科学客观性的要求与这些伦理要求相互协调。结果是公认的制度角色的显著衰弱（Epstein, 1991; Treichler, 1991）。在这一章中，我将研究这一富有成效的开端，对受控机体医学理论来说，这一开端是一种合作的医疗实践。

关怀和治疗

在过去的世纪中，医学的本质和功能已经逐渐变化了。曾经主要旨在关怀病人的交流活动，已经变成了一种能够越来越成功地治疗病人的技术行业。尽管没有什么人想要拒绝这些技术进步而退回到过去，但医学的传统关怀功能已经被新的体制所遮蔽，而且，它现在因为缺少人之间的接触而受到指责，对患者来说，即使在医学知道如何治疗他们之前，这种接触对治疗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人类交往与技术，哈贝马斯学说中的生活世界与体系。我们似乎回到了恶托邦的框架，而且的确有一些具有恶托邦色彩的东西是关于医学的一种必然趋势的：医学成了一种纯粹的技术活动，患者只不过是其中的标本。

但是医学并不只是如此简单。如上所述，对医学实践的研究表明，患者的身体状况时常受到医疗交往质量的影响，医疗交往构造了整个治疗活动。即使像解释一个程序的可能效果这样基本的关怀形式，对结果也能产生影响。此外，像外科手术或开药方这样的技术本身就是关怀的各种象征，恰恰不是或多或少有效的治疗，因此，技术干预的风格对患者有影响，这一点连内科医生也并不总是表示怀疑。自相矛盾的是，作为纯粹技术活动的医学已经是一种交往形式，而交往却通常被看作是技术的结果。

这些复杂性通常安全地隐藏在医生和患者只是朦胧地感觉得到的背景中，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却不可能忽视它们。这些困难的情况是，医学尚不具备有效的治疗手段，因而这时，对旧的关怀风格的需求就特别地强烈。这里，现代医学中的肉体和精神、技术和规范无法解脱地纠缠在一起，再次突现了道德问题。

面对那些症状难以理解的患者，医生不能简单地耸肩了事。相反，在解释这些模糊症状、经历测试或检查程序、尝试各种治疗，也许还包括实验治疗等等这些方面，他们必需谋取患者的合作。放弃治疗就是抛弃患者，而继续治疗就是让病人付出代价和冒险。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医生和病人的相互职责就产生了与权利和义务相关的所有问题。

这些思想与哈拉维所要求的“‘激活’以前各种被动的知识客体范畴”产生了共鸣（1991：199）。当然，在医学中，那些客体包括我们自己，因此，与技术行业的情况一样，在临床环境中寻求知识和治疗就是一种我们被卷入其中的、在规范上受控的交往。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伦理学，甚至政治学从一开始就是医学知识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人文主义的追思。“然而，一个‘真实’世界的解释不是建立在‘发现’的逻辑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充满权力色彩的‘对话’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1991：198）。那种对话必然遇到伦理和技术双重问题。

最近几年，随着爱滋病患者想参与医学实验的迫切要求，医学疑难病例获得了新的、令人烦恼的透明度。只有爱滋病已经把绝症患者和医生之间的长久冲突戏剧化地表现了出来。这些患者经常希望参与临床研究，然而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了。正如《国家孤儿疾病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所总结的：“大多数患者和家庭都愿意使用测试药，但是他们发现，找到他们能够参与的研究项目的信息实在太难了”（1989：xiii）。结果是，他们被迫进行不受监督的自我实验

，并且常常加入非传统的治疗规划。在他们看来，对绝症而言，实验疗法是一种合法的关怀形式，尽管他们知道，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而且感到自己被医疗机构和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粗暴地排斥在关怀形式之外。直至最近，多数医生和伦理学家依然认为这种实验观是非理性的，是自欺欺人的结果，而不予以考虑。但不管怎样，爱滋病患者已经有效地动摇了人体实验研究的准则。

下面，我试图借助临床研究中的“参与者利益”（participant interests）概念来证明这种趋势的正当性，我把它与人体受试者的权利相区别。但是，在转向这些问题之前，我将简要回顾一下临床研究领域中规章政治学的演变。只有在这种演变过程中，参与者利益才最终得以承认。

对伦理规则的反叛

人体实验的伦理规则应该能够阻止医药公司牟取暴利，保护病人免受研究人员更多关心科学而忽视人性的危险。伦理学的各种准则是用来保证病人的各项权利的，这些权利有：拒绝把他或她的身体让他人使用的权利，知情权，随时退出的权利，治疗由于参与实验而发生的并发症的权利，等等。

1966年，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对人体研究颁布了严格的规章。从此以后，道德风气事实上有所好转（Curran, 1969）。这些规定设想在道德目标和消费者保护方面取得成功，第一步使人体实验对象的权利法律化，第二步防止缺乏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科学鉴定的药品销售。

假设我们当前关于临床研究合法化的流行观点，起源于二战后对虐待病人和战俘的反感，那么，对于权利的片面强调是可以理解的。在那种环境下，实验性的参与当初看起来似乎是个人的对社会的牺牲。因此，病人参与的期望首先表明了他们的误解。毕竟，经常提到或暗示出这样一种观点，只有绝望才能解释，为什么一个病人愿意参加他或她不能理解的、而且或许不起任何作用的科学实验（Ingelfinger, 1972: 466; Mackillop 和 Johnston, 1986: 182-183）。汉斯·乔纳斯（Hans Jonas）写到：“……与他的条件和环境相联系的所有事物都自然会使病人比健康者缺乏自主性。自发性的自我-奉献几乎被排除了；同意也是在无能为力的条件下被迫的……”（1969: 239）。

然而最近几年，这些“绝望”的病人已经造成了一次实验医学的危机，以至于实验医学许诺会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像早期那样支持道德程序。那些正在促成这种危机的爱滋病患者进入了医学领域，在同性恋群体中达到了主要以政治目的而组织起来的高度，这恰恰使他们比以前的任何患者团体都能更好地抵抗家长式的作风。在过去十年中，围绕社会的和政治权利而激发起来的活力转向了医疗体系，而且，病人教育和支持网络也以一种在任何其他疾病中前所未见的规模出现了。他们很快获准广泛地接近实验药物，削弱了由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和其他医疗机构强加的至今还津津乐道的防护罩。

从1987年到1989年，在强烈的政治压力下，使用未经证实药物的障碍逐渐被消除。首先，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提出了加速对爱滋病药品的行政评论（“1AA 评论程序”）的建议，还有一项扩展计划：“观察性新药品特惠豁免”，或称“INDs 治疗方法”，它使得把未经试验的药品卖给垂死的爱滋病受害者成为可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还公开宣布，进口未经批准的药物供个人使用是合法的。

事实上，尽管在开放新药物方面新规章还不是很有效，但是它们确实趋向于把实验的负担从药品制造者转到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身上，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注意到了这个显著的变化。

（Marwick, 1987: 3020）肯尼迪没有误解新政策的含意。1989年6月，彻底屈服了的行销代理与国家敏感症和传染病协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 NIAID）共同制定了一套新的“并轨”药品检测体系。在这套体系中，甚至在获得正规的对比

研究结果之前，医生也有权像开许可药品那样开仅仅经过毒性检测而未经检验的药品。“‘这’前进了一大步”，美国爱滋病研究基金会的马梯尔德·克利姆（Mathilde Krim）博士说，“总体上讲，在如何发展爱滋病药品和威胁生命疾病的药品方面，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共识”（Kolata，1989：B5）。

这些措施对解决爱滋病药品检测方面的政治危机有极大帮助，但是，克利姆博士不切实际地利用了一种新共识。许多研究人员都关心这些规则既给患者，又给新药品的科学评价可能带来的伤害（Marwick，1987：3020；Reidenberg，1987：599-560）。他们问道：当患者能够通过直接通过他们的医生得到同样的实验药品时，如何能使他们重新加入到安慰剂控制研究中来（Goyan，1988：3052-3053）？当病人能同时得到和使用所有药品时，这些药品如何加以比较？而且，这些相当不正式的并轨结果如何能够得到严格地评定？

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无法回答，但是各种新规则看来也许受到的指责更少。事实上，在规则改变之前，对照试验已经中止了（Barinaga，1988：485）。不守规的行为者、爱滋病患者和他们团体组织者开通了所有违法渠道来获得有希望的药品。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趋势像那些自由化的规则一样会带来相同的后果。因而这的确不是调整问题，而是公众对平衡——临床研究的科学功能和关怀功能之间的平衡；与此相应，病人和医生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之间的平衡——的理解发生了一种变化。

这种转变将迫使研究团体重新考虑科研和治疗之间的关系。直到今天，研究人员在没有其它选择时，能够征集无法治愈的病人接受对照试验。这些最严格的试验将来可能很少使用，更多依靠临床经验和历史上的对照试验。但是为了某种目的，取得病人——那些同意接受控制和采用只有经临床医生同意的药物治疗方法的病人——的合作将总是必要的。

如果能够在研究机构之外得到实验药品，就必须寻找新的方法来征集参与者接受对照试验。有两种可选择的方法：到不受西方伦理约束的贫穷国家进行研究；或者建立一种新的病人教育和治疗框架，在其中，能够招募受试者进行可以与并轨试验相竞争的对照试验。后一种选择明显更可取，但是，只有当医学恢复其对绝症患者的传统责任时，这种方法才能取得成功。

爱滋病危机迫使医学已经把参与实验的愿望当作患者的一种不再能够被武断剥夺的权利。正如科学为了考虑患者权利不得不适应早期研究中的种种限制那样，科学将不得不寻找新的方法来适应这种由道德进步带来的问题。那时，也只有到那时，一种新的共识才将真实地出现。

参与者的利益

政治学侵入医学政策引起了非常不同的反响。那些继续忽视病人要求的人把他们政治上的成功当作对“科学”（亦即实验医学的既定代码）的粗暴干涉而加以谴责。而那种代码已经具有的社会属性被完全忽略了。不幸的是，这种对新要求的反应方法是很典型的。另一方面，有些人抵制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完全支持医学“消费者”选择任何他们所希望的治疗方式的绝对权利（Illich，1976：252-253）。如果这是对现有体系的惟一替代，那么，医生和患者之间非常真实的知识差异对改革将的确没有多少帮助。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虽然改变其技术代码以提高知识共享和病人的主动性，但维持专业主义（Ladd，1980：1128）。正如波拉·特莱切勒（Paula Treichler）写道：“对当前社会地位的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于那些拒绝或谴责技术的人，而是来自于那些抱有进步的政治目的、为了日常生活中科学和科学理论的发展而试图取得社会地位的人”（1991：69-70）。

这绝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方案。有许多在公众的压力下而发生好转的医学实践的例子。有时，不管角色——照理说它们是作为一种技术领域的医学的构成要素——分工如何，新的规范反映了病人的要求。近年来，产科学和妇科医学已经认可了分娩培训、配偶或辅导者进入产房

和母乳喂养等，这一切都是因为来自于妇女社会运动的压力。在这些案例中，技术代码都因为考虑到新的要求而被修改，而现在，对于医疗人员来说，回到曾经看来是如此严格和科学的早期实践几乎不可能了。当这些改革进入官方的实践之后，它们原来的大众性消失了，留下的是技术自主性的幻想。一旦它们已经被有效地编入一种技术代码，那么，建立新规范的辛勤工作就被遗忘了。

我认为，现有的规章结构和技术代码忽视了参与实验的病人的重要利益。正是这个疏忽引发了当前对专业主义的挑战。我将为患者尤其与健康有关的各种动机呼吁，以承认人体实验对象“固有的”或“参与的”权利。²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权利获得承认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一切权利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决定社会政策和法律的公开讨论中。但事实上，社会群体的要求并不自发地带有“权利”色彩，只有通过某种公认的解释才会如此。至于临床研究，由于缺乏这样的解释，数百万公民的愿望被有组织地拒绝了。这些公民与其说被不公正对待，不如说是无能力者。

在医学这样的技术领域，顾客的权利必须体现在举足轻重的技术代码中。正是这种代码实现了两种关于受控机体身体的话语之间的转换，并且把道德-法律人引入了科学。因此，伦理学对医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设定了目标或者控制了虐待，更根本的是，它用形成设计和系统的方法使它们适应其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务。在拉陶看来，规范的授权（Delegation）因此就成为医疗技术的中心。

因此，我建议，对医学伦理学作一种新的社会技术（sociotechnical）的解释。像其他职业伦理学一样，医学伦理学通常被用来为判断个案提供规则。在一种未经考察的背景下，各种伦理问题被视为共识，这些共识涉及程序、医-患关系以及其他医学制度方面的问题（Lowy, 1987: 597-601）。结果，讨论被人为地限定为在制度的范围内能作什么，而这种制度的范围又无意中等同于医学的科学基础，从而免受批评和讨论。但是，我将证明，那些对于医学显得最“科学的”东西最好被看作是社会利益的技术中介。这样，通过考察规范就能彻底深入这一问题。揭示医学的规范层面驱散了构成个人主义研究背景的技术必然性的幻想。

从社会意义上考虑，伦理学就像是在社会需要和技术干预之间的一种转换器。那些被医疗行业采纳的要求，一旦出现被制度化的趋向，则必须转化成合法的医学话语。医学是在各种社会约束下运作的，当医学使这些社会约束内在化时，病人的新权利就变成了标准化的协议。只有对医疗制度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扭转这种趋势，并把医学的技术代码和它所表示的历史需要之间的隐含关系揭示出来。²¹

直到最近，临床研究的技术代码仍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参与中的病人的权利。相反，由于强调诸如无知、非理性这些因素，病人的参与愿望被非法化了。这种负面性判断的结果只是在严格区分了“实验”和“治疗”的技术代码中体现了出来，既没有可能使患者免遭虚假权利的伤害，也没有机会来证明诸如使用安慰剂这样没有治疗作用的程序的正当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患者们不得不发起了收回解释权的政治运动，并且迫使那支配研究的代码发生了变化。

²⁰ 医学道德规范将把这些被忽视的效果归到参与研究的动机，各种文献在论述动机时通常都非常谨慎，因为难以在实际的利益与各种微妙强迫形式之间作出区别（Freedman, 1975）。事实上，我认为这些考虑并不恰当，但是它们必须被提及，因为有人主张，希望得到治疗是患者寻求的一种“奖赏”，就像对志愿者的付出所颁发的勋章一样。这种类比是混乱的。证明会使人糊涂。把治疗当作纯粹外在的奖赏来看待，这就忽视了病人在承担实验参与的风险时进退两难的悲剧性的方面，把道德贡献贬低为赤裸裸的市场关系，并且愚弄了那些拼死参加研究计划的病人。

²¹ 至少从左翼的观点看，把伦理学当作不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计划而抛弃现在是很普通的事。这种态度在哈贝马斯和罗尔斯学派对纯粹的、非历史的合理性的中找到了其相应的理由。然而，在任何专业理论中，尤其是医学，必须有伦理学的位置。甚至当一个医学问题明显来源于社会，也没有人看病不是为了病人的幸福而是为了社会变革。当然，哪里缺乏对病人承担的义务，哪里各种可信的动机也就更少，但这恰恰就是调整专业以确保标准程序体现伦理价值的理由，而不是把伦理学当作与己无关的东西加以排斥。

下一节，我将试图从医学角度说明这样的权利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用证据来表明，这种权利内在于医学知识体系之中。我将根据现有的医学文献来说明，在实验参与中，某些种类的患者具有合法的权利。尽管政治压力能够突现种种新的需要，但这些需要必须被各种这样的证据重新组合才能造成技术代码的变化。缺少某些这样的论证，仅仅是非专业的人们抗议这一事实是十分无聊的；为了达到对专业的自我理解的目的，案例不能超越政治学的范围。很明显，在足够的压力之下，医学也许会对民众的要求做出许多“非医学的”让步。这一点说明，一些让步勾画了一种制度替代的轮廓。

我希望用这种方法提供一个伦理和技术间紧密交流的实例，因为技术给人造成了它们之间是明显隔裂的假象。如果我能够成功，这个事例将会确认我在本书第一章中为民主干涉技术的可能性所做的主张。的确，我们这里正在对付的是被保护得特别好的技术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干预似乎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我将说明，非专业的人们不仅对医学提出了各种创新的主张，而且这些主张能够从医学上得以证明，并最终融合到医学实践中去。

下面，我将讨论问题的三个主要部分，它们非常有助于理解参与者的权利。它们涉及：

(1) “安慰剂的效果”，作为医疗关怀中无特效治疗权力(non-specific healing power)的一个实例；(2)与慢性病问题相关“病人角色”；(3)研究人员和受试者之间协作的伦理意义。

参与者权利是在实验过程中自然出现的，它不仅包括治愈的希望，而且还包括接近医生、试验结果、建议和病人培训等等。对志愿者而言，这些事物的重要性尽管没有得以充分地研究，但已经得到广泛地承认。巴里·R·卡西莱滋(Barrie R. Cassileth)发现，他的被调查者中超过半数以上都把期望得到最好的医疗关怀作为他们乐于参与研究的主要动机(Cassileth, 1982: 968-970)。为了证明并轨实验的正确性，国家敏感症和传染病协会(NIAID)的安东尼·福齐(Anthony Fauci)博士说道：“许多人无私地加入临床试验——即使他们也许知道得不到实验药物，当然也获得了同步的医疗关怀。”(Kolata, 1989: B5)对病人参与研究的愿望有一些令人惊讶的解释，在下一节中，我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承认参与者的权利并不是说，在征募信息闭塞或无治疗能力的个人作为实验对象时，要违背道德戒律，也不是说它会偏离旨在获得新知识的实验的主要目的。然而，即使在这些限制中，随着参与机会的不断增多，实验者的权利能够得以更好地维护。

直到最近，职权的提供完全由科研需要所控制，没有考虑希望参与的病人的数量。许多医生和伦理学家把职权的匮乏看作一件貌似灾祸实际使人得福的事，因为它保护了大量也许是自我欺骗的病人。这种态度现在证明是站不住脚的，统计的最小值(需要确定的保险系数和有效性)不再控制职权的数量，相反，职权加倍地适应了病人的要求。

在政治领域，这一点已经有效地提出来了，就对病人的重新尊重而言，这里还有一点微妙的含意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某些实验设计促进了参与者权利，而另外一些则阻碍了它们，与替代事物的科学有效性无关。因此，一个爱滋病激进主义分子会拒绝“各种(设计中)主要为采集数据而提出来的断然降低病人的需要和权利的重要性的观点”。(Smith, 1989: 1547; 参看 Epstein, 1991: 56-57)由爱滋病权力解放联盟(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ACT UP)制订的《国家爱滋病治疗研究议程》(The National AIDS Treatment Research Agenda, 1989)总结了许多详细的使实验治疗人性化的建议。为了响应这些考虑，一些医学评论员开始相信，“我们需要考虑其他的研究计划，这些计划允许病人对治愈抱最大的希望，并有控制他或她命运的机会。”(Goyan, 1988: 3053)

总之，医学的职责不仅仅是获得有根有据的承诺，尽可能地避免伤害；而且还要设计对病人有用，同时对科学有用的实验。这种情况使人回忆起霍赖特关于组织化生活的待确定的讨论，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模式不是由技术规则明确地加以界定，而且还建立在要求各种规范的基础之上。这里，我们也有一个科学上待确定的选择范围，而道德思考必须在其中做最后的选择。

这种待确定的社会结果也是很重要的：同一个的技术“变化”满足了多样的社会需要。在正常的技术环境中，这些要求不再互相排斥，也不需要相互交替。这一点也不是那种陈旧的观点：通过生活消费品供应的不断扩大，技术克服了社会冲突。更正确的说法是，技术自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多元的社会中介。我将在第九章中回到这与围棋有关的观点。在那里我将说明，游戏规则中一步价值中立性明显的棋，传统和现代性是如何共存的。在这里，类似的问题是：研究和治疗必须共存于医学实验的实践中。

医学实验的社会技术伦理学

一旦参与研究被承认是一种合法的治疗形式，很可能会有更多的病人愿意加入进来。重新思考病人关怀的整体结构是很必要的。事实是，医疗机构几乎不接受病人培训这样沉重的职责，而病人培训能够独立地赋予有根有据的承诺以内涵。这个缺陷已经被容忍了很长时间，当临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成千上万的难以治愈的病人时，它要冒成为过分虐待根源的风险。这种虐待要么能够反过来证明重新设置限制参与机会的维护旧制度的努力是正确的；要么能够在实验医学的实践中激起各种改革。这种选择将取于医疗机构对参与者权利的认可程度。

作为一种关怀形式的实验治疗

如果能够证明临床研究能够给予实验对象合适的医学利益，那么，参与者的权利仅仅在专业框架中就能够是合法的。因而，给予那种利益的适当方法就能够记录在研究的技术代码中。治愈的希望不会很大，因为它通常是令人失望的。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很少的成功的机会是否超过了参与的危险。甚至在患者病危的情况下，这时，已经很少考虑风险，治愈已经是如此的不可能，那么，继续坚持诱人的承诺就是不诚实的（Glaser 和 Strauss, 1965: 1098-1100）。因此，尽管能够证明希望具有通常所说的好处，但从医学的角度看，仅仅这样并不能证明目前放松规则是正当的。

当焦点集中在希望问题上时，病人的愿望和医生所认为的病人的权利之间会出现一场严重的冲突。这场冲突只有通过发现与治疗无关的参与利益才能得以解决。事实上，大量的文献表明，病人对医疗的“关怀”功能所寄予的希望至少和对实际治疗寄予的希望一样大（Powles, 1973: 16-24）。例如，弗莱彻和他的合作者发现，患者对他们的医生最看重的是同情和有效性，而不是技术成就（Fletcher 等, 1983）。

对医学中顺势疗法（homeopathic）和脊椎指压治疗法（chiropractic）的研究表明，许多病人，尤其是那些慢性病患者，都在寻找替代的治疗，因为在通常的环境中得不到这些关怀上的便利（Avina 和 Schneiderman, 1978; Kane 等, 1974）。因为医疗文化忽视了慢性病，因此在这个群体中发现普遍的不满就并不令人惊奇（Kuttner, 1978）。消极的态度有时是非常直接地示意给患者本人的，据说有一位医生对他的一个患有多种硬化症（MS）的病人说：“你有多种硬化症，不要担心；从图书馆拿一本书看看；如果你有问题，给我打电话。”（Hartings 等, 1976: 68）

对关怀的强调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医疗技术的拒绝。同情经常通过对药物或程序的管理来表达的，即使明知这样做没有多大价值。波勒斯写到，“在现代医学文化中，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对疾病的技术控制方面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表面的。因为除了要考虑对生物层次上的人类健康所构成的各种挑战之外，这种技术迎接各种疾病所涉及的情感的和生存的挑战。”（Powles, 1973: 20）

如果参与研究被看作是一种有效的关怀模式，而不是一种有缺陷的治疗模式，它的正确性会更容易地被证明。那么，对于医生和病人来说，参与临床试验就像象征性开出但多少有点效果的药物的普通药方一样，具有某些相同的意义。尽管在研究中必须很诚实地玩这种游戏，但临床试验也许要用另外一种方式，运用这种方式，高度技术化医疗系统能够为绝症患者提供关怀。

所谓的“安慰剂效果”正是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而且它无疑是实验参与的惟一可预言的好处。现在，如果安慰剂效果被当作医疗关怀的一个正常的方面，那么，实验参与将是一种对绝症患者最合适不过的治疗形式。不幸的是，“安慰剂”这个术语本身就有欺骗的意味；我们似乎已经陷入虚假希望与医疗责任两者之间的二难境地。

但是，在医学实践中某些与安慰剂效果非常相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如并没有欺骗性地发放像糖丸或其他具有欺骗性质的“真”药替代品。得到一种诊断这种简单的事往往有效地缓解了病痛和其他症状。医疗的许多好处并不是因为技术效力，而是因为人类学家所说的“象征的效力”，这实际上对前现代社会医学的大多数价值作了注解（Levi-Strauss, 1968: 198）。这种状况暗示着思维和身体的相互缠绕，它已经引起了对免疫反应的神经病学基础和其他诸如此类事物的全面思索。然而，对医生和病人来说，问题并不是用科学的术语，而是用个体的术语提出来的，并且，解决的方法必须考虑患者的需要，把这些需要当作尚未理解的自然过程的最终的指示器。

至于在日常医疗实践中安慰剂广泛的作用，夏皮罗和莫里斯提出了以下相当宽松的定义：“任何特意用来起非特定的、心理的或精神生理的效果，或者用来起原先假定的特殊效果但对症状并没有特殊作用的治疗或者治疗成分。”（Shapiro 和 Morris, 1978: 371）这个定义适合于通过仍不清楚的机制使病人受益的多种医疗互动（Brody, 1980: 8-24）。

霍华德·布罗迪论证说，既然实际上并不要求欺骗达到安慰剂的效果，病人就不应该被骗着去获得它的好处（Brody, 1980: 110）。因此，即使安慰剂的效果是所有病人都愿意从临床研究中得到的，这也不能证明以下做法是正确的：对他们撒谎说可能获得成功，或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征募患者参与不合格的或纯粹象征性的实验。一切实验医学代码中规定的要求——诚实地向病人通报情况，研究要有科学根据——像以前一样是站得住脚的，尽管这种方法承认，对于科学家和病人来说，研究将并且也确实应该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

阿德勒和哈米特关于安慰剂效果的论述为更有治疗效力的参与研究的设计提供了一种方法。他们把焦点集中在意义的治疗能力问题上。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的意思是，了解一个人的病情是幸福和健康的一个条件。而意义反过来又有赖于病人对疾病获得了“系统的”理解，也就是说，对患病经历的某种合理解释；意义还依赖于社会支持的有效性，他们称之为“团体构成”（group formation）。在作者看来，这两个因素是安慰剂效果的基础。“团体构成和系统构成……对精神机能是必不可少的，就像营养对身体机能一样……基本要素（组成了主观上作为‘意义’感加以体验的那些东西）总是被用于所有成功的人际疗法，而且是安慰剂效果的充分必要条件。”（Adler 和 Hammett, 1973: 597）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医生就能用促进“团体构成和系统构成”这种“有象征性效果的”方法，通过把医疗干预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扩大参与的正面效果。因此，在实验设计中，这些目标应与科学目标相互协调。顺便提一下，这就要求不管试验的目的是治愈病人或仅仅是促进知识。

病人的角色

爱滋病危机使现代医学的两种相关的失败缺陷戏剧化了：各种慢性病患者越来越不满意，而医学却提供了拙劣的实验治疗。社会的制度结构、慢性病患者的需要与研究的需要之间的冲突是实验对象被误导、对承诺结果有效性的怀疑、退出实验而导致关怀连续性的中断、征召受

试者的困难、被迫的屈从等等这些问题的原因。当公众开始明白研究的任务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而不是一种科学活动时，这些问题只能变得更糟。

这些问题说明对医学的社会组织进行改革的迫切需要。考虑这个复杂问题的出发点是所谓的“病人角色”，这是医疗制度的基础之一。医学之所以不适应人体实验对象的各种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阻碍了“团体构成和系统构成”的对病人角色的界定。这反过来说明了，为什么几乎没有病人会理解科研事业的现实，为什么一旦轻松地获得了未证实的药品，研究人员为对比试验征募参与者会如此的困难。

与平常的用法相反，病人角色不是病态的心理逃避状态。这个术语原是由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提出从社会学意义上把疾病定义为“越轨”(deviance)的一种形式，这种“越轨”包括用合法性地暂放弃正常的社会责任以便真心实意地努力康复。²²“病人的角色”，他写道，“为越轨开辟了通道，因为这样，两种最危险的可能性，即合法性权利要求的团体构成和成功确立，就被消除了。病人不是和其他越轨者(deviants)合伙形成一种病人的‘亚文化’，而是各自与健康人的群体、他自己的圈内人，当然首先与医生建立密切的联系。病人……被剥夺了形成团结一致的集体的可能性。”(Parsons, 1951: 477)

总之，病人被放到与社会隔离的地位。尽管对患短暂急性病的个人来说，隔离并不是特别地麻烦，但对慢性病患者来说却毫无疑问是有害的。这里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慢性病患者间的同病相怜对他们有好处。莱丽·福克斯(Renee Fox)对临床研究的出色研究表明了共享任务和风险体验的极端重要性。从上面归因于意义的角色问题角度看，她的观察资料特别令人感兴趣。“从尽可能广泛的角度来看”，她写道，“我们在会议室、实验室和病房里观察到的，是面临各种共同的巨大压力的两群人：高度的不确定性、局限性、危险和死亡。通过与群体内部成员及其他群体成员的互动过程，医生和病人取得了各种类似的应付他们压力的方法……每个人都从他们隶属的联系密切的群体中，以及从他们与其他群体的亲密接触和相关认同中得到支持和指导。”(Fox, 1959: 253)

尽管帕森斯式的隔离并不总是被强调，但它仍是一种规范，背离这种规范的情况只是偶尔发生，虽然有时遇到相当大的医学上的阻力(Brossat 和 Pinell, 1990)。很少有对病人群体活动的研究，这也许是因为当病人聚集在一起时，医生和研究人员通常不在场。但是仍然有一些关于对慢性病患者运用群体治疗法的研究，我愿意简要地考察其中的三种研究，这些研究并不是想为结束对慢性病患者的社会隔离提供极好的理由。

这些研究描述了各种意在减少焦虑和压抑的治疗团体，但事实上讨论是肤浅的，并且是以各种出乎意外的方式帮助了病人。不管其最初的意图如何，研究人员实际上证明：当病人通过自愿联合而形成一种“亚文化”时，他们相互提供社会支持——一种在维持健康方面被广泛认可的因素(Nuckolls 等, 1972)。另外，实验的其他方面重新思考了列维·斯特劳斯、阿德勒和哈米特关于安慰剂效果象征性意义的作用的解释。

典型的作法是，研究人员把病人说成是一开始就不顾自身病情的严重性而陷入自我施加的隔离中，有时又把病人说成是立即开始投入诊治(Chafetz 等, 1955: 961-962)。然而在群体中，他们很快就开始交流关于症状的信息和对医疗行业，尤其是对他们病情诊断的拖沓的抱怨(Chafetz 等, 1955: 962; Hartings 等, 1976: 68)。并不总是包含在最初协议中的教育结果成了病人的一项主要要求(Chafetz 等, 1955: 963)。它帮助“病人……忍耐通行的治疗方法，现实地作计划，并且更多地感觉到对其生活的控制”(Hartings 等, 1976: 66)。在一个治疗团体中，医学专家确实应邀向病人演讲(Buchanan, 1975: 529)。而在另一个团体中，“重点在临床研究，这继续作为群体的一个目的，它对患者权利和他们的患病过程提供了明确的证据”(Chafetz 等, 1955: 962)。

²² 根据帕森斯的假设，医学上的“越轨者”必定表现了一种想健康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对许多慢性病患者来说毫无意义。因此，帕森斯的模型需要做些修改。显而易见，对有条件的免除责任的预防根本不适用于那些永远不会痊愈的个人。弗莱德森通过提出一种疾病类型的“展开分类法”而解决了这一难题，即，在严重慢性病的条件下，无条件地承认逃避社会责任的合法性(Freidson, 1970: 238-239)。

实际上，这些描述清楚表明，群体利益更多与社会学，而不是与心理学有关，特别是与病人角色的改善有关。在一个最成功的事例中，一群多种硬化症（MS）患者冲破预期的被动性和隔离，出版了一期发布财政、娱乐、治疗和设备的信息的时事通讯（Hartings 等，1976：73）。

在实验结束以后很久，病人们要求更多的集会，但是在三个事例其中的两例中，组织者莫名其妙地断定“更长期的团体的优势是值得怀疑的”（Chafetz 等，1955：963；参照 Buchanan，1978：426）。尽管病人的兴趣在于创造各种新的关系，但这些研究人员却要他们的病人尽可能地恢复到传统的病人角色中去。

其中只有一位医生更多地认可了他的病人们的愿望，允许他的团体在实验按计划结束后继续集会。假设这些团体为其成员履行了多方面的职能，这样做看来是适当的。这些职能以及它们所隐含的新的病人角色预示着一种协作的关怀模式，就像随爱滋病而开始出现的那种模式。从上面所讨论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种模式提供了不同的改进这类病人所处境况的方法，我将论证说明，对负责的研究和实验参与而言这是一种更有利的环境。

协作模式

伦理学家经常争论说，那些遭受不治之症痛苦的病人是被他们的疾病“逼”进实验参与的。如果病人是可能只产生知识的过程的无知牺牲品，那么这种观点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他们消息灵通，而且——也许没有放弃治愈的希望——追求合理设计的实验能够正常提供的参与者权利，那么，这种观点就是家长式的。换句话说，如果是普通的治疗，那么只有了解情况的病人有资格去承担一无所获的风险。医学伦理义务的圆满完成不是由于禁令，而是由于能够确保病人有足够的准备来做出这样的判断。

在缺乏这种重要努力的情况下，即使病人已经知道他们正在干什么并且真切感受到拒绝的自由，但宽松的规章也可能导致大量不明情况的病人进入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的实验中去。各种研究都倾向于支持英格芬格的担心，这种担心就是：“获得与其所有规章和条件相一致的明确承诺的过程只不过是一种精心设计的仪式，一种手段，如果实验对象没有经过指导并且不明情况，那么，这种手段只不过是给人体实验一种适当性的伪装”（Ingelfinger，1972：466）。令人悲哀的事实是，多数“病人对试验的承诺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医生”（Mackilopp 和 Johnston，1986：187）。

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悲观的结论更少地适用于慢性病患者。有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急性病患者和慢性病患者对他们医生的态度具有“惊人的差异”（Lidz，1983：542）。前者往往是被动的，而后者经常主动地参与医疗决断、讨论选择和建议或拒绝可选择的治疗方法。这项研究把这些差异与急慢性患者对一贯被动的病人角色的不同态度联系了起来。作者得出结论：“就某种类型的慢性病患者而言，在某种类型的组织结构中，以一种积极的病人角色出现是可能的”（Lidz 等，1983：543）。在探索关怀慢性病患者的最佳行动方针上，这些结论与 Szasz 和 Hollander 的医患“相互参与”理论相一致（Szasz 和 Hollander，1956）。

通常在慢性病的症状治疗（symptomatic treatment）和临终阶段的医疗决断中能够观察到这种相互参与。例如，能熟练应付诸如（Lou Gehrig's Disease，ALS）和多种硬化症（MS）这类疾病的医生懂得听取病人关于如何带病生活的各种发现，并且经常在患者间传递各种建议。只要他们见面，病人们自己就会交流关于症状治疗的信息。症状的缓解不仅意味着舒适，而且意味着生命的延续，这里，病人和医生也常常一起努力以取得传统医患关系中不能取得的成效。最后，依靠像呼吸器这样辅助器械的病人越来越多地被卷入到他们自己的死亡过程中。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谈论作为研究人员和实验对象之间协作的实验医学才有意义。这种常常表示出来的希望，对大多数急性病患者而言似乎是狂想式的，而对那些已经学会参与其自身治疗的慢性病患者，这种希望并不是特别遥远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特别努力地去实现更高品质的承诺，而不是限制参与的机会，那么，对病人的伦理义务就被更好地履行。假如这种义务被认真履行，那么医生和慢性绝症患者将能够消减存在于现代医学向技术行业转化过程中的某些压力。

治愈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的事情，与此不同，实验治疗则涉及加入到解决一种科学问题的集体努力中去的问题（Parsons, 1969: 350-351）。进入那种集体的大门应该完全只对那些与其具有同样精神的人开放，而不管他们所期望的个人利益如何。在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有影响的文章中，汉斯·乔纳斯论证说，承诺本身只能使实验对象成为谚语中所说的“豚鼠”（guinea pig，供医学实验用的动物）那样的东西。“仅仅是‘承诺’（通常只是许可而已）并不能纠正这种异化。其中的‘错误’只有通过既与实验对象，又与研究人员的事业的真正统一（identification）才能得以‘纠正’，实验对象在这种事业中所承担的角色恰恰不是由研究人员许可，而是由他要求（willed）的。他的那种作为自己目的的独立自主的愿望使其在另外的非人性的环境中恢复了人格”（Jonas, 1969: 236）。或许，正是对这些道德问题的理解启发了全国卫生学会中临床研究中心的创始人，1953年，他们为自己制定了以下原则：“临床研究的病人或受实验对象被看作是研究小组的一个成员……”（Curran, 1969: 575）。

在乔纳斯看来，同一是一种理想，实验医学并不总是追求它，而且它很少能够实现。但是，不管有多少困难，协作模式都不只是一种虔诚的愿望。它在莱丽·福克斯所研究的实验病房中决定了生命的进程。吉恩·道塞特（Jean Dausset），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类型的发现者，围绕这个问题设计他的各种实验。他组织了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报告会和讨论会，向数百名他所必需的志愿者解释他的研究。道塞特的实验对象已经被称作“知识英雄”（educated heroes）——这是一个某一天应该应用于所有人体实验对象的术语（Bernard, 1978: 197）。

由传统的病人角色所强加的隔离是这个目标大的障碍。它阻止了患者形成一种在其中接受教育和扩大社会支持的共同体。然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共同体，患者又如何能够充分地了解研究以便懂得参与的各种风险，如何对治疗前景获得一种现实主义的观念，又如何理解各种非治疗性的实验和对比试验的有效性？或许，由爱滋病引发的危机将最终导致一种替代的慢性病患者关怀系统的制度化。当患者们不再只是等待治疗的医学实验对象，他们因而可以成为更大的研究事业中的积极合作者。

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在传统的实践中出现了两个基本的变化：（1）消除参与的所有压力——在持续性症状治疗项目规定的范围内实施临床试验，给那些没必要参与实验、并且与实验的延续或成功无关的病人以支持；（2）确保足够的理解——利用病人集会使他们有能力理解自己的疾病、研究中人体实验对象的角色以及实验的选择权。

科学和伦理学

现在，我们开始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考虑本章开篇提出的各种问题。困难不再是确定肉体或精神、机制或生动的体验何者为基础。我们对每个问题的不完善的理解要求我们求助于他人，而且，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把两者并列起来，实现人文和科学两方面的目标。

在冲破通常的把病人的关怀与科学分割开来的界限的过程中，实验设计在伦理学上看起来是针对这个目标的。但是，这种界限的削弱使得运动朝两个方向发展，而迄今为止我们仅仅讨

论了参与者权利设计的含意；而另一方面，受控机体医学则提出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病人权力问题。

正如斯蒂芬·爱泼斯坦（Steven Epstein）所表明的，爱滋病运动“试图为科学家自己的地盘标出某些范围。这些积极分子就真理和方法问题与科学家争吵。他们不仅试图通过从外界施加压力来改革科学，而且还试图通过置身其中来执行科学。他们怀疑的恰恰不是科学的用途，也不是对科学的控制，有时甚至是科学的内容和科学得以产生的程序。最根本地是，他们要求像专家那样的令人信服地说话的权利——就像那些科学地了解事情、能够分享这种特殊的、强大的真理话语权的人一样。最让人难以捉摸的是，他们试图改变科学游戏如何进行的基本规则”（1991：37）。

很显然，在诸如像病毒学（virology）这样的技术领域，非正式的自我训练可能并没有多大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骄傲自大尤其会自我毁灭。然而，不管有多大风险，在这种新的环境下，无论对科学还是对病人，总有一些事情值得去做。不论未经证实的药物的已有效果如何，只有信息畅通的患者共同体才有可能提供对研究效果有利的志愿者。他们的参与为其共同体所知，他们的慷慨被实际受益人所感知，而不是像今天大多数受人体实验对象那样是一个抽象的假定。而且，在一个对医学权威的尊重急剧下降的社会中，带有这种背景的参与者更可能负责地为科研努力的成功而工作，按规则进行药物治疗，认真地遵守记录和约定，向临床医生报告各种问题，提出有用的建议，从受制于医生的那些人的有见识的立场出发向各种不切实际的、非人道的计划提出挑战，把各种来源于长期实践中的伪科学观念确定为偏见，等等。

尽管病人能做的许多事都是平凡的，但他们的实践远不是只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作用。它是多种小任务的日常体现，绝不是他们肉体的被动出租，它组成了一个集体研究主体。哈拉维写到，对生命的研究“并不是研究漫无目的的发现，而是研究相互的并且常常是不平衡的构造，研究冒险，研究所能发挥的权能”（1992：298）。它包括操纵和控制，当然也包括挑战、勇气和自制。研究主体是由联系在一起的活生生的人类、通过按协商的伦理契约而形成的实验设计而构成的。

这些契约不仅仅是对自由探索的外在约束，而且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它们提供了一种深入生命层面——即健康——的实际的洞察力，对医学知识而言，由于其机械论的范式和理论，健康仍然还是一个迷。伦理学也通向生命，这是一种不同的生命，既不能理解为一种消逝的乌托邦，也不能理解为一种机械装置，而应该理解为本质上不可预见的东西，它出乎意料地出现在认识论和技术所控制的领域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说，忽视病人把研究过程重新界定为一种治疗形式的努力是对医学使命的一种侵害，是对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身体的一种侵害。

这个结论与马尔库塞的技术美学化观念有些类似。正像对技术的美学渗透有可能使各种价值对它产生影响，这反映了科学上没有理解的各种生命维度；同样，医学伦理学也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生命概念，这一概念更充分地与人需要相和谐，这是一种科学所不能表述的、被解放的、并且具有解放功能的概念，而且，我们能够希望像赋予“人类实验”这一术语一种的新含义那样使这一概念获得永生。

第三部分 后现代技术

第六章 法国理论和后现代技术：从利奥塔到小型电传

破解现代之谜

正是计算机才促成了后现代性中的“后”。没有其他的技術象计算机那样如此地主宰着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的变化所进行的讨论，也没有其他的技術根据其承诺和威胁如此地塑造未来的形象。在上一辈，这种技术可说是核能或太空探索，但这些技术奇迹许诺的是更多更好的现代性，是范式内部的增长，而不是现代本身的意义变化。这就是计算机的独特之处：它终结了数世纪以来的确定性，即对我们的身份、对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中的成员的我们的所想的确定。事实上，一些理论家认为它终结了现代性本身。

尽管后现代性与计算机有关系，但它开始却是作为建筑业对“国际风格”的反叛，我们从世界上每一个大城市中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摩天玻璃大楼中就可以了解这种风格。鲍豪斯建筑学派²³的口号“形式服从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提出了美学的工程学控制。以前的装饰原理被当作矫揉造作和不合理的东西抛弃了，新的线条简洁的建筑物被看作是具有合理的结构从历史中脱颖而出。

后现代建筑学拒绝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这种区分，但是，没有这种区分，功能主义本身恰恰是另一种风格。时代已不再是一个一直向上的箭头，它已经被平面化为一张风格菜单，没有一种风格能够声称比其他的风格更先进。平滑的表面就像用陶立克式的圆柱完成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一样具有装饰感，使功能主义建筑学看起来特别现代的合理性的情愫已经失去了。面对历史遗留的各种可能性的大杂烩，后现代的建筑师建造了具有反讽意味的由零零碎碎的不同时期的风格拼凑起来的模仿物。

我之所以回顾后现代主义起源这些人所皆知的事实是想更好的引入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的讨论。这本书第一次把“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介绍给了建筑学之外的广大读者，而且今天它还值得重读，因为它的许多论点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²⁴那种考验的结果也将在下面讨论。

利奥塔在哲学层面上再次表明了某些具有当代建筑理论特征的态度。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对现代合理性的论述，建筑师和哲学家都把现代合理性看作一种局部现象，而不是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或者像利奥塔所指出的，对所有“语言游戏”都有效的普遍规则。然而，利奥塔并没有拒绝现代科学的意思，而是打算用存在着多重合理性、现代科学不单单在于理解宇宙这种观念来整理游戏的领域，以便以一种旧实证主义的科学信念所不采用的方式来考虑差异性和多样性。

²³ The Bauhaus, 德国建筑之一派。——译注

²⁴ 有关他对《后现代状况》主题的最近的（也十分相似的）立场，参见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野蛮》（The Inhuman），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和第4章。

令利奥塔关于后现代性的阐释具有如此影响的新要素是他在社会计算机化、科学进步和最近的法国理论之间所建立的联系。回顾一下法国思想中语言学的转向将有助于理解这与众不同的联结。

六十年代期间，一种对战后时期存在主义的反向运动改变了法国的知识生活。这种倾向的主要代表是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语言学，尤其是弗尔德南·德·索绪尔工作的影响下，他对文化展开了一种独特的分析。索绪尔严格地区分了语言结构和语言实践，并且把注意力从语言实践转移到专注于语言结构。他认为语言是在各种任意的符号之间的差别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而意义则从一种差异系统中产生，差异存在于原本无意义的要素之中。在第一种情形下，“结构”的概念涉及到这样一种系统的基本逻辑。

当列维·斯特劳斯把这种模式应用到人类学时，它显示出种种令人不安的含义。现代的自主性主体的观念依据的是意义的不可通约性（irreducibility），是在某些直接的原始经验中被揭示出来的。如果结构主义被限定在语言上，那么意义就能够在其他领域中找到，例如，感觉，生活体验，艺术，或理性直觉等，而主体的自主性也得以保存。然而，如果像语言一样来构建一切文化，那么，与意义有关的所有事物都还原为一种差异系统。正如列维·斯特劳斯解释道，“对我来说，什么是意义？当一种特殊滋味尝起来是各种成分的组合，而其中没有任何一种单独获取的成分会提供一种可以比较的滋味，那么意义就是一种被意识觉察到的特殊滋味。”（列维·斯特劳斯，1963：641）²⁵

既然意义与主体（agency）和历史一道都被还原为结构的结果，因此这种理论就有了决定论的意味。这一理论流行时正是在法国人开始与技术决定论阶层的观念调情的时候，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对结构主义和各种系统之间的相似性还有思考的余地，这些系统近似于同期开始产生影响的社会管理。²⁶ 尽管存在着确实重要的区别，但两者都消除了支持理性秩序的决定论模式的传统历史观。

当然，当结构主义侵犯到每个都自称有自身权利的知识领域时，抗议的吼声来自让·保罗·萨特，来自像保罗·利科那样的现象学家，而且还来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些反应没有一个能够阻止结构主义的潮流。它们最多只是提供了一种反-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社会意识，这种意识最终作为一种新型的激进主义的基础出现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

但是在知识界，对结构主义真正有效的反应不是来自于它所挑战的各种旧理论，而是来自于语言学阵营内部本身。在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所谓的“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提出了各种新的主体理论（theories of agency）。²⁷ 有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曾经放弃了旧的自主主体的概念，但是他们也拒绝那种将对历史的参与还原为虚假幻想的决定论。他们通过重新评价用法的语用学而创造了一个新的主体概念，并认为结构的实践能够改变它的形式。今天，福柯的权力策略分析是法国在文化编码（coding）理论框架内重新构建主体尝试的最有影响的幸存者。

如同福柯的策略理论，利奥塔的语言游戏的语用学试图重新恢复主体在结构领域中的权利。而且福柯和利奥塔两人都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都拒绝单一的合理性模式，因而也拒绝任何形式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决定论。在利奥塔那里，这种立场采取的是多重合理性的“谬误推论的”（paralogic）形式，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完全偶然的世界中的秩序的安全岛。科学合理正是这些安全岛中的一个，是有霸权地位的一个，可以肯定，决不是惟一的一个。这里，我们离列维·斯特劳斯寻找一切语言和文化根本合理结构的意图已相距甚远。

²⁵ 另外参见保罗·利科在《精神》（*Esprit*）中的相同主题上对列维·斯特劳斯所作的值得注意的批评。

²⁶ 不用说，这种比较与列维·斯特劳斯特殊的人类学贡献是不相干的。

²⁷ 除了代表了非同寻常的激进立场形成的福柯和德勒兹的著名著作之外，它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和哲学中到处都能够看到。例如，读者可以参见 Michel de Certeau 的《日常发明》（*L'Invention du Quotidien*, Paris: UGE, 1980）、Marcel Detienne 和 Jean-Pierre Vernant 的《可爱的智慧》（*Les Ruses de l'Intelligence*, Paris: Flammarion, 1974），以及 Louis Marin 的《故事是一个陷阱》（*Le Recit est un pièg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8），对后结构主义与技术的关系的概括性论述，参见 Mark Poster 的《信息模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

然而，这是形成特别的感受性的背景，利奥塔把这种感受性带到了后现代性的观念中。他对科学合理性的在当代社会的霸权提供了一种冷静的评价，并且避开了人道主义者的遗憾。今天的秩序不是对恶托邦式的合理性的浪漫抗议，而是对被新系统无意识开放的机动边界的探索。²⁸

叙事的危机

《后现代状况》首先攻击的是利奥塔称之为“宏大”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东西。它们是各种我们对自己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涉及我们作为民族、种族、阶级或类的成员之命运。宏大叙事确定了共同体的含义并使它的各种事业合法化。尽管世俗化的现代性依然依赖于叙事的合法性，但它们显然还是与传统社会和宗教神话紧密相联。后现代性起源于现代叙事在它自身的自我矛盾和科学技术改变影响下的普遍的危机。

利奥塔的社会理论建立在叙事性知识和指示性知识（denotative knowledge）之间对比的基础之上。叙事性知识是社会的文化仓库，在那里传统通过讲故事而得以留传。利奥塔根据谈话中的三种身份对它作了说明：讲故事的叙事者；听故事的听众和英雄——叙事的对象；它的名字取决于那些在故事中自己所代表的共同体的成员。叙事者的权威来自于他自己过去作为听众的体验，最终来自于共同体本身。

这里，知识存在于说明性的例子，而不是事实性的命题之中，并且它通过诸如表演、与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背景相对立这些社会互动表现出来。这种类型的知识使指示性知识、说明性知识和美学以一种不可分的状态混合在一起，而这种混合无论对对话者身份的建立，还是对它们的实际内容都是重要的。

在传统共同体中，指示性知识还没有作为一种特殊领域分离出来。当它分离出来时，它改变了认知过程的语用学，为各种截然不同的事实要求建立了证明规则。然而，叙事仅仅改变了功能以回应指示性知识的自动化。它不再体现文化的全部内容，相反却使得今天包含已知事物主要部分的指示性知识合法化了。

柏拉图是叙事合法化这种观念的典型。在《理想国》中，当开始为哲学辩护时，他所能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关于逃离洞穴的故事。那个故事本身说明了为什么人们听故事而不是进行理性的对话。柏拉图确实意识到了追求指示性知识叙事合法化中的反讽悖论（the ironic paradox）。正是这个悖论体现了整个哲学传统的特征。

在现代世界，有两种主要的大叙事，一种建立在启蒙的观念之上，另一种建立在政治解放的故事之上。这些关于知识和自由的元叙事需要像人民、人类、世界精神之类的元主体（metasubjects），它们的历程为故事提供了内容。利奥塔详细讨论了这些故事中的两种：一种是黑格尔著作中知识的历程，黑格尔描述了具体科学被一起纳入绝对认知者生命过程的长期斗争；另一种是康德著作中自由的历程，康德把人类看作是追求自主和自由的道德行为主体（moral agent）。

但是利奥塔证明，这些叙事破坏了它们自己。例如，为了促进合法的元叙事，黑格尔必须开始就对一切特殊的知识提出疑问。尽管他关于知识的直接要求的怀疑态度最终在绝对启蒙中得以克服，但它在总体的知识危机中还能够延续。这就是恰好在尼采那里发生的事情，在那里，理性转向自己并对它自己的要求从根本上提出疑问。²⁹

利奥塔相信最近几年中宏大叙事已经崩溃，没有元主体能够拥有这样的历程，我们的现在是这种历程的合法结果。在这一点上，利奥塔的故事开始意味深长地涉及技术，因为技术转变

²⁸ 参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第4章）对 de Certeau 的作为机动边界的战术理论的讨论。

²⁹ 这是典型的启蒙辩证法的运动，其中理性对其自身的合法性发出挑战。

——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出现——构成了叙事危机的普遍社会化的基础。无论这些新技术是电子学的、生物学的或是管理学的，计算机是所有这些新技术的象征。

对利奥塔来说，计算机使认知（knowing）非人化和机械化，知识因而变成了一种社会功能要素、一种技术和市场商品，而不是现实的一种“真实的”表现。这也是把知识作为主体的自我建构的人道主义理想的终结。

与计算机霸权一道产生的是一种特定的逻辑，因而也是一套特定的决定什么样的陈述被认作是“知识”陈述的规则。

至于“认知者”（knower），无论他或她在知识过程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我们都因此可以期待一种彻底外化的知识。那种认为知识的获取与智能，甚或与个人训练（Bildung，教育）不可分离的旧原则正在成为过时的东西，而且将越来越过时……知识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它现在是并且将来也是为了实现其在新产品中的价值才被消费，在两种情形下，目的都是交换。知识不再是其自身的目的，它失去了其“使用价值。”（Lyotard, 1991b: 4）

因此，计算机既是一种装置，又是一种文化转换器。在其双重角色中，它类似于福柯社会规训起源理论中的圆形监狱。计算机和圆形监狱都在执行技术性工作的同时以新的方式对社会现实进行编码。按利奥塔的术语，与计算机相对应的语言系统是“短语的认知体制”（cognitive regime of phrases），与福柯的从现代规训技术中产生的“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相似。但两种研究之间也存在重要的区别。利奥塔对系统构建的理解本质上是康德式的。在福柯那里，一切语言系统都具有历史的特征，而对利奥塔来说，它们建立在各种能力——认识能力、道德能力等——的基础之上。

利奥塔总结道，计算机技术打破了由认知对话和其叙事合法性形成的现代格局。单单指示性知识现在就能够要求认知的有效性，但它不能建立它自己最终的合法性。它像其他语言游戏一样被肢解了，也正是这种情形创造了一个空间，在其中，现代性的幻想，特别是对进步的信仰被剥去了神秘的面纱。结构主义对历史的批判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明显的结果。的确，它对这种情形的表达是如此的清楚，看来不再有必要找一条返回到具有不证自明的意义和直接确定性的完整共同体的路线。“大多数人对失去的叙事已经不再怀念。”（1984: 41）

这就是利奥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歧之处。它的批判性的理想是一种过时的乌托邦主义，一种自我和社会相统一的神话。那种神话可以作为有机的起源用来表现过去，或者作为哈贝马斯的合理共识用来表现未来。在两种情形中，随着阶级斗争的失败，马克思思想中与各种乌托邦目的相对应的力量的衰退，法兰克福学派的反抗成了一种为捍卫人道主义而进行的没有实际结果的战斗。同时，它过高地估计了各种现代社会的效率以及它们把社会关系归于技术控制的结果的能力。与那些把他们的真实性保存在高雅艺术和哲学批判中的原子化的大众不同，利奥塔看到了一种不稳定和多元的、不断产生新思想和新价值的社会动力。今天，思想家的任务既不是重建已经失去的人与自然的统一（马尔库塞，阿道尔诺），也不是让启蒙死灰复燃（哈贝马斯），而是对后现代社会正在出现的语言游戏进行反思。

后现代语用学

当合法化的叙事策略失败时，各种后现代社会发展了两种试图恢复其合法性的替代方法：一种是“执行性”（performativity），或效率，另一种是“谬误推论”，或追求独创性。

技术专家治国论认为，既不用求助于传统的符号，也不用求助于现代观念，通过手段的不断完善完全能够使知识和社会合法化。这种观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越来越流行。这是对“意识形态”——既是资本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叙事神话——幻灭的回应。但是，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观念建立在两种自我矛盾的前提基础之上：一是对科学有效性的信心，而技术专家治

国论却通过使研究服从于市场因而破坏了这种信心；二是对构造各种决定论的系统的信仰，而科学本身现在已经怀疑这种信仰。

为了生产和确证各种事实，现代科学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这就使得它更加依赖于提供认识的技术手段的公司和国家。但是，这些机构想要从科学和技术那里得到的并不是它们的真理，而仅仅是它们可能创造的效率。如此不同的期望制造了潜在的冲突，并出现了关于把科学作为另一种或多或少的操纵成分融入社会系统的可能性问题。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行政机构能够消化这种它极度需要的、而且向超越系统的真理观念寻求其合法性的特殊佳肴吗？

同时，科学本身逐渐地被其所依赖的制度的精神气质所渗透。当追求真理只不过变成了一种买卖，一种新的“执行性”，真理概念便取代了传统的实在论。但是，仅仅掌握了证明的技巧就能够代替任何含义更广的认知合法性概念吗？换言之，知识难道只不过是那种在其中与资金（funding sources）联盟是胜利关键的竞争的产物？³⁰

这些问题导致了对科学内容本身的怀疑，但是对利奥塔来说，反对执行性合法性的决定性理由并不在这里。他怀疑整个的技术决定论的规划，因为整体控制的思想在我们所生活的混乱世界中完全没有地位。由于下决心不是从理论中消除混乱，而是弄懂支离破碎的世界的意思，现代科学已经出卖了其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产物。量子力学、哥德尔定理、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和其他新的研究标志着这样一种基本的认识论转变。

尽管预示着一一种后现代的选择，但科学知识的进化不再相信仅仅由执行性而产生的合法性。利奥塔称这种选择为“谬误推论的合法性”（paralogic legitimation），也就是通过他要求至少在科学制度中占优势的独创、创新和争论而取得的合法性。科学的目的是效率而是发明创造；成功的科学家并不是要让系统合理化，而是要改变它。假设事实上科学以前已经为社会的合法化提供了各种模式（例如，靠客观的知识），那么谬误推论不可以有同样的命运吗？我们也许能够在后现代社会中根据新的对科学的理解使自由重新概念化。

这就是利奥塔的冒险。在他看来，当代社会被两种可能的未来搅得心神不定，一个是令人恐怖地追求一种总体的系统，以一致性和无自由为代价致力于使效率最大化；另一个是在那些承认所有协议和要求的局部特征的个人和团体之间形成一种临时性契约。就其对差异和语言游戏多样性的重视而言，后一种模式是谬误推论式的。这种对差异的尊重使它有别于那种仅仅正在系统反面等待其权力机会的辩证性的反抗。谬误推论是一种拒绝总体化、支持特殊性和局部性的微观政治学。它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抵抗。

计算机再次在论证中扮演了一个的决定性的角色。根据利奥塔，“我们终于明白社会的计算机化如何影响这个问题框架。它能够成为控制和管理市场系统，进而扩展到包括知识本身的‘理想’工具，并且按照执行性原则实施惟一的统治……但是，通过为各种团体提供它们通常在做有见地的决定时所缺乏的信息，它也能够对讨论各种元惯例（metaprescriptives）的团体有所帮助。计算机化所走的是这两条路线中的第二条道路，原则上讲这条路线十分简单：给公众进入存储器和数据库的自由。”（利奥塔，1991b：67）

后现代技术

《后现代状况》出版于1979年。在那样早的年代，它对计算机的分析必然带有推测性。有时，利奥塔的思索所具有的预见性并不比更早的后工业主义预言家所作的那些预见多多少少。和他们一样，利奥塔过高地估计了原先设想的当公众进入数据库和计算机辅助教学时所受的损失。的确，他对计算机的理解看来相当狭隘。例如，他担心未来知识将被局限在只能用“机器

³⁰ 按利奥塔的分析来研究科学社会学中社会构成主义学派的出现将是有趣的。

语言”来表达的那些事物上（利奥塔，1991b：4）。³¹ 机器语言是一个技术术语，它是指最基本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指令被编进计算机硬件。尽管这个层次上的计算机结构也许的确限制着能够计算什么，但没有理由担心机器语言将限制以计算机可读格式表达的知识，并且这对人文学科似乎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们也许还担心过二十六个字母的贫乏，然而却从中诞生了莎士比亚！

尽管有这些局限，但利奥塔还是抓住了我曾经称为计算机的“二难境地”问题。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就通过流动的网络传播各种知识和交往的机会而言，计算机既可以作为控制系统，也可以作为一种媒体（芬伯格，1991：第5章）。作为一个多重合理性的世界，如果后现代性有一种技术基础，那么，计算机一定同时具有这两种矛盾的可能性。如果技术进步的原型仅仅是一种控制的工具，那么理论将以恶托邦式的感伤而告终，并缺乏一种可替代路径的线索。但是，是否有什么证据表明计算机能够担当这种解放的角色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简要地谈谈出现于八十年代的法国远程通讯业务（French telematics），那时正好在讨论后现代性的话题（下一章将进行更为详细的说明）。作为加速法国社会后工业化的一种手段，小型电传系统（Minitel system）由法国政府非常慎重地提了出来。这一系统原先被设想为用于国内信息，这是朝向利奥塔及其他人当时所要求的数据普遍分发的第一步。

可视图文（Videotex）被选为系统的软件。可视图文把遍及网络的信息从储存数据的大型计算机传输到可以在任何地点，包括在家里设置的终端。网络可以传送列车时刻表、法律信息等等，也能作为某种事务的中介，例如，银行业，远程购物等等。在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人们普遍相信可视图文将开创后工业时代。但是，尽管这样进行商品销售似乎有道理，但在所有引进这一系统的地方（足以让人奇怪的是法国除外）结果令人失望。在这里，系统不仅发挥着作用，而且同时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分布着超过 600 百万个终端，运行着几千台服务器。然而在美国这种情况却一点没出现。

法国系统独特的发展部分证实，部分否定了后现代的期望。既然利奥塔曾在关于计算机的信息上依赖于远程通讯业务的早期预言家们，那么，他和他们有同样的幻想就不足为奇了。大致说来，他们相信，如果以正确的精神继续工作，计算机时代将通过提高全体居民的教育水平和扩大其参与责任重大的自我管理机构的机会来完成启蒙的工作。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将超越其专业起因，并且成为普通文化的基础。这些理性主义的期望使他们相信公众将对增加的接近信息的机会做出积极的反应，而这需要参与到他们所设想的那种发达社会中去。

远程通讯业务的理性主义反映了在现代官僚政治和学术文化中科学技术的霸权。那种霸权受到了系统设计师的欢迎，而且被后现代理论家无可奈何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却是毫不留情地——接受了。但是，尽管这根本上不是大多数积极的用户想做的事情，而正是他们决定了系统的发展。事实上，他们在应用中改造了它。

在 1979 年，通常的观点认为计算机只有信息存储和计算的功能。很少有人预见到它作为通讯媒介现在所取得的成功。正是在法国，首先在大规模的范围内发生了对计算机的重新定义。这里，简要地说说它是如何发生的。在新的远程通讯业务网络上的许多主机中，有一些是能够给系统操作员传送信息或者放置分类广告的。熟练的用户们“黑”了其中一台主机用作简单的通讯，并且把它变成了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的通讯联系系统。不久，通讯联系成为网络上最受欢迎的行动之一，网络从一种信息提供者被改造为一种新的信息媒介。

这是一种新奇的通讯方式。在这个奇异的社会领域中，匿名引起一种独特的、要求新的运行类型的语言游戏。每一个人都是表演者，他把使用语言作为自我表达和吸引人们注意的惟一媒介。这里，身份是交流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前提。成功也许在于获得了他的电话号码和约会，这也许是为了一次艳遇，或者只是为了证明某人的演说能力。³² 这种类型的交往实践是建立在

³¹ 翻译者错误地把“机器语言”（“langage de machine”，见法文版第 13 页）翻译为“计算机语言”“computer language”。

³² 在法国，关于电子通讯的匿名有一个有趣的文学作品。例如，参见 Alain Briole 和 Adam-Franck Tyar（1987），以及 J. Jouet 和 P. Flichy（1991）。

利奥塔后现代性的谬误推论所暗示的词语创造性基础之上的临时契约世界的缩影。这里，我们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关于反技术专家治国论社会的预兆，这个反技术专家治国论社会把各种新的自我表达形式赋予高技术。

然而，困难的是找到追寻那种假设后现代性在其中的“局部”合理性的根据。与此不同，远程通讯业务揭示了计算机在构建新的性别和个人身份形式中的作用，而且，不清楚的还有如何假定利奥塔使之与叙事相联系的身份与局部合理性存在着联系。利奥塔在写这本书时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没有感到需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身份的主要支柱，如国家，政党等，似乎在普遍的叙事危机中正在失去其可信性（Lyotard, 1991b: 14）。当然，今天情况已经完全改变，而这个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社会存储器

法国可视图文的经验表明，我们正迈向一个“通讯”（communication）时代，而不是一个“信息”时代。这个趋势明显地表现在通讯应用在许多不同类型的计算机网络中的高速增长。例如，学术的国际互联网创建初衷是研究者需要交换文件和数据，但是今天，数百万国际互联网的用户主要用它来交换个人信息。同时，局部的电子公告版和公司网络链接了全世界其他数百万使用者。计算机通讯（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种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十分不同于利奥塔等同于计算机前景的获取信息的普遍化。这些变革将不会影响知识的分配，而是影响在其中叙事和指示模式之间的区别迄今为止已经被决定了的结构本身。

法国系统运用了一种非常原始的终端，结果，它主要被限制在探测同步通讯中的匿名者。事实上，用户交换的信息通常是无法复述和稍纵即逝的，因此它的社会影响是有限的。而那种更广泛地采用异步电子邮件的系统则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计算机为大多数办公活动那样的小群体活动提供了最初的有效电子媒介。事实上，通过媒介的群体活动已经在研究者之间和许多大公司中变得很普通。那么，在这些新团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如何不同于他们面对面交流的对象？在本章后面的部分中，为了讨论这些既与后工业，又与后现代模式不同的问题，我想引入一种理论框架。

利奥塔的叙事和指示知识系统之间的区分扎根于那种口头文化与读写文化有别的理论传统之中。一种有影响的关于现代个人主义的假设认为，这种区分产生于印刷术和识字（麦克卢汉，1964；Ong, 1977）。体现了读写文化特征的指示性语言游戏的自动化与书写技术相联系，通过书写，知识才能够独立于叙事者和听众的社会互动而被记录和传播。

随着印刷术的发明，这种新的对话关系变得很普遍了。以讲故事为手段的文化传播的社区中心模式开始衰退，一个新的认知空间打开了，而现代个人主义正是在这个空间中发展起来的。书写式对话的扩展促进了一种新主体性的相应扩展：读者的眼光（我）是独特的。建立在重复和表演基础之上的组织化的言语共同体让位于突然间与共同体语言拉开了距离的现代个体的独立性（privacy）。在这种新的立场上，个体得以控制私人语言，这种控制之所以是“双重的”是因为说话者/书写者不再被认为与他或她自己的语词相一致，而是为了“效果”才使用它们。这种距离是现代个性的本质。当距离消失在表演的伪-同步广播中时，个性在这种转变中衰退，而一个大众社会开始出现（Ong, 1971: 284-303; Katz, 1980: 84-89）。

拿马歇尔·麦克卢汉来说，他欢迎这些发展并且宣告读写文化的终结和建立在广播基础之上的新的“口头”文化的兴起。他预言，将兴起一种新的集体主义形式，这种集体主义建立在“情感上意识到他与人类社会其他人完全相互依赖的、具有综合和深层结构的人（person）”取代“有读写能力的、分裂了的西方人（man）”基础之上（麦克卢汉，1964: 50-51）。

麦克卢汉的电子团结性（electronic solidarity）观念为相应的单面社会的梦魇贴上了一层美丽的外表。就利奥塔把单面性主题当作目前超验的决定论科学的一种残余而加以拒绝来说，他还拒绝了麦克卢汉的心理投射。他自己的关于幸福破裂的观念改变了，而不是取消了个人主义的传统观念。然而，对他所预见的发展做出论证方面，利奥塔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东西。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计算机作为交流中介的作用很快就会表现出来，那么他就不能够使口头文化和读写文化之间的差异适应计算机所导致的新形势。

在这种情形中，那种传统的各种基本概念需要彻底的普遍化。因此我建议用可重复的（repeatable）和可检索的（retrievable）对话之间的区别来代替这些基本概念。“存储”在人类记忆中的文本通过“重复”或“执行”而得以“存取”。在各种主要依赖于重复的文化中，文化传播常常委托给特殊的个体，并且文本的存取不在个人的控制之下，而是通过对公共职能和观众的参与在社会上受到调控。共同体的真正存在依赖于把它的社会记忆组织起来的执行气质。这就是利奥塔所描述的叙事的原始天堂。

相反，检索（retrieval）涉及到进入如一本书或一张磁盘这样永恒的文本。原则上不存在为什么这样的进入不应该完全受个人控制的理由，因为各种检索技术不需要其他人的在场。随着计算机联网，我们看到整个共同体不是围绕着面对面的口头互动，而是围绕着可检索性（retrievability）而组织了起来。这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书写文本的交换而存在的共同体，具有特殊的回忆和洞察它们整个过去的的能力。没有什么东西完全像它这样适用于一个建立在口语基础之上的共同体。像讲故事、书本和大众传媒等都是通过不同类型的“复述”（iteration）维持着对过去的回忆，而这里，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可以与它们相媲美的社会存储器形式（Derrida, 1972）。

今天，检索和重复之间的差异不再与书写和言语之间的区别密切相关：应答机器按程序给予我们的是作为一种可检索的文本的言语，各种计算机对话系统允许同步书面对话，而且，复杂的电信会议和语音邮件系统以及计算机化的声音管理技术将很快在商务通讯中使平衡向可检索性转变。因此，我们能够同意德里达所说的：“按照麦克卢汉意识形态的描述，我们现在证明不了那种使社会关系恢复透明性和直接性的书写的终结。”（Derrida, 1972: 392）

这种转变具有显著的社会意义。如果下个世纪的主要媒体不像广播电视，而是像计算机网络那样构造起来，情况会如何呢？计算机通讯看来将使书写再次成为一种通用的表达式。这种朝普遍化的可检索性的转变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后现代”个人主义未来，这并不是作为垂死过去的退化的纪念品，而是对最先进的媒介性体验方法的回应。也许某些像利奥塔谬误推论社会的观念那样的东西将会出现。正如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论证的那样，“计算机书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语言学行为。随着书写主体以非线性的时空方式分散、非物质化以及稳定身份的瓦解，计算机书写设立了一个后现代主体性的制造厂，一台组装非统一主体的机器，一种西方文化的对立物形成最理想的表现形式的标记。”（Poster, 1990: 128）

代码的失落

仅仅指出这种转变将是喜忧参半没什么了不起。社会的计算机化可能通过取消所有那些不掌握新技术的人的资格而加剧阶级差别。的确，有些与这非常相似的事情发生在部分需要不断更新计算机技术的工作部门。但事实上，与其说问题在于大众被计算机革命所抛弃，不如说他们参与计算机革命的地位从根本上讲将是不利的。

莱昂内尔·戈斯曼（Lionel Gossman）认为，口头文化和读写文化之间的区别随着解释代码和这种代码所适用的对话之间的关系而转移。在共同体围绕着共时言语而组织起来的口头文化中，代码会立即被所有人知道。传统不是一种研究对象，而解释也没有明确的规则可循。更确切地说，个体是传统恰恰就在其间活动的共同体的成员，因此他们不需要有意识地做解释性

努力来理解任何构造好的话语。“传统中几乎所有的因素都完全可以依据现行的经验加以理解。因而不存在什么解释问题，因为保存过程同时就是解释过程。”（Gossman, 1971: 779）

建立在书写基础上的文化有一种根本不同的结构：“另一方面，书写的文献是非共时性的，因为来自不同时期的文本是书面语传统中不同阶段的结晶，它们以书写的方式被保存了下来，并且适用于后代的读者和作者以及完全非本土的团体。”（Gossman, 1971: 779）这些文本的意义不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它们已经与原作者、与所有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目的相分离。

“代码和执行被分割开了，解释成了关注的中心。”（Gossman, 1971: 779）在解释的代码没有普遍适用于共同体成员的地方，那些没有获得解释代码的人就必须服从那些掌握了解释代码的人的领导。

在（仍在继续着的）广播时代，人们一直试图在越来越依赖于书写的复杂社会中保留口头文化的某些直接性。就各种普通代码和仪式事件得以继续维持的程度而言，这一直是因为有电视（Katz, 1980）。甚至当电视本身有助于延迟弱势阶级向书写文化世界的融合时，以读写为基础的这个世界转变的全部动力也许被这个事实削弱了。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传统共同体有所削弱，但经验的编码最终却相对而言没有受到疑问。

正在瓦解的正是这种格局。新的通讯技术给我们带来了过渡到这样一个世界的希望，在其中，我们使之与书写文化相联结的经验和解释结构将成为普遍的、取代伪口语的广播共同体的结构。像利奥塔那样的对这种新的社会交往形式前景的乐观估计，预先假定了一种作为潜在基础的书写能力、一种普遍化的相当精致的解释技巧以及普遍适用的意义代码，依靠这些意义代码，一种日益变化和复杂的社会现实才能够以可感觉的模式加以组织。

如果我们不具有这些乐观的假定，我们则会面临着各种令人烦恼的可能性。新社会中分裂的、失去资格的大众将如何运用各种赋予其工作以价值并且作为其社会互动中介的技术？我们已经达到计算机专家所说的“界面设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问题的程度，而且我们尚不知道解决方法。

在一个根本上无组织、日益被个体所占据的交往环境中，也许我们已经正在渐渐地趋向混乱，这些个体已经丧失了具有社会意义的生存代码，而在社会的技术核心中需要这种生存代码。难道这些个体将通过使这些代码严格地屈从于越来越聪明的机器的秩序的方法而被控制起来？我们的选择是，无政府状态或是人工智能？混乱或是一种完全仪式化的大众对一套无法理解的机械程序进行参与的系统？

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也许人性化的技术设计将非常成功地模拟熟悉的对象，以致于普通人在计算机创造的世界中感觉象在家里一样舒适，并且能够在那儿实施某些控制。这就是虚拟现实承诺，它倒不是像新闻界陈词滥调所说的那样试图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把幻想变为现实，而是提供新的和更加“直观的”的操作机器的方法。如果这样的承诺得以实现，那么广播的伪口语性将逐渐地被相应的互动性形式所取代。对技术社会进行完全参与的某些障碍将技术本身所克服。

但是，舒适的运用是有其代价的。在一个用户感到友好的世界中，现实和计算机虚构之间将不存在清晰界限。在一个认识上如此受到损害的社会中，那种也许会出现新的压迫形式的社会也能够产生新的抵抗吗？这是计算机朋克（cyberpunk）科幻小说的主题，这些小说探讨了由机器所带来的深层心理渗透的恶托邦式的威胁，还探讨了当出现一种其现实的确定性由技术来决定的社会时，随之产生的新的斗争方式。

结论：互动的展望

利奥塔对技术决定论和恶托邦思想谬误推论式的替代预见了对技术的态度，因为这些态度是由社会的计算机化所形成的。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论证的那样，技术日益成了我们在其中

进行竞争的地带，而不是从外部压迫我们的敌人。谬误推论的行动正好把这种互动关系带进了技术领域。

计算机朋克科幻小说是这种转变的一种常见的符号。威廉·吉布森的小说《新罗曼司》（1984）通过提供一种语言和一种虚构的系统开创了一个虚拟现实的时代，正是这种语言和系统把各种现有的仿真技术集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未来景观。在吉布森的完全计算机化的世界中，界面是立体对象和轨线的“交感幻觉”（consensual hallucination），在这中间，用户以熟悉的姿态和身体动作——当然也是幻觉——行走。解释的代码不再是读写式的。在线行为不在于在键盘上的神秘敲击，但目前还表现出行动的特征：攻击，防御，飞行，挣扎等等。总之，它成了可叙述的，混淆了科学和那种把发达社会轻描淡写地谴责为不人道的故事之间的严格划分。

吉布森描述的世界是恐怖的，但严格说来并不是恶托邦式的。精英们确实用无限强大的手段统治着世界，但这些手段是如此的复杂，以致于没有人真正地已经控制着它们所引发的所有现象。有许多小通道，聪明的黑客通过它们能够进入系统并从事各种各样非程序活动。未来是不清楚的，但也许还能够被网络上的人类行动所改变。

吉布森的工作是对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像 J.G. 贝拉德（J.G. Ballard）、塞缪尔·迪拉尼（Samuel Delany）、菲利普·迪克（Philip Dick）和厄休拉·莱·归恩（Ursula Le Guin）这些作者所探索的科幻小说新方向的延续。通过回顾，现在已经清楚的是，他们与朱勒士·维恩（Jules Verne）、威尔斯（H.G. Wells）、雨果·格恩斯巴克（Hugo Gernsback）和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等“硬科幻小说”（hard science fiction）传统惯例的决裂并不简单的是个人灵感问题，而且反映了更深刻的社会变革。

最后一节考察三部预备了后现代主题的小说。它们是厄休拉·莱·归恩的《天堂机床》（*Lathe of Heaven*）、菲利·K·迪克的《Ubik》（*Ubik*）和斯塔里斯劳·莱姆（Stanislaw Lem）的《未来学大会》（*The Futurological Congress*）。像利奥塔的作品一样，这些小说预示了当代互动者的感受性。它们都是些关于我将称之为“绝对技术”之类东西的传说，在头戴显示器和数据手套之前很久，“绝对技术”就已经威胁到现实本身的本体论核心。

我所选的这些小说都建立在脆弱真实性的感觉基础之上，莱姆称之为现代技术面前的“现实消散”（actualysis），“崩溃”或“现实腐蚀”（1974：122）。不再有任何建立独立个性的私人空间，也不再有任何直接的经受直接社会互动和冲突检验的公共现实空间。这些故事展现了一种令人烦恼的潜在趋势，那就是对陷入极度怀疑境地的主体的统一性和真实性的担忧，而这种怀疑现在包括思（*cogito*）本身。全面的技术干预已经既动摇了个性特征又动摇了客观的现实性。

莱·归恩的《天堂机床》（1971）有一个奇特的假设就是存在着一个梦想成真的人。当世界发生每一种变化之前，乔治·奥尔（George Orr）能够独自地恢复它，这样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改变宇宙结构对他来说责任是太大了，因此他尽可能少睡觉以避免梦的实现。他的失眠最终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而他则落入一个肆无忌惮的精神病医师的手中，他把乔治·奥尔天生具有的“有效梦想”能力改变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工具。

精神病医师的后-催眠暗示具有神秘的功能。由于受乔治·奥尔无意识的衍射，他们从未完全造成预想的结果。例如，精神病医师为世界和平所作的呼吁引起了外星人的入侵，这最终导致地球上的各国团结一致。这个能干的医生掌握着一项绝对技术，能够在幻想中分解现实中的固体资料，但这种技术的不可预测性与其威力一样大。小说中有效梦想的运用和滥用可以象征现代技术普罗米修斯精神的内在裂缝。

但是莱·归恩并不十分推崇被动性。有效梦想是一种本体论的展现，如果运用得当，它属于世界的内在过程。“一切事物都在做梦。形式的游戏、存在的游戏是梦的本质。”（Le Guin, 1971：161）关键在于学会不是随意地，而是与整体无限的复杂性相协调地做梦。

菲利普·迪克的《Ubik》（*Ubik*, 1969）甚至比莱·归恩的故事更奇怪。在迪克的故事中，像心灵感应之类的精神技能是作为先进的工业侦探形式在市场上买卖的。与此相应，“谨慎组织”（prudence organizations）再一次开始通过阻断精神传输来恢复受到威胁的隐私。

由于发现了“半衰期”（half-life），即死后精神活动的维持，不仅自我之间的分界已经瓦解，而且肉体生命的界限也被弄得模糊不清。以“延期偿付”（Moratoria）方式——当然，搞得最好是在瑞士——冻在“冷藏袋”中的死者，通过电子网络与他人和活人相联结。

任何人都能够看到，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们，一个倒霉的谨慎组织的那些成员，在故事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完全死亡状态。令人惊奇的数百页中，他们在一个共同构成的幻觉世界中发挥着人的作用。他们的幻觉偶尔也会消失，并且只有在被称作 Ubik 的气雾状态中，绝对者（the Absolute）的明智应用才能够重新构成他们破碎了的真实结构。

他们的状况体现了这样一种极端情况：在一个完全媒介化的社会中，人的各种独立特征的衰弱，以及现实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的衰弱。但是，迪克的世界不是早期科幻小说带有决定论色彩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世界，勿宁说它是一个具有如此令人困惑的复杂性以致没人能够真正负责的世界。甚至在他们灾难性的境况中，那些人物还在探索道德的可能性并与邪恶作斗争。Ubik 是一种黑色的喜剧幻想，但确实是这样一种幻想：它能够揭示关于未来的某些重要的东西，在这种未来中（解释故事中的一行文字），“自我系统的定义缺乏各种可靠的界定。”（Dick, 1973: 45）

莱姆的《未来学会议》（1974）也探索了在完全中介的条件下传统个性观念的崩溃。莱姆的英雄被困在致幻催泪瓦斯的云雾中，这种催泪瓦斯是用来控制哥斯达黎加骚乱中的群众的，他正在那儿参加一个“未来学会议”。当主人公对未来社会产生幻觉时，小说在“真实的”世界中进进出出，而未来社会也一个比一个更奇怪。这些想象世界中最终的也是最多的一致性是他们完全围绕着药品来组织。“药物统治”（Pharmacocracy）已经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取代了广播，小说的大部分篇幅所描绘的世界是一种纯粹的“虚拟现实”。

故事的这个要素——对大众的欺骗——多多少少我们听说过，然而，莱姆的想象还包括一种独创的成分。在他的未来社会中，对所有的个人自发性的压制和服用适当的毒品被认为是“文明的”，与其说是控制，不如说是从社会意义上使人自身的情感和行为合法化。愤怒的个人不是靠平静素（calmant）来抑制他的愤怒，相反，是通过服用“兴奋素”（furiol）来确立这个社会的现实性，同样，幸福的个人必须快速地服用一剂“欣快丸”（euphorium）来证明他充满幸福的微笑，如此等等。“受控情感和自然情感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存在了。”（Lem, 1974: 116）

当莱姆的英雄发现他的大脑被移植到几个不同的身体上时，这清清楚楚地表明，人的个性特征失去了其自然的直接性。同时，个体似乎已经获得了一种技术性的自我-控制，它正好与新的社会控制机制相类似。这里，“非区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已经如此深远地触及到了自我，个体把自我等同于他们自己生命的技术主体。在社会意识更大的国家范围内的程序设计背景下，他们忙着通过药物不断进行其内心状况的“程序设计”。在这些技术的控制下，内心的世界已经溶解。

下一章将回到这些小说所提出的某些问题上来。它们包括各种关于当代互动关系结构与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社会之间关系的值得注意的预见。今天，机器不断地要求个体参与到它们的操纵中去。同时，只要人类交往以计算机为媒介，那么，超越其自身自我-表达和语言的主体力量就得以极大地扩展。共同的虚拟现实表明这些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些令人惊异的幻想的最终实现（Lem, 1984: 102）。对那些能够控制系统的人来说，各种新的可能性将一定展现出来，也许有些充满希望的可能性蕴含在利奥塔的谬误推论中，在莱·归恩的有效梦想中，或者至少在迪克半衰期的道德世界中。对那些不能掌握新代码的人而言，莱姆的恶托邦幻想正向他们招手。

这些有关未来的景象暗示了一个不祥结论：也许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而在于包含了不同命运的单一未来。这些命运大体上与今天贯穿于社会的阶级划分相对应，这些划分可以在新技术环境中以新的方式继续再产生出它们自己。技术进步，对那些能够控制以精心的书写表达形式为基础、具有变化的社会和符号关系的后现代社会的人来说，增强了其参与力量，也正是同样的技术进步也许在被排斥的人中间传播了恶托邦的痛苦。

这种分裂的状况让人回想起《Ubik》恶梦般的世界中一个奇怪的特点。在迪克的“半衰期”幻想中，居民们剩余的生命力消耗在与现行时尚保持一致的努力之中。死亡在于经过形态和方式各个阶段的退化，再经过数年和数十年演化风格的退化，朝向最终的非存在。这个过程影响了当前必须通过不断地注入生命力来加以维持的个体世界的结构。

这种如同“世界退化”一样的奇特死亡形象可以作为后现代社会新危险的一种隐喻。也许我们开始看到了从工业时代之初就已经隐含的威胁的第一个真正的征兆，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社会，在其中技术进步的步伐已经最终加速到这样的程度：社会的状况将由变化连续统一体中的状况来决定。

信息还是通讯？

“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这类说法是对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预见——是一种社会科幻小说（Bell, 1973）。由煤炭、钢铁和铁路所构成的旧世界会随着工业时代的烟雾而灰飞烟灭，随之而诞生的是一个以通讯和计算机为基础的崭新的世界。大力宣传这种观点的人把这种美好的向往用在许多恶托邦批判感到悲哀的相同趋势上：诸如经济和愈具重要性的专门知识更高程度的组织化和一体化等。

在这些预见中计算机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因为社会机构和个人生活的管理越来越依赖于快速地获取数据。计算机不仅能存储和处理数据，它们还能够联成网传播数据。在后工业的未来，计算机通讯（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将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

在过去的十年中，那些有能力改变世界的政界和商界领袖们接受了这些预言。在努力实现它的过程中，人们对这个前景了解到了许多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当结果与期望相距甚远，那些曾经激发起最初预言的理论便使人产生疑虑。本章探讨的是，在大众计算机化这一特别重要的事件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并且介绍一下法国的可视图文。

可视图文是一项最适合快速传输数据的 CMC 技术。可视图文是一座在主机的存储器里储存了大量信息“书页”的在线图书馆，装备了电脑终端和调制解调器的用户能够进入其中。尽管原先是为查询存储在主机的资料而设计的，但有些系统还允许用户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或分类广告等进行相互访问。因此，这是后工业社会这种观念的一种主要技术体现。

信息时代的理论认为正在出现的可视图文市场大有希望。可视图文的经历进而在实践中考验了这种理论的某些主要设想。早期的设想使我们大多数人很早以前就获得了可视图文的服务（Dordick 等，1979）。到七十年代末，电讯部门和公司就准备用新的交互式系统来迎接这种大胆预言的未来。但是今天，这些实验的大部分都被认为是令人沮丧的失败。

这种结果也许部分是因为反托拉斯裁决阻碍了巨型电话和计算机公司在大规模的公共 CMC 系统中融入它们的互补性技术。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制定终端标准这一错误使得形势更加恶化。由于缺乏大公司的财力和技术，而且它们的努力也与政府不协调，因此，对小型娱乐和出版公司不能在商业化的可视图文上取得成功这一点就不足为怪了。（Branscomb, 1988）

除法国的 Teletel³³ 之外，在美国，所有外国的有关可视图文的实验都证实了这些令人失望的结果。例如，英国，早在法国亮相前三年就率先提出了 Prestel³⁴ 可视图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大规模地投入到可视图文中去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害怕落在英国后面！

Prestel 具有政府支持的优势，这一点没有哪个美国系统可与之相比。但它也相应地存在一个缺点：过度的中央集权化。起初，信息提供者无法将远处的主机与系统联接起来，这就严重限制了服务的发展。更重要的是，Prestel 依赖于那些为其电视购买了解码器的用户，解码器是一种价格昂贵的、使可视图文能跟电视节目相竞争的硬件。订户基数以可怜的速度慢慢增

³³ 法国可视图文的一种数据检索系统的商标名。——译注

³⁴ 英国的一种商用可视图文（数据业务）系统。——译注

长，在前五年中只达到 76,000 人。（Charon, 1987: 103-106; Mayntz 和 Schneider, 1988: 278）

同时，CMC 的成功运用都是由，并且为私营企业、大学或计算机谜来组织的。普通大众仍然很少甚至没有进入旨在占领市场的网络，也没有必要使用诸如目录查询和软件库这样特殊的在线服务。因此，在短暂的对可视图文的后工业热情喷发之后，CMC 现在被看作主要适合于工作，而不是娱乐；它满足了职业需要而不是休闲或消费。（Ettema, 1989）

我下面将要描述的有关 Teletel 的故事完全不同。从 1981 年法国系统首次检测日至十年后，Teletel 成了拥有数千家服务机构、数百万用户、收入数千万的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可视图文系统。今天，Teletel 在多少有点黯淡的商业可视图文画面上是一个璀璨的亮点。

这个结果是令人困惑的。难道是法国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同吗？但当 Compuserve³⁵ 和 Sears/IBM 奇迹公司（the Sears/IBM Prodigy）的系统发展到百万订户时，那种非常可笑的解释变得更加似是而非了。对这些系统的最终评价并不在于它们纯粹的规模，尽管规模往往说明家庭可视图文市场的存在。然而，我们如何才能解释 Teletel 令人惊讶的成功呢？它对激发起其创造性的信息时代理论又包含什么意义呢？

Teletel 之所以特别让人感兴趣是因为它也没有使用所有那些尝试过可视图文但失败了的国家不愿意使用的技术。它的成功只有通过那些唤起过公众对 CMC 广泛兴趣的社会发明进行分析才能得以解释。对这些发明的仔细考察不仅揭示出了先前的可视图文实验的局限性，也揭示了信息时代理论的局限性。（Feenberg, 1991: chap. 5）

新媒体的兴起

尽管在如何组织公共可视图文系统方面 Teletel 包含了各种普遍有效的发明，但它毕竟是在法国。它具有重要意义的独特性来自三种因素的影响：（1）特殊的法国现代化政治；（2）官僚机构关于国家公共服务的带有自愿主义论色彩的意识形态；（3）强烈对立的政治文化。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发挥了作用，但开始时法国社会没有一个团体愿意出这个头。它们共同开创了社会实验的空间，而 Teletel 则为这种实验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现代化

在法国，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问题，这一点在美国是难以想像的。美国人把现代性当作与生俱来的权利来体验；美国不会去为现代性而奋斗，因为现代性的定义是美国确定的。因此，美国不将其自身的现代性当作一种政治问题，而是依靠具有创造性的混乱的市场。

另一方面，法国对现代性之类事物的理论和政治关注却有着悠久的传统。先是在英国，后来在德国和美国的影响下，法国开始努力把自己融入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一直视为外部挑战的现代世界。这就是著名的由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总统授权两位高级公务员所作的《诺拉-明克报告》（Nora-Minc Report）的精神，它确定了本世纪最后几年法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和目标。（Nora 和 Minc, 1978）

西蒙·诺拉（Simon Nora）和阿兰·明克（Alain Minc）号召在“远程通讯业务”（telematics）上发动一次技术攻势，他们创造这个术语是用来描述计算机和通讯的联姻。他们论证道，远程通讯业务的革命将像工业革命一样从根本上改变现代社会的性质。但是，他们

³⁵ 美国在线信息服务机构之一。——译注

补充说：“‘远程通讯业务’与电不同，它带来的不是惰性电流，而是信息，也就是说，权力。”（Nora 和 Minc，1978：11）“控制网络因此就是一个根本目的。因此必须按公共服务的精神来考虑它的框架。”（同上，1978：67）总之，就像战争对将军具有的重要性一样，商人也不能不考虑后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后工业发展必须成为一种政治事务。

西蒙·诺拉和阿尔·明克特别注意的是，必须让公众接受远程通讯业务革命，并且必须通过抓住正在出现的远程通讯业务市场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取得成功。（Nora 和 Minc，1978：41-42）他们认为，国家可视图文服务在实现这些目标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当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计算机终端保护市场时，这种服务将使仍然落后的法国公众感受到计算机时代的奇迹。通过推动国内市场，法国将最终成为终端的主要出口国，并且从预期的国际经济重建中受益，而不是进一步的落后。（Nora 和 Minc，1978：94-95）这些思想触发了 Teletel 计划的产生，作为宣传和工业政策的混合物，Teletel 计划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中央经济统计论（statist）特征。

自愿主义

如此看来，计划自然落入了行政机构之手。对蔑视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美国人来说，这种选择看起来是奇怪的，而在法国却完全行得通，因为在那里，商界的形象比政府更糟。

当官僚机构而不是公司充当了现代化的先锋队时，政府机构的团队精神（the esprit de corps）便在结果上表现了出来。在法国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法国官僚主义者是以统一提供邮政、电话、道路、学校等诸如此类的服务的方法来确定国家的含义的。提供这些服务是一种以平等主义等的“共和政体”理想为依据的道德使命。法国称这种官僚主义方法为“自愿主义的”（voluntaristic），因为不论好坏，为了满足普遍的公共利益，它毫不顾忌那些局部的情形和经济制约因素。

为了理解负责发展 Teletel 的法国电话公司如何能够设计和实施没有任何利润保证的国家可视图文服务，人们必须记住这种自愿主义论的使命感。事实上，Teletel 并不是一个挣钱的计划，而是民族同一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由此可见，就像电话和邮件一样，它打算延伸到作为国家统一基础一部分的每户家庭。（Nora 和 Minc，1978：82）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电话公司连续发放了数百万台被称为“小型电传”（Minitels）免费终端。尽管早期的广告主要针对富裕地区，但任何人都能够申请一台小型电传。最后所有的电话用户都配备了小型电传。有着最落后的电话系统的法国，一下子从工业国家的行列直接跃进了下个世纪的技术。

如果是一家美国电话公司的话，肯定会对用户设备的这种煞费苦心的升级收取费用。即使是法国电信（French Telecom）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慷慨的正当性也有些怀疑。它提出的理由是建立全国范围的电子电话簿，只有小型电传用户才能使用，但事实上，计划实施的主要目的就是尽快获得大量的户外终端用户（Marchand，1987：32-34）。原先的想法是，终端的免费发放随之会带动服务市场的发展。就像伴随高速公路而出现的路边商业那样，远程通讯业务也被指望着随着小型电传的发放而繁荣起来。

1981 年发放了首批 4000 台小型电传，十年后超过了 5,000,000 台。这一过程的速度和规模对巨大的远程通讯业务投机经济学来说是一种思路。电话公司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规划已经使其成为法国工业七十年代独一无二的最大主顾。大胆的远程通讯业务被设计来对付肯定会随市场快速饱和而出现的电话机生产中的萧条状况，从而避免一个主要工业部门的崩溃。

反对派

按照原来的构想，Teletel 被设计成能通过提供范围广泛的服务从而把法国带入信息时代。但是，每个家庭需要的是更多的信息吗（Iwaasa, 1985: 49）？而且，在一个民主社会，谁有资格提供信息服务（Marchand, 1987: 40ff）？在法国可视图文的早期，这些问题引发了各种相互冲突的答案。

通过国家服务机构的现代化确定了高度集权和控制的国家项目的意义。更为糟糕的是 Teletel 计划是由保守政府发起的。这种结合一开始就导致人们对可视图文普遍的怀疑，并且唤起了众所周知的对重要舆论部门的反抗。人们熟悉的中央控制和大众“抵抗”模式再一次在 Teletel 身上体现了出来，Teletel 是这样一种规划：它“自上而下”到毫不怀疑的公众，但是很快就以它的创造者从未想像过的方式被公众所改造。

新闻出版界领导着反对政府控制可视图文的斗争。当电话公司的头脑人物宣告无纸社会（如在美国达拉斯各地）到来时，由于害怕失去广告收入和独立性，出版业作出了消极的反应。关于计算机统治社会的各种恶托邦的影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位愤怒的发行人写道：“谁掌握电缆谁就是强大的，谁掌握电缆和屏幕谁就更强大，谁掌握电缆、屏幕和计算机谁就拥有上帝的力量。”（Marchand, 1987: 42）

随着 1981 年社会党政府的上台，新闻出版界取得了胜利。为了防止对在线“内容”的政治干预，电话公司只被允许提供其电话号码簿的电子版本。当前的标准打开了通往 Teletel 的大门：任何人只要拥有政府颁发的出版执照就能够把主机与系统联接。到了 1986 年，甚至连这种限制也被取消了，今天，任何人只要拥有计算机就能够挂上系统，在目录上列上一个电话号码并且得到为电话公司服务而获得的收入的一部分。

由于小型主机十分廉价，加上在无论大公司或小公司中，可视图文知识都很罕见，这些因素一开始便产生了高度非中心化的影响。Teletel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无组织的试验空间，一个在线服务的“自由市场”，它比大多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通讯市场更接近自由主义的理想。

这个获得市场成功的例子具有广泛的意义，但并不像反常的鼓吹者所想象的那样广泛。事实是，作为普遍技术变革需求的中介的市场并没有使其成为一副通用的万能药。例如，情况经常是，只要大公司出售成熟的技术，那么它们就利用市场来抑制现有产品所不能满足的需求，或者把这些需求重新引导到不会产生根本的技术变革的那些领域中去。然而，消费者偶尔也会通过市场重新开启设计程序。这的确就是把市场看作是在新技术发展中具有潜在动力作用、具有双重机制的原因。

通讯

令人惊奇的是，尽管电话用户现在拥有了信息时代的设备，但他们相对而言却不怎么利用可从 Teletel 上获得的大量数据资源。他们习惯于查询电子目录，但仅此而已。然而，到了 1982 年，黑客们把被称为 Gretel 的信息服务器的技术支持设备改造成了一种通讯系统（Bruhat, 1984: 54-55）。在做了无力的（也许假装的）抵抗之后，这个服务器的管理员认同了黑客的发明并发了一笔财。其他的服务机构则以“Desiropolis”³⁶、“偏执狂之音”（La Voix du Parano）、“SM”、“Sextel”为名蜂拥而上。“粉红色”（Pink）信息以其带有猥亵意味的匿名交谈而著称，用户以这种方式来寻找具有相同意向的谈话或交往伙伴。

³⁶ 一种词语游戏。——译注

一旦信息传输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小型的远程通讯业务公司就把 Teletel 改造成了一种通讯媒介。它们设计了各种程序来维持大量的用户同时发送而不是接受信息，此外它们还发明了一种新型的界面。一旦进入这些系统，用户会立刻被要求选择一个用户名并填写一个简单的履历 (C.V., curriculum vitae, 或访问菜单, carte de visite)。然后，他们被邀请浏览那些当前在线者的履历以确定一个意向相同的交谈伙伴。新的程序运用了小型电传的图形功能把屏幕分割开来，为多达六个交流者中的每一个传输信息分派给一个单独的空间。正是在这儿，被远程通讯业务所唤醒的创造力在法国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并不是为了适应政府官僚心中所热衷的模糊不清的技术挑战，诸如确保法国在正在出现的国际数据库市场形成中的地位 (Nora 和 Minc, 1978: 72)。

最初的 Teletel 计划并没有完全排除人际通讯 (human communication)，但是与数据传播、在线交易，甚至视频游戏相比，它们显然低估了它的重要性 (Marchand, 1987: 136)。在早期有关的官方文件中很少提及信息传输 (例如, Pigeat 等, 1979)。在 Velizy 进行的一个 Teletel 实验，显示出对通讯的出乎意料的热情。原来打算设计一个把用户和 Velizy 项目组链接起来的反馈机制，然而信息传输系统很快就被改造成一个自由讨论的普通空间 (Charon 和 Cherky, 1983: 81-92; Marchand, 1987: 72)。即使在这次经验之后，也没有人想到人际通讯将在成熟的系统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但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

1985 年夏，法国公用分组交换数据网 (Transpac) 的通信量超出了其容量并导致系统瘫痪。数十万用户为了消遣，从一个信息服务器跳到另一个服务器，就像银行和政府机关被撞出了线一样，法国高技术的倡导者也被迫屈服。这就是新的远程通讯业务体制的最后展示 (Marchand, 1987: 132-134)。尽管涉及一小部分用户，但到 1987 年，百分之四十的国内信息流通时间是花在信息传输上面的 (Chabrol 和 Perin, 1989: 7)。

“桃红色”信息也许是对信息时代思索所产生的一种微不足道的结果，但能够对这个案例做出更积极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信息传输的成功改变了通常所认为的远程通讯业务的内涵，从信息改变成为通讯。这反过来促进了——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教育、卫生和新闻等领域的多种多样的实验 (Marchand, 1987; Bidou 等, 1988)。这里是一些例子：

——电视节目在 Teletel 上提供广告服务，观众能够在那里获得补充信息或交换看法，这就在单向的播放中增加了互动因素；

——政治家们在 Teletel 上与选民们进行对话，政治运动也开通了信息服务以便与它们的成员进行沟通；

——例如在巴黎卫生学校，教育实验已经让学生和教师一起上电子课程并进行辅导；

——心理服务提供了讨论个人问题和寻求帮助的机会。

也许最有趣的实验发生在 1986 年，当时，一次全国性的学生罢课是根据《解放报》(Liberation) 的信息传输服务器来进行协调的。服务器提供了关于热点问题和行动的信息，开辟了在线讨论组，每小时更新新闻，甚至还有一种嘲弄教育部的游戏。它很快收到了 3000 条来自全国各地的消息 (Marchand, 1987: 155-158)。

这些应用显示出媒介创造令人惊讶的新的社交形式的无可置疑的潜力。不是模仿电话或书信，它们展现了作为非常个性化的匿名通讯媒介的独一无二的功能。这些实验预示了发达社会中一种非常不同的公共和私人生活体制 (Feenberg, 1989a: 271-275; Jouet 和 Flichy, 1991)。

系统

尽管没有人事先把它的一切因素都计划好，但最终在这些不同力量的作用中出现了一个相关的系统。这个由各种相当平常的因素所构成的系统却形成了独特的整体，它破除了一般公众接受 CMC 技术的种种障碍。这个系统的特征表现在五个基本要素方面：

1，**规模**（Scale）。只有政府或巨型公司才具备进行像 Teletel 这样的足够大的规模才能保证系统公正测验的实验手段。更小的试验使所有倡导者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二难境地：构造一个服务市场需要用户，但没有一个服务市场就不能吸引用户。法国的经验证明：解决的方法是，为了吸引足够的新用户和临时用户，要对传送设备和终端进行巨大的初始投资，以此证明存在着一个数量上足够多的必要的服务群体。

2，**回报**（Gratuity）。也许惟一最具革命性的系统特征就是终端的免费发放。与其他任何一种全国性计算机网络相比，分组交换网络和终端被看成是一个单一整体。回报支配着如何明智地选择终端的性质：耐久性和简单的图形。在公众认识到这种不熟悉的系统的重要性并且为昂贵的终端或预订投资之前，它从一开始就为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广泛基础。

3，**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法国电话公司的垄断地位和小型电传终端的免费发放确保了几个重要领域的一致性。各种设备和开始程序被标准化了，并且不受地域限制以单一的价格提供单一的全国电话号码服务。（现在有了稍微复杂一点的价格结构。）电话公司运用其支付系统进行所有的收费，与服务提供者分享收入。

4，**自由主义**（Liberalism）。让主机更容易地接入分组交换网络，作出这样的决定势必与电话公司对其技术系统的一切方面进行控制这个根深蒂固的习惯相左。然而，一旦作出了这个决定，它就打开了通往异常旺盛的社会创造性之门。尽管小型电传原先是为信息恢复设计的，但它能够被用作许多其他的目的。系统的成功主要归因于自由的服务市场与灵活终端的结合。

5，**形象**（Identity）。由于自称是现代化计划的代表，并且通过大量发放有特色的终端，系统获得了一种公共形象。下列因素还形成了独特的形象：特别的电话号码簿，与 Teletel 字母浏览标准相关的图形风格，采用可视图文屏幕操纵以取代滚动显示，以及“桃红色”信息传输的社会现象。

代码的冲突

对 Teletel 的这种解释与那种使西蒙·诺拉、阿兰·明克和许多其他后工业主义理论家获得灵感的关于计算机社会影响的决定论假设相矛盾。在这件事情上，技术的逻辑完全不能给现代化问题确定一个完美的答案，相反，非常混乱的冲突、谈判和创新过程产生了一个意外的社会性结果。这些社会因素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影响法国 CMC 的发展呢？

社会构成主义

Teletel 的演变证实了第一章所介绍的社会构成主义的研究。与决定论不同，社会构成主义并没有仅仅依靠一种人工制品的技术特征来解释它的成功。根据“对称原则”，在一个成功

者的位置上总是存在着各种也许已经发展起来的替代物。人工制品的突出之处并不是某些诸如“效率”或“效力”之类的东西，而是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正如我们在可视图文这件事中所看到的那样，社会需要是各种特殊需要混合起来的，在最终确定一种适合这种社会需要的特殊产品的过程中，那种关系是通过发明者、公务员、商人、消费者和其他社会集体之间的协商来完成的。这个过程被称为“闭合”（closure），它产生了一个稳固的“黑箱”，一种能够被当作完成了的整体来看待的人工制品。在一种新技术得以闭合之前，它的社会特征是明显的，但是一旦它被完全确定，即使不可避免地要天真地回顾一番，它的发展也似乎纯粹是技术的。通常的情况是，后继的观察者忘记了“黑箱”最初在其中得以闭合的那种原始的模糊状态（Latour, 1987: 2-15）。

平切和比杰克用自行车的例子阐述了他们的方法。在十九世纪晚期，在目前的自行车形式得以确定之前，设计是朝几个不同的方向展开的。有些顾客把骑自行车看成是一种竞技体育，而其他人则抱有完全功利的用于交通的目的。与第一种目的相一致的设计有高高的前轮，这种前轮因为不安全而被第二种设计类型的骑车人否决。他们宁愿要那种两个大小相同的低轮子的设计。最终，低轮获得了成功，而且从那以后直到今天的整个自行车的历史都源自那样的技术发展线索。在这个例子中，技术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相反，“各种社会集团对人工制品内容的不同解释通过不同的问题和答案的链条导致了后来不同的发展。”（Pinch 和 Bijker, 1984: 423）

对可视图文来说，这个研究具有几层意义：首先，像 Teletel 这样的系统设计并不取决于普通的效率标准，而是取决于那种把与不同标准相适应的各种技术选择区别开来的社会过程。其次，那种社会过程与预先确定的可视图文技术的运用无关，涉及的恰恰是可视图文的定义以及由它而导致的问题的性质。再者，各种相互竞争的定义反映了不同技术选择过程中的现代社会相互冲突的社会景象。这三点表明需要在技术研究中来一场革命。第一点扩大了包括技术主题在内的社会冲突的范围，而技术主题通常一直被看作是纯粹“理性”共识的对象。另外两点则意味着，各种作为有效力量的意义并不仅仅是通过文化生产和政治行动进入历史中的，它也在技术领域内发挥作用。为了理解一种技术的社会观念或定义，人们需要一门关于技术客体的解释学。

各种技术都是有意义的客体。从我们常识的角度看，它有两种含义：第一，技术具有一种功能，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意义与这种功能相一致。然而，我们还是认识到使技术客体与其他独立于功能之外的社会生活方面相联系的各种“内涵”（connotations）的影子（Baudrillard, 1968: 16-17）。因此，汽车是交通工具，但是它们还或多或少地表示了所有者的身份、财富、性感等等。

在技术得以充分确立的情况下，功能与内涵之间的区别往往是清楚的。有一种趋势就是把这种清晰性强加到过去的事物身上，并且想象技术的功能先于客体而存在并促使其产生。相反，社会构成主义的纲领认为，技术的功能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在客体的发展和运用过程中被发现的。在社会和技术环境的演变中某些功能逐渐地被确定，例如，就像汽车的交通功能在低密度城市设计中被制度化那样，这种设计产生了汽车所要满足的要求。因此，闭合（Closure）部分依赖于在一个更大的技术网络中建立各种紧密的联系。

至于新技术，开始往往没有清楚的功能界定。结果，与技术相关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意义之间就没有明确的区别：一辆为速度而造的自行车和一辆为安全而造的自行车在功能和内涵方面都是不同的。事实上，一项设计的内涵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就是功能。这些模糊性并不仅仅是概念上的，因为设计尚未“结束”，而且也没有制度上的束缚使它明确地固定在其多种用途的某一种上。因此，一项新技术定义中的模糊性必须通过技术发展本身才能得以消除。设计者、购买者和使用者在这过程中都起了同样的作用，新技术的意义也由此最终确定。

技术的闭合最终凝固成一种技术代码。技术代码根据客体已经获得的最普遍的社会意义，用严格的技术术语对客体进行了界定。拿自行车来说，这个结果出现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了交通安全，一辆自行车只能按照一种代码来生产，这种代码规定：座椅最好安置在一个小前轮的后面。当消费者遇到一辆根据这种代码生产的自行车，他们会立即明白这是为什么：用今

天的话说就是“安全”。这个定义转而又会涉及妇女和老年骑车人，涉及步行去商店等等，还取消了与追求刺激的年轻运动员有关的各种联想。

技术代码通过同样用来解释文本、艺术作品和社会行为的解释程序而得以解释（Ricoeur, 1979）。但是，当代码成为重大社会争论中的热点问题时，解释工作就变得复杂起来。意识形态的观念因而就在技术设计中积淀。正是这一点说明了“同构，即器械的技术逻辑和在其中扩展开来的社会逻辑之间的形式上的趋同。”（Bidou 等，1988：18）这些趋同模式解释了更大的社会-文化环境对闭合机制的影响（Pinch 和 Bijker, 1984：409）。可视图文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下面，我将探讨从最高的世界观层次向最低的技术设计层次转化的模式。

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乌托邦

这个例子的主题是后工业社会的真正本质。“信息”时代原来被看作是一种科学化的社会，一种使国家和企业的技术统治的目标合法化的观念。构成这种幻想基础的各种关于人性和社会的理性主义假设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作为一种实证主义的乌托邦而为人们所熟悉。

它主要的特点是人所共知的。科学-技术的思维成了整个社会的逻辑。政治仅仅是研究和发​​展共识机制的普遍化。个人不是通过压迫，而是通过理性认同被融进社会秩序中去的。他们的幸福是通过对个人和自然环境的技术控制而取得的。权力、自由和幸福，所有这一切因而都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

这种全球性的观念支持着与工程和管理相关的代码和实践的普遍化。人们不需要抱有一种明确的乌托邦信仰来相信，甚至在这些原则通常被运用的组织化环境之外，对这些原则的专业研究也是有用的。建立在系统分析、理性选择理论、风险/利益分析等基础之上的社会工程观念的传播证实了在社会合理化中的这种新的进展。在不用大惊小怪地假设法国官僚机构存在工程崇拜的前提下，类似的假设影响了 Teletel 的主办者。

在微观层次上，这些假设在传统的计算机界面上起着作用，这种计算机界面有着简洁分级菜单，而这些菜单由单字的“选项”描述符所构成。由这样的选择项组成的逻辑空间与热衷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个性的个人“用户”有关。当以公共信息服务的形式投射到社会整体时，这种研究就意味着一个确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自由”或多或少是预先选择的选项中一种明智的选择，而预先的选择是由像技术专家治国论权威这样的普通事例所决定的。这样的事例要求成为一种中性的媒介，而它的力量却正好通过其透明度而合法化了：数据是精确的并且加以逻辑地分类。但就此而言它依然是一种力量。

个人在他们与公司、政府、医疗和学术机构的互动中就这样被卷进了系统。可视图文把这个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世界变得合理化了。事实上，Teletel 上有些最成功的功利主义的服务机构提供了关于官僚政治规则、职业计划，或考试结果的信息。这些服务机构在理性社会中产生了生活的“忧虑的效果”（Bidou 等，1988：71）。但是，忧虑的作用揭示了这种乌托邦更为黑暗的一面。系统似乎体现了更高层次的社会合理性，但对那些系统造就了其生活的人而言，它是一种夹杂着复杂性和任意性的梦魇。这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中充满恐惧和仇恨的“水晶宫”，或者是阿尔法村³⁷，在那里，计算机的良好统治是最不人道的压迫。

³⁷ Jean-Luc Godard 的影片《阿尔法村》（Alphaville）中一个由计算机控制的城市，参见本书第 3 章。——译注

幽灵般的主体

Teletel 被卷入一场关于哪一种后工业经验将通过国内计算机化而得以在技术上实施的争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用理性主义的技术代码所确定的互动性定义立即遭到了来自“用户”的抵抗，这些用户不理睬系统的信息潜力，而是用它进行匿名的人际交流和猎奇。

这些意想不到的应用向被实证主义乌托邦所遮蔽的后工业社会的日常经验展示了另外一种整体层面。随着人的个体性和社会角色之间裂痕的扩大，以及个人被融合进“大众”，社会生活围绕着非个人的互动而不断地被重新组织。个体在各种角色以及各种完全没有他们的身份中轻易地滑动，每天在各种各样的大众中进进出出，完全不属于任何一个共同体。“孤独的群体”的孤独性就在于有大量无足轻重和模糊不清的陌路人。在这种新的社会体验中，匿名起着关键的作用，它产生了种种性幻想和暴力，这种暴力体现在大众文化中，从更小的范围上讲，在个人的生活中得以实现。

正因为可视图文允许个人向职业规划机构或政府官僚机构提出个性化的匿名质询，因此，由于小型电传 提供了电话联接，一直模糊不清的与色情文本有关的各种关系现在变得具有个性，甚至互惠性。独立的家庭发挥了以前由像酒吧和俱乐部这样的公共空间所承担的功能，但有一种重要的变化：单调的屏幕不仅用来联结交谈者，而且也保护了他们的身份。

随着报纸的“个性化”，个人有了这样的印象：小型电传 使他们完全掌握了所有他们发送的信号，与带风险的面对面接触不同，这里，控制充其量也是不确定的。经由书面的自我展示而加强的控制使复杂的身份游戏变得可能。“身份不再具有原来所确定的状况（通讯通常是从这开始的），它成为一种重要的事情，一种通讯的产物。”（Baltz, 1984: 185）

假名通讯的体验让人想起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把自我看成“形象”或身份，以及“神圣客体”的双重定义，这样思考是因为：“作为一种形象的自我，是把一项事业中具有表达意义的全部事件拼合而成的；而作为一种参与仪式游戏的演员的自我，他，体面或不体面地，老练或不老练地应付着各种意外的情况。”（1982: 31）通过不断控制形象而不断降低陷入为难境地的风险，信息传输改变了自我两个层面的社会比例，并且打开了新的社会空间。

主体相对的世俗化（desacralization）削弱了社会控制。把团体压力施加给某些不能接受不同意见的人是困难的。通过减轻自我在其通讯中的“生存”约束，CMC 因而增强了个人自由感和个人主义。“热情”（Flaming）——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各种在线情感——被认为是这种自由情感的一种负面结果。但是，改变了的他者的现实感也许还增强了通讯的色情刺激（Bidou 等，1988: 33）。

马克·古劳默（Marc Guillaume）引入了“游离性”（spectrality）概念来描述个体间这些新的互动形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这些个体被化解为匿名，然而，却成功地运用那个匿名来掩蔽和维护他们的身份。“通讯技术，如果从文化领域来考察”，他写道，“反映了一种强烈但不明显的欲望，这种欲望就是部分地和立刻地既躲避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符号制约，又躲避极权主义的机能。并不是以那些短暂的公共宗教仪式时期或传统社会允许的混乱时期仍然仪式化的形式来躲避，而是根据为自由付出代价的主体的意愿来躲避。他成了一个幽灵（spectre）……这里从术语上讲有三重含义：他逐渐消失，目的是像幽灵一般自由地游荡，并且是在一个他已经明白的符号秩序中。”（Marc Guillaume, 1982: 23）

这里，社会进步看起来已不是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因素彻底地扩散到日常生活中去，而是电话系统交换逻辑的普遍化。为了完全理解这种选择，有必要再次考察一下浸入到社会谈话中的技术隐喻。全国性计算机网络是建立在 X.25 标准之上的，它使主机能够通过电话线为远程的“客户”服务。尽管网络就像电话系统联结所有用户那样多地联结其所有主机，但联结数量并不是网络原来所考虑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它被设想为能够让用户群在各种特殊的主机上共享时机。在通常情况下，无论是用户或是主机彼此之间都不能进行交流。

Teletel 被设计成一种普通的 X.25 网络，它具有以主计算机为中心的分层结构，在这个网络中，用户是星状互动的一个点。但是在系统的实际运用过程中，用户成了普遍的水平状相互联系的中介（Guillaume, 1989: 177ff）。这种转变象征着“网络联系”的出现，它既替代了正式的组织，也替代了传统共同体。计算机系统为这种新的社会形式提供了一种特别有利的实验环境。

在 CMC 中，人际交往的语用学是十分简单的，事实上，它被简化为技术联接的协议。与此相应，从一种社会联系过渡到另一种社会联系也变得更加容易，这又一次符合交换的逻辑。

“桃红色”信息传输仅仅是这种转变的一种征兆，标志着整个社会逐渐转变的过程。

各种最后的仪式把个人封闭在传统自我的堡垒中，而伴随着这些仪式崩溃的是一套完整的解放话语。随着家庭和其他稳定结构的瓦解，个人生活成了网络管理的事情。新的后现代个人被描绘成温顺的、易塑的，能够从多方面把他们的表演搬上舞台，并且能够日复一日地改变场景。网络使其成员加入到各种临时的社会契约中而不断地形成共同的相互信任，这就增加了网络成员的力量。结果，后现代“原子化的社会变成了灵活多变的语言游戏网络。”（利奥塔，1979: 34）

CMC 深深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时-空坐标，促使个人超越了报纸的速度，而报纸仍然是今天左右公司和政治机构这类庞然大物时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人们因而获得了相对的解放：如果你不能够躲避后现代工业全面控制的梦魇，但至少增加了联系和接触的数量，这样，联系的交叉点就成为丰富多彩的选择点。存在就是联接（To be is to connect）。

确立后工业时代意义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小型电传的社会构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使 Teletel 获得成功的独具特色的妥协是处于紧张状态的这些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已经从法国可视图文的社会界定这一微观层次上追溯了这种妥协的各种条件，但是它在系统界面的技术代码上留下的痕迹仍然可辨。

为资产阶级的内在性质布线

小型电传是这些紧张关系的感光表。负责设计它的那些人担心公众会拒绝任何与计算机、打字机，或其他专业设备相似的东西，并且努力使其适合于国内环境的社会内容。他们在劝说数百万普通人把终端搬回家时，既谨慎地考虑了各种“社会因素”，也考虑了各种相关的人为因素（Feenberg, 1989b: 29）。

这是一个设计问题，它有长而有趣的历史。它的前提是公众与私人、工作与家庭的分离，根据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这种分离在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时期就开始了：“对个人来说，生活空间第一次与工作场所相对立。生活空间是由其内在性质所构成的；而办公室是其附属物。那些思想与办公室的现实相一致的个人需要在其幻想中保持其内在性质。”（Benjamin, 1978: 154）

设计的历史表明，这些内心深处的幻想是在公共行为和人工制品对私人空间持续的入侵中，通过公共领域获得的形象而逐渐形成的。从煤气照明到使用镀铬家具等的一切事物，都是在公共领域首先出现，然后逐渐渗透到家庭中（Schivelbusch, 1988; Forty, 1986: 第 5 章）。电话和电子媒体通过明确地改变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而强化了这种渗透。

本雅明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内在性质”的最终消失有待于互动性的普遍化。新的通讯技术有希望消弱，也许甚至化解家庭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别。远程工作和电话销售有望使两个世界合而为一。“家庭不再能够自认为保持了私人生活的空间，保持了主要的非经济关系，并且在与商品世界的关系中保持了自主性。”（Marchand, 1984: 184）

小型电传是完成这种最终的非区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工具。在朝向一种完全不同的内在性质的道路上，它朴实的设计是一种妥协。更早的可视图文系统曾经运用了非常精致和昂贵的专用终端、电视适配器，或配备了调制解调器的计算机。迄今为止，除了法国，国内的 CMC 只有建立在计算机基础之上才取得了成功，但它的扩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计算机爱好者亚文化。从这些计算机爱好者那里得不到任何对全面销售有用的设计原则，因为他们并不为卧室梳妆台上或厨房餐桌上不协调的大型电子设备所困扰。从功能上讲，小型电传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计算机。它只是一个“哑终端”，也就是说，一个具有很小内存和运算能力以及一个内置调制解调器的电视屏幕和键盘。这样的设备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工程师们主要用它来操纵大型计算机。显然，用于此目的设计作为有吸引力的家庭内部装饰就不够格了。

小型电传的设计者们打破了所有这些惯例，并且把它当作电话的一种扩展而不是一台计算机或一种新的电视这两种现有的模式（Giraud, 1984: 9）。由于伪装成一种“漂亮的”电话装置，对理性主义的技术代码来说，小型电传是一匹特洛伊木马。

这种装置是小巧的，甚至比苹果公司的麦金托什微机还小，它有一个能斜着支起来并锁定屏幕的键盘。开始，它配备了一个字母小键盘以有别于打字机。那个小键盘既不能让非打字员们也不能让打字员们满意，终于被标准键盘所取代，然而，小型电传的整体外观依然是无条理的（Marchand, 1987: 64; Norman, 1988: 147）。最重要的是，它没有磁盘和磁盘驱动器，它正面的开关很容易找到，后部也没有那些唬人的乱七八糟的电线，而是普通的电话插线。

家用的小型电传 终端采用电话接入而不是计算机接入的方法以适应用户大概具有的技术水平。计算机程序特别提供了大量的选项，可以方便地切换电源。而且，在 Windows 取得成功之前，大多数程序都有非常不同的界面，以致于每个人都需要经过一段特殊的培训。任何使用过早期 DOS 通讯软件的人都能够理解，它是多么地不适合于普通家庭使用，因为开启屏幕它就设置了 12 个模糊参数。小型电传的设计者非常了解他们的用户并提供了一种极其简单的连接程序：在电话上拨号，听到连接声音后，按一个键就行。

各种功能键的设计也方便了使用。这些功能键是用来管理电子版电话号码簿的。开始时，关于要不要给与某种目的相配的键一个特殊的名称也有一些讨论，如“城市键”、“街道键”等等。而改为给功能键以普通的名称，如“向导”、“下一屏”、“返回”等实在是一种明智的决定，这样就没有把它们限制在任何单一的功能上（Marchand, 1987: 65）。结果，这种键盘就为所有信息提供者确定了一种标准和非常简单的用户界面，计算机世界中的有些事是 Windows 带动起来的，但只不过是配备了越来越多的精巧设备而已。

小型电传证实了设计者原来在系统的通讯应用方面所具有的怀疑：功能键被用来从屏幕上查询数据库，而有着未经雕刻的树胶键的小键盘真是太笨拙了，它无法用来触摸式打字。这里，因为依赖于电话模式，法国为此付出了代价：被电话公司迷住了的厂商忽视了消费者的电子交易，甚至为最便宜的便携式打字机提供了低于当前国际标准的、具有电话功能的小键盘。更不用说这种终端的出口是多么的困难了。

二难的网络

如此设计的小型电传是一种悖论式的事物。它有电话的伪装，尽管这对进入家庭是必要的，但也把各种模糊性带进了的定义中，并且给通讯带来了种种设计者意想不到的应用（Weckerlé, 1987: I, 14-15）。对他们来说，小型电传应该是一个收集数据的计算机终端，

但是，连接了小型电传的家庭电话是一种社会媒介，而不是一种信息媒介。因此，官方对系统的技术定义就与电话业务发生了矛盾，一旦家庭安装了系统，电话业务就会立即把系统变为殖民地（Weckerlé, 1987: I, 26）。

在一定程度上，小型电传并没有完全排除人际通讯的可能性，许多可视图文系统也是这样，尽管有种种局限性，但它仍然能够改变其原有的目的。例如，尽管原始的功能键实际上并不是为通讯应用而设计的，但它们能够与信息传输程序融为一体，用户们通过用一种在线速记法打字而适应了拙劣的键盘，这种在线速记法具有丰富多彩的新俚语和独创的术语。小型电传因而成为了一种通讯设备。

巴黎的墙上很快就被登有各种信息服务机构广告的招贴画所覆盖。一种全新的经过改造的小型电传形象取代了官方电信（Telecom）那种严肃的现代主义宣传。在这些招贴画中，图案不再是老一套的电脑终端，而是与公然的性挑逗联系了起来。在有些广告中，小型电传能走，会说话，会招手；它的能够上下翻飞的键盘成了一张嘴，屏幕变成了一张脸。在一片奇怪的喧嚣声中，功利主义的沉寂被打破了。

随着私人 and 公众之间界限的逐渐淡化，小型电传开辟了一条双行道。在一个方向上，家庭成了迄今为止属于公共活动的地方，这些公共活动如查询火车时刻表或银行账单等。而在另一个方向上，远程通讯业务在毫无顾忌的公共世界中掀起了一场真正的私人幻想的风暴。用本雅明的话说，个人仍然需要“在其幻想中维持内在性质。”但是现在，那些幻想采取了具有攻击性的色情形式并传遍整个网络。

这种社会变革中所蕴含的小型电传的技术变革虽然是看不见的，但却是本质性的。它是作为用户节点来设计的，与主机相联接，没有考虑普遍交换系统中的运用，而普遍交换系统就像电话网络那样，允许任何用户与其他任何用户建立直接的联系。然而，随着它的形象的改变，法国电信相应推出了一种通用的电子邮件服务，被称为 Minicom，它给每个拥有小型电传的人提供了一个电子信箱。小型电传最终完全与电话网络融为一体。

尽管从这些通讯应用中获得了收益，但法国电信还是抱怨说它的系统被误用了。奇怪的是，一个世纪以前，那些引进电话的人在电话的界定上与用户进行了一场同样的斗争。这种相似性具有启发性。开头，拿电话与电报作比较，广告也主要是把它当作对商业有帮助的东西。对电话的社会运用存在着普遍的抵抗，并试图把它确定作为一种重要的商业工具（Fischer, 1988a: Attali 和 Stourdze, 1977）。在与电话的这种“男性”特征的对立中，妇女们逐渐把它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容纳进她们的日常生活之中（Fischer, 1988b）。正如 1909 年一位电话公司官员所抱怨的那样：“电话超出了它原来的设计，一个确定的事实是，今天大部分按固定租金制来使用的电话更多地用于娱乐、消遣、社交和接待别人等方面，而不是用在实际的商务或家庭需要方面。”（引自 Fischer, 1988a: 48）

在法国，色情内容伴随着电话的这些早期社会运用而多起来。令人烦恼的是，当丈夫或父亲外出工作时，外人能够闯进家里。“在《美女 Epoque 的法兰西》（French of the Belle Epoque）的想象中，电话是一种勾引工具。”（Bertho, 1981: 243）正是因为如此顾及女接线员的贞操，以致于电话公司晚上用男性来代替她们，或许这样能够抵挡诱惑（Bertho, 1981: 242-243）。

尽管开端有这些困难，但到三十年代，在美国，社交性已经成为电话的一个不可否认的话题。（在法国，转变的时间要更长。）因此，就像可视图文一样，电话是一种引进的技术，它具有受到许多用户拒绝的官方定义。和电话一样，当小型电传成为个人交往具有特权地位的工具时，它也获得了新的意料不到的内涵。在两种情况中，无实体的声音或文本魔术般忽隐忽现的作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存在于中介化通讯的本质之中。

结论：通讯社会的未来

Teletel 的最终配置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用户的意愿来构造的（Charon，1987：100）。所形成的画面与原先的设想相距甚远。这种结果的教训是什么呢？信息时代的理性主义形象并不会经历了经验的考验后而不发生变化。今天的 Teletel 并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市场。与预料之中的运用相并行的是，在一个非个人的官僚主义社会中，用户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通讯形式以适应社会游戏和交往的需要。在这样做时，普通人超越了计划者和设计者的意图，并且把后工业的信息资源转变为后现代的社会环境。

可视图文技术的意义由于这种经历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但是，超出这个例子的特殊之处来看，一幅更大的图景隐隐出现。有人发明了通讯技术并抢先公开地通过理性主义代码对它作出了说明，但无论如何，通讯技术的人性层面只有超越那些人的文化设想后才能逐渐出现。这个过程揭示了后工业主义技术专家治国论规划的限制。

第四部分 多元文化的现代性

第八章 西田哲学中的现代性难题

今天我们所谓的东方研究仅仅意味着把东方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为了产生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必须对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刻反省，然而，这项工作至今却未展开。”

西田 (Kitaro Nishida, 1958a: 356)

现代性问题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初期，日本哲学在对政治思潮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日益变成为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哲学。除了可敬的几个人之外，多数思想家，例如九鬼 (Kuki)、田边 (Tanabe) 以及和辻 (Watsuji) 都为日本帝国主义做辩护。³⁸ 西田与众不同的态度尤其重要，因为他不仅是能够理解主要西方思潮的第一位日本哲学家，而且还是能利用西方传统详细阐述自己的独创哲学的第一位日本哲学家。通常他被认为是日本现代哲学的创始人。

二战后，哲学与民族主义政治之间的联结并没有被遗忘，有时形成了两者一起被抛弃的情况，尤其在左派那里。但是，哲学家对于政府政策的热情差别很大，西田决不是最差的一位。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他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军事的，他对官方政策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解释持批评态度。然而，很久以后，他内心对战争的怀疑看来才影响到他的理论观念，而且，他的思想反而被思想家们认为要比他自己所认为的更加具有帝国主义的热情。³⁹ 就我看来，直至战争结束，他仍继续希望日本将作为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领域的中心从战争中脱颖而出。他在下面这篇写于 30 年代末的重要政治评论中概括了他对日本的文化抱负：“到目前为止，西方人仍然认为他们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人类文化也是朝着他们自己的形式发展。其他的种族，比如东方人，是落后的。而且，即使他们进步了，他们也将获得相同的形式。甚至一些日本人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是……我相信，东方文化中具有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东方和西方）必须相互补充，并且……最后实现完全的人性化。日本文化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样一个原则。” (Nishida, 1965e: 404-405) ⁴⁰ 尽管这种立场中仍然有许多值得关注的东西，但由于它逐渐地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命运混在一起，以至于今天很难把它的永恒意义从其形成的环境中提取出来。本章的目的就是要解释西田的观点，以便尽可能的确定他对文化和至今仍远未解决的现代性问题讨论的贡献。

最近，人们又重新关注起战时知识界的一件大事，它使西田立场的有些方面突现了出来。1942 年，以文化创造性为题开了几次研讨会，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叫“超越（欧洲的）现代

³⁸ 关于战前日本思想的帝国主义背景，参见 Dale (1986)。

³⁹ 关于西田产生怀疑的一个实例，参见 1942 年 6 月他写给原田 (Harada) 的信 (Nishida, 1965g: 199-200)。

⁴⁰ 除注明之外，所有日文翻译均出自有坂阳子 (Yoko Arisaka)。

性”(Overcoming [European] Modernity)。⁴¹ 会议提出了大量的观点,有些是非理性主义的和反西方的,而其他观点在要求日本文化的权利方面则更有节制。西田的许多追随者出席了大会,其中包括西谷(Nishitani),他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具有独创性和真正精神气质的文化,在其对现代文明的支持能力上,可与西方传统相媲美。因此他反对用欧洲文明为整个人类来定义现代性的主张。把现代性完全定义为人种的主张。正如哈努图尼恩所指出的,“问题是找到一种界定发生在日本,而不是发生在西方的现代性的方法。”(Harootunian, 1989: 74-75; Najita 和 Harootunian, 1988)

同样在 1942 年,《中央公論》(Chuo Koron)公开了西田的学生围绕“世界历史的立场和日本”这一主题而进行的圆桌会议讨论内容。⁴² 这些讨论反映出西田在维护传统日本文化的同时,也肯定现代的科技文明。这是一种常见的来自德国的反现代主义模式,正如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所解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模式把科学和技术重新界定为带有德国文化传统特点的东西,这样就把它们从传统的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带有浪漫色彩的批评中解救了出来(Herf, 1984)。然而,在西田自己的著述中,这种模式依然是抽象的,与他同时代德国人的尼采主义的和虚无主义的主题无关,而与种种事实上由他的学生们加以探讨的不同的政治观点相一致。

他的学生发表在《中央公論》上的那些评论,根据恩斯特·容格(Ernst Jünger)和其他德国反动分子的观点把这种模式具体化了。他们赞美“道德力量”(moralische energie)与体现了战时日本特征的现代技术的融合。他们把在中国的斗争视为一场文化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日本将强有力地使亚洲从西方的手中解放出来。尽管他们有自己的拥护者,但是多数读者发现,他们极少关注战争的正当性,而对于全面动员的道德和美学维度却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可以这样讲,在他们的辩护中,参与者正在赞同一场假想的战争,但是,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这却是参与实际战争的一般方式。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些讨论中,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从西田的文化哲学中获得了一层荒谬的反帝国主义的伪装。

“超越现代性”的思想奇怪地预示了后来其他非欧洲的知识分子在反殖民主义运动中要求脱离他们现代性的欧洲根源以取得自身精神独立的种种尝试。今天,这些讨论越来越频繁地被引用,以此作为 20 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中特别盛行的各种日本例外论(Japanese exceptionism, nihonjinron)的先例。日本例外论欠这些前辈一笔秘密的债,但是,更早论述中的许多重要的内容已经和更加令人难为的民族主义痕迹一起而消失殆尽。

关键是要把西田相当复杂的辩证的普适论(universalism)与文化民族主义的这些不同表现形式的特殊论(particularism)区别开来。在二战前的著作中,西田与许多思想家一样,试图积极地阐述日本哲学而对他认为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化作出贡献。他乐观地相信:“在日本能找到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结合点”(1958a: 365)接着他论述道,与一切形式的孤立主义相反,“建立全球化的东方文化不必停留在自己的特殊性上,而是必须重新解释西方文化,而且,一种新的世界文化必须被创造出来。”(1965e: 407)

在这种背景中,西方文化自然是指与现代科学技术相关联的合理性的特殊形式;西田所致力文化综合包括赋予这些形式各种源于东方传统的新涵义。但是对于战后出现的例外论来说,各种历史的可能性已经被预先排除了。日本文化的最高表现现在是差别的产物,特别是在那些至今仍然没有被科学技术的合理性触及的生命领域里。因此,当时首先要提出的是关于现代世界文化构成的假设,在这种文化中,日本文化与欧洲文化是平等的,并且吸收了它的科学

⁴¹ “超越现代性”的研讨会论文于 1942 年 7 月在《中央公論》(Chuo Koron)上发表。其他参与者中还包括:几位作家、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小林(Kobayashi)和西田的三个学生下村(Shimomura)、铃木(Suzuki)和西谷(Nishitani)。至于当代日本的评价,参见广松(Hiromatsu 等, 1989)和广松(Hiromatsu, 1990)。

⁴² 参与者包括:小坂(Kosaka)、河山(Koyama)、铃木(Suzuki)和西谷(Nishitani)等人。关于这些会议,参见坂井直树(Naoki Sakai, 1989: 105ff)。

和技术。今天，这个假设是根据日本与普遍的欧洲模式种族上的独特差异而表述出来的。这项没有更大抱负的方案因此也就没有更彻底的含义。⁴³

本书的下一章中将对这些不同的关于合理性和文化的研究方法进行详细对照。其中我会分析伟大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Yasunari Kawabata）的一部作品中对现代化的描述。他的小说《围棋大师》（*The Master of Go*）描述了一场著名的围棋比赛，对他来说，这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象征。这场比赛通过使日本传统的下棋风格与一种新引入的西方下棋风格相对照，对现代“合理性”的普遍性进行了检验。

川端康成的小说比日本例外论更有力地指出了任何把合理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的不足。围棋在欧洲人之前早就达到了一种理性系统的程度。它本身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略行动文化，与类似的西方观念有微妙的不同。人们在川端康成小说的传统部分中也许可以看到这种文化的踪迹及其特殊的合理性形式。我们同样也会在西田的行动理论的中心内容中发现它们。尽管川端康成没有从他的小说中得出结论，但西田却明确指出，不同的文化可以产生出不同类型的合理的社会秩序。他的哲学中的这一点是非常具有当代意义的，就某些在其思想中已经发现了日本的“后-现代性”预言的日本知识分子而言，已经形成了向西田的“复归”，尽管其他人担心这种复归似乎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复兴。⁴⁴

经验和科学

象其他非西方的文化人一样，日本人很容易就能理解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以及它赋予西方的物质优势。合理性的这种形式和他们自己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使日本人极为烦恼。难道他们既要完全抵制现代性又要保持对过去的忠诚？或者与此相反，难道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才能获得抵制西方的技术手段？或者，他们为了防卫之类的实际目的而采用科学和技术时，同时又能保留他们传统的精神价值？⁴⁵

每一个这样的问题都意味着一种天真的外在性，首先，就一个民族而言，它的历史和经历不可逆转地注定了其命运；其次，就一个人而言，不能像脱掉一只旧手套那样摆脱他的文化；第三，就一种精神传统而言，它同样受制于社会的物质生活。西田拒绝了所有这些虚幻的解决办法，而是认为，日本能够通过对东方和西方要素进行综合而形成一种特定的日本现代性。他希望通过拒绝西方科学，而是通过用一种从其文化中自然产生的经验概念来包容它的方法使现代性适应日本传统。

西田用相当标准的现代术语，把现代性理解为出现了与受教条约束的传统和偏见相对立的理性探索。既然西方思想通过严密地考察事实而取得了进步，任何类似的日本特征将同样形成一种本土化的现代化潜能。因此，西田相信，甚至在遭遇西方之前，日本人对“确定事实”的倾向——对其纯粹状态的经验——就是类现代的（protomodern）（1958a: 352）。

但是，西田对经验的理解与流行的西方观点完全不同。正如有坂阳子（Yoko Arisaka）所指出的，日本人的经验观念既不是经验论的，也不是浪漫主义的（Arisaka, 1993）。经验主义排除了客体的“第二特征”，并且从经验的知觉内容中抽象出诸如“感觉资料”或“非理性的

⁴³ 正如坂井直树写道，“与双方宣传的相反，普适论和特殊论相互加强和补充；它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冲突；它们相互依存，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试图形成一种对称的、相互支持的关系以避免正面交锋，那样必然会危害它们所谓的安全和协调的单一世界。”（Sakai, 1989: 105）

⁴⁴ 关于这些新的研究的一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参见《批评》（Critique, 1983 年）中中村雄次郎（Yujiro Nakamura）的一篇有趣的文章。至于主要用西方语言对西田及其学派的考察，参见大桥良介（Ohashi, 1990 年）。

⁴⁵ 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使得后来的立场具有向前看思维的特征；但是，这些改革论者想要达到的平衡从来就没有实现。关于这种早期的经验，参见 Ssu-yu Teng 和 John K. Fairbanks, 1954 年，第三部分。

事实”那样纯粹概念上的实体。而浪漫主义则要求从概念活动回到纯粹的直接性。但是对日本人而言，经验是一种悖论式的文化知觉。它涉及到把联系的网络纯化成为一种普遍拥有的剩余物。据说俳句（Haiku）就经常关注于对自然的经验。但是事实上，他们所谈到的诗一般的自然界处于丰富的情感和历史联系之中，并没有把纯粹的物质内容与文化和主体的作用区别开来。

这种经验概念与西方的自然主义是矛盾的。自然主义认为，客体唯有在与主体的任何联系之外才能够被表达，作为经验基础的自然，也只有从文化和历史中抽象出来加以思考才有意义。与此相反，西田认为，不是自然而经验才是现实的本体基础。在他看来，最初的“纯粹”经验“至今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其中“知识和它的对象是同一的。”（1965a: 1）与主体和客体一样，经验既不存在于物质的事物之中，它也不是个体的和心理的。从这种意义上讲，经验构成了一个主体间共享的意义领域。它是外在的并且是具有文化特性的“一种公共领域”，而不是像西方的经验观念那样是内在和普遍的（1970: 186）。然而，像后者一样，它对西田最终加以详尽阐释的绝对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之类的内容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伤（1965e: 410）。

西田的声望开始于 1911 年他的第一本书《对善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the Good）的出版。⁴⁶正是在这本杰作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涵盖所有领域的经验概念。西田后来的著作建议，这个概念以及他思想中的各种后续概念表达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方法，并没有任何排外的意义，完全是日本文化发展的顺其自然的产物。他相信，尽管自然科学曾经使西方文化得以普遍化，但日本哲学注定要把日本文化的这种特性提升到普遍性的高度。

这种普遍化存在于什么地方？事实上，就在于在西方服装中表达了日本观念。这从西田的《少女的成就》（Maiden Effort）第一页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一开始他就运用威廉·詹姆士的“纯粹经验”概念来解释他自己的思想。但是，尽管有这种相似的出发点，但西田和詹姆士之间仍有真正的区别。例如，对詹姆士来说，纯粹经验只是一种解释性的范畴，而在西田那里，它有时似乎还表达了佛教“无心”（no-mind）的思想，这是一种特殊的联结经验的方法。在这里，纯粹经验甘愿倒退为一种特定的心理态度，一种世俗的启蒙。（Feenberg and Arisaka, 1990: 183-185）

尽管西田从詹姆士那里借来的概念使他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经验概念的真实性令人怀疑，但是，他的做法却并不是不合理的。在西田看来，詹姆士提出了一种准-全称的（quasi-universal）现代性逻辑，按照这种逻辑，日本哲学将不得不忍痛打破其传统的东方话语模式。然而，目标并不是不加选择的西方化。正是詹姆士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评使他的思想成为日本哲学现代化的一种合适的中介。正如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评论的那样，与其说詹姆士延续了西方哲学传统，不如说他使得这种传统突然中断，从范围和意义上讲，这可以与笛卡尔式的革命相提并论：他“扫清了舞台上的旧道具”以便与发生在整个欧洲文化中的深刻变革相协调。（Whitehead, 1925: 205）西田相信，这些创新为更广泛的对现代性的国际性参与开辟了道路。在 20 世纪初期，詹姆士有权期待着进入这种正在出现的世界文化。

在描述西田对当代西方哲学的评价中，“准-全称的”（quasi-universal）这个矛盾修饰语因而是恰当的。尽管他承认其文化上的局限性，从建构一种假定的东方替代事物的立场出发，他仍然拒绝对现代性作外在的批判的思想。相反，他宁愿投入到西方哲学中去，因为他相信，他的具有日本特色的思想的创造力将洞穿一切。正如下村（Torataro Shimomura）解释道，他把“西方哲学当作一种用来挑战西方哲学自身的中介。”（Shimomura, 1966: 16）西田的信心没有放错地方，但是在 1911 年，他所从事的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三十多

⁴⁶ 参见《禅的研究》（Zen no Kenkyu）（Nishida, 1965a），Masao Abe 和 Christopher Ives 翻译为《对善的探究》（1990）。

年间，他忙于构建自己的一个又一个样式的体系，却没有一个令他满意。但不管怎么说，他的选择使他能够在模仿西方化和东方情调之间开辟了一条新的进程。⁴⁷

在西田后来的著作中，他的已经具有文化意义的经验概念成了历史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他认为，就认识的主体是一个人类个体而言，他就不仅是一个认识者，而且也是一个参与者，他不仅与事物相关，而且也与历史有关。如果有人不把认识看成是我思（*cogitos*）与事实之间的一种理智遭遇，而是看成一种实际的社会活动，那么，我们就可能要问，除了纯粹的知识之外，这种活动还需要其他什么东西？这里要问的不仅仅是理论的有效性或它所确定的活动目标，更重要的是它在生活方式中的地位。西田把它称为“基本观念”（*fundamental idea*）：“通常，我们把物质世界、生物世界和历史世界看作是独立的。但是在我看来，历史世界是最具体的，而物质世界和生物世界是各种抽象。因此，如果我们抓住了历史世界，我们就抓住了现实本身。”（1965e: 408）

今天，这些表述与那种认为理性的普遍性是一种幻想这种观念产生了共鸣。在福柯、女权主义理论和构成主义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之后，所能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科学的确是其他科学中惟一的一种“人种科学”（*ethnoscience*）。（Harding, 1994）然而，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西田并不能在不向反动的愚民政策屈服的情况下而简单地要求全面地回归到人种科学的传统。⁴⁸ 本土主义的“日本科学”观念在他看来是一种借口，用以抵抗与西方文化成就的真诚接触，而这种接触正是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所要求的。西田并不打算退回到具有民族根源的“本土知识”，而是试图在反映了其文化价值的历史框架中限定科学自身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涵义，科学并不仅仅被用作获得物质财富和民族独立。日本作家和知识分子普遍地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并在他们同时经历的现代化运动中，这种思想被理解为既是对普遍的-科学真理，也是对特殊的-西方势力和一种回应。

西田在东方文化的各种基本假设中寻找绝对的历史主义的原则。然而，在转向这些东方根源的过程中，他相信自己是顺应现代科学的趋势向前，而不是倒退。如果我们沿着西田早期已经不自觉地采用的詹姆士的路线，和他在现代科学的革命性特征上有相同的看法，那么，这种明显的悖论才有意义。他相信，近代的物理学和数学已经打破了西方自己大多数的狭隘限制，例如，继承于希腊人的基督教的先验论和实体论等。但是，这些传统的观点在历史科学中继续存在着，只有当其他文化具有现代性时，它们将会不可避免地克服。

东方思想对历史知识中的这场革命能够做出独特的贡献。就像希腊思想一样，它用现世的（*this-worldly*）词语来界定现实，而没有希腊人实体论的偏见。通过它的介入，历史世界就被自然界一样的旋风清扫了一遍；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事物”或者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牛顿的“规律”，而是热烈的冲突形成过程超越虚无的深渊而发挥作用。对于西田来说，日本的现代性展现的恰恰就是这种最新的景象。

⁴⁷ 然而，在当今许多的学术中，他的成就的这一方面却被遗忘了。因为西田试图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重新阐述一种被称为日本世界观的东西，他的思想的研究者常常把它当作一种精心编排的传统的大乘佛教（*Mahayana*）形而上学的版本来理解。（Carter, 1989）尽管能够用东方的术语来译解西田的作品，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方法仍然造成一种普遍的印象，认为西田是一位反现代的、因循守旧的思想家；但事实上，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他对现代科学和文明的评价总体上是积极的（有一点必须指出，这与对佛教的同情并不矛盾）。

⁴⁸ 一位西方读者想要了解现代科学在日本产生的解放性影响（这和对日本军事技术的恐惧不同），应该看看杉田玄白（*Genpaku Sugita*）的著名的著作《西方科学在日本的破晓》（*Dawn of Western Science in Japan*, 1969）。杉田叙述了他 1771 年的一次经历：在对中国和荷兰的解剖学著作进行比较时，检查死刑犯被剖开的尸体。他以前作为一名医生所学到的一切被突然推翻了，于是，他倾其余生去翻译荷兰的著作，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他的眼睛曾经证实了的真理。当然，这并不排除后来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恢复中国解剖学的意义，只要它不再照字面意义上被看作是身体器官的一种图像。

地位 (Place) 的辩证法

在黑格尔的影响下，西田对这种方法的论证采取了一种辩证体系的形式。作为一名优秀的黑格尔主义者，他相信“真理就是整体”。孤立的部分是“具体整体”——即它们从属于的总体性——的“抽象要素”。他的体系从抽象的部分开始，通过连续转换观点而扩大解释的范围以便重新构整体，从抽象转变为赋予它们以活力的生活方式。这种方法产生了一种辩证的知识层次序列：反映、行动和经验，其中每一个都或多或少地代表了具体总体性的一个抽象的方面；然而，总体性自身却不是以黑格尔的风格，而是以海德格尔的风格被概念化为绝对的在场活动。⁴⁹ 西田将那些他称之为“绝对虚无的地位” (place of absolute nothingness) 的事物定位于这个最高的层次上，这个哲学概念来源于他早期的纯粹经验概念并且保留着其佛教的含义。

这里，我大致构划出西田辩证法的四种基本层次：⁵⁰

1. 判断，或自然知识：从认知者中抽象出来的知识。
2. 自我意识，或知识和行为的心理自我：从文化中抽象出来的认知者/行为者。
3. 作为行为基础的意义或价值的世界：从其文化意义方面加以考虑的自我。
4. “绝对虚无”：经验，作为一种直接的主-客体统一体的领域，这种统一体构成了文化、行为和知识的基础，并使它们有可能成为这种更重要的统一体的外在对象。

西田把每个层次称为一种“basho”，一种“地位” (place) 或“领域” (field)。在不同的地位中，他都要区分客观的和主观的方面。一个层次中的主观方面在下一个层次中作为客观的方面出现，反之亦然。例如，判断层次的主观方面是“谓词的领域”，用来描述事物的普遍概念。它们所断言的亚里士多德的事物的特殊的客观性与这些谓词相对应。但是，这种事物究竟是什么呢？从只有运用全称命题才有效的判断的立场来看，它的个性是不可思议的。只有个体才能与个体发生联系。对已知事物的充分探讨要求我们超越逻辑论断的范围，识别出什么是正在认识的事物，什么是认识的主体。这种转变标志着通向自我意识，即辩证法的下一个层次。谓词——事物——辩证法的客观方面现在成了占主导地位的认知主体，它通过把谓词包括在知识领域中而超越了它的谓词。最初存在于事物中的谓词现在存在于认识它们的意识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从亚里士多德转移到了康德。

但是，辩证的序列在延伸。正如我们在最后一节所看到的，认知主体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者，他是一个必定处于一种文化世界中的人。“认识自身”，西田写道，“已经是一个社会历史活动” (1970:96)。令人为难的是，尽管认识是一定文化环境中的活动，但文化对它来说却似乎是随意的。纯粹的事实并不能决定使人行动的价值，也不能区别善恶美丑。这是文化的功能，只能用与意义相关的意志理论才能得以解释。在那样的层次中，意识看来是由各种包含了它并为它的行动提供了更广泛的环境的道德和美学价值决定的。主体——意识——变成了文化体系框架中的客体，它是这种框架的一种展示或“自我决定”。这一观念不是给我们提出一种科学的文化理论，而是一种文化的行为理论。

在每一个层次，我们对西田的朝向更崇高的具体性、脱离抽象知识朝向“存在”、朝向经验的辩证运动是如此熟悉，使得我们在试图分类和解释的过程中经常忽视了它。那种经验是行为中主客体的直接统一体。在多数西方思想中，这种统一体被看作是在纯粹的反映中对意识的抹杀。哲学，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很自然地把知识的对象看作是首要的现实。但对西田而言，事实恰好相反：行为者与环境的联结要比认识更重要。知识必须摆脱自身，学会识破行为的动机。

这种设想并不是欠考虑的，但是，自我意识的概念并不足以来描述它。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西田的文化理论超越自我意识阶段而向一种正在统一的直觉移动，这种直觉既不

⁴⁹ 帕克斯认为这种相似性不是偶然的，Parkes, 1992。

⁵⁰ 对西田作这种系统解释的发明人是河山 (Koyama, 1935)。另外参见 Abe (1988)。

是我们通常设想的认识也不是行动，而是隐含在行为自身当中的知识。在这个层次，我们发现自己再次处于纯粹经验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在事实和价值、境遇和意志之间的抽象区分之前，意义和存在就以文化方式直接结合起来。

这种“行为-直觉”与海德格尔的“寻视”（*umsicht*）概念相似，因为它也致力于使主-客体之间的联系从理性主义模式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这就意味着，除了别的事情之外，在追求主观目的的过程中，还要克服把行为当作仅仅是执行预期计划的这种自愿主义论观点。像海德格尔一样，西田拒绝知识对于从文化上加以界定的行为世界（知识在其中才能找到其根源）的特权，相反，他坚持文化对于知识的相对优先权。

然而，西田相信，海德格尔的方法还不够动态。他声称，“即使海德格尔的存在观点是历史的，但它没有运动或活动。”（1970：40）这里，西田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公平的。海德格尔无疑具有行为的观点，但事实是：他关心只是慎重地理解作为实践对象的事物，而没有把握人类主体与他者（the Other）互动中的自我-构造。与海德格尔不同，西田的哲学集中在行为主体的客观性上，集中在行为主体在“地位”（*basho*）中的基本处境，主体的行动必须由此出发，并且在其中发展和成型。

这个焦点超了解释学而走向辩证法。但是这里，西田太不满意西方的表达方式了。他认为，尽管黑格尔发展了辩证法的所有基本，但仍然顽固地停留在自我意识的层次上。“黑格尔”，他写道，“寻找现实背后的理性，而不是寻找理性背后的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他的辩证方法是主观的，并在努力理解具体现实的过程中陷入纯粹的形式主义……我们不应通过逻辑的公式来理解现实。相反，理性必须被历史地解释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不是按照理性的发展过程来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而是应该像虚无的自我决定一样，把理性理解为对具体生活的一种抽象。”（1965f:80）总之，当把辩证法引入了在狄尔泰和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发现的历史实践的解释学中时，西田就把行为-直觉引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从实践的角度使它重新概念化。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在真正的历史世界——真正客观性的世界——中，接近事物与接近你自己是一回事。”（Nishida, 1970:95, 译文有所改动）

这种与众不同的综合产生了一种预想的系统理论。历史是一个过程，其中“已形成的事物”变成“正在形成的事物”。西田把它解构为自我-生产和自我-转化的不同循环过程。用行动创造历史的主体是自身历史的产物。价值立刻变成了客观的历史假设和动态的行为原则。这样来理解的话，历史就不会降低为像稳定的自然物那种层次的事物，因为它根本上是由行为组成的。自然科学种类的知识不能理解这种历史世界，相反，它必须通过辩证法才能领会。（1970:216ff）⁵¹

就这样来介绍他的体系而言，我已经强调西田和影响他的西方思想家之间的关系，正是通过他们而使他的观点能够被理解。然而，在这里，西田的思想不能和詹姆士一样简化为它的西方根源，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东方传统决定了他对西方资源的使用。这一点在西田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尤其明显。这个阶段，“绝对虚无的地位”不是某种神秘的直觉，但是，不求助于佛教，它的确难以理解。⁵²正是在这里，西田无疑是想证实他的概念是东方对现代文化的独特贡献。我只能草拟一种研究这个困难概念的方法，从我首先要考虑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入手。

在西田的历史观中，有一方面超越了纯粹的实践理论而朝向生存的实现。在西田看来，行为者必定设置了一种环境，他们必然以这种环境为背景来要求自己的生活权利，然而，当他们展现他们的生命时，他们却使自己在斗争中客观化了，变成了彼此的环境。这就是“对立面的同一”：“行动意味着对他者的否定，意味着使他者成为自己（一种表达方式）的意志。这就是说，自我想成为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否定自我并且成为世界的一部分”（Nishida, 1958b: 171）。“行动”，总而言之，“本质上就是‘被动的’”（Nishida, 1958b: 186）。

⁵¹ 关于西田的历史概念的不同解释（我在英文中只发现了另外一种），参见 Huh（1990）。

⁵² 尽管西谷（Nishitani）在这一点上没有引用西田，但他对“空”（*Sunyata*）解释几乎就是在佛教基础上对西田绝对虚无概念的一种注释（西谷，Nishitani, 1982）。关于进一步的解释，也参见西谷（1991）。

莱布尼茨式的单子每一个都反映了世界本身，这样一种单子共同体的景象预示了一种自我和他者的辩证模式。根据西田，“每个存在的单子都通过表达自己而创造自身；而且，它也通过否定自己和表达世界而表达自身。单子因此是共生的，通过相互否定而形成了世界。单子就是世界自身的景象；通过相互否定和肯定，它们组成了互相表达的世界。相反地，历史的现实是依靠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这种历史现实的具体基质在其自身之内含有这些单子的景象”（1987：58）。因此，历史的客观性起源于参与历史的个体间的相互知觉。换句话说，它的客观性只不过是这些行为间必然的交互关系，因为行为者和客体已经成为彼此的景象，而不是截然不同的种类。

这种真理的内在实现就是对“地位”（field, basho）存在意义上的发现，自我和他者正是在此基础上展现他们的统一性和差别。当自我具体地融入那种领域时，他“发现了在其自身无限的深奥中，历史的自我转变的根基”（Nishida, 1987：84）。那种领域是一个不是用西方个人主义方法，而是用传统的佛教方法来理解的斗争场面：一个人毫无保留地发挥作用，而且还具有一种直接系统感，这种系统是通过一个人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形成的。一个人越是与作为整体的系统融为一体，就越能在其中正确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反之亦然。行为的这种特殊的双重结构，是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假设起作用的，作为“虚无的地位”，则提供了一种具体总体性的原始形象。

西田的结论非常具有悖论色彩。他在阐述源于东方传统的经验时，创立了一种包含现代科学的绝对历史主义。就响应彻底的认识论的上无神论而言，那种阐述本身就是现代的，正是这种无神论形成了二十世纪科学和哲学的基础。然而，在论证历史是最终的现实时，西田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恢复了对科学的考察。正如我在下一节中将要提出的那样，他自己的东方逻辑制止了一场本土主义的倒退。科学知识，作为西方的文化和行为，不能被抛弃，但在现代化的奋斗中必须真正地加以正视。辩证的体系有意使日本参与到这场奋斗中去。

总之，西田把握了各种威胁着科学的自我-确定性的文化联系和消弱了主观自主性的社会互惠，而且仍然肯定了科学和主观性。他并没有采用一种温和的相对主义的方法来拒绝文化在知识中的超然存在，这种相对主义至少能够摆脱西方科学的霸权。西田似乎决意让自己不得安宁。这种二难境地与日本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艰难处境有关。

文化的自我确定

西田的文化哲学试图为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的自身权利作辩护，以对抗欧洲的世界霸权。从二战中形成的新秩序将恢复日本历史性的“世界使命”，只要“亚洲国家受欧洲帝国主义的压迫并且按照殖民的角度来加以考察，这种新秩序就将失去”（Nishida, 1965d：429）。

按照西田的观点，所有的现代文化，包括日本文化，都是平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每种文化都对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化做出了一份贡献（1965b：267-268）。对民族文化来说，不能够有统一的全面替代，因为“当它们失去其特殊性，它们就不再是文化”；但是，每一种文化的独特性也不能保证“在个别的方向上取得纯粹抽象的进展”（1970：254）。“只有当不同文化保留各自的特点，同时又能够通过世界交流来发展自己的时候，一种真正的世界文化才会形成”（1970：254）。一切现代文化都必须参与到有效的融合和相互的影响当中。可以与现有的各种文化相媲美的世界文化存在于一种对话和冲突的环境中，而不是存在于一种特殊的独立存在的生活方式之中。每个民族都建立在其自身的历史基础之上并有其自身的世界使命，这就是每个民族怎样拥有一种历史生活的问题。当我说每个民族在超越自己和创造一种世界文化时都必须认识自己，我的意思是指，每个民族都必须通过自己独特的文化来认识自己。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各种独特的文化才能从历史基础中产生并形成一种世界文化。在这样的一个世界

中，每个民族的文化都表现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生活，同时，通过它们的世界历史使命，它们共同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世界（1965c：428）。这种世界文化的辩证法与西田的行为概念是一致的。东方与西方的结合在表面冲突的情况下，包含着更深刻的协作；这是具有全球意义的现代性的一次富有成果的转变。

因为各种现代文化都包括科学，它们现在都普遍地依赖于“真理”，而不再被简单地描述为错误或偏离。但是，怎么才能解释它们的多样性呢？西田的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在民族特性和合理的普遍性之间架起了一座“多元文化”的桥梁。他的辩证法不同阶段的范畴每一个都能用来描述一种文化类型独特的重要方面。文化存在于思想、行为、范式或“原型”的范围之内，其中一种或另一种范畴从单方面讲是独立化的（1958a：353-354）。民族斗争表明，在全体民族及其生活方式的层次上，社会本体论的不同范畴框架间存在着冲突。总之，本体论的范畴和文化的范围相互间是可以转化的。通过交流和讨论的过程，各种文化彼此间是能够交往和完善的，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本体论的形式得以详尽阐释。

尽管西田拒绝了传统上认为是黑格尔所致力最后的综合，但这种观点在某些方面确实应归功于黑格尔的现象学。在这点上，西田实际上更接近当代黑格尔派的学术观点，它认为，最终的“概念”（Begriff）不会形而上学地解决独立存在的总体性中的各种矛盾，但在维持它们之间的对立时能够从方法论上把握它们。对黑格尔的这种反形而上学的解释回应了当代思想中的怀疑论和新康德主义趋势（Pippin, 1991：66-79）。

西田拒绝综合的理由是完全不同的：他对行动的强调排除了对矛盾的纯粹概念上的消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的著作没有提出第三个术语，而是不断地在历史和文化矛盾的不连续的领域中转换重点，并且在世界体系中确立它们相应的行动。

伴随着这种对多样性的肯定，西田为明显相反的观念作辩护，这种观念认为，日本文化具有全球性的特征。既然现代文化具有科学的特征，日本的全球使命不能像有时所假定的那样不过是宗教的或审美的，而必然包含一种独特的理智内容，一种“逻辑”，它具有某种属于其他现代思想成就的普遍价值（Nishida, 1958a：363）。这种逻辑就是在前一节按照“矛盾的统性”所描述的现代性中所具有的日本文化特点。

这与构成日本适应和同化外来影响的漫长历史的逻辑是相同的。在古代，日本吸收了中国文化，并且今天它同样将吸收西方文化，以此作为一个全球的接合点（Nishida, 1965e：417）。按照西田的观点，日本文化的“无形”（formlessness）或“空”（emptiness）使它自身能够包容各种未解决的矛盾。这种无形在历史-文化的水平上反映了各种纯粹经验和绝对虚无的哲学观念。在这里，这些十分深奥的哲学范畴最终意味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特性或作用。

难以确定的是，西田所考虑的在现代生活中哲学的功能是什么，它似乎是一种文化的交叉点，一个以加强了人们之间的互动为特征的时代中转化和交流的基本点。西田把他的思想看作是文化新时代中文化对抗的产物。它没有提供一种最终的综合，而是一种语言，借助这种语言，哲学家能够适应多种多样的思想方式。西田的抱负不是要解决这些矛盾，而是要在思想与他者（Other）的关系中为思想的每个阶段设计出一种方法。在这方面，他的哲学反映了空，这就打开了日本通向普遍经验的大门（1965e，407）。

但是不幸的是，西田关于文化的自我确定的观念看来已经超出了追求富有成效的对话的范围，并且把军事斗争理解为一种积极的阶段。最后，我必须讨论他思想中这一令人困惑的方面。然而，这种讨论受到了围绕西田在战争中的角色问题而产生的混乱状态的限制。他似乎并没有任何官方或者甚至是半官方的职务，但那个时期的各种文本是如此的抽象，以至于它们可以适应于各种相当不同的政治立场。因此，有些人把西田当作一名最主要的知识分子，坚持认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负有一定的责任，而另一些人则把他看作是一名温和主义者，认为他超越了最恶劣的意识形态时代，这两种人之间论战没有取得最后的结果（Hiromatsu, 1990：207-208；Lavelle, 1994；Yusa, 1991）。然而，我将指出，他最后的文本至少表明了各种临时性的结论，我下面将提出这些结论，希望引起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希腊人或犹太人？

黑格尔认为，对现代民族来说，战争是精神自我确定的一种手段。今天，这种观点已经变得令人厌恶，但是，对几代人来说，黑格尔的学说仅仅明确表达了关于欧洲和北美民族的常识。例如，使人想起我们自己的“命定说”（Manifest Destiny）⁵³ 观念中的庸俗黑格尔主义。在以后的时期，保守的日本哲学家正是站在这种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上为战争辩护，而并没有理解，在今天发动殖民事业和冲破旧模式的影响范围实在是太迟了。

西田似乎同意这种观点。几位未来的国家领导人，近卫（Konoe）和木户（Kido）等听过他的课，而且，1941 年他甚至被邀请向天皇作演说（Nishida:1965b）⁵⁴。那么，政府向他请教就不足为奇。他反对与美国作战，他极其强调全世界文化互动的重要性，但除此之外，他对世界政治的零星评论似乎跟随着当时传统的观点（Nishida: 1965c）。他支持日本在亚洲的霸权，尽管他从未解释如何取得这种霸权，而且他还是一个君主制的热心的鼓吹者。的确，对西田来说，皇室位于政治和文化体系的中心。他就此把它称为“矛盾的同一性”，并神秘地把它放在他自己的作为相互作用系统的行动概念的范围之外（1965d: 336）。⁵⁵ 这看来会使国家绝对化为天皇意志的一种表达，由于表明了国家将成为没有特殊内容的一种虚无的地位（basho），政治和文化在西田思想中持续的模糊性反而使它与那时不成熟的中央集权经济统治论者的民族主义保持了一定距离。

下面是他对天皇的演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话，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他的立场的风格和今天我们难以对它进行评价的原因。

今天，由于全球交通的扩展，世界变成了一体。必须从这个角度来定义今天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是要各个民族转而依赖自己，而是各个民族要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说，每个民族必须具有全球意识。当不同的人们进入这样一种世界历史性（sekaishiteki）的联系中，正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其中也许存在着冲突，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于是，最具世界历史性的民族必然成为平息这种骚乱时期的一个中心。我所说的一个民族具有全球特征的含义是什么？意思是指，这个民族信奉整体论，同时并不否定个体；实际上，是把个体的创造作为它的媒介。今天，我们常常以为个人主义和整体论是互相排斥的，但分开来说，个人主义是过时的，而任何否认个体的整体论也是过去的事情（1965b: 270-271）。

在战时状态中，这些评论能够，但并没有必要被看作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委婉的辩护，但是同时，西田似乎也以个体和文化的创造力为名反驳极权主义。

阅读西田战争期间的著作，就会立即想起与海德格尔作比较。但是这种比较会令人误解。西田的确与纳粹时期的海德格尔类似，听说他曾反复宣扬帝国主义口号。但是，海德格尔一度是以政府官员的身份用纳粹国家的官方语言来表达他“个人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和他不同，民间的思想家西田总是从他自己的文化立场来限制民族主义攻击性的表达。例如，这里有一段话，其中，西田实际上对那种为太平洋战争的正当性作辩护的皇道意识形态没有丝毫疑问，并试图从文化上对它重新加以系统阐述：“日本的构成原则必须同时成为世界的构成原则……但是，最危险的是让日本屈服，那样只能使皇道（the Imperial Way, kodo）军事化，并使它帝国主义化（teikokushugika）……在比较中，通过在我们历史发展的深度上发现我们自己的自我-构成原则，我们必然会对世界有所贡献，这个原则就是矛盾的统一性。这就是真正的……皇道。这就是‘八紘一字’⁵⁶ 的真正含义”（Nishida, 1965d:341）。⁵⁷

⁵³ 一种认为某一民族扩张其领土系天命所定的反动史观。——译注

⁵⁴ 这是一种崇高的荣誉，但并不是象一个斯特劳斯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哲学家与政治家的联合。其他卓越的知识分子也被给予了同样的在非常正式的场合教育天皇的机会。

⁵⁵ 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它忽视了本体论的差异，并把存在本身等同于一种特殊的存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海德格尔自己并没有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⁵⁶ 有坂阳子在给中译者的电子邮件中指出，“八紘一字”（hakko ichiu）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统一亚洲，实际上是统一世界的口号，它是“新世界秩序的原则”。——译注

在他们历史地位方面，西田与海德格尔之间甚至有着更深刻的区别。尽管海德格尔主张面向未来，但他不能够为其与众不同的真正现代性观念注入任何积极的内容，最终他成了自欺欺人的希望的牺牲品，那种希望认为，德国能够成为其所确立的人类反对技术和大众社会的反动计划中的主力。这是他的纳粹活动的基础，对此他从来没有相反地提出另外一种易于理解的，因而也就更不可信的替代解释（Herf, 1984:109ff）。海德格尔后来关于存在的思想提出了一种玄妙的、公然努力让世界再次沉醉的话语，但是，它严重缺乏一种具体的可替代物。⁵⁷

通过对比，作为新的发达国家中的一个非西方人，西田似乎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感到特别的忧虑。他没有受韦伯、容格和斯宾格勒等人具有的忧郁情绪的影响，而是充满希望地看待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的出现，这种现代性是用他自己的各种丰富生动的日本文化术语来界定的。因此，他没有必要用“存在的政治学”来结束不屑一顾的现在。

有人或许还会想起马尔库塞的立场，它提供了第三种参照物。他的早期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海德格尔思想左翼黑格尔派式的回应；与之对照的是，西田对民族文化的回应则是右翼黑格尔派式的。象他的老师一样，马尔库塞试图按照实践本体论重新构造“技术问题”。在方法论上，他也赞同有必要在日常经验的世界中按现象学的方法寻找原因。但是，马尔库塞也受黑格尔所提出那种历史化的世界观的影响，并因此建议有必要提出一种远比海德格尔思想中任何事物都更具体的基础。

由于科技在西方的霸权，寻找这样一个历史基础变得复杂起来。人们不再把传统文化当作解决办法，只有政治上的蠢人，海德格尔当然算一个，才会设想拙劣的民族主义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本体论配方。人们也不能简单地求助于当前的文化，它早已被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殖民化了，以至于它也别无选择。因此，马尔库塞只能依靠没有特殊地域特征的文化来组成框架，西田同样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西方人，他的视线不得不转向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看来适合于他的目标：通过扩展科学-技术合理性的历史联系，使之在一个安定的社会中完成其潜在的变革。但是，假设这种步骤成立，马尔库塞可以说是天真到竟然没有注意苏联已经沿着西方的路线加入到现代化过程中来了，实际上，他使他的乌托邦与苏联的实验保持着距离。对西田来说，要抵抗观念和实际的历史主义的统一要更困难。他曾经把绝对虚无的原则等同于他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民族文化尽管已经发展了两代，仍然保持着重要的自主性。

1943年，战时内阁需要一份关于新世界秩序的官方文件，在他的答复中，正是这一充满希望的概念与日本的帝国主义纠缠在了一起。在那里，我们能够发现他叙述了旧黑格尔派关于民族统一性的内容。根据这一文本，太平洋战争将导致东方文化对现代性的掌握，而迄今为止东方文化只是作为西方征服的对象参与到现代世界中去的。在这里，战争被看作是一种获取承认的斗争，一种新的全球共同体形式将要在这种斗争中产生。

西田没有解释为什么日本必须要模仿西方殖民主义以达到这令人称赞的目标，而且，他对各种事件的理解似乎是奇怪的时代错误。他天真地把战争比作希腊与波斯的斗争，把它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功的文化自我确定的军事前提：“就像很久以前希腊在波斯战争中的胜利为欧洲文化开辟了一条沿用至今的道路一样。同样，当代的东亚战争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历史的新纪元确定了一条发展的道路”（1965c: 429）。从这种立场看，日本的失败似乎象征着文化世界的毁灭，甚至是现代世界中多元文化可能性的毁灭。

明治时期的人们多少也处于这种境况。在明治时期，日本的军国主义包含有比后来更清楚的反帝国主义的内容。1905年，当时日本仍然蒙受西方列强的民族羞辱，因此西田对日本战胜俄国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就容易得到同情。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明确地支持20世纪30-40年代与中国的战争，因为那时日本已是一个强国。

⁵⁷ Lavelle (1994) 没有考虑这明显具有反战性质的陈述，而是以反帝国主义的论调甚至在当时的军界也很普通为由，把西田的观点等同于近卫（Konoe）派的温和的极端民族主义。我相信，在消除西田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模糊性方面已经矫枉过正，不必特意插入他的公开声明。

⁵⁸ 难以置信的是，海德格尔在最后的访谈中表达了他的信念：“唯有上帝能够把我们”从现代技术中“拯救出来”。对海德格尔技术观的深入研究，参见 Zimmerman, 1990。

西田有所保留的态度也许反映出他已意识到这种差别。或许他希望通过加强日本在亚洲文化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领导权将有助于尽早结束战争。但是，他仍然按势力集团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直到很久以后，他的著作才反映出一种清楚的认识：日本的殖民政策并不仅仅是一种参与世界政治的常规模式，而且也恰恰是他自己的文化计划的终结。⁵⁹ 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由、平等和贸易都具有文化上的含义，而不是对弱邻的军事征服。

今天，在战后的非殖民化经历的条件之下，我们难以忽略这一点。假如日本赢得了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它就会乘欧洲放弃殖民主义之时建立一个庞大的亚洲帝国。和光荣的欧洲人一样，日本人来到宴会桌太迟了，以致于不能享受其中的乐趣。人们所设想的结果是：日本将让下一代来进行遍布亚洲的游击战；法西斯主义将一直延续到下一代。征服亚洲远远没有完成西田的文化计划，它只能导致一场可怕的文化灾难。

战争临近结束，西田似乎更清楚地理解了他的时代。他和他周围的人考虑到民族文化的生存，就战后的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投降前的几个月中，他写了最后一篇题为“地位的逻辑和宗教世界观”（The Logic of Basho and the Religious Worldview）的文章，其中暗示了一种对日本形势完全不同的理解。这篇非凡的文章敏锐地区分了人类经验的政治维度和宗教维度。按照格尔学派对品德（Sittlichkeit）的理解，民族是道德-政治的统一体，但就此它也属于“堕落的”日常生活世界。因此，“民族不能挽救我们的灵魂”（Nishida, 1987: 122）。然而，按照“矛盾的统一性”的逻辑，内在性就是超验性，而民族的生命力因此也和绝对相联系。“一个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民族的原因在于……它作为历史生活的自我表现的宗教特征中。当人们把世界原则包容在自身之内，并且在历史和社会中塑造自己的时候，一个真正的民族就诞生了”（Nishida, 1987: 116）。宗教的民族性的本质既具有文化上的特殊性也具有世界性，它同样包含着现代国际共存的秘密。

这些观点表明了与当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彻底决裂。西田更早的政治作品曾经按照传统的观点，过高估计了国家的哲学意义，从明治时期开始起的重新改造日本的过程中，在国家处于中心地位的条件下，这是一种非常自然而然的趋势。然而，这种国家民族主义已被证明是一条错误的道路，西田将他自己的文化主义注入其中的努力也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假如他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他无疑会承认这一点。

随着失败的形势越来越明朗，西田创造了一种新的不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话语。在许多细节方面，这种话语仍然是旧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延续，而且，通过战后他的追随者的影响，或许已经为日本这样一个解除了武装的文化国家的稳步重建提供了基础。重要的一点是转变为原则性地肯定种族的同一性，当然不是建立在原始的种族主义基础上，而是根据排除了军国主义的世界文化使命。这种转变显示出关于日本的世界地位的历史隐喻正在变化。

隐含的参照点不再是希腊人，而是古代的犹太人。《圣经》，尤其是《圣经·旧约》的《耶利米书》记录了他们的失败以及被巴比伦人的占领。西田注意到，尽管他们被征服了，但犹太人仍然保持着他们“精神上的自信”，并且超越了他们纯粹的种族界限而创造了一种世界宗教（Nishida, 1987: 116）。⁶⁰ 他认为，“日本精神参与到世界历史中……能够成为新的世界文化的出发点”，但是，只有当日本克服了它的“岛民”和“盲目自信”的意识，情况才会如此（1987: 112）。因此，日本将不再不得不通过暴力与西方竞争来创造其文化贡献，而是要像犹太人一样，能够学会在一个由他人决定和支配的系统内部捍卫和传播它的各种价值。

在《圣经》的文本中，西田找到了一种与即将来临的失败有关的编码方式，他在这个时期的信件中公开预言了这种失败。人们很容易理解 1945 年轰炸攻击中的这些预言的感召力：“因为恶，而不是因为善，我要抵制这个城市，主说：它将落入巴比伦王之手，而且他将把它

⁵⁹ 势力集团的思想当然不限于日本。直到 1949 年，George Kennan 还写到：“现实主义要求我们不要反对日本影响的重新介入和深入韩国和满洲的活动”，以便阻止苏联在亚洲的扩张（选自 Cummings, 1989: 16）。

⁶⁰ 请对比一下 1945 年 5 月西田写给铃木（D. T. Suzuki）的信（1965g: 426）：“最近，阅读犹太宗教的发展史使我浮想联翩。在巴比伦囚禁期间，犹太人为他们的世界宗教的发展方向建立了基础。人的真正的精神就应如此。一旦军事力量毁灭，也就是把自信与军国主义联在一起的民族毁灭之时”。

付之一炬”。令人惊讶的是，在麦克阿瑟的战舰逼近的时候，西田引用了耶利米的警告：尼布甲尼撒也是耶和华的仆人（1987:116）。即使是上帝选民的敌人也要通过惩戒主的子民来满足上帝的愿望。在这奇特的段落中，西田似乎预料到一种意味深长的占领，结果也正是如此。

一切并不为时尚早！日本在现代世界中的角色不可能符合旧的黑格尔模式，而是需要一种其轮廓只在战败前数月中才初见端倪的新模式。通过把文化的自我肯定与政治-军事的自我肯定彻底地分开，犹太人的例子指出了一条出路。西田令人惊奇地参照犹太人这一事情表明，他要日本接受它的失败并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似乎承诺，假如日本这样做，它将作为战后世界的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从灰烬中站起来。

结论

对西田来说，世界文化的全球化向哲学和科学提出挑战，要求承认非西方人的贡献。他相信，东方文化能提供一种新的理解历史的范式，它不仅将回答当代的理论问题，而且还将满足对民族和文化共存新模式的迫切需求。这种范式以矛盾的统一性观念为基础，全球的冲突被理解为自我及世界构成的过程。对西田来说，作为一种特殊民族的例子，日本文化似乎在这方面是一种典范并且能够代表新的范式，就像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自然科学对世界的普遍成就。

这些观点对当代的贴切性是清楚的。世界体系逐渐的非中心化要求重新反省文化的平等性。但是，要使道德要求与强大的处于霸权地位的科技的认知要求相和谐是不容易的。西田面对的正是这种两难境地。在对这一情形作出反应的过程中，他认为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并不是简单地存在于各种垂死的传统中，而是存在于各种有特色的现代实验的精神中。

第九章 可选择的现代性？玩日本文化的游戏

“如果游戏既塑造又反映了文化，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全部的文明，以及处于这种文明中的整个时代都能够具有其游戏的特征就是合乎情理的。”

罗杰·卡洛斯 (Roger Caillois, 1955)

“作者的反讽是一种在没有神的时代所能发现的否定的神秘主义。”

乔治·卢卡奇 (1968: 90)

作为理性系统的游戏

1938 年，伟大的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目睹了围棋比赛历史上的一次转折。那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记者，负责报道由他的报纸赞助的锦标赛。本因坊秀哉 (Honinbo Shusai)， “无敌大师”，他曾称霸棋坛数十年，面对着一位年轻棋手的挑战。围棋是如此的受大众欢迎，以至于川端康成的报纸能够为棋手们参加比赛提供全部的条件并支付他们所有的费用。这些开支是相当可观的，因为比赛持续了数月之久。

川端康成认识到，通过 1938 年的那场围棋比赛，他已经目睹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许多年以后，他出版了报纸上的这些旧文章，增加了新的虚构材料，并且发表了一部名为《围棋大师》 (Meijin) 的小说。这部小说是对日本现代化以后所失去的世界的一首挽歌。但是，川端康成相当伤感的传统主义并不简单地是它开始所显现的那样，乡愁是现代意识结构中的一种要素，更是 (*a fortiori*) 一种小说形式。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故事对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现代社会的本质和可能性的东西。

也许看起来有些奇怪，川端康成对现代性最持久的研究竟然是这么个一个有关棋盘游戏的故事，但事实上，各种游戏都在形式上代表着各种理性系统。就像市场、法律、科学技术研究一样，游戏从社会生活的连续统一体中挣脱出来，把一种理性的秩序强加到一部分经验上面。各种现代制度同样具有的特征是：具有各种清楚的规则和明确的标准，具有确定的行为时空，没有先定的内容，参与者地位平等。它们与游戏类似的结构在正在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中与各种非理性的、独断的和有偏见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们将看到，川端康成是如何通过他对重大围棋比赛的叙述，反复思考论据，并逐步展开了一种含蓄的对形式合理性之特殊性和偏见的批判。他是通过独特的文学技巧来完成这一过程的，具体的做法是，在比赛的各種走棋中展开一层接一层的意义。显然是中性的游戏形式结果被赋予了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内容。围棋比赛能够象征正在侵入日本的整套的现代体制，这些体制的中每一个所引起的社会变革都要比表面上所显示的要多得多。

在本章的结束部分，我试图在三个方面扩大这些反思的范围。首先，我将把川端康成小说的层次结构与前一章所讨论的西田辩证法的顺序作比较。其次，我将把他的文学技巧与卢卡奇早期的小说理论作比较。运用不同的、源自于他自己的文化的方法，川端康成完成了一种建立在双重意义基础之上的形式，同样，卢卡奇的分析所运用的是反讽范畴。正是这种形式构造了川端康成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日本文化的特性常常被提及是因为它是一种上升为工业强国的因素，究其缘由，川端康成的小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游戏的规则

就像西方人玩国际象棋一样，有数百万日本人玩围棋。川端康成的小说设想人们对围棋规则十分熟悉，然而不幸的是因为我们对围棋还知之甚少，还不能对它作必要的讨论。因此我必需请求读者允许我对围棋的规则作一个简要的描述。⁶¹

图 1，典型的围棋布局。根据奥斯卡·科谢尔特（O.Korschelt）的《围棋的理论和实践》（东京：Charles E. Tuttle, 1965）第 34 页。

据说围棋比国际象棋更难下。尽管围棋的规则更简单，但走法却更复杂，因为仅围棋盘就比国际象棋棋盘“大”四倍。黑白棋子要放在这种棋盘上纵横各 19 条线的交叉点上。（参见图 1）可能的走法数量是 361 的阶乘，超过银河系的原子数量。

游戏的目标是用自己的棋子占领地盘并围歼对手的棋子。一旦落子便不能移动，除非它们被包围，否则就必须一直在原处停留到终盘。每一个棋子都占据着两条线的交叉点，这两条线又与其他线相交形成四个毗邻的点，每个点被算成一个“眼”或“一口气”。相同颜色的毗邻的棋子拥有共同的“眼”。只要一个或一组棋子至少有一个这样的“眼”还没有被对手占据，这就是“活棋”。一旦所有的“眼”被占，那么它就被提走而它所占据的空间也就属于对手的点数。（参见图 1，a—d）

因为棋盘很大，因此如果长久地集中于它的任何一个部分，就可能在一个更具机动性的对手面前失去主动。棋盘上到处充满着争夺，棋手们一会在这下，一会又到别处下，而先前的战斗在某个时刻又影响后面几步的结局。初学者常常会被这些显然是不确定的斗争所迷惑，但这正是游戏的本质。

比赛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开始，在棋盘各处布置一些孤立的棋子把地盘标出来。渐渐地，在相抵触的地盘周围出现了战斗，在比赛早期阶段，没有一个地盘是完全安全的。最后，棋盘

⁶¹ 想更多地了解围棋，参见 Korschelt（1965）。

被填满了，等局势明朗再计算所占领的空间和子数。直到最后的阶段，总是还有许多官子、断线、漏子等等。尽管各种重要布局需要适当地调整，但当棋手遇到更大的挑战时，这些内部事务一般要等到终盘再收拾。

围棋的各种规则是简单性和清晰性的典范，但它们包含着一个逻辑缺陷。会出现一种摆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棋手不得不再来来回回地重复上一个步骤。当提掉对手一个棋子而自己的棋子本身又要被提时，这种状况就会产生，而且所要做做的就是不断形成这种局面。（参见图 1，e 和 h）这种情形叫做“劫”（ko），来源于梵语的“劫波”（kalpa），意思是一世或世世代代。为了防止没完没了的循环，第二个棋手必须在别的地方下一手棋才能回来打“劫”。而第一个棋手能够在这里补一手。（如果白棋走图 1 中 h 所标明的位置，提掉黑子后就会出现图 1 中 I 所示的“劫”。）后面我们将还要回到这种“缓走”（playing away）观念上来。

围棋之道：自主性（autonomy）和反思

围棋是十三世纪前从中国传入日本的。在日本，它逐渐地演变成一种规训，一种坐式的武士道。围棋开始被视为是一种“道”（do）或自我-实现之道，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种竞赛，尽管最好的棋手毫无疑问地会受到尊敬。川端康成写道：“东方的游戏已经超越了力量的比赛和检验而成为一种技艺，它已经赋予这种游戏某种东方的神秘性和崇高性”（第 117 页）。他还把围棋与“能”（Nō）⁶² 和茶艺相比较，都属于“独特的日本文化”（第 118 页）。⁶³ 如果记住这种背景，那么人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围棋主要流派的冠军采用佛教的规程被称作“本因坊”（Honinbo）。

这种带有日本特色的道的概念具有双层结构。就护道的行动而言，它必须从日常生活的各种偶然性中抽象出来，并且被构建成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的自主“领域”（field）。接着，就参与这种行动的主体而言，这个领域必须成为反思和自我-转化的场所。

围棋的自主化包括下列特征，其他棋类游戏也具有这些特征：

- 1，游戏中的每一步必须遵守简洁明确的规则；
- 2，各种步骤要完全消除语义内容并且简化为各种能够精确图示的明确动作；
- 3，游戏的每一步及整个游戏的目的都被明确地界定并且内在于各种规则之中；
- 4，游戏的胜负取决于精确的数量标准，结局没有丝毫的疑问；

5，各种步骤总是能够与游戏的社会环境中的其他事件区别开来，因而能够被确定作为一种特殊的游戏“时空”；

6，就各种规则而言，参赛者在游戏中的地位无论在哪方面都是平等的，主要但是不可避免的例外就是第一步；

7，游戏是一种协作性的表演，需要各种形式的互惠，从最简单的步骤——轮流下子和互相应答——到最复杂的行为——注意对手精神状态或肉体需要。

上述这些特征中有两点看来尤其重要：第一，通过这些作为清楚的规则和数量标准的手段，在游戏的领域中消除了对模糊性的担忧；第二，参赛者之间人为的平等化，尽管在日常生

活中他们肯定在各方面都存在着游戏所忽视的微妙差别。游戏的这些特征表明它与周围社会环境

⁶² 能被称为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古典戏剧。能的曲目共约二百出，按照曲目内容可分为五类。第一类称作胁能戏或祭神戏；第二类称作二类戏或修罗戏；第三类称作三类戏或假发戏；第四类叫作四类戏，也可以说是杂类；第五类称作尾能或鬼畜戏。参见西乡信纲等著，佩珊译：《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的传统和创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译注

⁶³ 有关川端康成与这种传统的关系，参见他接受诺贝尔奖时的讲演（1969 年）和 Petersen（1979：129-132）。本章从《围棋大师》中的摘录将只标页码。

的距离，在周围的社会环境中，模糊和不平等就是规则。由此看来，这些特征似乎奇怪地重复了我们关于科学和政治合理性的现代观念。我们将回过头来论述这种令人惊奇的巧合。

自主性（Autonomy）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与反应能力有关。因为游戏能够与其环境相分离，它特有的各种情形能够被不断地重复和研究。自我批评、重复和实践能够磨练各种专门的能力。表演能够被评判，游戏能够被完善，而能力的程度也能够各种比赛中被衡量。

反思并不仅仅改进了表演，而且还在参赛者的生活历程中再次构造自主性的游戏。游戏是一种通过规训改造游戏者的自我实现的实践。这就是道的观念的核心，在西方社会中，“天职”（vocation）的思想起着同样的作用，在职业这种相对自主的领域中，它描述了对行为主体的作用。

作为一种道，游戏的重新构造实践在增强其自主性方面具有悖论式的作用。游戏完全同化于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本身又完全同化于游戏。正如川端康成谈到那位老大师时所说，他是“一位在一种技艺上受过如此训练的人，以至于他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现实”（第 32 页）。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61: 20）称之为“不相关规则”（rules of irrelevance），指把注意力集中到游戏上，并且把它从周围的社会中抽象出来，而这就已经耗费了他的一生。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围棋生涯。有一个古老的中国传说，讲的是一位樵夫偶然碰见两位老者正在森林中下棋，于是便停下来观棋。最后，比赛结束，两位棋手化烟而去。而惊讶的樵夫发现在对局过程中自己的头发已经变白了，他的斧柄已经完全腐朽。而对川端康成而言，游戏则具有一种魔力。“棋手房间外面的走廊上笼罩着一种神秘的紧张气氛，我从那里瞥了一眼外面的花园，强烈的夏日炫目，我看到一位洋气的姑娘正在喂鱼。我感到我似乎看到了什么怪物，我难以相信我们属于同样的世界”（第 27 页）。

无念（No-Mind）：冲突的结构

游戏之道不在于取胜，而在于通过规训的自我-实现。但自相矛盾的是，通过规训的自我-实现却取得了胜利。川端康成讲的是两个高段位的年轻棋手向一个高人请教如何获胜的故事。“那个人说，正确的方法是在等对手下棋时要放弃一切自我意识”（第 42 页）。

这里，人们立即就清楚地认出禅宗的“无念”概念，因为它出现在日本的武士道中，这是一种特殊的、与打斗性的运动或格斗有关的忘我形式。但这的确是佛教——一种禁欲脱俗的宗教——的奇特运用。正如铃木（Suzuki, 1970）所解释的那样，“非-附着”（non-attachment）的原则能够扩展到注意程序这种层次上，能够使行动者摆脱对自我或他人的强制性专注。注意力的这种分散消除了犹豫和恐惧，并且增强了战斗性能。Takuan 认为，“最精彩的行动就出自于这种绝对的虚无”（Herrigel, 1960: 104）。⁶⁴

这里并不是要讨论“无念”概念的宗教运用。无论如何，我所感兴趣的是，概念的结构是如何通过一种奥妙的转换从传统的印度教和佛教的非-二元性（non-duality）观念中产生出来的。正如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其名诗《梵天》（Brahma）中所说的那样，根据冲突是虚幻的这种观念：

如果杀人者想到他在杀人，
如果被杀者想到他在被杀，
他们都不完全知道各种难以捉摸的情形，
我存在，死亡，轮回。

选自铃木（Suzuki, 1970: 207）

⁶⁴ 对“无念”概念感兴趣读者应该考虑铃木（Suzuki, 1973 年），以及他的书（1970 年）和 Herrigel 的书中有剑术的章节。另参见 Loy（1988 年），尤其是第 123 页关于下面讨论的“第三”种观点所涉及的主题。

乔治·路易斯·伯格斯（Jorge Luis Borges）的小说《神学家们》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小说极其优美的结局就是形而上学争论的注解，这场争论最后以悲剧告终：在其他人的煽动下，一位争论者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在天堂里，奥勒里昂（Aurelian）认识到，因为那难以理解的神性，他和潘诺尼亚（Pannonia）的约翰（John）（正统的信徒和异教徒，仇恨者和被仇恨者，控告者和被告者）构成了一个单一的人”（1964：126）。

这些作品看来要促使我们超越争论而持“第三种”立场：梵天的“我”或神学家们的“神”。假设，如果剑手和神学家们都持这种立场，那么，他们的争斗将停止，而且，他们将在完全的理解中相互妥协。

无念观认为，表面上的二元性揭示了一种更深刻的统一性。但是，有趣的是它排除了第三种立场。斗争性本身被看作比斗争双方更重要，被看作是一种根本的统一，斗争双方仅仅是这种统一的外部表现。因此，无论其他人如何辩证地投入到冲突中，通过考察各种冲突并不能达到真正的非-二元性。这样的观察者将仍然形成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更确切地说，无念是生活二元性的一种特殊方法，一种内在的生存态度，而不是超越生活二元性的一种知识形式。因此，禅宗大师对开明者（the enlightened）如何应付饥寒这种不礼貌的问题的回答就是：“饥则进食，寒则添衣。”（Suzuki, 1973: 75）

这种回答说明了为什么禅宗终归特别适用于武士道，下面我还将表明，为什么最终也适用于文学。因为这种教义的目的不是超越冲突来达到和解，而正是在斗争中与斗争的环境取得完全的统一。如果冲突能够被超越，那么也必须是从内部超越，并不是创立一种超出斗争的“第三种”意识。这种无念也不是一种神秘的状态，而是一种意识，它已经与行为结构的各种条件形成一体，并且在“逻辑”必要性的意义上，而不是心理需要的意义上领会其在行为结构中的作用。

这种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围棋。当棋手完全与棋局，如与“整体”融为一体时，他们只是设想他们的任命并且完成它，并不考虑生存或者胜利。好的棋手因此并不采取单方面的个人进攻，在比赛最激烈的时候，棋手们共同和谐地进行盘面构造，就像在一首复杂的合唱乐曲中歌手们彼此呼应一样。他们在相互应招中所表现出来的协作要超过他们的斗争。最终，他们“构成了一个单一的人。”

被扰乱的模式

在日本文化中，通过一种道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是从美学上展现自己的，就围棋这种具有盘面之美的例子中，对手们的举动在上面产生了一种华丽的复杂的图案。当然，围棋的目的是赢棋，然而，日本评论家们总是注意到，这个目的被一种取得更高的“和谐”和图案的美学成就的兴趣所超越。围棋是通过竞争的游戏而得到的具有美学形式的协作的作品。协作和竞争，这两种因素都同样重要，因为没有斗争就没有美。不抵抗的弱的棋手不能分享令人满意的充满匀称和惊奇的布局成果。因此，在艰苦的战斗游戏中，总是包含着一种美学补偿上的承诺。在现代仅仅就胜负论胜负时，川端康成的小说是一个关于背叛那种承诺的故事。

图 2，大师（白子）和挑战者大竹（黑子）间 1938 年的比赛。

那种新的对胜负的关注在 1938 年大赛的高潮中日渐明显。在许多月的艰苦比赛后，那场由于大师的病而中断的比赛似乎双方完全势均力敌。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在中盘爆发了。当那天结束时，挑战者大竹（Otake）似乎对他的下法没有把握。他在一张卡片上写下了他那天最后一步棋——第 121 手，并且把它封进一个信封中，让裁判在第二天早晨打开，棋手们就此告退（参见图 2）。

信封在续盘时被打开，那一手根本不在中心战场，而是离得远远的在靠近棋盘的顶部对大师发起了进攻。然而，这至少迫使对手应了一步，这就像处于不利地位的棋手用佯攻来调动对手以躲避一“劫”。棋手们很快回到了大师下得不好的棋盘中部，这使他付出了致命的代价。

那么，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呢？比赛的组织者准许每位棋手有总共 40 个小时的时间来考虑他们的下法。而每天的最后一步封起来就是防止棋手在比赛之间在已经足够多的时间基础上增加时间。但是，由于这种平常的封棋赛能使大师耽搁一阵，大竹似乎已经用非常冷淡的态度对待最重要的行动，以致于可以通宵从容不迫地来思考它。大师则认为大竹利用封棋赛来赢得时间以思考盘面中央的困难局面，因为他正迅速地耗尽他的用时，所以他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尽管第 121 手看起来很可疑，但并不能确定挑战者实际上会用这一手来获得不正当的优势。虽然在这一点上讲述者说道：“即使在下棋过程中大竹可以把棋子分成小块就将扭转败局”，但对他的描述并非是不令人喜欢的（第 178 页）。他甚至被描写成在下棋前用阅读《莲花经》（the Lotus Sutra）来使自己镇静下来。讲述者，对大师充满了钦佩，也尊敬他的挑战者，并且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干预以防止他输掉比赛。

这种不明朗的形势使小说的情节具体化了。而且，由于高潮的那一步的人文意义是不明确，因此，即使在小说发表后已经赋予了它一种意义，但实际比赛的特征和具体性依然存在。事实上，对最终的解释而言，它依然是一种永恒的绊脚石，是构成小说的多重代码的模糊的交叉点。

但是，大竹是否利用了额外的时间从根本上来讲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大师被密封的那步棋所扰乱，以致于再也不能完全定下心来比赛。挑战者朝向胜利的明显攻势打破了比赛的格局，并且颠覆了比赛的精神意义。这就像布局这种精巧的工作，对棋手来说，布局作为从属的结果也具有胜负的意义，而它竟被无赖之间激烈的竞争中中断了，这些无赖丝毫不关心与他们的劳动相关的综合意义，除了赢之外没有其他目的。这一事件使得游戏中协作性与竞争性之间，以及胜负者在护道角色之间的潜在冲突明朗化了。⁶⁵

因为大师被扰乱了，因此他的情绪立即显露在讲述这一故事的记者面前。川端康成写道：“大师一直把比赛视为一件艺术品。这就像画画，在其高度紧张的时刻却被弄脏了。这种黑白

⁶⁵ 重要的是，不要忽视传统游戏中特别强调获胜的特征。礼仪当然是有意义的，因为正是它把传统游戏与现代游戏区分开来，但是，认为传统游戏的形式主义意向与现代朝向胜利的工具意向是相对立的，这也是错误的。在评价斗牛时，人们在区分形式的动机和工具的动机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在射击牛中引进了一种新的“现代”风格，川端康成小说中描写的相同的问题也将会出现，只不过是有一种荒谬的形式出现的。

相间的游戏有其自身的意义并且具有创造性艺术的形式，其中流动着音乐般的灵性与和谐。但是，突然冒出了一个错误的音符，一切都失去了，就像二重奏的一方突然莫名其妙地自己即兴表演起来。而一场精彩的比赛会毁于对对手情绪的麻木不仁”（第 164 页）。

大师后来也有疑惑，但无论如何却是更沉默寡言了。他对这场比赛的公开解释，就像对冠军的解释一样，并没有对这关键的一手棋提出批评，除了那额外的计时，这场比赛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普通的。因此，情绪的波澜很快淹没了毁掉那场比赛的疑惑，一切努力均为保护它们的艺术形象。

元-规则：礼仪或平等

合理性并不是在现代才首次进入社会生活。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受形式规则支配的领域。在两种条件下，这些规则在社会学概念的意义上能够被看作是“合理的”：第一，它们把经验检验运用到思想和行动上，或者在思想和行动中渗入了各种等量（equivalence）、暗示（implication）或最优化（optimization）原则；第二，它们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确程度来这样做。例如，运用为了保证收支平衡的会计学规则，或者是惩治犯罪的法律规则。围棋的各种规则创造了一个领域，在其中，更好和更坏游戏间的区别是不可以争论的。

尽管所有的社会都产生了这样的领域，然而，现代性却不能够通过其独特的对待合理性的方式而与每一种其他类型的社会区别开来。在各种现代社会中，某些形式上合理的行为摆脱了传统的重新构造（recontextualizing）策略，正是这些策略使它们与各种礼仪和社会等级制相互和谐。在像围棋游戏这种例子中，一方与另一方要求之间的潜在冲突预先就通过我称之为“元-规则”（meta-rules）的东西得以化解，“元-规则”调控着棋手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便与游戏的要求相适应。

在古代的日本，礼仪毫无例外地在行为主体（agents）的一切行为中标明了其身份。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所感受到的礼仪的约束要比在西方社会所能想像的要强得多。不管是不是真的，只有在日本才有这样的传说：战役开始前，封建时代的将军会把头发洗净并洒上香水，因为一旦失败，他的头会被砍下献给胜利者及其宫廷的贵妇们。

礼仪在形式上使合理的行为得以重新构造，以确保它们在一个根据十分不同的原则，如年纪大小，来排序的世界中占据一个次要的地位，这就把一切人类行为与行为主体的成败和他们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依从不仅表示了一种社会偏见，而且包括形式合理性的具有社会危害的补偿潜力。⁶⁶

在 1938 年的比赛之前，这种文化构架已经完全把围棋封裹在各种复杂的准-宗教的仪式之中。那场比赛标志着把游戏当作一种精神规训这种更陈旧的观念的崩溃和一种新的游戏观念的产生，在新的游戏观念中，比赛本质上是一种力量的检验。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每个领域中一直困扰着传统日本文化的现代化过程最终取得了这种独一无二的结局。

这种转变的各种特征与我所说的围棋这种棋盘游戏的文本性（textuality）有关系。比赛的非文本化（decontextualized）特征使围棋成为一种道，但也可能通过简单地叙述各种走法的次序而随时定义游戏的状态。事实上，在产生一种能够与任何特殊的物质支撑相分离的客体这一点上，各种游戏都与写作相似，这种客体如一篇论文或一种盘面，并且是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来流通的。

游戏的准-文本性质使其适宜通过报纸来传播。就像他的早期报导一样，川端康成的小说使围棋比赛戏剧化了，尽管由于他采用了许多人性化素材而使小说具有诗意的色彩，但小说忠

⁶⁶ 当然，其他的重新构造是可能的。例如，在前现代的欧洲，技术系统通过各种行会而被融合进社会生活。社会主义也可以被解释为以民主的方式而对同样的现代技术的重新构造的需要。参见 Feenberg（1991：第 7 章）。

实于比赛的曲折和转变。这种真实性本身是有意义的：叙述者是一位记者，就像川端康成那样，而在报纸文章中出现的同样的棋谱在小说中又再次出现。

报纸对冠军赛的介入显然导致了一种重要的转变。以前一直是一种独特精神展示的游戏变成了一种机械的可以一再重复的展览，一种“比赛”。当然，过去总是有一种表演的成份在里面，但是，当间接的大众旁观取代了亲自跟随棋手到达他们的比赛现场并且观棋不语这种累赘的礼仪，情况就发生了改变。报纸的读者立即接触到的只是正在进行的比赛的断断续续的棋谱、连续的进攻和躲避，以及朝胜利的最后冲刺，所有这一切都能够按比赛忠实地印刷出来。由游戏的形式自主性而取得的这种转变消除了游戏的“意味”（aura），并且减少了其中所蕴含的作为一种道的趣味，它现在变成了一种传说或记载在新闻中的装饰（Benjamin, 1969: 224-225）。

报纸及其读者更多地关心的是游戏的公正性而不是游戏的各种传统层面，因此，新的元规则的引入确保了更好的棋手的胜利。“甚至在挑战大师自己的时候，现代的方法坚持在抽象正义的前提下进行战斗”（第 52 页）。在游戏中，除了棋子的颜色外棋手间没有任何区别，游戏的一致性必须通过他们在比赛中的角色反应出来。与这种公平观念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就是契约，因此，比赛的机构是按照契约确立的。

有一些新的规则仿照了西方的国际象棋，比如，比赛的时间限制，一天比赛结束时的封局等。棋手们甚至被隔离开来以防旁人出主意。关于这种规则及其冷酷的理性主义，川端康成说道，“后来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死亡的预兆”（第 58 页）。

不可能存在反对这些规则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在增加报纸发行量的情况下，人们希望通过参与比赛而获得丰厚的奖金。而是这些规则只专注于“谁是最好的棋手？”这种问题，粗暴地冲击了日本所珍视的感受性。

传统礼仪不是确定了老棋手和年轻棋手之间、冠军和他的挑战者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是确定了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因此，这位无敌大师有权指望，人们对他的经历和名望的认可，不仅仅是因为外在的令人尊敬的形象，而是因为钦佩他的棋艺，赞同比赛的时间长度和定时规则，以及各种相关的事物。蕴含在这种安排中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冲突，但是，大师的立场也许过于明显，并且对他来说其责任感也过于沉重，以至于没能充分利用他的判断力。对荣誉的种种考虑制约了棋手间的不对称。然而，把他们两者都置于一个平等的基础之上，这难道不是拙劣的吗？对围棋艺术而言，通过利用这些规则，就认为棋手们主要对胜利感兴趣，这难道不是卑劣的吗？难道发现谁棋下得最好就足以以为这些冒犯开脱了吗？

从某种意义上讲，答案是明显的。川端康成的叙述者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甚至了解老大师的一切真相。他没有对我们隐瞒大师躲避了一场与他的挑战者的老师铃木的比赛，铃木也许已经彻底地击败了他。他的一个弟子怀疑在一场先前的比赛中已经向大师私下说出了获胜的走法。最糟糕的是，他把他自己的立场视作“一种商业资产”，并且“以前所未有的价格把他最后的比赛出卖给报纸”（第 53 页）。有道德的旧日本不过如此而已！

但是，叙述者仍然把大师描写为“永远的真诚和清白”，与那些圆滑的现代棋手相比，他确实如此（第 109 页）。川端康成解释道，偏爱的消失并不像它所显示的那样是清白的状态，因为，“新的规则产生了新的策略”（第 165 页）。他注意到，“当一种新的规则被创造时，发现了漏洞的狡猾之人依然故我。人们不能够否认，在更年轻的棋手中间存在着某种狡诈，当所签署的规则用来防止狡诈时，这种狡诈便利用规则本身”（第 54 页）。包含第 121 手棋的密封的比赛就是一个例子。

要求普遍地对待一切事物的各种规则被运用在一个具有特殊环境的世界中。它们并不是超然于斗争之上，而是最终作为达到胜利目的的手段被工具化在个人的策略之中。对新规则漏洞的巧妙把握取代了真正有洞察力的棋手的诚实的精明。因此，棋手间作为一种类似于机械平等的公平理想永远不会达到。而且，人们必须再一次地依赖于荣誉以抑制弊端。但是现在，荣誉已经被为服从规则字面意义所作的辩解所消弱，这些规则在现代精神中取代了荣誉的地位。

新规则的导入还有一个更加不幸的结果：各种美学价值的失落。就比赛本身而言，礼仪当然是外在的，而且正因为如此，可能与游戏的逻辑相冲突。但事实上，小说并不涉及像年纪这

样归属性的 (ascriptive) 价值与建立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倾向之间的韦伯式的斗争。小说并不是要强调不公正性和曲解遵从的原因,而是把礼仪当作比赛的一种环境提出来,唯有它才适合在一场真正英雄式的比赛中创造美学的成就。同时,它是一种指向成功的倾向,由于仅仅依赖于各种技术细节,成功却显得扭曲了比赛。叙述因而瓦解了常见的归属 (ascription) 与成就 (achievement) 之间的对立。

小说让我们懂得,仅仅是官僚政治框架的建立已经注定了大师的失败。这恰恰不是因为应付系统方面他必定比年轻人更不聪明。不是这样!而是因为规则本身就体现了不信任,这必然在某些方面挫伤了他的士气并使他经受了无法忍受的困扰。在这种背景之下,有些事件肯定会使人对形势产生怀疑,并且导致大师精神的崩溃。川端康成写道:“也许可以说,大师在其最后的比赛中被现代理性主义所困扰,对现代理性主义而言,繁琐的规则就是一切,围棋艺术所具有的一切魅力和优雅都已经消失殆尽,它完全不需要考虑对老年人的尊重,并且不重视人类之间的相互尊重。日本及东方之美已经远离围棋之道”(第 52 页)。

因为与比赛的竞争层面相比,礼仪更强调比赛的合作层面,因此它开创了一个道的美学理想能够茁壮成长的天地。但是在新日本,比赛的社会环境只是从个人事务中抽象出来的仅与公平有关的问题。公平把游戏的其他方面,诸如平等和斗争等,投射到社会环境之中。当社会行为被看作仅仅是一种竞争时,游戏的结构,以及胜负者之间清晰的结局,便开始简化生活本身。

意义的层次

这种研究与西田的辩证法非常(如果不是巧合的话)相似。西田 试图以一种独创的方法使现代性适应于日本传统。他不是集中于各种显而易见的社会-历史主题上,而是在西方科学知识和具体社会实践的更基本层次之间的关系中寻找它们的基础。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那样,他的实践理论以某种他称之为“绝对虚无意识”(consciousness of absolute nothingness)的东西而告终,即上面讨论的关于无念的哲学观念。西田的计划是想通过把西方的贡献——科学的合理性——放到更大的具有东方基础的框架中而使知识包括在实践之中。

当然,川端康成没必要读过西田以后才拥有相似的看法。日本知识界面临的是来自于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各种意义层次的混乱并置。只有一些有限数量的方法来清理这种混乱并使之条理化。和许多人一样,西田 和川端康成在其生涯的某一时刻,以哲学和文学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但以一种相似的精神担负起了这一重任。

表达形式之间的这种差异也许具有一种其自身特有的历史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西田 的哲学表达了一种战前似乎是正当的文化抱负。对川端康成来说,战后的作品是日本文化最高程度的表达,是他称之为“挽歌”的作品,是叙述日本文化衰落的文学作品。把这些挽歌放在西田哲学的背景中能够解释许多现象。

川端康成是如何在其小说中发展了辩证法的呢?《围棋大师》建立在多元代码的基础之上,运用这些代码来解释游戏中非常简单的一步棋。每个层次的各种意义的秩序和关系都与其他各个层次的秩序和关系相对应。除了其背景和重要性之外,同样的行动在一切层次上都能够被视为同一的和不变的。从因果关系上把这些层次联系起来并且用另一个层次来解释一个层次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层次都有其自身的“逻辑”。这些多-层次的纠缠就是形式化领域的特征。当任何具有明显的技术或形式动机的行为处于其自身的社会环境中时,它都显示出双重的或三重的意义。⁶⁷

⁶⁷ 参见 Latour: “如果你获得任何黑箱并且要构造它的封闭-结构,你可以以两种不同的方法把它看成是结合起来的联合系统:首先,考察一下它被设计成把谁结合进来;其次,考虑一下为了使结合必然发生,什么是与其相关的事物。我们可以一方面画出它的社会关系网图(sociogram),另一方面画出它的技术图示(

川端康成的小说试图理解通过现代性而取得支配地位的辩证法不断渗入的各种更低的层次，并且把它们包括在一种更高的美学形式之中。用西田的话说就是，游戏是一种形式-合理的系统，作为一套空间坐标，是一个能够与其实内容相分离的“谓词的领域”（field of predicates），是一幅图表。对游戏的这种表述是从生产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在生产过程中，游戏是作为个人行动，即“自我-意识”的客体而出现的。作为一种表演的重新构造，抽象的图表是通过比赛的实践而被赋予生命的；通过这些棋手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比赛它才成为这种特别的比赛。在游戏、游戏规则及比赛策略的层面上对行动完全自我充分的说明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出版的关于游戏的各种说明书就似乎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说明。

当然，与认为合乎这种出版物上所介绍的情况相比，总是会有更多的情况发生。通过揭示棋手各种活动的心理学上的意义，小说把我们带到了幕后。在这种层次上，在一种令人惊讶的复杂的叙述过程中，游戏似乎是一种掺杂了尊重、公正、进攻和焦虑等各种社会关系的结构。

但是，即使是这种描述也是不完全的，它要从还要广泛的环境——社会背景——中抽象出来。棋手们毕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社会的成员。游戏因而被进一步地包括在各种社会、文化和历史意义的更广泛的实践领域之中。这些意义随着与道和胜利的不同关系而体现在不同的有关礼仪和公正的元规则之中。这里，我们涉及到西田辩证法的第三个层次，即包含在历史中的合理性和个体性。

报纸的各种规则与旧的仪式之间的冲突反映了比赛中戏剧性地表现出来的一种更大的历史冲突。本因坊秀哉并不是一位围棋大师，只是一位旧日本这种垂死文明的冠军，在这种旧文明的世界中，一种贵族式的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战胜了关注成功和金钱的现代意识。对大师来说，比赛是一个超越任何纯粹的个人竞争而展现美的机会。但是在现代，不再有任何的“余地让人想起作为一种艺术的围棋之崇高和芬芳”，挑战者只是为了赢棋（第 52 页）。正如川端康成所写的那样，“大师看起来就像是明治时期的一件遗物”（第 63 页）。事实上，比赛结束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的挑战者，不管怎么样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正派人，则是现代世界的代表。他的胜利意味着旧日本的终结和受商业和媒体支配的新精神的诞生。

对川端康成而言，1938 年的冠军赛是日本现代代的象征。他再现了人们在日本文学中所熟悉的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一般差异：理想与利益、情感与理性、美与力等之间的冲突。尽管有一些陈词滥调，但他的叙述者还是不能够完全同意现代人；他说，它将“给围棋界带来新的活力”（第 145 页）。

事实上，小说似乎软化了其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时代差异。毫无疑问，我们有意地把关于大师的各种传闻不当回事，而是相信对他的挑战者的最不利的东西。但是，各种模糊性意味着，现代化问题恰恰不是心理学或伦理学问题；游戏具有不同的潜力，它们是以具有历史意味的各种人物形式而反映出来的。因此，个人的层次依赖于游戏——合理性——空间中、社会生活中的根本变化。⁶⁸ 从一个角度看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下法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一步败着。棋手们实际上在玩不同的游戏。他们的遭遇必然导致一种深深的误解，导致一种“双打”（doubles）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是按照不同的代码行事。⁶⁹

正是新闻工作者这样的叙述者承担了解释这些更大量含义的重任。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亲自体现了比赛的那种模糊性。一方面，正如大师在比赛前把他自己化为虚无一样，叙述者也这样说道：“当我凝视着大师时，我把自己化为了虚无”（第 115 页）。另一方面，他与大竹

technogram)”（1987：138）。这里，“黑箱”是指由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产生的事实和人工制品。它们的社会和科技逻辑彼此无法解脱地纠缠在一起。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围棋比赛中。

⁶⁸ 在人物塑造通常表达了时代转变这方面，Pilarcik（1986 年）提出了各种熟练的不同分析方法。尤其参见她对棋手运用时间（第 12 至 13 页）及其策略（第 14 至 15 页）的描述。参照 Thomas Swann（1976：105-106）。但对一部小说而言，其中同样的转变从根本上是被当作正在改变的人物来对待的。请与 Endo（1980 年）加以对比。

⁶⁹ 这里所运用的双打概念来自 René Girard。至于把他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关于小说中经济学的作用，参见 Feenberg（1988a）。

的关系表现出平等主义友爱和尊重的特征。他的两面性反映出日本自身的两面性（Pilarcik, 1986: 16-17）。

然而，把叙述者视为被动的将是一个错误。他的行动是环境的逻辑结果，具有优美性和直接性。而且，通过给棋手们带来安慰和建议，他在一场正在展开的比赛中扮演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正是通过这种实际的接触，作为纯粹的感受，他的意识把握了整体。

叙述者身份中所具有的深深的模糊性打开一个空间，它把所有较低的领域包括在一种文学的无念，一种西田式的“绝对虚无”之中。在其《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川端康成认可了其作品中的这样一种观点。他引用诗人西行（Saigyō）的诗说：“面对自然万象，他身心俱空。天籁岂非真音”（1969: 42）？他总结道：“我自己的作品已经被形容为虚无之作……”（1969: 43）。

唯美主义，东方和西方

《围棋大师》代表了一种美学批判，在这种批判中，日本精神在历史之外而得以幸存，它对胜利的现代性有一种特别的、时常产生的怀疑，并且揭示了现代性的各种局限。也许谷崎（Tanizaki）在 1933 年写其著名的论文《影子颂》（In Praise of Shadows）时就预见了这种事情。他写道，传统日本文化正在明亮的灯光下苟延残喘，“我想，也许仍然有什么地方，可能在文学或艺术中，一些东西能被保留下来。我至少将在文学中召唤我们正在失去的世界的影子。在那被称作文学的殿堂中，我将拥有深深的屋檐和黑暗的墙壁，我将把那些太醒目的事物推回影子中，我将剥掉那无用的雕饰。我并要求什么地方都这样做，我们也许只有一座大厦，在那里，我们能够关掉电灯，看看没有电灯会是什么样子”（1977: 42）。

这些日本作家的唯美主义与卢卡奇早期把小说反讽作为一种“否定神秘主义”的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令人感兴趣的类似之处。⁷⁰ 这种巧合是重要的，因为它为川端康成对现代性的批判提出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背景：小说传统。进一步说，卢卡奇的理论表明了一种方法，它把作为美学形式的川端康成的小说与仅仅是对过去的感伤式的乡愁区别开来。

根据卢卡奇，小说是对现代性最初的和最深刻的批判。那种批判，至少在卢卡奇当作典型的法国和俄国小说中，与其说是道德的和政治的，不如说是美学的。这些小说是反讽的产物，这种反讽一半在世界的各种冲突之中，一半在其之外。小说家既非以传统或热情——通常以英雄为例——为理由与现代社会形成尖锐的对立，也不用利奥塔所说的终结于当代或者导向一个光明未来的“宏大叙述”为现代化及其代价作辩护。的确，如果完全并且简单地把作者等同于世界或者英雄，那么，小说将蜕变为小册子或抒情诗。

小说的反讽因此特别地处于二难境地。一方面，通过揭示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外表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它消除了现代性要求普遍性的神秘性。（例如，在狄更斯或巴尔扎克的作品中）这常常导致某种对传统的伤感。但是，另一方面，通过展示传统如何与现代社会深深地纠缠在一起，小说的反讽结构推翻了任何回到过去的想法。的确，传统，就像英雄们对抗现代性的其他没有希望的理想一样，从根本上来讲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里程碑，它只能够在社会的紧张和对立中被显示出来。小说家也许看起来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他的反讽仍然使他处于卢卡奇所说的“超验地位”（transcendental place），只有从这个位置才能看清整体。

⁷⁰ “作者的反讽是一种在没有神的时代所能发现的否定的神秘主义。这是一种具有博学式无知（docta ignorantia）色彩的态度，是一种对恶魔既和善又恶毒的活动方式的描写，是一种对理解的拒绝，而不是这些活动方式的纯粹事实；其中有深刻的确定性，只有通过给定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这种确定性就是，因为不想知道（not-desiring-to-know）和不能够知道（not-being-able-to-know），他已经真正地遭遇、瞥见和把握了最终的事物、真正的本质、现在和不-存在的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反讽是小说的客观性。”（卢卡奇，1968: 90）关于这一节的批判性的讨论，参见 Bernstein, 1984, 第 195 页等。

从形式上讲，这种反讽的姿态与道的意识，与无念相类似，当它与其贡献了冲突成份的整体相统一时，无念最充分地发挥了作用。正因为如此，川端康成的叙述者怀着乡愁站到了旧大师一边，而且还设法用一种避免带倾向性争论的方法来描述日本传统与西方现代性的矛盾。他是书中真实斗争的一位神秘的中立观察者，这产生了各种美学形态，它们与文学表现方法，与文化冲突中的优美下法和应着相适应。描述一件“虚空作品”（work of emptiness）中的这种斗争就是在美学上超越传统与现代性的对立。卢卡奇不同寻常地直觉到小说中具有宗教的内容，这被来自另一种文化的回响所确证。⁷¹

然而，西方的和非西方的对现代性的反讽意识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区别。在西方，一种典型的英雄类型体现了各种来自过去的理想，而社会的进步决定了这种过去的命运。但是，年老的大师，是一种按非-西方背景描写的相似的英雄典型，并不仅仅是历史落后这一悲剧的例证，而且代表了地理政治空间中当代各种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在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环境中产生的，在这种冲突中，日本似乎注定要失败，到不是因为它的死期已到，而是因为它遇到了一种更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获得了一种相应的，但也许是不应得的声望。日本社会后来的发展表明，不忽视这种差异是多么的重要啊！⁷²

今天，在一个日本已经成为主要工业国的世界中，我们仍然能够发问，日本文化生命力延续不断的迹象是否不会驳倒像谷崎和川端康成这类作家美学化的悲观主义。他们的立场属于文化创伤时期，这种创伤开始于明治维新，在被占领时达到顶点。正是在这期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小说繁荣了起来。它开创了一个空间，在其中，西方现代性能够以其特有的方式丝毫不犯地暴露在丧失了信誉的神学或意识形态的偏见面前。它的结构因此是现代的，尽管表面的启示常常是传统的。但是，如果小说，毕竟是一种泊来的形式，能够从其西方起源中达到如此高的批判程度，那为什么对相似的适应和混合可能性的绝望会在其他领域中出现，而产生了一种日本特有的现代性？⁷³

这种思索让人回想起对各种可选择现代性进行反思的珍贵传统，自 1933 年以来，这些可选择的现代性已经被用来解释日本如何在现代计划内并不是通过反动的撤退来保护其文化的创造力（Nishida, 1958; Ohasi, 1992）。尽管川端康成因这种前景的明显失败而感到绝望，但在他的小说的根本结构中却能发现模模糊糊的支持。《围棋大师》向我们表明，现代性也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通过一种一般化的“污染”过程，几种可能的文化彼此互相交锋（Vattimo, 1991: 158）。

⁷¹ 在当代世界文学这一更大的背景中，通过时代不同的人而实现了小说的转折，他们反思了各种类似的发展水平，并且运用了他们各自文化所提供方法。因此，在匈牙利人卢卡奇与日本人川端康成相似性（分别描写了一代人）的背后，在世界不同地方现代化的各种节奏中，有一个更深刻原因。1871 年至 1873 年，岩仓代表团（Iwakura Mission）访问欧洲研究如何使日本现代化，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匈牙利的例子上，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匈牙利似乎是一个指明了道路的国家。他们的报告注意到：“今天，在其启蒙上被延误的不同民族都将通过研究匈牙利的情况而感触颇深。”（Soviak, 1971: 15）由于小说与两个国家经历的发展过程中的批判时机相适应，所以打开了艺术和理论的空间。

⁷² 在解释西田的学生河山（Koyama）的历史哲学时，坂井直树写道：“……历史不仅是时间性的或年代性的，而且也是空间性的和关系性的。把历史当作各种事件的一种线性和进化的序列而加以接受的可能性的条件是它尚未与其他历史、其他共存的时态（coexisting temporalities）建立起主要的联系。”（Sakai, 1989: 106）

⁷³ 关于日本小说文化上特殊的现代性，参见三次（Miyoshi, 1989）。

文化的谱系

可选择的现代性这种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真的是似是而非的吗？我所说的对可选择的现代性的“内容研究”（content approach）强调的正是如人们食物种类这样的种族和意识形态差异，家庭或宗教的作用，财产和行政的法律形式，等等。对一种选择而言，这些都是不牢固的基础，因为现代化，正如我们自从马克思和韦伯起所了解的那样，正是在于以一种集中的文明模式消除或结合了这些种族的和意识形态的内容。普遍主义者的观念不加批判地把西方化和现代化混在一起，与此相比仍然具有说服力。

如果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是可能的，那么，它必定不是根据内容，而是根据更深刻的文化形式上的差异。尼采的“谱系的”方法意味着这样一种研究：跟随生活方式的进展，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从这种尼采式的观点看，犹太-基督教不是一种特别的宗教，而是一种在世的方式，这个世界能够以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外观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再现。尼采也许会主张，这种形式如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样在西方仍然是有活力的。

直接或间接地受尼采启发，其他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已经发展了各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关于西方文化的最根本形而上学假定的模式。这些哲学家往往默认，自从现代体制和技术合理性在西方出现以来，从根本上讲它们与其他文化是不调和的。⁷⁴ 正如“后现代性”或“多元文化论”一样，这种观点导致了对传统和种族特性的重新估价，在最坏的情况下，萎缩为内容研究。

《围棋大师》实际上引起了这样一种传统的读解，至少对那些想从中看到日本特性和现代文化普遍性之间斗争的西方人来说是这样。按照那些方法，川端康成将证明，礼仪、自我实现和美学是根本的目的，在现代社会中，它们必定是工具效率的牺牲品。

对小说的这种解释与平常普适论者的观点是一致的，普适论恰恰把日本文化看作是一种不同的文化，就它仍然带有封建残余的烙印而言，很可能将作为现代化的产物而消失（Morley, 1971: 19）。当然，与 20 世纪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者最初提出理论时相比，今天它更难以让人相信了。既然日本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封建主义似乎就不可能在那里存活，但是，在那些发现日本文化压抑性和专制性的观察者中间，普遍主义的观点仍然很流行。

令人疑惑的是，川端康成的小说似乎与这种普遍主义的框架相一致，因为它所赞同的各种旧日本的价值也带有大师的感伤和脆弱，它们的失败标志着日本进入了现代性。但小说和韦伯式的框架仍然是不可比较的。它所包含的种种日本成份并不只是为形式合理性而牺牲的实质性“内容”，因为它们包括了一种特殊的游戏战略实践。因此，即使按韦伯醒悟了的观点看，启蒙运动对进步的宏大叙事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宿命的必然结果。

总之，并不能轻而易举地使川端康成的小说与目前时髦的反对极权主义合理性的种族范式相适应。我相信，川端康成与其说是一位反对普遍性的特殊性的捍卫者，不如说是一位对虚假普遍性各种主张的批评者。在这点上，他也非常接近于早年卢卡奇所界定的小说传统。

围绕西方各种公平观念而对围棋的重组不是一种从特殊到普遍的迁移，只不过是改变了力量平衡以有利于一种新型的棋手。当恭敬下降时，与其相随的是它降低了自我-实现和在传统礼仪环境中兴旺的美学的价值。从此以后，围棋将是一桩生意而不是一种精神上的规训。最好的棋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那些创造最完美游戏的人，他们将被那些最能赢棋的人所取代——与我们所看到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因此，对川端康成小说的反思意味着把合理性等同于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并且为非西方现代性的谱系提供了出发点。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日本现代性的进步将大致与西方的发展相平行，也就是说，封建-基督教传统曾经是那种同样文化的一种有效的表达式，在其逐渐衰败中，出现了基本文化形式的新的世俗表达方式（Dore, 1987）。

⁷⁴ 对相关主题的有用评价，参见 Johann Arnason（1992）。

诚然，假设日本刚刚开放和现代化，那么，就常常难以把各种幸存物与更深文化形式的现代事例区别开来。那种模糊性是作为川端康成小说的中心议题出现的。我现在想解决这一问题。

地位（Place）的文化

为了这个目的，我将先论述一下“地位”（place）范畴，它在日本哲学和社会思想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⁷⁵ 这个概念构成了无念概念的基础，而我们看到，无念在川端康成的小说中起着作用。作为一种一般的文化现象，它明确表达了适用于社会每个成员的日常经验。这是在社会关系系统中寻找人的“地位”的经验，人们正是在这种社会关系系统中发现他们自己。

人们能够轻易地把这个范畴吸收到社会地位的观念中去，并把它视为日本文化中保持等级制的证据。中根千枝（Chie Nakane）提出了著名的垂直社会理论（the theory of the tate shakai, vertical society），用来解释日本在现代世界中的成功（Nakane, 1970）。这个理论已经受到很多的批评，因为它实际上用文化来证明对权威的屈从是有道理的（Dale, 1986: 44-45）。令人感兴趣的是把全部的地位观念当作受到意识形态侵蚀的文化理论的一种人造物品，当作一种为残酷剥削服务的伪-传统主义而加以拒绝。

Nakane 社会理论的模糊性与我们在《围棋大师》中遇到的那些模糊性相似。在两种情况下，一种半-封建的遵从与一种形式系统（经济学，围棋）的理性操纵结合了起来。但是，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小说家是一位引起争论的观察者，而不是一位理论家。他清晰地描述了已经存在于传统日本文化中的独特的形式合理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与传统文化中理性层面相关的各种价值和实践是否能够在旧的遵从消失中幸存并且使它们自己适应于现代的条件。

这不是川端康成偶然想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想考虑的问题是，地位的逻辑是否不可以不受传统独裁主义的支配。它似乎在一种比威望和权力差异更基本的层次上，被构建到日本文化和语言的结构中，并且表明了一种更广泛的有区别性属性的范围。也许，就像西方的个人主义，从广泛的谱系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能够在跨时代的制度转变——包括权力分配和行使中的各种转变——中再生自身的文化形式。

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种解释。例如，说日本语言（和几种其他的亚洲语言一样）的人必须选择反映了年龄、性别和身份差异的代名词、动词形式和称呼，而身份在西方只通过服装而心照不宣地表现出来。男女的说话方式有一种非常清楚的差别——这是最重要的地位差异之一——以至于有些语法书事实上提出了男女两性版本的对话。毫无疑问，阳性和阴性用法反映了性别等级，但是，它们被认为是表现了男性和女性的全部内涵，并不仅仅是一种权力关系。尽管社会等级的区别得以迅速的消弱，同样的观察依然适用于那持续下来的形式语言（Miller, 1971）。

语言学的编码看来为社会差异增添了巨大的影响力，或许反映了它们在社会现实中的不同寻常的力量。日本属于这样一种文化，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其中你必须知道你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当他们到达西方并说法语或英语这种无法提供任何明显表示地位的语言时，这能够具起非常大的约束作用。

地位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服从于社会统治者的权威。在诸如公司和政府部门这样的机构中，大量的注意力是放在通过集体讨论来构建共识上面。当事情进展顺利时，这种共识的构建是一条双行道，它既包括权威，也包括服从。当然，事情并非总是顺利的。自我确认（self-assertion）就常常是必要的，而且，当它比在西方更为突出地受到限制时，日本人的确不必等西方个人主义到来以后才学习如何去做。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这是现成的，但是，对地位的要求使它受到限制并且变得具体化了，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用一般的术语把它理解为角色

⁷⁵ 参见 Nishida (1958, 1990)；Abe (1991)；Watsuji (1987)；Berque (1986)。

超越。因此，地位并不涉及一个人是否玩他自己的游戏，而是涉及玩游戏的人是谁，以及那种游戏必须如何来玩。

地位并不仅仅形成日常话语和社会关系，而且还形成宗教和艺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这种经佛教无念概念重新解释的概念的影响下，日本武士道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演变为精神的规训。战士们被训练成很少关注胜利，而是更直接地关注在运动的系统中说明他们的地位，以便完全满足其环境的各种要求。用美学术语来说就是，每一种战斗姿态都是一对事物中的一部分，它的另一个部分必须，并且只能由对手来补充。从某种更深刻的意义上讲，游戏中的每一步都是通过棋手合作性的竞争而产生的一个更大图案的一个要素。在地位的这些艺术和宗教的应用中，更为清楚的是，传统的权力关系掩盖了也许能够在它们之外生存下来的一种更基本的文化形式。

地位和可选择的现代性

在其强调自我实现和美学的价值的同时，像通过武力而获得地位这样的事情在川端康成对传统游戏围棋的描述中也是起着作用的。他所进行比较的两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是以在更大系统中体现人的地位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另一种是西方关注公平和胜利的生活方式。

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一种受传统的约束，而另一种集中于比赛的逻辑。两者都完全与比赛的逻辑相关，但是，尽管一种突出了与地位文化最相关的比赛的各种层面，另一种突出的是附带了个人主义文化的各个层面，因此，从广义上讲，两者都是“合理的”。

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两种可选择的、围绕游戏的不同形式层面而构建的围棋下法。两种方法都志在取胜，但出发点不同。西方强调的是平等，它来源于游戏“各方”的等价，这与传统的遵从的确是相冲突的。但是，日本人对美学的关注与游戏的形式合理性并不对立，它实现了游戏的另一种内在维度，那就是，在有进有退的斗争中体现棋手们必不可少的相依性。

在日本传统比赛中占支配地位的美学价值因此并不外在于游戏的本质，而是表现了只有在非西方环境下才能清楚地体现出来的游戏的各种维度。这些价值也并不仅仅是特殊的。美学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主观感受的东西，但是，各种数学和技术系统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扎根于客观合理性之中的美学品性。只要翻翻任何一本围棋教材就立即展现出这种品性，对各种游戏也是如此。虽然完成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议事日程，但围棋之美来自像年轻挑战者所遵循的各种精确价值那样的形式合理行动的各种条件。通过证明成功本身并不比遵从更合理，川端康成重新建立了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对称性。两者都外在于内在的比赛逻辑，根本的不同在于它们所特别遵循的那种逻辑。

总之，某些传统的价值与所谓的现代公平的价值至少具有同样的“普遍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也许并不是完全有意识地）描述了两种可选择的合理性类型，其中每一种都是现代性的候选者，尽管只有一种是胜利者，只有一种事实上构建了一个现代社会。

我们这里因此便有了一种思考可选择现代性的模式。日本是一个好的案例，因为它把一种完全外来的文化与一种非常熟悉的技术和体制框架结合了起来。作为理性的系统，技术、市场、民主选举等都与围棋游戏相似：它们也能够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进行不同的实践。在这种环境下，日本文化并不是一种非理性的侵入，而是强调了技术合理性的各种不同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既包括自我实现和美学，也包括对成功的狭隘追求，这种成功从种族中心主义立场上讲在西方也是认同的。⁷⁶

在川端康成的比赛中，每一步棋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则，但在比赛所运用的不同系统中却具有不一样的意义。不同的文化都存在于棋盘上并且影响其展开的模式。也许，所有的现代制度和现代技术本身都由各种文化意义按相同的方式所构成。一种有活力的文化，无论它是古老的

⁷⁶ 关于技术合理性的各个不同阶段的进一步说明，参见 Feenberg，1991 年：第 8 章。

还是新的，只要努力把握住了现代性，它就能够影响其各种合理系统的进展。种种可选择的现代性可以出现，但其中的区别恰恰不是依据诸如饮食文化、时尚，或各种政治理想等，而是依据各种主要的技术和行政体制。

川端康成的挽歌也许是早熟的，但某种与此相似的事情在日本已经开始发生。许多专家已经试图证明，日本经济已经借助于独特的文化资源获得了极高程度的动力和效力（Dore, 1987）。通过与似乎具有伦理学缺陷的个人主义的西方作比较，他们指出了归属、奉献、品质和天职等观念在日本的重要性。

与川端康成所哀伤的、似乎已经极度衰败的某些遵从形式不同，这些观念并不是被现代化过程所命定的幸存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是日本文化以此投身现代性中的各种特殊形式。实际上，这些价值的流行可以说明日本模式的优劣。各种工业社会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天职信仰、关心整体和协作性竞争等观念。但是，只有当它们摆脱依然带有日本国家本来具有的官僚政治特征的顺从主义（conformism），各种现代政治系统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有效的经济与平庸的政治的奇特结合就是这种模式的特征（Van Wolferen, 1989）。

问题是，带有文化特性的现代化还将走多远，而且，当日本越来越多地从其对西方现代模式的原始依赖中解脱出来时，西方的技术遗产将承受多大的转变。

现代性的批判

像技术这样的合理系统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特权的角色。正是这使得现代性有别于前现代性。一段时间内上述特征通常被看作是进步——由于普遍和必然真理的发现而超越了纯粹偶然的和特定的地方风俗。

合理性似乎不受其周围社会世界的制约，甚至是那个世界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表面上的自主性不是偶然的。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它产生于对各种合理系统的抽象、定位和非构造化（decontextualization）。然而从马克思开始，批判的理论和社会学就已经揭示了一个接一个的合理系统——市场、官僚机构、法律、科学、技术——的社会基础和偏见。今天，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坚持认为，“技术科学”并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所假定的独立的社会基础，而是一种附属的变量，和其他的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

这些观点并没有像肤浅的相对主义自称的那样抹杀了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之间的区别。然而，在没有那种区别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解释或者甚至说明西方文明取得全球性胜利的意义？但是，我们再也无法依赖于旧的自主合理性观念来作出这种区分。现代性并不是以事实上的理性自主性为特征，而是以不可避免的自主性假象为特征。那种假象在技术专家治国论和恶托邦全面管理的幻想中暴露无遗。这一点也是哈贝马斯为了重新确立交往的正当地位而试图限制技术合理性的根源。但是，如果技术和社会本质上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既抛弃对恶托邦的恐惧，也抛弃对纯粹的交往领域的希望。

尽管现代性引入了各种非常真实的变化，合理的一致性和文化渗入在现代社会中和在前现代社会一样，不是可供选择的事物，而是分析的技术层次。正如没有“纯粹的”语法一样，也没有“纯粹的”技术这样的事物。就像语言能力一样，技术能力只有在具体的形式中才能实现。极其抽象的意义上的合理性既不是一种中性的方法，也不是专属于西方，就像语言结构一样，它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属于行为和人工制品的范畴。

但是现在，我们如何来描述现代性，它的突出的特点又是什么呢？

对这个在最近几年中已经不断为人们所熟悉的问题，有一种回答的方法就是完全否定现代和前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着“分水岭”（Latour, 1987: 211ff; Bloor, 1991: 138ff）。例如，结构主义认为，推理的过程在一切社会中都是相似的，而合理的信念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与社会的利益相关。因此，现代科学与假定的前现代性的前合理的（prerational）信念没有根本的区别。

这种思路看来很少是由对人类学家指责为非理性的土著人的同情所激发起来的，更多的是想从自然主义的还原法（reductionism）中把经验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拯救出来。我就是出于这种动机，因此我上面已经说到，美学的和伦理的经验接近自然科学所不理解的现实层面。值得考虑的是科学也许有一天会用什么方法来说明这些现象，至少直到实际的研究已经有一些东西贡献出来为止。越过事实而傲慢地坚持普遍的还原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与许多科学家的内心信念相去甚远，而且主要服务于寻求资助像人类基因计划或人工智能研究这类开创性事物

的公共关系活动。相对主义能够被用来与这些自命不凡的要求作斗争，但是它与之厮杀的是科学和技术的幻影，而不是真实的事物。

而且，相对主义的研究是在冒着摧毁合理性的重要特征的风险而取得它的胜利的。人们也许希望，在不是不加区别地使科学-技术合理性等同于非理性的社会实践的条件下，否认科学-技术合理性天生就比其他任何思想和文化经验模式更优越。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不否认科学-技术合理性的特殊性的情况下，减轻这种巨大区分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吗？它毕竟不仅仅是另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现代性的基本争议领域之一（Harding, 1993: 14）。

马尔库塞和西田之所以吸引我，不是因为他们将理性信念的内容，而是将理性形式本身相对化了。他们太清楚地意识到理性化巨大的和成问题的社会后果，从而无法忽视理性和别的东西之间的断裂。他们还抛弃了通常从这种认识中得出的本体论结论，并且拒绝把现代的成功作为证据用来证明其对自然的陈述提供了关于存在和虚无的最终判决。他们同意怀特海这样的观点：即将我们的理论等同于可能解释了在场世界的根本现实，这是一种“误置的具体性的谬误”。例如，我们不能凭借大脑无意识的活动而把那个世界还原为感觉中所表征的自然现象和主观情感之间的外在结合。的确，关于自然的各种理论必须被理解为对经验的抽象，这些抽象在我们论述世界时扮演着一个特殊的但又不是独一无二的角色。

和黑格尔式的实践哲学家一样，马尔库塞和西田把合理性理解为一种活动而不是对其所是的被动反映。那种活动具有特别的使它远离普通经验的特征，但是它与其他构造社会和文化世界的实践也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合理性因而是在一种它永远不能完全超越的实践背景中产生的，它必然以合理化的制度和技术成就的形式返回到这种背景。它向世界的重新进入包含特殊的重新构造的实践，因为抽象并不完全“真的”离开某种社会的具体过程。批判就在于破解这个实践和理论的网络，以便把握经验的特定合理框架的历史性和潜力。

这些理论把经验看作是有本体论基础的。自然主义被抛弃了，但对现象学那样的纯粹直接性又是那么的留恋。取而代之的是，经验既被解释为*不可还原的*，又被解释为*历史的*。这是一种悖论式的观点。那么，人类行动的结果如何能够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基础呢？一种基础是如何能够受到文化上的制约并且因而在时空上是狭隘的？多重文化的行动者又是如何能够不论人所共有的绝对本性而开始彼此之间的交往的呢？这里我们没必要让这些有限哲学的难题所阻碍，这些困难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这种黑格尔式的研究已经让位于哈贝马斯的新康德主义和后现代的相对主义。

然而，最近在法国，在一些坚定的非黑格尔主义的现代性研究者的工作中，这些悖论又出现了。在米歇尔·塞莱斯（Michel Serres, 1987）、拉陶（Bruno Latour, 1991）和奥古斯丁·贝克（Augustin Berque, 1990）的著作中，经验被看作是自然和文化要素的一种不可还原的“混合源物”（hybrid）。当然，他们的确保留了自然和文化的区别，但是他们既拒绝自然主义的，也拒绝社会学的还原论。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颠倒了区分的条件与它所贯穿其中的经验基础之间的普通关系。经验形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比组成它的“部分”更基本，而部分唯有事后通过拉陶所谓的“净化”实践才被认识。这种重新构造的经验本体论是否能够解决实践哲学悬而未决的难题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混合的现实

本书是一本关于技术和现代性，而不是关于本体论的著作，因此，我与其继续研究这些深奥的问题，到不如回到本章开头所涉及的现代和前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这一问题上。也许考察一下具有合理性的前现代方法将有助于在没有人类中心主义自我庆贺的条件下重新构建那种差异。

各种前现代社会并不需要一种实践哲学或一种结构主义社会学来告诉它们说，合理性的运用本质上总是社会的。与现代社会相比，前现代社会必然包含各自的合理因素，无论它是一种游戏，一种生产方法，一种交换，也无论它是在符号系统，神话和突出了社会依赖关系的仪式中。它们的技术过程天衣无缝地把各种自然客体从其原始的关系中抽象出来，在因果性原则的指导下把它们编进某种设计，并把它们放入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之中。对自然的抽象和社会的重新构造在这些社会中并不像它们在现代社会中那样看起来似乎是分开的，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以至不能够轻易地区别开来。我们将区分的各种实践的这种混合并不仅仅是更原始时代的一种局限，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是一种“差异性的缺乏”（lack of differentiation）。恰恰相反，它揭示了有关技术客体的一个重要真理，即它们像任何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人类的产物，是社会生活的方面，而且，它们不可避免地承载着文化的意蕴。

每一个社会都产生了一个人工制品的世界，除它们各种最简单的实践功能之外，它们扮演着各种社会角色并且代表了神话的或仪式的力量。只要人工制品依然比较简单并且技术上彼此无关，就象它们在现代之前普遍所具有的那样，那么，通过把它们分别地置入一种非-技术的符号框架内，它们就会在文化上被编码（Levi-Strauss, 1955 年，第 22 章；Guillaume, 1975 年，第 2 章）。工艺和艺术被结合在一种同时改变了世界和生产者的实践之中。人工制品获得了由设计特色、装饰物和与其他非-技术实践相联系的仪式等支撑的象征性的内涵。制造一件物品并不仅仅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工作”，而且是一种自我-生产和一种仪式表演。房子是房子，但它也是一种秩序的象征，建造它就明确表示建造者是共同体的一个成员；斧子是斧子，但它也是社会团体的图腾，因此制造它就明确表示制造者是一家之主，等等。（Bourdieu, 1972 年，第 3 章；Sharp, 1952: 69ff）

我称此为象征性的表达设计（symbolically expressive design），因为在这里，一种文化系统由其人工制品而表达出来。澳大利亚 Yir Yoront 部落中石斧的情况提供了有关这种设计的一个特别有启发性的例子。Yir Yoront 人处于石器时代，他们的技术极其简单，然而他们对他们的沙漠环境的适应却是十分有经验的。他们的主要工具，石斧，被用来砍柴、准备食物和建造栖身处。只有成年男子能够制造和拥有石斧，他们把石斧借给依赖于他们的妇女和儿童。斧头还是促使他们与其他部落建立联系的贸易循环的中枢，是在他们对宇宙的理解中起着某种作用的图腾。这里我们有了一个极为简单的人工制品，它不仅是各种技术任务，而且也是权威、性别、社会关系和信仰系统的媒介（Sharp, 1952）。

Yir Yoront 人的斧头是一种上面所讲的那种含义上的“混合源物”（hybrid）。这种部落人工制品的混合状况对那些制造和使用它们的人而言是完全清楚的。他们没有对它们的技术和符号特征进行理智论述的问题。和我们不同，他们从不对自然和文化是如何结合成一种独特而且偶然的结构感到惊讶。在某些我们的世界所不具备的方面上讲，他们的技术世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必然的，因此他们把他们的混合源物当作基本的现实来体验，而不是像我们那样把它们分解成抽象的自然和文化要素。

奇怪的是，我们这些现代人，我们这些具有如此的文化自我意识并且实际上已经以技术为中心来组织一切事物的现代人，却发现感知我们所创造的混合源物要困难得多。按照拉陶的说法，这归因于“现代构造”（Modern Constitution），也就是说，正是对现代性的基本的自我-理解使得技术的合理性与社会意义相分离（Latour, 1991:23ff）。人工制品不像它们在任何前现代社会那样被理解为各种统一体，这两个方面就是从这些统一体中抽象出来的，与此相反，它们被看作是现象的两个独立系列：手段和目的、事实和价值、功能和形式、自然和文化等的一种外在的结合。在这种体制下，合理性专注于完善每一对的前一项而不管对第二项的后果如何。

现代人工制品是如此的概念化，看来十分不同于前现代的人工制品，虽然拉陶坚决主张它们在本质上的确是非常相似的。差别是有差别，但并不在于取得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合理性，而在于与传统禁忌的决裂，以便把越来越多非人类的目的加入到社会过程中去，这些目的是：“螺旋式的伸展，它所带来的事物范围的扩大，并越来越持久地补充这些存在物”，总之，以系统或网络的形式构造技术（Latour, 1991:147）。这个过程需要容忍社会和符号超出通常的

前现代理智标准的改变。因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曾经以此打碎符号秩序的胆略，但它并不是巨大的认识论分裂的根据。

设计的类型

拉陶的许多论据是有说服力的，但是我怀疑他是否冒着使真正的差异变得模糊不清的风险而对把独特性（uniqueness）归因于西方的倾向作了过度的补偿。当问题的焦点转移到设计过程上时，这些便变得越来越清楚。从那个观点来看，显而易见的是，现代性的“构造”包括一种新的赋予技术以文化意义的方法，这种文化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旧的表达式的设计实践。我的观点是，现代技术唯有对我们而言才显得是“纯粹的”，因为虽然是以这种新的方法把价值授权给技术，而我们却用旧的方法考虑它。

各种技术实际上是如何取得广泛的文化内涵和意义的呢？有三种主要的方法：（1）修辞学的程序，它赋予它们以符号的意义，如神话或广告；（2）设计的特征，它把价值嵌入人工制品中；（3）与其他各种技术在一个网络中的互相联结，它强加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第一，各种修辞学的赋予是太熟悉了以至于不需要作太多的详尽论述。然而，在前现代的人把人工制品放在一种神话框架中的方法和现代广告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差异。传统的符号系统比较严格，它把分散和物质的生产不偏不倚地包括在一个严密继承下来的意义网络中。而另一方面，广告属于“想象”的领域，属于受组织控制或个人创新影响的词和物之间的随意联想，在任何情况下属于第三章所描述的那种转变的无序过程。在前现代的各种社会中，符号系统构造了想象，以及控制着它们无序可能性的技术合理性（Guillaume, 1975:29）。随着向现代性转变过程中那种系统的崩溃，想象接管了它的许多功能。Yir Yoront 人的斧子和男性权威形成了一种符号上不可分的一致性，但是铁斧却是非代码的并可获得多样的和可操纵的意义。

第二，通过固有的设计特征而对人工制品的价值渗入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最显著的是，它包括我们认为是装饰的事物，例如，象征着诸如威望或人的力量这些值得向往的品质的设计。然而，一种“装饰”就是对一种原始功能的美学补充，而这种补充性（supplementarity）从特征上讲是现代的。前现代社会中生产和装饰的统一反映了对人工制品以及它们的生产仪式的严格彻底的符号编码。因此，人工制品本身看来并不是“本质上”就是功能性的，而是贯穿于我们“分化的”社会一切界限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符号性的体现。美学的概念，至少在其设计运用中，是我们的这种根本社会体现的贫乏的版本。

还有第二种也是更精巧的把文化价值授权给人工制品的方法：一种表现出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能够被设计进人工制品的面向实践的倾向。通过相互竞争的技术之间的对比，这种倾向也许惟一成为清楚明了的。那时人们才开始理解假使实践受到社会符号框架的促动，为什么特殊的技术选择是必要的。

日本在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期间轻武器奇怪衰微的故事说明了这个过程。日本贵族面临着在两种十分不同的屠杀技术，枪和剑之间进行选择。一旦国家统一，屠杀就不再主要是数量问题，而是种类更多的能够影响武器的技术决定的实践和价值。贵族阶层对剑的优先选择因而变得清清楚楚。枪是一种不需要什么训练的平民武器，但这样也许可能改变社会的阶级平衡。但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在一个个战士只有通过战场才能获得荣耀，战斗被设定为代表了家族传统勇气的世界中，射击是与人力无关的。甚至各种与文雅举止有关的身体姿态也与用枪的姿态不相容（Perrin, 1979）。枪在这种环境中的失败反映出一种枪在其中完全没有位置的实践系统的严格约束。

价值在技术中得以实现的第三种方法对我们来说难以觉察得多，因为它既被我们的现代“构造”赋予了特权，又被它所遮蔽。构造是具有复杂联结的技术网络或系统，它看起来似乎是价值-中立的，但实际上当我们在我们的日常行动中适应它时，它便把我们引导进一种规范

框架。无止境的一系列依赖关系正产生于我们所使用的每一件事物，从原珠笔到汽车，从罐装辣椒到计算机，还包括我们。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每一种姿态都由我们的人工制品严格地程序化了，这种严格在各种前现代社会中是没有先例的。的确，其中只有符号系统能够决定生活方式，在一个多样性的文化系统中，技术是十分灵活可变的并且因此为我们所用。

我在第四章中探讨了价值和技术的这第三种关系的政治层面。汽车在这里是能够让人想起这种设计特征的典型事例。汽车、都市化、石油工业、生产和消费系统，还有我们最近所看到的国防工业，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支配着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系统。人们徒劳地寻找着一个准确的位置，在那里，具有价值意义的因素能够被找出来强加到这个上油均匀的机器上去。系统还毋庸置疑地衔接着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反映了经由这些技术才能变成现实的实践。

这三种表示和指称技术的方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们通常在把相对单一的意义分配给技术客体时共同发挥着作用。通过修辞学的程序、装置和系统的内在特征、网络和谐等的结合，技术总是已经被赋予了美学的、伦理的和文化价值的色彩。随着现代性出现而发生变化的是这些决定性因素之间的比例。

现代技术缺乏许多由传统工艺传递给前现代的人工制品的象征性的丰富性，因为美学规范不再被系统地嵌置于个人的装置本身之中。正如拉陶所指出的，伦理的授权在继续着，但是这些伦理授权被理解为功能，并理所当然地被这样理解，而它们的规范性质却被系统地忽略了。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好象我们的机器在技术上是单纯的、合理的，被剥离得只剩下纯粹的因果关系。对常识而言，这种合理性显然不同于情感、意向和意义这些被标明是主观性的东西。同时，许多通常经由表达性设计而体现到客体中去的符号功能被驱逐出了合理性并且通过广告被重新定位于主观意见的范围之中。

然而，尽管在现代技术的设计中有这种重要的转变，我们依然倾向于在思想中把每一个技术客体孤立起来，似乎它是一种独立的事物。在传统人工制品的情况下，那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那建立在简单的技术原则基础之上，但是，现代技术特殊的正确性和精确性，这允许技术组织为一个系统，意味着设计主要在于使每个人工制品“适应”整体。强加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是系统，而不是个别的装置。复杂的现代技术的意义正在于各种关系。我将称创造这些关系的工作为技术性适应设计（technically congruent design）。

在海德格尔的现代技术批判中这种区分被神话化了。海德格尔把希腊工匠制造一只圣杯的虔诚的工作与一座现代水坝对莱茵河的破坏性的占用进行对比。通过依照形式象征性地进行的物质再加工，工匠显示了他的材料的“真理”。现代技术专家消除了他的材料的内在潜能，使它们“离世”（de-worlds），并且向自然“挑战”以适应他有条有理地计划和控制的系统（Heidegger, 1977: 7-17）。在这种“框架”（enframing, Ge-stell）中，起支配作用的不是人，而是纯粹的工具；存在并不仅仅在人类目的中，而且也在一种特殊的方法中显现自己，这是一种使得整个问题模糊不清的方法，海德格尔在著作中强调了这个问题，即，存在在世界中的显现。

我认为，海德格尔指出的正是从建立在表达性设计基础上的文化系统向建立在适应设计基础上的文化系统的转变。那样的转变是有代价的，的确，它涉及到一个世界的毁灭。日本贵族知道要及时抗拒的正是这种毁灭的过程。Yir Yoront 人就没那么幸运。劳里斯顿·夏普（Lauriston Sharp）描述了铁斧由传教士的免费分发破坏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当女人和儿童从传教机构那里得到斧子时，男性失去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在无等级区分的铁斧面前，部落内部的关系瓦解了，部落图腾崇拜的世界观崩溃了。一种自身没有符号意义的简单工具通过把那种文化的成员吸引到工业系统的周围而摧毁了一种完整的文化（Sharp, 1952）。

和哈贝马斯一样，海德格尔看来想在技术中找一种穷尽其社会意义的、普遍的工具性的本质。毫无疑问，他们将在 Yir Yoront 人的故事中发现那种意义。但我看到的却是更带有种族中心主义的解释。Yir Yoront 人不是对自然的工具性控制“过程”中的受害者，他们对他们的特殊的自然部分——澳大利亚沙漠的工具性控制已经达到了这样高的程度，以至于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够希望比得上他们。例如，他们能够在不带水的情况下生存数周。当然，这种原始的

控制形式主要是个人的。为了展示西方人的进步，人们必须把控制的标准从个人转换到以技术为中介的团体。那样的转换对现代西方文化而言自然是明确的，但它并不能说就具有普遍性。一旦控制自然的观念被相对化了，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一种十分特别的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胜利的故事。这也将是在日本引进枪的结果，后来在那里发生的的确是这个状况。

对技术作具体的社会研究并没有显示纯粹工具性的宏大叙事穿过了无知和传统的屏障。更确切地说，它发现适应性设计到处都在完成许多前现代社会通过表达性设计所完成的同样的工作，例如，技术客体被完全调整为适应一种特殊的文化，西方的文化。那种文化的全球性胜利与其说是由较高的合理性造成的，不如说是由政治和军事力量在适应性设计所构造的长期网络中奇怪的积累造成的。这里，存在着一个不是相对主义所能小看的真正的不对称现象。各种绝对的标准在控制人类存在的斗争中衡量着胜利和失败。殖民主义曾经让我们知道了这些标准：丧失民族和文化的独立性，丧失个性，丧失时机和资源。

从统一到多样化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就不是理性的、普遍的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就不是无法超越的技术可能性的地平线。然而，它的确具有也许可以被称作“实践普遍性”（practical universality）的东西，“实践普遍性”已经在全球范围施加着它的影响。没有一个现代社会能够走在诸如抗生素、塑料或电之类的基本技术发明之前，没有人能够脱离世界范围的通讯网络。走完全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了（Rybczynski, 1983: 第 5 章）。但是，就迄今为止的发展主线而言，有意义的创新是可能的。

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出于不同的目的来进入实践普遍性的知识领域。它首先出现在裹着特殊的技术和合理系统防护罩的西方。今天，随着西方霸权的衰弱，已经采纳了现代技术的各种各样文化的不同条件可以提供这样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重新打开了已经遗忘了的通往进步的道路，或者发现新的寻求局部适应的替代事物的道路。

这种转变的范围和意义具有巨大的潜力。技术选择建立了日常生活的范围。这些选择确定了一个在其中我们把特殊的替代看作目的、目标、用途和出场（emerge）的“世界”。它们还确定了在各种替代之间进行选择的主体：我们在通过技术创造世界之中创造我们自己。因此，根本的技术转变是自我-相关的（self-referential）。成为问题的是形成（becoming），而不是拥有（having）。目的是确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丰富的理想和一种人类类型，而不是按照流行的社会-经济模式获得更多的商品。

但是，新的不同的方向在技术上可能吗？有一种陈腐的观点认为，随着现代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它的结构会越来越多地遏制未来的发展，最终接近一种决定论的系统。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在道路的关键性的转折点上，在系统内部展现了新的自由度。公共干预有时成功地中止了正在发展的各种技术或者改变了它们的发展方向。宿命论是错误的，因为技术在本质上讲是待确定的，受到各种各样的要求和限制的干扰，新的因素以各种难以预料的变化顺序添加到这些要求和限制中去。

技术专家们自己用具有他们普遍没有意识到的社会意义的语言讨论这些问题。在日常的技术运用中，与那些局限于单一功能的设计相比，实现了的多样性的用途被称为是“优雅的”。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 Simondon），法国技术哲学家，更确切地把这种观念定义为“具体化”（concretization）。按西蒙顿的意思，当客体中一种单一的、巧妙构思的结构满足了许多不同功能的要求，技术就是“具体的”（Simondon, 1958: 第 1 章）。西蒙顿提供了像在柴油发动机中除去火花塞这样显然是中性的例子，它使用燃烧的能量不仅仅是为了功率，也为了循环地点火。

只要各种功能被追溯到人性或其他一些非-社会的根源，这种观察就只具有狭窄的技术上的重要性。但是结构主义现在已经表明，支撑着功能的是社会集团。因此，在把许多功能统一

到一个单一结构过程中，具体化的创新并不简单地提供技术改进，它们把许多社会集团集中到人工制品或人工制品的系统周围。“优雅”和“具体化”并不仅仅涉及效率上的改进，而且还涉及把技术安置在多样的立场和抱负的交叉点上。效率也许事实上增加了，但新的社会集群也随技术的转变而一前一后地发展了。

本书中所讨论的实验医学和可视图文的例子阐明了这个过程。在每一种情况下，技术系统都由科学-技术精英来构思和实施以回应它所喜欢的那套功能要求。那种出发点构成了一个初始的功能层次，这个功能层次或早或晚都会在思想上遇到来自具有其他观念的公众的抵抗。抵抗采取的形式就是通过在它的边界上使创新具体化从而把技术系统合并到另一套功能要求中去。因此，通过在同样的结构中调和一些不同类型的功能，第二个层次就被加到第一个层次上，而不是取代它。实验和治疗，信息和通讯，就在一个多功能的系统中得到了统一。在现代技术基础的民主的重建中，这种具体化策略的扩展原则上是有限度的。

科技创造是和交替的世界和存在方式玩的一种想象的游戏。多重文化的技术政治学是可能的，它将寻求在每一个装置和系统中调和几个世界的优良设计。就这种策略是成功的这一点而言，它准备了一个与迄今为止社会理论所设计的未来十分不同的未来。在那样的未来，技术不是一种人们必须选择赞同或反对的特殊价值，而是一种没有止境的使世界得以发展和多样化的挑战。

参考书目

- Abe, Masao (1988). "Nishida's Philosophy of 'Place'."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28, no. 4.
- ACT UP (1989). *A National AIDS Treatment Research Agenda*. New York: ACT UP.
- Adler, H. M., and Hammett, V. B. O. (1973).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Revisited: An Analysis of the Placebo Effect."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vol. 78.
- Amin, Samir (1989). *Eurocentrism*. Trans. R. Moo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Arisaka, Yoko (1993). "Haiku, Nishida, and Heidegger: Toward a New Metaphysics of Experience." Manuscript.
- Arnason, Johann (1992).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manuscript.
- Asimov, Isaac (1972a). *The Caves of Steel*. New York: Fawcett Crest. Originally published 1953.
- (1972b) "The Dead Past." In *Beyond Control*, ed. R. Silverberg. New York: Dell. Originally published 1956.
- Avina, Robert and Schneiderman, Lawrence (1978). "Why Patients Choose Homeopathy." *Western Journal of Medicine*, vol. 128, no. 4.
- Bainbridge, William (1986). *Dimensions of Science Fi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 Baltz, Claude (1984). Gréteil: un nouveau média de communication. In *Télématique: promesses dans les usages*, ed. Marie Marchand and Claire Ancelin. Paris: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Bates, Harry (1946). "Farewell to the Master." In *Adventures in Time and Space*, ed. R. Healy and J. F. McComa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Originally published 1940.
- Barinaga, Marcia (1988). "Placebos Prompt New Protocols for AIDS Drug Testing." *Nature*, vol. 335, no. 6.
- Baudrillard, Jean (1968). *Le Système des Objets*. Paris: Gallimard.
- Bell, Daniel (1973).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nedetto, André (1966). *Urgent Crier*. Basses-Alpes, France: Robert Morel.
- Benedikt, Michael (1968). "Alphaville and Its Subtext," In Jean-Luc Godard, ed. T. Mussman. New York: E.P. Dutton.
- Benjamin, Walter (1969).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1978). "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Reflections*, ed. P. Demetz, trans. E. Jephcot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Berman, Marshall (1982).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Bernard, Jean (1978). *L'Espérance ou le nouvel état de la médecine*. Paris: Buchet/Chastel.
- Bernstein, Jay (1984). *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 Lukács, 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erque, Augustin (1986). *Vivre l'Espace au Japo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1990). *Médiance: de milieux en paysages*. Paris: Reclus.
- Bertho, Catherine (1981). *Télégraphes et Téléphones: de Valmy au Microprocesseur*. Paris: Livre de Poche.
- Bester, Alfred (1956). *The Stars My Destina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 Bidou, Catherine, Marc Guillaume, and Véronique Prévost (1988). *L'Ordinaire de la télématique: offre et usages des services utilitaires grand-public*. Paris: Editions de l'Iris.
- Bijker, Wiebe, Thomas Hughes, and Trevor Pinch, eds (1990).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 MIT Press.
- Bijker, Wiebe and John Law, eds (1992).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Cambridge: MIT Press.
- Bloor, David (1991).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rges, Jorge Luis (1964). "The Theologians," trans. J.E. Irby. In *Labyrinths*, ed. D.A. Yates and I.E. Irby.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 Borgman, Albert (1984).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 Bourdieu, Pierre (1972). *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Geneva and Paris: Librairie Droz.
- (1981). "La représentation politique: Elements pour une theories du champs polit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o. 36-37.
- Branscomb, Anne (1988). *Videotext: Global Progress and Comparative Polic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38, no.1.
- Bridgman, P.W. (1948) "Scientist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4, no.3.
- Briole, Alain and Adam-Franck Tyar (1987). *Fragments des Passions Ordinaires: Essai sur le Phénomène de télésociabilité*.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Brody, Howard (1980). *Placebos and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ossat, Sylvia and Pinell, Patrice (1990). "Coping with Parents." *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 Bruhat, Thierry (1984). *Messageries Electroniques: Grétel a Strasbourg et Teletel a Vélizy*. In *Télématique: Promenades dans les Usages*, ed. Marie Marchand and Claire Ancelin.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Buchanan, Denton (1975). "Group Therapy for Kidney Transplant Pati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iatry in Medicine*, vol. 6., no. 4.
- (1978). "Group Therapy for Chronic Physically Ill Patients." *Psychosomatics*, vol. 19, no. 7.
- Burke, John (1972). "Bursting Boilers and the Federal Power," in M. Kranzberg and W. Davenport, ed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 Caillois, Roger (1955). "Les jeux dans le monde moderne," in *Profils*, no. 13.
- Cambrosio, Alberto and Limoges, Camille (1991). "Controversies as Governing Processes in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3, no. 4.

- Carter, Robert (1989). *The Nothingness Beyond Go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Nishida Kitaro*. New York: Paragon House.
- Cassileth, R., Lusk, E.J., Miller, D.S., Hurwitz, S. (1982). "Attitudes Toward Clinical Trials among Patients and the Public."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vol. 248.
- Caufield, Catherine (1989). *Multiple Exposure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 de Certeau, Michel (1980).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Paris: UGE.
- Chabrol, J.L. and Perin, Pascal (1989). *Usages et Usagers du Vidéotex: Les Pratiques Domestiques du vidéotex en 1987*. Paris: DGT.
- Chafetz, Morris, Bernstein, N., Sharpe, W., Schwab, R (1955). "Short-Term Group Therapy of Patient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 253, no. 22.
- Charles, Allan, K. Norr, C. Block, S. Meyering, E. Meyers, "Obstetric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Psychoprophylactic Preparation for Childbirth,"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May 1, 1978.
- Charon, Jean-Marie and Cherky, Eddy (1983). *Le Vidéotex: Un Nouveau Média Local: Enquete sur l'Experimentation de Vélizy*. Paris: Centre d'Etud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 Charon, Jean-Marie (1987). *Teletel, de l'interactivité homme/machine a la communication médiatisée*. In *Les Paradis Informationnels*, Marie Marchand, (ed.). Paris: Masson.
- Clarke, Arthur C. (1967). *Voices from the Sky*. New York: Pyramid Books.
- (1953, 1956). *The City and the Sta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1972). *Childhood's End*.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 Condon, Edward U. (1969). *Scientific Study of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s*. New York: Bantam Books.
- Crowley, James (1971). "Intellectuals as Visionaries of the New Asian Order." *Dilemmas of Growth in Prewar Japan*, J. Morley,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 Cummings, Bruce (1989). "Japan's Posi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 System: Regionalism, the Korean War, and the Dawning 'Post-Postwar' Era." Manuscript.
- Curran, William (1969). "Govern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Use of Human Subjects in Medical Research: The Approach of Two Federal Agencies. Ethical Aspects of Experimentation with Human Subjects.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 Dale, Peter (1986). *The Myth of Japanese Uniquenes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Darnovsky, Marcy (1991). "Overhauling the Meaning Machines: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 *Socialist Review*, vol. 21, no. 2.
- Derrida, Jacques (1972). "Signature Événement Contexte" in his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Détienne, Marcel and Vernant, Jean-Pierre (1974). *Les Ruses de l'Intelligence: La Métis des Grecs*. Paris: Flammarion.
- Dick, Philip K. (1973). *Ubik*. Frogmore, St. Albans: Panther.
- Dordrick, Herbert, et. al. (1979). *The Emerging Network Marketplace*.
- Dore, Ronald (1987). *Taking Japan Seriousl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 Stanford Univ. Press.
- Eco, Umberto (1984). *The Role of the Read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 Ellul, Jacques (1964).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J. Wilkinso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 Endo, Shusaku (1980). *When I Whistle*, V. C. Gessel, trans. New York: Taplinger.
- Epstein, Steven (1991). "Democratic Science? AIDS Activism and the Contested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Socialist Review*, vol. 21, no. 2.
- Ettema, James (1989). *Interactive Electronic Text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Videotex Ever Go Home Again?* In *Media Use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J.C. Salvaggio and J. Bryant (ed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Ewen, Stuart (1976).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McGraw Hill.
- Feenberg, Andrew and Arisaka, Yoko (1990). "Experiential Ontology: The Origins of the Nishida Philosophy in the Doctrine of Pure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30, no. 2.
- Feenberg, Andrew (1988a). "Fetishism and Form: Erotic and Economic Disorder in Literature," in P. Dumouchel, ed., *Violence and Truth*.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 (1988b). "Technique or Praxis: The Question of Organization in the Early Marxist Work of Lukács." *Lukács Today*, T. Rockmore, ed. Amsterdam: Reidel.
- (1989a). "A User's Guide to the Pragmatics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Semiotica*, Vol. 75, nos. 3/4.
- (1989b). *The Written World*. In A. Kaye and R. Mason, eds. *Mindweave: Communication, Computers, and Distance Educa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 (1991).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New York: Oxford.
- (1992). "Subversive Rationalization: Technology, Power, and Democracy," *Inquiry*, vol. 35, nos. 3/4, 1992.
- Fischer, Claude (1988a). "Touch Someone": The Telephone Industry Discovers Sociabilit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29.
- (1988b). *Gender and the Residential Telephone, 1890-1940: Technologies of Sociability*. *Sociological Forum* 3(2).
- Florman, Samuel (1981). *Blaming Technolo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Fletcher, R. H., O'Malley, M. S., Earp, M. S., Littleton, B. A., Fletcher, S. W., Greganti, A., Davidson, R. A., Taylor, J. 1983. "Patients' Priorities for Medical Care." *Medical Care*, vol, 21.
- Forty, Adrian (1986). *Objects of Desire*. New York: Pantheon.
- Foucault, Michel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A. Sheridan,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 (1980). *Power/Knowledge*, C. Gordon,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 Fox, Renée (1959). *Experiment Perilou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Freedman, Benjamin (1975). "A Moral Theory of Consent." *Hastings Center Report*, no. 5.
- Freidson, Eliot (1970). *Profession of Medicine: A Study of the Sociology of Applied Knowledg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Freud, Sigmund (1961).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J. Strachey, trans. New York: W.W. Norton.
- Gibson, William (1984). *Neuromancer*. New York: Berkeley.

- Giraud, Alain (1984). *Une Lente Emergence*. In *Télématique: Promenades dans les Usages*, Marie Marchand et Claire Ancelin (eds.).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Giraudoux, Jean (1935). *La Guerre de Troie N'Aura Pas Lieu*. Paris: Grasset.
- Glaser, Barney and Strauss, Anselm (1965). "Awareness of Dying." Katz, Jay. 1972. *Experimentation with Human Beings*. New York: Russell Sage.
- Goffman, Erving (1961).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New York: Bobbs-Merrill.
- (1982). *Interaction Ritual*. New York: Pantheon.
- Goldman, Eric (1961). *The Crucial Decade*. New York: Vintage.
- Gossman, Lionel (1971). "Literary Education and Democracy," *Modern Language Notes*, vol. 86, no. 6.
- Goyan, Jere (1988). "Drug Regulation: Quo Vad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vol. 260, no. 20.
- Greenberg, Daniel (1967). *The Politics of Pure Scienc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 Guillaume, Marc (1975). *Le Capital et son Doub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1982). "Telespectres." *Traverses*, no. 26.
- (1986). *La Contagion des Passions*. Paris: Plon.
- Habermas, Jurgen (1970).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J. Shapiro, trans. Boston: Beacon.
- (1984, 1987).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2 vols.,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 (1991a).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 Burger, tr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91b). "A Reply," in *Communicative Action*, Honneth, A., and Joas, H. eds., trans. J. Gaines and D. Jon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92)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Public Sphere,"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 Calhoun, 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amamoto, Darrell (1989). *Nervous Laughter: Television Situation Comedy and Liberal Democratic Ideology*. New York: Praeger.
- Haraway, Donna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1992). "The Promise of Monsters: A Regenerative Politics for Inappropriate/d Others," *Cultural Studies*, L. Grossberg, C. Nelson, and P. Treichler, eds. New York: Routledge.
- Harding, Sandra (1993). *The "Racial" Economy of Science: Toward a Democratic Futur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 Press.
- (1994). "Is Science Multicultural? Challenges, Resources, Opportunities, Uncertainties." *Multiculturalism: A Reader*, D. T. Goldberg, ed. London: Basil Blackwell.
- Harootunian, H.D. (1989). "Visible Disources/Invisible Ideologies." *Postmodernism and Japan*. Masao Miyoshi and H. D. Harootunian, eds.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artings, Michael, Pavlou, M. and Davis, F. (1976). "Group Conseling of MS Patients in a Program of Comprehensive Care." *Journal of Chronic Disease*, vol. 29.

- Heidegger, Martin (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W. Lovitt, tran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Herf, Jeffrey (1984). *Reactionary Modernism: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Herrigel, Eugen (1960). *Zen in the Art of Archery*, trans. R.F.C. Hul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Hiromatsu, Wataru (1990). <Kindai no Chokoku> Ron ("Theories on 'Overcoming Modernity'"). Tokyo: Kodansha.
- Hiromatsu, Wataru, Asada, Akira, Ichikawa, Hiroshi, Karatani, Kojin (1989). "Kindai no Chokoku to Nishida Tetsugaku" ("Overcoming Modernity' in Nishida's Philosophy"). *Kikanshicho*, vol. 4.
- Honneth, Axel (1991). *The Critique of Power: Reflective Stages in a Critical Social Social Theory*, K. Baynes, tra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Hoyle, Fred (1968). *Ossian's Ride*. New York: Berkley.
- Huh, Woo-Sung (1990).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Later' Nishida: A Philosophic Turn." *Philosophy East & West*, vol. 40, no. 3.
- Ihde, Don (1990).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 Press.
- Illich, Ivan. 1976. *Medical Nemesis*. New York: Pantheon Press.
- Ingelfinger, F. J. (1972). "Informed (But Uneducated) Consent."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vol. 287, no. 9.
- Iwaasa, Raymond-Stone (1985). *Télématique grand public: l'information ou la communication? Les cas de Grétel et de Compuserve*. *Le Bulletin de l'IDATE*, no. 18.
- James, William (1943). *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 and A Pluralistic Universe*. Longman's, Green and Co.
- (1952).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 Jameson, Frederic (1973). "Generic Discontinuities in SF: Brian Aldiss' *Starship*."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Fall, 1973.
- Jonas, Hans (1969).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Experimenting with Human Subjects." *Ethical Aspects of Experimentation with Human Subjects*.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 Jouet, J. and Flichy, P. (1991). *European Telematics: The Emerging Economy of Words*, D. Lytel, trans. Amsterdam: Elsevier.
- Kane, Robert, Olsen, D., Leymaster, C., Woolley, F. (1974). "Manipulating the Patient: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hysician and Chiropractor Care." *The Lancet*, June 29.
- Katz, Elihu (1980). "Media Events: The Sense of Occasion," *Studie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6.
- Kawabata, Yasunari (1969). *Japan, The Beautiful and Myself*, E. Seidensticker, trans. Tokyo and Palo Alto: Kodansha.
- (1981). *The Master of Go*, E. Seidensticker, trans. New York: Perigree.
- Kazashi, Nobuo (1993). *Four Variations on the Phenomenological Theme of 'Horizon': James, Nishida, Merleau-Ponty, and Schutz*. Doctoral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 Kevles, Daniel (1979). *The Physicist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Kolata, Gina (1989). "AIDS Researcher Seeks Wide Access to Drugs in Tes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6, 1989.

- Korschelt, Oscar (1965).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 S. King and G. Leckie, trans. and eds. Rutland, Vermont: Charles E. Tuttle.
- Koyama, Iwao (1935). *Nishida Tetsugaku*. Tokyo: Iwanami Shoten.
- Kuttner, Nancy (1978). "Medical Students' Orientation Toward the Chronically Ill." *Journal of Medical Education*, vol. 53.
- Ladd, John (1980). "Medical Ethics: Who Knows Best?" *The Lancet*, Nov. 22.
- Latour, Bruno (1987). *Science in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 (1991). *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 Paris: La Découverte.
- (1992). "Where Are the Missing Masses? The Sociology of a Few Mundane Artifacts," in Bijker, W. and Law, J., eds.,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Lavelle, Pierre (1994).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Nishida Kitaro," *Monumenta Nipponica*.
- Leguin, Ursula (1973). *The Lathe of Heaven*. New York: Avon Books.
- Lem, Stanislaw (1974). *The Futurological Congress*.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1984). *Microworld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Lévi-Strauss, Claude (1955). *Tristes Tropiques*. Paris: Plon.
- (1963). "Réponse à Quelques Questions," *Esprit*, Novembre 1963.
- 1968.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Trans. by C. Jacobsen and B. G. Schoepf. New York: McGraw Hills.
- Lidz, Charles, Meisel, J. D., Osterweis, M., Holden, J., Marx, J., Munetz, M. (1983). "Barriers to Informed Consent."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vol. 99, no. 4.
- Löwy, Ilana (1987). "Choix scientifiques et choix ethiques dans le traitement de la maladie rénale terminale," *Information sur les Sciences Sociales*, vol. 26, no. 3.
- Loy, David (1988). *Nonduality: A Study i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 Lukács, Georg (1965). *Theorie des Romans*. Neuwied und Berlin: Luchterhand.
- (1968).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A. Bostock, tra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Lyotard, Jean François (1979).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1991a). *The Inhum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 (1991b).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 Bennington and B. Massumi.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 Mackillop, William and Johnston, Pauline (1986). "Ethical Problems in Clinical Research: The Need for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Clinical Trial Process," *Journal of Chronic Disease*, vol. 39, no. 3.
- Macpherson, C. B. (1973). *Democratic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archand, Marie (1984). *Conclusion: Vivre avec le Videotex*. In *Télématique: Promenades dans les Usages*, Marie Marchand et Claire Ancelin (eds.).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1987). *La Grande Aventure du Minitel*. Paris: Larousse.
- (1988). *A French Success Story: The Minitel Saga*, trans. Mark Murphy. Paris: Larousse.
- Marcuse, Herbert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con.

- (1966). "The Individual in the Great Society." *Alternatives Magazine*, March-April.
- (1968). *Negations*, J. Shapiro, trans. Boston: Beacon.
- (1969).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Beacon.
- (1972).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Beacon.
- (1992). "Ecology and the Critique of Modern Societ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 Marin, Louis (1978). *Le Récit est un Pièg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 Marwick, Charles (1987). "Proposal to Make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s Available Without Clinical Trial Participation in Certain Cases is Receiving Mixed Respons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vol. 257, no. 22.
- (1988). "FDA Seeks Swifter Approval of Drugs for Some Life-Threatening or Debilitating Diseas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vol. 260, no. 20.
- Marx, Karl (1906). *Capital*, E. Aveling, tra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 Mayntz, Renate and Schneider, Volker (1988). "The Dynamics of System Development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active Videotex in Germany, France and Britain."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Technical Systems*, Renate Mayntz and Thomas Hughes (ed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McCarthy, Thomas (1991). "Complexity and Democracy: or the Seductions of Systems Theory." In Honneth, A., and Joas, H. eds. (1991).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 J. Gaines and D. Jon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McLuhan, Marshall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 Hill.
- Merrill, Judith (1971). "What Do You Mean? Science? Fiction?" *SF: The Other Side of Realism*, T. Claeson, ed.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Univ. Popular Press.
- Miller, Roy Andrew (1971). "Levels of Speech (keigo) and the Japanese Linguistic Response to Modernization," in D. Shively, ed.,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Japanese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iyoshi, Masao (1989). "Against the Native Grain: The Japanese Novel and the 'Postmodern' West," in *Postmodernism and Japan*. Masao Miyoshi and H. D. Harootunian, eds. Duke University Press.
- Morley, James, (1971). "Introduction: Choice and Consequence," in *Dilemmas of Growth in Prewar Japan*, J. Morley,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 Morone, Joseph and Woodhouse, Edward (1989). *The Demise of Nuclear Energy?*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 Najita, Tetsuo and Harootunian, H.D. (1988). "Japanes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P. Duus, e.d., vol. 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 Nakamura, Yujiro (1983). "Nishida: Le Premier Philosophe Original au Japon". *Critique*, vol. 39, nos. 428-429.
- Nakane, Chie (1970). *Japanese Societ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Nietzsche, Friedrich (1969).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nd Ecce Homo*, W. Kaufmann, trans. New York: Vintage.
- Nishida Kitaro (1958a). "The Problem of Japanese Culture." In *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Volume II. Ed. and Trans. W. T. de Bary. Columbia Univ. Press.

- (1958b). *Intelligibility and the Philosophy of Nothingness*, R. Schinzing, trans.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Press.
- (1965a). *Zen no Kenkyu*. Nishida Kitaro Zenshu, vol. 1. Tokyo: Iwanami Shoten.
- (1965b). "Rekishu Tetsugaku ni Tsuite"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ishida Kitaro Zenshu, vol. 12. Tokyo: Iwanami Shoten.
- (1965c). "Sekai Shin Chitsujō no Genri" ("The Principle of New World Order"). Nishida Kitaro Zenshu, vol. 12. Tokyo: Iwanami Shoten.
- (1965d). "Nihonbunka no Mondai" ("The Problem of Japanese Culture"). Nishida Kitaro Zenshu, vol. 12. Tokyo: Iwanami Shoten.
- (1965e). "Nihonbunka no Mondai" ("The Problem of Japanese Culture"). Nishida Kitaro Zenshu, vol. 14. Tokyo: Iwanami Shoten.
- (1965f). "Watakushi no Tachiba Kara Mita Hegel no Benseihō" ("My Standpoint Toward Hegel's Dialectic"). Nishida Kitaro Zenshu, vol. 12. Tokyo: Iwanami Shoten.
- (1965g). "Shokanshu" ("Collection of Letters"). Nishida Kitaro Zenshu, vol. 19. Tokyo: Iwanami Shoten.
- (1970).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Philosophy*. Trans. D. Dilworth. Tokyo: Sophia Univ. Press.
- (1987). *Last Writings: Nothingness and the Religious Worldview*. D. Dilworth, trans.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ress.
- (1990). *An Inquiry into the Good*. Trans. of Zen no Kenkyu by Masao Abe and Christopher 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Nishitani, Keiji (1982). *Religion and Nothingness*. Trans. J. Van Bragt.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 (1991). Nishida Kitaro. Trans. Y. Seisaku and J. Heisig.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Nora, Simon and Minc, Alain (1978). *L'informatisation de la société*.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 Norman, Donald (1988). *The Psychology of Everyday Things*. New York: Basic Books.
- Nuckolls, Katherine, Cassel, J., Kaplan, B. (1972). "Psychosocial Assets, Life Crisis and the Prognosis of Pregnancy."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vol. 95, no. 5.
- Ohashi, Ryosuke (1990). *Die Philosophie der Kyoto-Schule: Texte und Einführung*. Freiburg: Karl Albers Verlag.
- (1992). *Nihonteki na mono, Yōroppateki na mono* (What is Japanese, What is European?). Tokyo: Shincho Sensho.
- Ong, Walter (1971). "The Literate Orality of Popular Culture Today," in *Rhetoric, Romance, and Technolog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77). "From Mimesis to Irony," in *Interfaces of the Worl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Oppenheimer, J. Robert (1955). *The Ope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Parkes, Graham (1992). "Heidegger and Japanese Thought: How Much Did He Know, and When Did He Know It?" Heidegger: Critical Assessments, C. Macann, ed. New York: Routledge.
- Parsons, Talcott (1964).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1969). "Research and the Professional Complex." *Ethical Aspects of Experimentation with Human Subjects*.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Perrin, Noel (1979). *Giving Up the Gun*. Boston: David R. Godine.

Petersen, Gwenn (1979). *The Moon in the Water: Understanding Tanizaki, Kawabata, and Mishima*. Honolulu: Univ. of Hawaii.

Pigeat, Henri, et. al. (1979). *Du Téléphone a la Télématicque*. Paris: Commissariat General Au Plan.

Pilarcik, Marlene (1986). "Dialectics and Change in Kawabata's Master of Go," in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vol. 16, no. 4.

Pinch, Trevor and Bijker, Wiebe (1984).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 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it Each Othe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14, 1984.

Pinch, Trevor, Hughes, Thomas, and Bijker, Wiebe (198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ippin, Robert (1991). *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95). "On the Notion of Technology as Ideology: Prospects," in *Techn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 Feenberg and A. Hannay, ed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 Press.

Poster, Mark (198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wles, John (1973). "On the Limitations of Modern Medicine." *Science, Medicine and Man*, vol. 1.

Rabinowitch, Eugene (1960). "Pushing Back the Clock of Doom." *The Atomic Age*, M. Grodzins and E. Rabinowitch, ed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Reidenberg, Marcus (1987). "Should Unevaluated Therapies be Available for Sale?" *Clinical Pharmacology and Therapeutics*, vol. 42, no. 6.

Reisman, D., Glazer, N., Denney, R. (1953). *The Lonely Crowd*. New York: Doubleday.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Orphan Diseases (1989).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Health, U.S. Dep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Ricoeur, Paul (1979). *The Model of the Text: 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 In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Reader*, P. Rabinow and W. Sullivan (eds.).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Rybczynski, Witold (1985). *Taming the Tiger*.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de Saint-Just, Louis-Antoine (1968). *Oeuvres Choiesies*. Paris: Gallimard.

Sakai, Naoki (1989) "Modernity and Its Critique: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Postmodernism and Japan*. Masao Miyoshi and H. D. Harootunian, eds. Duke University Press.

Santayana, George (1926). *Winds of Doctrin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and Sons.

Schivelbusch, Wolfgang (1988). *Disenchanted Light*, A. Davies,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udson, Michael (1984). *Advertising: The Uneasy Persuas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Shapiro, Arthur and Morris, Louis (1978). "The Placebo Effect in Medical and Psychological Therapies." S. L. Garfield and A. E. Bergin (eds.), *Handbook of Psychotherapy and Behavior Chang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Sharp, Lauriston (1952). "Steel Axes for Stone Age Australians," in *Human Problems in Technological Change*, E. Spicer, ed. New York: Russell Sage.

Shimomura, Torataro (1966). "The Modernisation of Jap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hilosophy," *Philosophical Studies of Japan*, vol. VII.

Simak, Clifford (1952). City. New York: Ace Books.

Simondon, Gilbert (1958).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aris: Aubier.

Slater, Philip (1970). *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Boston: Beacon Press.

Smith, Rebecca (1989). "AIDS Drug Trials." *Science*, Dec. 22, 1989.

Sontag, Susan (1969). "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Against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Dell.

Soviak, Eugene (1971). "Journal of the Iwakura Embassy," in D. Shively, ed.,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Japanese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Stover, Leon (1973). "Science Fiction, the Research Revolution, and John Campbell." *Extrapolation*, vol. 14, no. 2

Sturgeon, Theodore (1971). *More than Huma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Sugita, Genpaku (1969). *Dawn of Western Science in Japan*, R. Matsumoto and E. Kiyooka, trans. Tokyo: Hokuseido Press.

Suzuki, D. T. (1959). *Zen in Japanese Culture*. Princeton Univ. Press.

----(1973). *The Zen Doctrine of No-Mind*. New York: Samuel Weiser.

Swann, Thomas (1976). "The Master of Go." K. Tsuruta and T. Swann, eds., *Approaches to the Modern Japanese Novel*. Tokyo: Sophia Univ.

Szasz, Thomas and Hollander, Mark.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A.M.A.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XCVII.

Szilard, Leo (1961). *The Voice of the Dolphin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Tanizaki, Jun'ichiro (1977). *In Praise of Shadows*, Harper and Seidensticker, trans. New Haven: Leete's Island Books.

Teng, Ssu-yu and Fairbanks, John K. (1954).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Thompson, Paul (1983). *The Nature of Work*. London: MacMillan.

Treichler, Paula (1991). "How to Have Theory in an Epidemic: The Evolution of AIDS Treatment Activism," in *Technoculture*, C. Penley and A. Ross, ed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Van Wolferen, Karel (1989).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Vattimo, Gianni (1991). *The End of Modernity*, J. Snyder, tr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Warshow, Robert (1964). *The Immediate Experience*. New York: Anchor Books.

Watsuji, Tetsuro (1987). *Climate and Culture: A Philosophical Study*. Trans. G. Bownas. Greenwood Press.

Weber, Max (1949).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E. Shils and H. Fin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s.

Weckerlé, Christian (1987). *Du Téléphone au Minitel: Acteurs et facteurs locaux dans la constitution des Images et Usages Sociaux de la Télématique*. Two volumes. Paris: Groupe de Recherche et d'Analyse du Social et de la Sociabilité.

Whitehead, Alfred North (1939). *Scienc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MacMillan.

Whitfield, Stephen (1991). *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Williamson, Jack (1948, 1949). *The Humanoids*. New York: Lancer Books.

Winner, Langdon (1991). "Social Constructivism: Opening the Black Box and Finding it Empty," *Science as Culture*, no. 16, 1992.

----(1992). "Citizen Virtues in a Technological Order," *Inquiry*, vol. 35, nos. 3/4.

Yusa, Michiko (1991). "Nishida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sm," *Monumenta Nipponica*, vol. 46, no. 2.

Zimmerman, Michael (1990).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 Technology, Politics, Ar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后记

我与芬伯格先生的“相识”开始于两年前。那时，我正在写作一本关于马尔库塞的著作，在因特网上查阅资料时一头“闯”进了他的个人网页，他那做得相当漂亮的和内容丰富的网页一下子吸引了我，从此我们之间开始了“相知相识”，却不“相逢”的网络交往。我想，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的那本《马尔库塞》很可能是写不出来的。在此过程中，我更了解了热情的为人和学术品味，也被他的“技术批判理论”所折服。正如他在本书中译本序言中说的那样，“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如此深入地建立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之上，以至于各种激进的意识形态似乎都难以触及其根本。我们转而需要的是我称之为‘技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这样的东西，这是一种深入各种技术系统生活内部的批判，正是这些技术系统构成了我们世界的基础并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当对现代性的纯粹否定的批判把一切事物当作既成事实之时，技术批判理论却能够揭示各种未加探索的可能性。只有运用这样一种理论，我们才能开始破解这种既普遍又特殊的现代性悖论，同时又能开始破解理性和文化悖论。”

在开始接触和思考芬伯格先生“技术批判理论”时，我就有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愿望。其实，围绕现代技术的“批判”探索，芬伯格先生已经做了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出版了三本著作：《技术批判理论》（1991年）、《可选择的现代性》（1995年）和《质问技术》（Questioning Technology, 1999年）。在我看来，他最满意的是最后一本，在《质问技术》还没有正式出版以前，1998年夏天他就给我寄来了打印稿，并告诉我法文译本也正在翻译之中。只是后来我们与Routledge出版社的版权问题没有谈妥，中译本的事也就搁置下来了，但愿以后能有机会实现芬伯格先生的“愿望”。

其实，无论是讨论马尔库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观念，还是讨论芬伯格先生的“技术批判理论”，我都特别关注这些理论对中国“贴切性”（relevancy, 相关性）问题。芬伯格先生自己也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可选择的现代性》一书对中国现代化思考的相关度最高。因此，这本书能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认可实在是一件幸事。

但翻译《可选择的现代性》却是一件不那么轻松的事。因为读者只要翻翻目录就可以发现，本书涉及的主题和内容实在是太广了：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理论，从海德格尔到日本哲学家西田，从爱滋病到计算机网络，从法国到日本，从好莱坞科幻影片到日本围棋……一切与现代技术和现代性相关的东西无不在他思考的范围内。这无疑扩展了读者思索的空间和深度，但却给翻译增加了难度。我把本书的翻译比喻为吃了一块烫山芋，其中的滋味也许得等到日后才能体会，但历时一年多的翻译工作的确耗费了我们大量的心血。甘苦寸心知，别的不说，我们起码是尽了心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而在翻译中留下的缺憾只能由读者来帮助纠补了。

这里，我想就几个概念的翻译作一个说明。

Dystopia，一般译为“反面乌托邦”或“反乌托邦”。问题是这里的汉语中出现了“乌”，原来utopia一词翻译成“乌托邦”是非常贴切的，因为“topia”指地方，而“(e)u”本身从词源上讲具有双关特性：no（乌有，没有）和good（好，美好）之意，也即utopia（no-place，乌有之乡）和eutopia（good-place，美好之乡）之意。⁷⁷因此dystopia一词中似乎就不应该有“(e)u”（乌）的意思在里面，而应该突出其前缀“dys-”——“反常的”、“困难的”和“坏的”——意思。其实，在我看来，本书dystopia一词中的“dys-”主要也是在“(e)u”（“美好”）的反面意义上来使用的，加上在许多英文文献中还有“anti-utopia”（反面乌托邦或反乌托邦）这一概念，因此本书翻译中便把

⁷⁷ 参见温森特·乔夫冈：《乌托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第1页，伦敦，1987。另见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Dystopia 翻译成“恶（坏）托邦”。合适否，请读者评论，我们也希望能找到一个更确切的译法。

本书在大多数情况下把“code”一词翻译成“代码”，而 code 在英文中还有法典，法规，规则，准则，代号等多种其他含义。的确，芬伯格先生在本书中用 code 时常指“technical code”，确有技术“规则”之意，但他在本书第 1 章“待确定和公众干预”一节中指出：“我已经提出‘technical code’一词来描述技术的这些特征，它表现了盛行于设计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和信仰。和文化本身一样，这些 code 通常是看不见的，因为它们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参见本书第 11 页）这里似乎就不仅仅是技术“规则”的意思，而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加上我们现在看问题已经具有了一些所谓的“后现代”范式和话语背景，因此我觉得翻译成“代码”可能更好一些。李幼蒸先生在《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中指出：“自从信息论术语‘代码’（code）被借用到语言学、符号学和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中后，它遂方便地成为非语言的或含语言在内的‘语法’、‘逻辑’、‘规则系统’的代称和通称。对非语言或含语言的文化记号系统的描述首先即在于为有关系统规定基本记号单元和诸记号联结的规则系统。”⁷⁸ 这里引用李先生的研究成果确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嫌，但对本书所谈的“技术”这种非语言系统来说，我们把 code 翻译成“代码”也许更“方便”一些。

此外，像把 Technocracy 翻译成“技术专家治国论”，有时把 communication 译作“通讯”，有时译为“交往”，有时把 agency 译为介入，有时译为主体，等等，都是考虑了不同的语境。至于读者和专家能否认同，我们心里也没有底。如果有时间的话，本书的许多概念和语句的译法都还需要推敲，只是翻译过程实在拖得太久了。有一段时间，我最怕的是编辑汪民安先生的电话和芬伯格先生的电子邮件，汪先生总是问下星期或下个月怎么样，芬伯格总是问又遇到什么麻烦了。我知道他们是想尽快把这本好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芬伯格先生，他更想了解中国读者对他这本与中国现代化“相关”的书有何评价。当我对他原先为中文版所写的序中有关中医的问题表示有点“怀疑”时，他似乎也有点沮丧，改了两三次才最终确定现在的中文版序言。翻译工作一直得到他们的关照，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美国旧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哲学系教授有坂阳子(Yoko Arisaka)博士不厌其烦，给我发来了多封电子邮件解答翻译中的各种问题，并为我们校订了一些重要的日文概念和人名，她的热情和真诚令人感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学院王宏伟博士为本书翻译作了大量前期工作，日文人名的翻译也得到了他诸多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江怡博士也对本书科学哲学一些概念的翻译提出了宝贵意见。向他们表示谢意。

张文杰翻译第 5、8 章，龚伟翻译第 6 章，陈净涤翻译第 7 章，严耕翻译第 9 章，陈鸿雁翻译第 10 章，陆俊翻译序言、第 1、2、3、4、章，全书由陆俊、严耕统校。最后还必须向读者交待的是，为了我们翻译工作的方便，芬伯格先生给我们发来了本书的电子文本，它在个别地方与印刷版本有些差异，尽管我们在校阅时尽量按照印刷版本，但有些地方还是没有完全修正过来，敬请读者原谅。

陆俊

2001 年 5 月 20 日于北京科技大学

⁷⁸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 514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